

# 彭真年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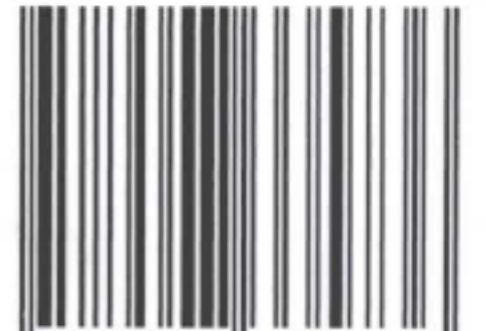
第四卷

《彭真传》编写组编

彭真

T17639

ISBN 978-7-5073-3573-6



9 787507 335736 >

定价：300.00元（全5卷）

# 彭真年譜

第四卷

一九六〇——一九七八

《彭真傳》編寫組編

中央文獻出版社

---

---

## 目 录

1960 年	.....	(1)
1961 年	.....	(90)
1962 年	.....	(166)
1963 年	.....	(237)
1964 年	.....	(313)
1965 年	.....	(384)
1966 年	.....	(458)
1967 年	.....	(494)
1968 年	.....	(499)
1969 年	.....	(503)
1970 年	.....	(505)
1971 年	.....	(506)
1972 年	.....	(507)
1973 年	.....	(508)
1974 年	.....	(509)
1975 年	.....	(510)
1976 年	.....	(513)
1977 年	.....	(515)
1978 年	.....	(518)

## 1960年 五十八岁

**1月2日** 将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右派分子摘帽子工作的报告》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核阅后，发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党组。此前，根据毛泽东指示，中央书记处已同意摘去在中央各机关工作的人员中属中央管理的三十人的右派帽子。上述报告下发后，各地在春节前摘去不属中央管理的一百一十二人的右派帽子。

△ 在当日收到的《中共山东省委转发四个养猪先进社、队的典型经验》上批示吴冷西：四个典型材料介绍的经验说明在平原产粮区、山区、沙地区和经济作物区，大养猪可以大增产，“请你们写个短评或者按语，并且改写和加上小标题在人民日报发表”。

**1月3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薄一波、李立三关于六个大区协作会议的情况汇报；讨论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发展情况的新闻公报稿；决定中央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

**1月5日** 晚，在上海锦江饭店。听取杨尚昆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六日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先看文件。

**1月6日** 上午，到杨尚昆处谈读《政治经济学教科

书》〔1〕问题。

△ 在公安部党组报送的《关于准备召开第十次全国公安会议的报告》上批：“刘、周、邓核示后退富治〔2〕同志。拟同意公安、高（法）院、高检在二月间召开全国工作会议。公安会议大体可以按此报告中所提的一九六〇年的工作打算准备。”

**1月7日—17日** 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李富春《关于一九六〇年计划和今后三年、八年设想》的报告后，确定了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讨论了今后三年和八年的设想。规定本年度钢产量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粮食产量为六千亿斤，提出八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过渡的设想。会议期间，讨论了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问题，漫谈了国际形势。十四日，听取林彪关于国防问题的报告，十五日，听取聂荣臻关于科学规划的报告及陆定一关于教育工作的报告。十七日下午，毛泽东讲话。会后，为继续跃进，创造所有制过渡的条件，各省市区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等。

**1月12日** 中共中央在批复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关于开展毛泽东著作学习运动提法问题的请示的批语中指出：青年中组织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在提正式的完整的口号的时候，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较为妥当。在为外国刊物写文章的时候，也可用这个提法。但在国内普通场合（包括演讲题目，文章和消息的标题等在内）可以用“学习毛泽东思想”。我们不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

---

〔1〕 指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

〔2〕 富治，即谢富治。

想”并列起来提，是避免人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误解为两回事；而正确的理解是，“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

**1月21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六十八次会议。会议讨论书记处的工作安排和上海会议的传达问题。在讨论传达范围时说：召开百万人的广播大会会耽误生产。会议决定分口、分片传达。

**1月23日** 将中共中央批转粮食部党组《关于在今后三年内争取把国家粮食库存增加到一千亿斤的报告》批送刘少奇、周恩来核阅后下发各省市区党委。

**1月24日** 和邓小平、李富春、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等乘专列离开北京赴广州。

**1月29日** 下午，周恩来在谈北京市的城市规划问题时指出：故宫保留，保留一点封建的东西给后人看也好。国家剧院应建在人民大会堂附近，还可以建一个宾馆，这样接见宾客、人大常委召开会议就方便多了，而且可以节省汽油。

**1月29日—2月4日** 和邓小平等在海南岛、湛江等地参观考察。二月四日，回到广州。

**2月5日** 晚，在广州杨尚昆住处，同周恩来、邓小平谈话。当时，遵照毛泽东的建议，一批中央领导同志集中在广州，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2月9日** 上午，杨尚昆来住处谈话。

**2月11日** 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听取康生关于莫斯科华沙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例会情况的报告，讨论康生报告中所提出的问题。

**2月13日** 和邓小平、柯庆施、李井泉到毛泽东处谈话。

**2月14日** 乘火车离开广州赴武汉。

**2月15日、16日** 在武汉听取中共湖北省委、武汉市委负责人汇报工作，参观工厂、长江大桥等。

**2月17日** 到达郑州。参观郑州北郊人民公社和郑州纺织机械厂食堂。

**2月18日** 参观花园口枢纽工程、郑州管城区街道人民公社。

**2月19日** 到达合肥。参观市容和安徽省博物馆。

**2月20日** 参观梅山水库。

**2月21日** 参观合肥特殊钢厂和小型化肥厂。

**2月22日** 参观蜀山人民公社、江淮人民公社、合肥矿山机械厂等。

**2月23日** 参观安徽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省农具改革展览会。

**2月24日** 上午，到淮南煤矿参观。下午，到达蚌埠。

**2月25日** 到达宿县。参观三八人民公社、淮海战役双堆集遗址。晚，到达济南。

**2月26日** 听取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晚，到达天津。

**2月27日** 上午，听取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工作。下午，回到北京。

**2月28日** 下午，和刘少奇、邓小平、李先念等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文化教育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

**2月29日** 出席北京市文教战线群英大会闭幕式。在会上讲目前国内国际形势，并希望大家在继续跃进中安排好工作、学习和休息，做到有劳有逸，使身体健康，精神饱满，以保证继续前进。



△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六十九次会议。会议听取薄一波、谭震林、李先念汇报当前工农业生产和财贸工作的情况，并作出相应的决定。会上询问了几个省农村的公共食堂情况。

△ 下午，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参加的联席会议和随后举行的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全国政协三届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联席会议。会议决定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于三月下旬召开，主要议程是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一九六〇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一九五九年国家决算及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全国政协三届二次会议同时召开。会议的开法，有分有合，代表发言可以分开，以增加发言人数。预计三月二十五日左右闭幕。

**3月1日** 出席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议并讲话。说：（一）关于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问题。毛泽东思想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对外宣传，正式完整的提法应按中央指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现在有一些人喜欢给毛泽东思想下定义、定位、排座次。如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列主义”、“学习马列主义要以毛泽东思想为纲”，这些都不妥当，不科学。马列主义是不断发展的，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分析得很透，列宁对帝国主义分析得很透。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我们党虽然提出了一些问题，如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否没有矛盾，人民内部有没有矛盾，政治挂帅和物质刺激，以及战争与和平、和平过渡等，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还只有几年，经验还不系统，我们在宣传、报道、写文章时，要谦虚谨慎，讲得恰当。学习毛泽东思想不要庸俗化，不要搞形式主义，到处贴标签。要名副其实，实事求是。（二）提高教学质量问题。要研究教学方法，不能

靠加班加点、多留作业、延长学习时间。学习不紧张不行，但要减轻学生负担，劳逸结合。要介绍教学方面好的经验，开现场会。中小学教员数量要适当增加，工资要注意上调。为培养师资，要扩大师范大学的招生名额。在刘仁讲到现在形式主义严重，开大会常常要学生去献词、献花时说：这类问题要向中央写报告。（三）人民生活安排问题。去年全国有六亿亩农田受灾，要充分估计灾情。郊区农民今年人均口粮三百七十斤，和别的省相比不算少。要把灾情向大家说清楚。困难是暂时的。城市食堂还是要一步一步地搞，城市食堂首先是参加集体生产的劳动者需要。资本家、教授、干部等不愿参加就不要勉强，物极必反。市场方面，现在日用百货供应没有问题，副食品、食品紧，只要安排好，不会出大问题，不要人为紧张。（四）干部问题。要注意把市级机关的干部和生产工作第一线的干部调换一下。现在有些领导干部，做工作不亲临前线。要注意提拔年轻干部。提拔干部要注意德、才。老干部身体不好的，可以保持级别、待遇不变，但不要妨碍工作。干部问题，要认真系统地研究。

**3月3日** 晚，出席柬埔寨驻华大使馆为庆祝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苏拉玛里特陛下寿辰和柬埔寨国庆举行的招待会。

**3月4日** 同北京市妇联城内各区的领导干部座谈组织城市居民生产和生活集体化问题。在谈话中说：各行各业现在只有街道居民尚未组织起来。他们中有私人医生一千多人，还有教打拳的，教小提琴的，做小买卖、搞家庭托儿的。把他们组织起来，生产、工作、学习、生活都有人管理。先把有积极性的劳动人民组织起来。第一是搞生产，包括医疗、修理、洗染、补鞋等服务项目；定工资，定价目。第二是生活，办食堂、托儿所等，以及一些代办业务。这样，劳动力解放，生活

集体化。不愿意吃食堂的，可以不入伙。一不登报，二不敲锣打鼓，实际做去。成立一个兼职的管理委员会，不要脱产干部。总结经验后，开大会介绍，可以树立起来一面旗帜。

**3月5日** 同刘仁、郑天翔、陈克寒等谈北京市农村工作。在谈话中说：如能达到粮食人均一千五百斤，养猪每亩地一头，有这两条，别的就带起来了。要逐社安排，订具体措施。市郊现已有社有制的公社十一个，要好好总结经验，加以巩固。再扩大，须经过市委批准。现在不要大搞社有制，那是主观的。干劲必须有，但要有科学分析。农村要办工业，公社一级都可以办。农业要实行机械化，耕作、灌溉、加工、养猪等等，都要实行机械化。各县要自己搞，自力更生。

**3月6日** 晚，和邓小平等出席刘少奇召集的会议，听取当天从广西回到北京的周恩来谈中印关系、中尼问题及其他与当前工作有关的问题。

**3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七十次会议。在谈到如何宣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时，同意邓小平的意见，认为这一时期马列主义提得少了，要注意。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真理越过了界限就会变成谬误。还有个人崇拜问题，对的就拥护，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凡个人与集体连在一起时，要把集体摆在前面。鼓干劲，中央报刊要防止宣传过头。（邓小平插话说：工青妇的报刊都要注意此事，不要把马列主义放在一边不宣传。“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提法不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段部分，还是以马、恩和列宁的论点为纲。社会主义部分，我们才搞了十年。宣传上要思前顾后，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是不可分的，是它的发展）在谈到干部调整时说：干部要提升，但机关不要搞大了，主要是加强第一线。

△ 下午，和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席首都各界妇女为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五十周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集会。并接见应邀出席大会的苏联、朝鲜、蒙古、匈牙利、日本等国妇女代表团和国际民主妇联的代表。

**3月8日** 晚，出席为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举行的招待会及首都妇女界两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联欢晚会。

**3月11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七十一次会议。会议讨论李富春准备向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所作的《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报告。周恩来参加会议。

△ 晚十一时至次日零时三十分，和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席刘少奇召集的会议。会议讨论与尼泊尔首相谈判两国边界的问题。

**3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七十二次会议。会议讨论李先念《关于一九五九年国家决算和一九六〇年国家预算报告（草案）》和李富春《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报告的第二稿。周恩来参加会议。

△ 下午，主持首都各界一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集会，欢迎尼泊尔王国首相柯伊拉腊和夫人以及随行人员。在大会讲话中说：中国人民愿意同尼泊尔人民继续携手合作，为促进亚非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共同做出更大的贡献。周恩来等出席大会。

**3月15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接见出席解放军工程兵第二届积极分子代表会议、解放军总直机关院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全国中小型高炉生产会议、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妇联召开的全国职工生活工作会议、第六次全国民政会议的全体代表。

△ 下午，约杨尚昆等开会，讨论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准备工作。

**3月18日** 和周恩来等观看莫斯科“斯巴达克”足球队和北京足球队举行的友谊赛，并接见了双方运动员。

△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准备提交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的《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提要》、《关于一九五九年国家决算和一九六〇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

**3月19日** 和周恩来等出席首都各界一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成立的集会，并接见来我国访问的拉丁美洲的学生、妇女、文艺界、医学界朋友及和平人士。

△ 和周恩来、陈毅等会见在我国访问的苏联、保加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印度、日本和塞浦路斯等国的外宾。

**3月20日** 晚十时至十二时，和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席刘少奇召集的会议。会议讨论中国尼泊尔两国签订边界问题和经济援助两个协定以及两国政府联合公报问题。

**3月21日** 下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会议上，就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议程和日程安排作说明：会期十一天，必要时延长一两天，全国政协委员列席会议。

△ 晚，和周恩来等出席尼泊尔王国首相柯伊拉腊举行的告别宴会。

△ 晚，和周恩来、邓小平等到刘少奇处开会。会议讨论毛泽东批示和中国同蒙古、朝鲜、越南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二十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报告中央政治局的意见，他准备在四月二十五日访问印度回来后，即去乌兰巴托，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好。当日，毛泽东批

示：“同意。似应抄送苏联、朝鲜、越南各一份，如朝、越愿意签订同样条约和具有军事援助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我想也是可以的。此意当否，请提向中央会议讨论决定。”

**3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七十三次会议。会议讨论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和出版列宁选集、列宁有关论述集，陆定一在各省市文教书记会议上提出的学术批判、教学改革、儿童教育以及少儿读物出版等问题。在谈到教育改革时说：现在要给学生一部分课余自由读书的时间。改革的关键，一是课本，一是教员。改九年制、十年制问题，到后面两年可以考虑分科，内容不一定都学一样的。现在对学前儿童有的管得太死，有的不管。

△ 晚，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集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开会，谈人大会议的发言安排问题。接着于八时三十分，主持召开电话会议，向各省、市、自治区有关负责人说明人大会议的开法和发言准备。

**3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七十四次会议。会议听取和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二年）补充计划和钢铁工业今后三年建设计划的汇报。周恩来、薄一波参加会议。

**3月24日、25日** 在天津，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薄一波、李先念、李富春，中央有关部门和华北、东北一些省委的负责人。毛泽东对当前工作提出十七个问题，其中主要是：（一）四化问题。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二）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问题。（三）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问题。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四）农村人民公社有的问题相当严重。一平二调、不守

纪律。县委也不管，省委更不管。（五）农业问题。主要是粮食问题。种植业同畜牧业要并重。（六）工业问题。主要是煤、铁。（七）小土铁路、小洋铁路问题。有煤有铁，就可以搞地方铁路。（八）工业交通系统、财贸系统、文教系统普遍支援农业问题。毛泽东还讲到地方自己办学校、完成“农业纲要四十条”，主要是“四、五、八”粮食亩产指标，以及“三反”等问题。讲话最后提出：我们这个社会“主要矛盾还是阶级斗争，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会议期间，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3月26日** 下午二时，和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林伯渠、董必武等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会议、后勤工作会议、全国邮电技术表演赛大会的代表，云南省各民族参观团的代表和中央团校第十一期全体学员。

**3月27日** 晚，和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李先念、李富春、薄一波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讨论李富春、李先念分别准备向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交的《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关于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和一九六〇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

**3月28日** 下午，在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就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议程草案作说明。会议定于三十日下午开幕。

△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参加并主持会议。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修改两个报告稿：一是《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报告》稿，二是《关于一九五九年国家决算和一九六〇年国家预算草案报告》稿。

**3月29日** 上午出席全国政协三届二次会议开幕式。

△ 下午，出席朱德主持的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预备会

议，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

**3月30日—4月10日** 出席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会议听取李富春作的《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作的《关于一九五九年国家决算和一九六〇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谭震林作的《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报告，并通过相应决议。会议还批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通过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的提案审查意见。

**3月30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徐冰在中南海颐年堂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商谈全国人大会议问题。

△ 收阅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毛泽东在文稿上批示：“如有意见，请加修改。争取在四月五日能发出（用电报），请尚昆办。”

△ 和周恩来、陈毅接见应邀参加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外国来宾、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

△ 审阅《人民日报》为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发表的题为《一定要继续跃进，一定能够继续跃进》的社论稿。三十一日社论发表。

**3月3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七十五次会议。会议决定出版《列宁选集》四卷本。在讨论中建议，选一篇列宁谈公社问题的文章编入选集。会议还讨论了省、市、自治区党委工业部的工作、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工作、克服“五多”〔1〕和科技保密等问题。

---

〔1〕 五多，指会议多、文件报表多、蹲机关多、事务多、一般号召多。



**3月** 在审改中共中央《对公安部党组关于加强保密工作报告的批示（草稿）》时加写以下内容：“今后所有没有公布过、没有人参观过的重要厂矿、水利工程、基本建设工地等都不得公布和随便开放让人参观，如果要公布和让人参观，中央管的企业要经中央主管部门批准；地方管的企业，要经省、市、区党委主管机关批准。”“各地党委对保密问题，今后一年要抓两次，认真地加以检查，并且要根据今后从严的原则，对失密、泄密人员，从严处理。”公安部党组的报告及中央保密委员会所拟《关于保守国家机密问题的暂行规定（草案）》均成稿于一九六〇年三月五日。

**4月1日** 下午，和刘少奇、朱德、董必武、林伯渠等先后接见出席北京部队先进集体和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和出席中直机关第三次积极分子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

**4月2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七十六次会议。会议讨论谭震林准备向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的《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报告稿。周恩来等参加会议。

△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七十七次会议。会议讨论国家计委提出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一九六〇——一九六二年）补充计划要点（草稿）》。周恩来等参加。

△ 同刘仁等谈试建城市人民公社问题。指出：城市建立人民公社与农村不同。农村以农业为主，所有制比较简单，劳动管理经验比较多，但城市情况复杂。北京市如何搞？（一）关于公社的范围。暂时不要打乱原来系统，大体上和派出所、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的管辖范围相符合，便于管理。（二）

先组织“贫雇农”〔1〕，其他的坚决放在外边。组织形式可以不同，有生产小组、工厂，这些都是柱子。也可以领了活回家去干，只要围绕生产组织起来就好，服务业也是生产。不愿意参加的人暂不进来好。所有制全民、集体都可以。公社生产工资不宜过高。（三）派一点干部到公社、街道去。要立账，会计要纯洁可靠的。（四）学校、商店、财贸系统的基层单位，以不下放为好，试点可以。国营工业的产品一般下放到地方国营工厂生产，不能把全民所有制降到集体所有制，不能退步。（五）公社要有一点经济基础，积累要搞一点，否则生产巩固不了，也不能发展。国家可以拨一点周转资金，但不要造成依赖心理。（六）城市公社用房很困难，除了生产用房，还要办托儿所、食堂。进城后我们盖工厂、职工宿舍不少，但街道民房拆得多、盖得少，老百姓不满意。建中小学和民房少，这是群众观点最不够的地方，要作为中心工作之一来抓。要突击盖一批生活用房，包括几层楼的宿舍。借机把易燃危险的工厂迁出市区。机关食堂要与街道的分开办，免得彼此有意见，等到街道食堂逐步提高到机关食堂标准，矛盾就少了。试办阶段，资本家先留在公社外边，我们把队伍整理好，然后坚持自愿的原则，吸收他们参加。看半年再说。

**4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七十八次会议。会议讨论修改谭震林准备向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的《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报告稿，决定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审定。周恩来参加会议。

△ 召集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东城、西城、崇文、宣武、朝阳五个区的区委第一书记开会，研究如何确保一九六

---

〔1〕 指城市中经济条件一般的职工家属和其他劳动人民。

○年修建一百万平方米居民住房的问题。提出以下意见：（一）五个城区当年各修建十五万平方米的居民住房（包括商业、服务业用房）。建房地地点由各区委会同规划局商定。（二）由区委挂帅负责建筑这批居民住宅。市建工局应于一周内为五个区各配备一个约有两千人的施工队伍。（三）市房管局应把当年修建一百万平方米周转房的投资和材料的一半拨给各区。住房建成后，由区委负责分配，市、区机关不得占用。（四）市规划设计部门应该下放一部分技术干部给各区专搞规划设计工作，由区委和规划局双重领导。（五）各区委应该尽量采取“小土群”、“小洋群”的办法，单独或者联合，或者和农村人民公社合作在国家计划之外，自力更生地生产生铁、钢材、水泥，争取多修建一些居民住宅。（六）有些现已成片建新房、只剩少量零星旧房的地区，应该有计划地拆迁，进一步改变这些地区的面貌。（七）从明年起，要用新建的居民住宅作为周转房，依靠原有的施工队伍，按照公社生活的要求，有计划地分期、分批改建居民区。四日，市委确定由赵鹏飞负责此项建房工程。

**4月4日** 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国家计委党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二年）补充计划要点（草稿）》和谭震林准备向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的《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报告稿。

**4月6日** 致信毛泽东：下午人大和政协共同举行座谈会，听取了吴振〔1〕等关于我国农业展览馆在新德里展出情况

---

〔1〕 吴振，时任农业部宣传局副局长、北京农业展览馆馆长。

的报告〔1〕，现将他们的讲话稿送上一阅。

△ 晚，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在中南海颐年堂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讨论周恩来出访缅甸、印度、尼泊尔等国问题。

**4月7日** 和刘少奇、邓小平收到中共中央转发的江苏省六级干部大会报告和毛泽东的批示。报告反映与会干部经过讨论认识到发展社有经济，必须建立在发展队有经济的基础上，靠“一平二调”、刮“共产风”是行不通的。毛泽东批示：“干部会议开得很好”，请杨尚昆用电报发给各省、市、区党委。

△ 晚，在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扩大会议上发言：（一）大会代表报名发言已经讲了二百八十七篇，未讲的还有一百零九篇，会议延长两天。（二）部分代表的发言涉及一些科学技术尖端机密，登报发表时，已删去有关的内容，特向主席团报告。

**4月8日** 上午，和朱德等前往机场迎接来我国访问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巴扬勒·贾尔卡赛汗率领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代表团。

△ 晚，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讨论周恩来出访印度等国家的有关文件和周恩来准备在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关系的报告的新闻稿等。

**4月9日** 下午，和朱德等陪同巴扬勒·贾尔卡赛汗和他

---

〔1〕 我国农业展览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一日至一九六〇年二月二十九日和苏联、美国等国在印度新德里同时展出。报告反映印度人民热烈称赞我国的建设成就。

率领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代表团，出席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巴扬勒·贾尔卡赛汗主席应邀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刘少奇、宋庆龄、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出席大会。

△ 下午，和陈伯达、陆定一、康生等出席邓小平召集的会议，讨论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的文章和出版《列宁选集》及列宁有关论述集等问题。

**4月10日** 上午，出席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全体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关系的报告。下午，出席大会闭幕会。

**4月11日** 晚七时，和陈伯达、陆定一、康生、胡乔木、杨尚昆等在中南海居仁堂出席邓小平召集的会议，讨论《红旗》杂志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的社论《列宁主义万岁》。

**4月12日** 上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陈毅等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讨论周恩来出访缅甸、印度、尼泊尔三国和粮食、棉花问题。

△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七十九次会议。周恩来参加会议。会议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关于棉花、棉纱、棉布、针织品一九六〇年和今后的生产分配方针。会议还讨论了今后五十天的粮食安排问题。在讨论到八月要开展农村“三反”运动时说：农村“三反”农忙时坚决不搞。

△ 晚，在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上讲当前农村工作。主要讲了四点：（一）产量问题。两年多来，人民公社修了水渠，平整了土地，市郊今年粮食生产能否争取达到二十一亿斤，甚至更多，要认真研究。（二）关于所有制过渡问题。经过整风、社教，有人主张把大队所有制过渡到公社所有制，这是好的。但是所有制过渡需要好好地发展生产，一是社员收入

要达到人均一百五十到二百元；二是社有经济在纯收入中要占到一半。还有其他条件。不够条件，不要急于过渡。现在的问题是要积极发展生产，创造条件，公社、大队、小队都要积极发展生产。但是，社有经济的发展不能靠“平调”。已经“平调”的要退回去。总之，不能损害生产队的利益和社员的积极性。（三）关于“三反”问题。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有一部分干部违法乱纪，贪污，必须进行“三反”。要把工作布置好，抓紧工作搞“三反”。（四）归并核算单位问题。规模过小的生产队，适当合并是可以的，但是要经过穷、富队社员的同意。为慎重起见，回去要召开一次五级干部会议，多找一些穷队和富队的干部、社员商量，不要只听大队干部的意见。

**4月13日** 上午，和宋庆龄、董必武、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去机场为出访缅甸、印度和尼泊尔的周恩来送行。

**4月14日** 上午，出席邓小平召集的会议，讨论关于列宁论帝国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言论的选录。

**4月15日** 晚，和邓小平等出席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举行的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的电影晚会。

**4月16日** 下午，出席邓小平召集的会议，讨论陆定一主持起草的拟在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稿《在列宁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4月18日** 晚，在中南海居仁堂出席邓小平召集的会议，讨论拟在二十二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的文稿。

△ 将中央统战部代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资产阶级分子的高薪、病假期间工资和“退职退休”等问题的指示》稿报送毛泽东、邓小平和李富春审阅后发。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

该指示，并告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对资产阶级分子的高薪、病假期间工资和“退职退休”问题处理的三点办法〔1〕，“少奇同志已经在这次民建会、工商联两会代表大会期间，向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宣布了，各地应该贯彻执行”。

△ 和朱德、林彪、宋庆龄、董必武、邓小平等出席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开幕式。

**4月20日** 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报告城市人民公社的工作情况。报告说：北京市已建立城市人民公社二十五个，现已将街道未就业、就学人口三十三万中的二十六万人（占百分之七十九）组织起来搞生产。其中，集中生产的工厂八百多个，容纳十万多人，生产小组一千九百多个，约三万多人，分散生产的小组二千二百多个，约五万多人，临时工等二万多人，服务业人员约五万人。生活方面，参加集体食堂的二十二万人，入托儿所的十一万人。未加入城市公社的是多子女的母亲、顾虑较多的干部和职工的家属、老弱病残、资本家、高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家属、退职的旧官吏，及少数五类分子及其家属，合计约占街道未就业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公社社员的月工资，老社员（一九五八年建立公社入社的）平均

---

〔1〕 三点办法是：一、继续贯彻高薪不变的政策。一九五八年下半年以来，因调动工作、职务，或因下放而减了薪金的，一般应恢复其原薪，并把被减掉的薪金额补发给他们。二、病假期间的工资，应按国务院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一日《为贯彻私方人员病假期间工资支付办法的通知》办理，对于股金在两千元以上的私方人员，只要确有困难，病假期间，可以参照股金两千元以下私方人员病假期间工资支付办法，发给本人工资的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七十。三、对于年老、体弱、多病的人，目前暂不采取退职退休的办法，可采取准假的办法，请假时间不加限制，薪金照发。

二十三元左右，新社员平均十五元左右。今年第一季度工业产值和加工费共一亿七千万元，预计全年可达十亿元左右。试建城市公社的基本经验是：先组织生产，后组织生活；先吸收经济上有需要、政治上有觉悟的人入社，逐步动员其他有积极性的人参加；不要贸然打乱城市政权的组织系统，如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及派出所等；一般不同机关、工厂、大专院校合起来办，因为所有制不同，福利补贴的来源和标准及生活水准不同，但是在工矿区，街道居民多系职工家属，可以建立以工矿为中心的公社。市委计划，待已建公社整顿巩固后，今年再发展一批，达到未就业、就学居民的百分之九十，再进一步达到百分之九十五左右，使城市街道基本上公社化。五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将这个报告转发各地，并批示：“报告中所提出的政策、步骤等问题，对目前正在发展城市人民公社的地区是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可“参照执行”。并强调了大集体和小自由的问题，重申“只注意集体，要求什么都集体，不允许小自由是错误的，这一点特别在城市人民公社的工作上要十分注意”。

**4月22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八十次会议。会议听取张经武关于西藏工作情况的汇报，并通过相应决定。在讨论西藏工委提出要增调干部入藏时，发言说：数量不宜太多。

△ 下午，主持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朱德、林彪、邓小平、宋庆龄、林伯渠、董必武及干部群众一万人。陆定一作题为《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报告。

△ 《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等文，提出高举



列宁的革命旗帜，批判“现代修正主义”。

△ 晚十时三十分，和邓小平、杨尚昆、伍修权去钓鱼台毛泽东处谈古巴问题、阿尔及利亚问题和越南问题，并向毛泽东汇报了今年“五一”节实行分散庆祝，不搞游行的打算。

**4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八十一次会议。会议听取并同意薄一波关于省、市、区党委工业书记会议〔1〕的情况汇报。讨论时说：工矿企业中的计件工资改成计时工资的办法，可以让群众评议一下。又提出，现在会议太多，干部根本下不去工作。农村“三反”今冬明春搞，九、十月前各省先搞典型，不普遍开展。

△ 下午，和毛泽东、朱德、林彪、邓小平、宋庆龄、董必武等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出席全国民兵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

△ 下午，在中南海居仁堂听取徐冰和平杰三汇报统战工作座谈会情况。讨论时说：阶级立场、世界观的改变谈何容易，须通过头脑，一步一步地实现自我改造。对愿意接受改造的，要给以时间。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正在形成中，但是还不占据主导地位。又指出：阶级斗争一张一弛是个规律，目前阶级关系紧张是他们跟不上形势，而不是反对社会主义，是“跟”不是“反”。对资产阶级应当采取主要方面抓紧，次要方面放松的方针，工作上要他们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生活上要适当照顾。

**4月24日** 下午，和邓小平等到机场迎接古巴人民社会党总书记布拉斯·罗加及其夫人一行。次日晚，和邓小平等参

---

〔1〕 这次会议于一九六〇年四月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大抓生产、推广新技术等问题。

加朱德举行的欢迎布拉斯·罗加夫妇的宴会。

**4月26日** 下午，在钓鱼台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讨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问题。

**4月27日** 下午，和邓小平、康生、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等到毛泽东处谈话。次日凌晨二时，毛泽东离京去天津。

**4月28日** 下午，出席首都各界六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集会，声援南朝鲜人民反对当局血腥屠杀和镇压的爱国正义斗争。

△ 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提交关于北京市职工教育问题的书面报告。报告说：三月份，毛泽东在天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督促地方和大厂要抓教育，办职工大学和中学。北京市通过检查，全市一百零二万职工中，有必要和有条件接受业余教育的职工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其中包括青壮年文盲、半文盲十八万人。全市兴办了由大型厂矿挂钩新办和扩办的业余大学十七所，业余中专学校三十多所；四个城区和四个近郊区办业余大学十一所，业余中专十九所，电视大学一所，参加学习的人数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八。主要问题是专业教师严重不足，师生比例为一比二百二十四；再是平均出勤率只有百分之七十九，有的缺课占一半，需要切实抓紧巩固和提高。

**4月30日** 晚，和朱德、宋庆龄、董必武、林彪、邓小平等出席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宴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出席宴会的有来自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三千多位中外来宾、各国驻华使节和帮助我国建设的各兄弟国家、兄弟党的专家。贺龙在宴会上讲话。宴会结束后，宾主参加了联欢晚会。

**5月1日** 和邓小平等，分别到北京工人体育场、北海公

园、景山公园、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等场所，同群众一起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 和朱德、林彪、邓小平、董必武等同各国外宾在天安门城楼欢度“五一”之夜，并接见了来自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

5月2日 上午，和邓小平等到机场为古巴人民社会党总书记布拉斯·罗加夫妇离京回国送行。

5月3日 下午，和聂荣臻、贺龙、罗荣桓、康生等出席邓小平召集的会议，讨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军事部分的注释问题。

△ 经邓小平核阅后电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同意你们四月二十六日电的意见，把‘三反’工作推迟。”

5月4日 上午，和谭震林、康生、胡乔木、罗瑞卿等出席邓小平召集的会议，继续讨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注释问题。

△ 下午，参加首都各界五万多人在北京故宫太和殿广场举行的支持土耳其人民爱国正义斗争大会。

5月5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八十二次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对公安部党组《关于开展保密检查运动加强保密工作的请示报告》的批示等文件。会议决定：（一）中央保密委员会由谢富治、杨尚昆、宋任穷〔1〕、赵尔陆、韩光〔2〕、萧华、杨奇清七人组成，谢富治任主任。（二）中央各机关出版的科技刊物种类太多，对保密不利，要坚决停掉三分之二。（三）由彭真召开中央和北京市各机关领导干部

---

〔1〕 宋任穷，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

〔2〕 韩光，时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会议，吸收中央机关各刊物主编参加，传达中央指示精神，督促各机关认真做好保密工作。会议还讨论了其他问题。在谈到学生劳动时间问题时说：共青团、少先队的思想工作做得不错，但还要注意身体，少先队员要保证每天九小时的睡眠。

**5月初** 观看北京京剧团演出的历史剧《凤凰二乔》。在和马少波〔1〕等谈话时指出：新编的历史剧很好，可以帮助观众和青年们熟悉历史，增长智慧，鼓舞斗争精神，培养优良的思想品质，是人们所需要的。现代戏也可以搞。京剧《白毛女》我是赞成的，但艺术性还要提高。在北京成立川剧团、越剧团要考虑，把一流演员集中在北京，地方有意见。可以轮流进北京演出。又说：戏曲演员下乡，劳动要适量，可以联系群众，辅导文化工作。有些名演员在广场演出，要注意保护嗓子。

**5月6日** 和林彪、邓小平等参观北京第一机床厂。

**5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八十三次会议。会议讨论决定：（一）《人民日报》要发表社论，支持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对美国飞机侵略苏联领空的谴责。（二）同意国家经委党组关于加强物资供应工作和建立物资管理机构的请示报告。

**5月8日** 上午，和朱德、林彪、邓小平、谭震林等参观石景山钢铁公司、农业大学等。

△ 晚，和朱德等在政协礼堂出席首都各界人士同在北京的捷克斯洛伐克同志一起举行的集会，庆祝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解放十五周年。又和朱德等会见了约瑟夫·奥巴夫斯基团长率领的捷克斯洛伐克友好代表团。九日晚，和朱德、林彪、邓

---

〔1〕 马少波，时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小平等出席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布希尼亚克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5月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八十四次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做好粮食分配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劳动力安排的指示》。在讨论农村“三反”运动文件时，建议加上“要利用农事间隙时间”进行。在讨论粮食问题时又说：今晚粮食调度电话会上，要强调一下，这一个月里各地无论如何要消灭浮肿病，“无论如何不能再死人了。”

△ 下午，和邓小平等出席首都各界一百多万人为支持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而举行的示威和集会。会议由郭沫若主持。

△ 在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的工业交通五级干部会议总结大会上讲话。总结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讲话强调：要把群众路线和技术革命相结合；要政治挂帅，人人动手，但不搞人海战术；“小土群”是群众路线的组成部分；必要的苦战和劳逸结合，保证劳动者有八小时睡眠；取消计件工资，但要照顾群众利益；并强调工业支援农业，城市支援农村，推进农业的机械化，以及利用超声波新技术等。这次会议五日开始，总结和交流了全市以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经验，要求各厂矿企业上半年争取完成全年计划的一半，在原材料、燃料紧缺的新形势下，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大搞综合利用，保障全年“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

△ 批转《内务部关于第六次民政会议的报告》并告钱

瑛、吴德峰〔1〕：“你们的报告，我略有修改。”另对四月二十九日钱瑛来信提出关于生活困难群众的医疗补助等问题，经征询卫生部党组意见后答复钱瑛：卫生部党组认为原有的规定是有理由的，因此暂时不改变旧办法为好。将修改后的报告及卫生部的批复意见“先送钱、吴阅后再送邓、谭、习〔2〕核阅后发。”

**5月11日** 下午，和罗瑞卿、廖承志在中南海居仁堂参加邓小平召集的会议。

△ 和贺龙等观看苏联哈萨克共和国体育学院男子篮球队同北京青年男子篮球队举行的友谊比赛，并接见双方运动员。

△ 审阅并批转五月十日文化部党组上送中共中央的《关于调整报刊、图书、课本出版用纸的请示报告》。批示周扬应在报告中把出版物过多、有的粗制滥造、发行数很少不受读者欢迎等方面的情况也补充进去。

**5月12日、13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八十五次会议。会议决定：（一）对于现代修正主义和半修正主义要继续进行公开批判。（二）基本同意李富春关于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二年三年计划要点的汇报。当讨论到工作要冷热结合时发言说：各部现在既要抓政治，又要搞业务，但机构编制和计划越做越大的做法，实际是违反多快好省原则的。在谈到企业布局时说：关于布局要在计划中写一段，特别是大企业包钢、上钢，要配架子，指定地区建立新的，这样就落实了。

**5月13日** 下午，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有关同志和杨奇清谈保密问题。

---

〔1〕 吴德峰，时任国务院政法办公室副主任。

〔2〕 邓，指邓小平。谭，指谭震林。习，指习仲勋。

**5月14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共中央机关和国务院机关纠正“五多”和加强保密问题的报告会。到会七百余人。在会上讲话指出：在保密工作方面，当前首先要抓好以下工作：一是教育干部，克服麻痹思想；二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一九五八年的十二万增加到二十万人，人员要进行审查；三是书记处决定，各部门的刊物砍掉三分之二；四是大企业、大油田、大水库以至国防基地等的参观、报道要经过批准。关于“五多”问题，小平同志在工业书记会上曾说，“罪魁”是中央各机关，文牍主义、官僚主义，中央有责任。上面会议、文件、报表多，下面忙于应付，连公社书记一个季度也只有十几天时间在基层。这样搞下去，要亡党亡国的。因此，各部门要检查一下。书记处商定，今后召开全国性的会议，工交系统李富春批准；农林水系统，谭震林批准；财贸系统，李先念批准；工青妇各单位，刘澜涛批准；中央各部委的会，中央书记处批准。各部发的文件，由部长批准。所有的统计表，由统计局综合一下，由计委批准下发。这样，才能使干部从“文山会海”中解放出来，深入基层。

**5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八十六次会议。会议决定：（一）同意朝鲜劳动党中央关于一旦有可能进行南北朝鲜的贸易时，我国应给予物资支援。（二）关于在北京市建筑首脑机关隐蔽部和地下铁道的问题，由罗瑞卿、杨尚昆和北京市委负责同志共同研究提出规划，报书记处审议。在谈到教学改革时说：今年大专学校招生不要降低水平。在谈到群众的发明创造时说：有奇迹不要泼冷水，但不要吹。

△ 下午，会见捷克驻华大使布希尼亚克。谈到和平共处时说：美国在财政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扩充军备，他们在社会主义阵营周围建立了许多军事基地，这哪里像是和我们和平共

处？我们要准备两手，既要争取和平，同时要准备对付可能发动的战争。谈到对民族资产阶级当权的国家时说：我们同他们既团结又斗争。他们反帝的一面，我们支持；他们反动的一面，我们斗争。总之，我们要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去决定政策，而不能凭主观愿望。

**5月17日** 上午，和宋庆龄、朱德、林彪、邓小平等到机场迎接访问缅甸、印度、尼泊尔、柬埔寨和越南后回国的周恩来、陈毅一行。

△ 上午，和陆定一、王稼祥、吴冷西等出席邓小平召集的会议，谈四国首脑会议〔1〕的一些问题和周恩来访问印度等国的情况。

△ 下午，和朱德、林彪、邓小平等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出席解放军装甲兵第一届参谋工作会议、北京空军第三届先进集体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以及出席全国农村统计工作经验交流大会的全体代表。

△ 下午，出席邓小平主持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参加的会议。会议研究最近的国际形势；听取周恩来访问印度等国的情况。

**5月19日** 下午，和贺龙等出席首都各界一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集会，欢迎以克里姆·贝勒卡塞姆副总理为首的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团。在大会讲话中强调：我

---

〔1〕 四国首脑会议，指一九六〇年五月十六日，苏、美、英、法四国政府首脑在巴黎举行的会议，讨论苏美在欧洲进一步缓和关系和寻求解决重大国际问题的途径。会议期间，赫鲁晓夫要求艾森豪威尔对一九六〇年五月一日美国U-2高空间谍飞机侵入苏联领空事件公开道歉，遭到拒绝后退出会场，四国首脑会议宣告流产。



国人民和阿尔及利亚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共同斗争中，是互相支持、互相鼓舞的。

△ 晚十二时许，接杨尚昆从南昌来的电话，传达毛泽东关于要在全国各地举行群众集会，支持苏联对四国首脑会议的立场的指示。

**5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八十七次会议。会议讨论：（一）请张治中出面给台湾蒋介石写信说明中共中央对台湾的政策问题〔1〕。（二）讨论并修改邓小平当日下午在首都各界人民支持苏联、反对美帝国主义破坏四国首脑会议立场的集会上的讲话稿。

△ 下午，和周恩来、朱德、宋庆龄、林彪、邓小平等参加在天安门广场和各分会场举行的首都各界三百二十万人的集会，支持苏联正义立场、反对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邓小平在会上讲话。

**5月21日** 下午，和朱德等到首都机场迎接来访的丹麦共产党主席耶斯佩森和夫人。

△ 在南方日报社《关于泄密问题的初步检查》上批示龚子荣，请龚告中央机关所办九个刊物的主管部门，认真检查，防止泄密事件再发生。

**5月22日** 下午，和朱德、林彪等在中南海接见出席全

---

〔1〕 张治中给蒋介石的信中，主要说明中共中央对台湾的政策：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具体是：（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陈诚、蒋经国亦悉由蒋意重用。（二）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三）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之同意后进行。（四）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

国财贸部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表演大会的代表和出席纺织工业全国厅局长会议的全体人员。

**5月23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参加的会议。会议听取邓小平传达二十一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在杭州就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后的局势问题同金日成会谈的情况和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的会议上的讲话。

**5月24日** 上午，和朱德、邓小平等会见并宴请丹麦共产党主席耶斯佩森及其夫人。

**5月2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八十八次会议。会议决定：（一）拟于六月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增加罗瑞卿等十人参加。（二）汇集有关工交企业发生工伤事故和农村发生浮肿病、饿死人等情况的材料，以便在扩大会议期间同有关省、市、区第一书记进行研究，吸取教训。（三）指定郑森禹〔1〕代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

**5月26日** 下午四时，和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在怀仁堂接见出席解放军全军文化教育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炮兵院校政治工作会议、空军直属机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参加全国职工文艺会演的全体人员、出席第一届全国盲人聋哑人代表会议以及全国海关第二次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的代表。

**5月27日** 上午，和朱德、邓小平等到机场为出访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周恩来、陈毅等送行。

**5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八十九次会议。

---

〔1〕 郑森禹，时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秘书长。

会议决定将国家计委党组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准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补充计划建议的报告》等文件，立即印发参加扩大会议的人员先行研究和征求意见。

△ 收阅中共中央《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稿，请邓小平、李富春核阅后发出。

**5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九十次会议，讨论安排有关林伯渠的治丧问题。林伯渠是当日逝世的。

△ 下午，和刘少奇、宋庆龄、邓小平等到北京医院向当日逝世的林伯渠遗体告别。三十一日下午，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林伯渠灵堂守灵。六月二日，参加首都各界万人祭奠林伯渠的仪式。

△ 下午，和邓小平等参加刘少奇召集的会议，研究拟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工联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有关问题。

**5月30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九十一次会议。会议基本通过国家计委党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补充计划建议的报告》。

**6月1日** 上午，和朱德、宋庆龄、邓小平等到机场迎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后回国的周恩来、陈毅等。

△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董必武、邓小平等出席全国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并一同接见大会主席团的全体成员。

**6月2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董必武等到机场欢迎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晚，陪同刘少奇会见哈奇·列希。

△ 在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上，贾星五传达彭真看了北京

市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工作报告稿后讲的一些意见：关于工业，几年来全市工业的增长不止百分之四十，报告中要举几个不保密的例子。当前搞技术革新，要强调一下原材料、多种经营、综合利用问题；质量不好的产品不要出厂。农业方面，要着重讲自力更生道路，用“小土群”、“小洋群”的办法，搞机械化、半机械化，武装农业。北京城内有些房子过了“年龄”，要争取尽快改造好。教育要突出讲学生参加劳动的必要性，培养一批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但要强调劳逸结合，关心学生的生活，保证睡眠时间。要讲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

**6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九十二次会议。会议讨论六月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具体工作安排；决定会议期间，彭真留北京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

△ 晚，出席刘少奇为欢迎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举行的宴会。

**6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苏共中央六月二日的来信。信中提议：六月间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就美国破坏五月中旬在巴黎举行的美、苏、英、法四国首脑会议后的国际形势交换意见。书记处同意召开这次会议，但认为会议需做充分准备，不同意六月召开，建议十月革命节前后，最早也得在八月份开，并成立中苏两党联合起草小组。给苏共的复信可在上海会议后定稿发出。

△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都各界一万多人欢迎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和全体阿尔巴尼亚贵宾的集会。在大会讲话中指出：“美帝国主义在破坏了四国政府首脑会议以后，尽管大谈

所谓‘和平努力’，表示愿意继续同苏联谈判，实际上却到处制造紧张局势，疯狂加紧扩军备战。”“这是值得全世界人民高度警惕的。”

**6月5日—9日** 世界工会联合会第十一次理事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五十八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会代表。

**6月5日** 上午，杨尚昆从杭州来电告邓小平：关于召开兄弟国家党的会议问题，毛主席的意见是：提议改期在十一月七日举行世界各国共产党会议，六七月份我们有事，不能参加。如果同意，则八月派代表去苏联，共同起草文件。此事最后要在上海会议决定。八日，电告在上海的杨尚昆：六日苏共中央又来信，所提会议已决定推迟，征求我党中央意见。

△ 晚，和朱德、邓小平等出席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的招待会，招待全国文教群英会代表。

**6月6日** 批示发出李先念关于给京、津、沪、辽紧急调粮的电报。

△ 同在杭州的杨尚昆通电话，谈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工会联合会第十一次理事会的情况〔1〕。

△ 晚，和李先念、习仲勋、刘澜涛、林枫等出席周恩来

---

〔1〕 世界工会联合会第十一次理事会的情况，是指由苏联工会代表、苏共中央委员格里申准备的世界工会联合会第十一次理事会的报告草案中，对中国的人民公社、大跃进和大办钢铁都加上了引号，因此在理事会内部产生意见分歧。经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同格里申协商，谈妥邀请世界工联执行局十个国家的党员委员（代表），加上七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员代表交换意见，以便取得一致，从而在公开的会议上不谈分歧。参加者名单是刘宁一同格里申协商确定的。但是在通知的时候，七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没有被通知到。这次会议未能取得一致意见。

为世界工会联合会第十一次理事会会议代表举行的宴会。

△ 晚十一时十五分至次日晨四时三十分，召集刘澜涛、胡绳等有关人员讨论世界工联理事会的工作方针和修改有关的讲话稿。

**6月7日** 晚十时至次日凌晨一时四十五分，召集有关人员在中南海居仁堂谈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情况，讨论修改刘长胜、李颀伯两人在会上的发言稿。

**6月8日** 下午，在住地听取刘宁一汇报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情况。晚八时四十分至次日凌晨一时十五分，在中南海居仁堂同刘澜涛、刘宁一等有关人员继续讨论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情况。

**6月9日** 上午，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集有关人员讨论对兄弟国家党的会议准备材料。

△ 晚，杨尚昆从上海来电话告知：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彭真、康生、王稼祥出席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同时参加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兄弟党的会晤。

△ 晚，出席首都一万多名工人举行的集会，欢迎参加世界工联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各国代表，庆祝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的召开。

**6月10日** 审改《关于北京市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北京市一九五九年财政收支决算、一九六〇年财政收支预算草案的报告（草稿）》。

**6月11日** 和王稼祥等到达上海。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代表团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并与到会的兄弟党会晤等问题。毛泽东估计，这次去布加勒斯特开会，赫鲁晓夫一是可能要整我们，二是可能拉我们，要做两手准备。这次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上苏方代表团团长态度恶

劣，值得警惕。经讨论，毛泽东将商谈结果归纳为六句话：坚持团结，坚持原则，摸清情况，后发制人，据理辩论，留有余地。

**6月12日、13日** 在上海，主持起草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时的贺词、贺电及祝酒词稿，经邓小平阅正后，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十三日返回北京。

**6月14日** 电示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途经莫斯科时，愿与苏共交换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会议的意见。并告刘晓：最近时期，我党中央已将我党和苏共之间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分歧意见和最近在北京召开世界工联第十一次理事会议期间的斗争情况，告诉了正在访问中国的阿尔巴尼亚列希主席。“估计在莫斯科的会见和在布加勒斯特的交谈，将有一番尖锐的争论。”

△ 晚，接杨尚昆从上海来的电话，得知王稼祥因病不能随中共代表团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改由伍修权去。

**6月15日** 下午，召集康生、伍修权、刘宁一等谈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问题。

**6月16日** 上午，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乘飞机取道莫斯科前往布加勒斯特，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当日，到达莫斯科。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是：康生、伍修权、许建国〔1〕。

**6月17日** 下午三时至晚十一时二十分（莫斯科时间），率领中共代表团在苏共中央大厦同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科兹洛夫等进行会谈。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在座。会谈一开始，询问

---

〔1〕 许建国，时任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

苏方，借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机会，讨论召开兄弟国家党的会议的准备工作，要讨论哪些问题？会前要做什么准备？苏方提出苏共中央要求“谈谈苏中两党的相互关系问题”，并对中国共产党关于时代的性质、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兄弟党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原则立场，以及有关中国的国内政策、“双百”方针、经济建设及中印关系等方面的问题，一一加以指责。当即依据中共中央的原则立场，一一加以阐明，澄清事实，批驳其指责。双方轮番声辩，会谈长达八个多小时。谈话最后说：我们两党应该团结，而且可以团结。在一些问题上有些分歧，交换意见后是可以取得一致的。兄弟党之间，特别是中苏两党之间，应该经常交换意见。

**6月19日** 上午，率中共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当日抵达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

**6月20日** 上午九时（当地时间），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应邀前来参加大会的有四十六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团或代表。

**6月22日** 上午，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致贺词并宣读中共中央贺电。在贺词中说：“国际斗争的形势，十分有利于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事业。”“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同情和支持下，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正义斗争，正在如火如荼地兴起，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的本性决不会改变，美帝国主义是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世界各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决不能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必须再接再厉地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并且在斗争中互相团结和互相支持。这也就是说，各国人民群众的力量及其斗争，是制止战争、保



卫和平的决定性的因素。”“我们共产党人的神圣责任，就是以《莫斯科宣言》为基础，加强我们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同时以这个伟大的团结为核心，团结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反对帝国主义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世界和平事业、工人阶级解放事业和一切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的最可靠的保障。”

△ 下午，接到罗马尼亚工人党总书记乔治乌·德治口头通知，二十四日召开出席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的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会议〔1〕。但通知没有说明会议的内容。晚上，同赫鲁晓夫会谈。会谈长达六小时，其中大部分时间是赫鲁晓夫指责中国共产党。会谈中，问赫鲁晓夫二十四日的会议如何开？赫鲁晓夫说苏共代表团准备了一份对中共的意见书，准备在兄弟党会议上分发。对会议开法，赫推说不太清楚，但又说，苏共代表团准备建议会议发表一个简单的公报或决议。当即表示：这样做，时间太仓促了。

**6月23日** 下午三时，收到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在中共代表团住所当面交来的苏共中央给毛泽东的信和《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同志的通知书》。安德罗波夫说：《通知书》阐明了苏方“对中国同志所提出的各项问题的态度”。《通知书》的中文副本长达八十四页，内容主要是围绕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人民日报》社论《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红旗》杂志社论《列宁主义万岁》，陆定一在纪念

---

〔1〕 指苏联、中国、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蒙古、朝鲜、越南、古巴等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

大会上的讲话，以及六月初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工联理事会上中共代表的发言等，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如当今时代的性质、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问题等，肆意地攻击中国共产党。《通知书》的时间署为“六月二十一日”，但送达中共代表团的时间却是在两天之后。下午七时，苏方又送来十二国兄弟党会议的公报草案。代表团当即于二十四日晨交信使送给中共中央。

**6月24日** 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第一次会议。会议由乔治乌·德治主持，赫鲁晓夫率苏共代表团出席会议。会议一开始，即要求会议主席明确会议的性质，提问：是按照苏共中央六月七日向中共中央的建议，对召开兄弟党会议的成员、时间、地点和组织起草委员会等问题交换意见，还是谴责中国共产党？赫鲁晓夫模棱两可地答复说是交换意见的会议。在保加利亚和捷克代表发言之后，又发言指出：中苏两党之间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种分歧虽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问题，但不是无足轻重的问题，主要是在五个方面：一是时代问题；二是战争与和平问题，在帝国主义还存在的条件下，决不能把裁军当做指导革命的路线，决不能认为现在可以实现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世界；三是和平过渡问题；四是共产党和工人党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团结问题；五是中印边界问题和世界工联理事会上所谓的问题等。对于苏共中央给毛泽东的信及长达八十四页的《通知书》，和要求中国代表团签署公报稿，发言指出：你们昨晚才把材料送给我们，今天就开会，这种突然袭击的方法是恶劣的，强迫中共代表团在公报上签字的做法，违反了苏共六月七日来信的建议，违反了《莫斯科宣言》协商解决问题的精神。我们的代表团未被中央授权签署公报。当赫鲁晓夫用

挨次点名的方式，强迫其他十个党同意公报时，明确表示：今天我们无法表决，由此而引起的不良后果，不是我们的责任。并坚持要求会议延长两三天，至少从现在起，延长四十八小时。又说：我们一定要请示中共中央，如果你们不予考虑，那么你们就是不遵守《莫斯科宣言》所倡导的协商精神。

**6月25日** 上午，出席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五十一国兄弟党代表举行的第一次会议。听取二十个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代表发言之后，阐明以下三个问题：（一）说明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工联理事会上发生争执的原因和事实真相。指出：世界工联理事会在报告中肆意攻击中国的国内政策，为此，中方邀请了十七位兄弟党的主要干部，说明情况，共同研究，从内部来解决问题。这就是事实真相。既然工联的报告干涉中国内政，而且还要我们举手同意这个报告，我们当然有必要加以澄清。（二）在和平、战争和革命问题上，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明确主张。（三）关于会议公报问题。严正说明：第一，六月七日赫鲁晓夫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明确说，在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期间，各兄弟党的代表可以在布加勒斯特交换意见，但不作任何决定。（请翻译当场向大会朗读苏共给中共的信）然后说：现在的会议不是交换意见，而是谴责中国共产党，而且要签署公报，这是苏共违反原订协议。第二，重申我们代表团不同意签署公报，而且在中共中央没有授权以前，不能在公报上签字。因此，昨天我们请求会议延长两天，以便我们请示中央，但未被接受，现在公报已经通过，赫鲁晓夫剥夺了我们讨论和表决公报的权利，所以我们保留权利以后再讲。发言避开了赫鲁晓夫设置的要中共代表团同其他兄弟党直接争论的陷阱。

△ 中午，同印度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古普塔

和印共全国委员会委员、书记处书记潘尼亚谈话。谈话约一小时。

△ 同在北京的杨尚昆通电话。

△ 晚，出席罗马尼亚方面举行的宴会。

△ 接到中共中央给彭真、康生、伍修权的信件，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谈公报（修正草案）》、《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声明》和周恩来为中央起草的信。信中提出在会外散发我方声明（对《公报》的修正意见）的步骤和方法。中央还指示代表团在分发上述两个文件后，可以在公报上签字。这是二十四日上午，邓小平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提出如何处置的方案后，由在上海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作出的决策。

**6月26日** 凌晨二时至四时三十分，约见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一书记乔治乌·德治，向他说明中共中央对会议公报有修改意见并且有所声明，要求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会议。同时，把中共中央的指示告诉对方，为了团结，中共代表团将在公报上签字。并说：我代表团临行前，毛泽东主席曾指示一定要坚持团结，坚持原则。我们在同苏共谈判、同赫鲁晓夫会晤和这次会上都是这么做的。乔治乌·德治表示这要同其他党商量，并要我们先把文件发给其他兄弟党。当时便将中共代表团公报修正草案交他们分发。同时说明：在昨晚的宴会上，赫鲁晓夫当着西方记者的面影射攻击我们，假如我站起来回击，就会使主人难堪。出于党性，我没有讲话并且走过去和他碰杯。乔治乌·德治称赞彭真同志做得对，为了顾全大局。谈话结束时说：我们中国共产党只服从真理，决不会屈从压力，我们可以被压成粉末，但是，绝不会被压扁。

△ 上午十时五十分，出席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

团第二次会议并在会上发言。说：为了兄弟党的团结，共同对敌，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中共中央授权我们在会议公报上签字。但是，中共中央对公报提出了修正意见，这个修正意见，已经分发给各位。由于会议公报草案对当前国际形势的重大问题没有表态，对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根本没有提到，中共中央认为是错误的，因此声明“不能接受这个草案”，并提出修改意见，希望予以讨论。“如果这次不能达成协议，建议成立一个专门的起草委员会，经过充分讨论后，拟成一个为大家能够一致接受的文件。”在当场散发中共中央的声明书后说：我们同意起草委员会由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再加上十四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组成，会议地点在莫斯科，时间在今年秋天，会议由苏共召集。

△ 下午，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五十一国兄弟党代表团的会议。会上，赫鲁晓夫以作总结的姿态，又一次全面攻击和污蔑中国共产党“违背《莫斯科宣言》”、“不要和平共处”、“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等。当即加以澄清和批驳说：此次兄弟党会议，苏共原来说是“交换意见”，“不作任何决议”，但事实是苏共代表团事先准备了八十四页的长文，对中共代表团严密封锁，直到会议开始的前一天晚上，才交给中共代表团，强迫中共代表团在社会主义兄弟党代表会议的公报草案上签字。这种突然袭击的恶劣做法，符合《莫斯科宣言》规定的协商一致原则吗？二十五日晚，在罗共中央的宴会上，赫鲁晓夫当着西方记者的面，用露骨的语言攻击中国共产党，符合哪条马列主义原则和布尔什维克纪律？赫鲁晓夫肆意违反原则，破坏团结，而要别人尊奉他为乐队指挥，能无原则地跟着他的指挥棒走吗？发言强调：中苏两党是兄弟关系，不是父子关系，我们要求平等相待，而决不能只许你们放火，不许我们点

灯。

**6月27日** 下午，率领中共代表团乘专机离开布加勒斯特经莫斯科回国。

△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高举莫斯科宣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旗帜》的社论。

**6月28日** 回国途中，在飞机上同越南劳动党代表团团长黎笋谈话。说明中共代表团在会上的做法，是为了达到兄弟党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团结。黎笋表示同意说，越南代表团也是在十二国兄弟党开会前一天晚上十二时，才收到苏方的公报草案。苏方事前没有和越方商量过，他们也没有时间请示国内，因此在会上处境困难，在讲话中只谈从本国情况出发，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黎笋认为赫鲁晓夫耍了手段，事先找欧洲的兄弟党进行了布置，会上感情用事多于理智，因此不能解决问题。代表团已报告了劳动党中央，胡志明主席已致电苏共和中共，希望两党团结。黎笋还说，会上他和法共代表费古勒斯接触，费古勒斯认为彭真在罗党代表大会上的致词，可以作为团结的基础。

△ 率领中共代表团回到北京。邓小平、李富春等到机场迎接。

**6月29日** 上午，和邓小平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书记处书记黎笋。

△ 晚，和康生、伍修权等中共代表团全体成员参加由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举行的便宴。饭后出席在怀仁堂举行的京剧晚会。

**6月30日** 上午，出席北京市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并讲话。指出：解放十年来，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来，北京市无论工农业生产、市政建设、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卫生、商业服务业等

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差得很远。所以不要自满，而是要踏踏实实，埋头苦干。（一）要抓紧农业。农业是基础，包括粮、棉、油、菜、猪。全国六亿七千万人口，首先要解决吃穿用。农业上不去，工业也要受到限制。（二）要抓紧工业、交通运输，特别是原料工业。没有原材料，各种工业发展都要窝工。还有品种问题，今年我国计划生产一千八百万吨钢，但是品种很不齐全。（三）生产指标问题。宁可定得稍微低一点，使年终能够超过以至于大大地超过。这样大家心情舒畅，各方面安排也主动。中国共产党历来就是做的比说的多，不是说的多做的少。我们要坚持踏实、苦干的作风。不但现在，一直到我们的后代，永远要这样下去。（四）劳逸结合，安排好群众生活。我们一方面要号召大家鼓足干劲，一方面要合理安排劳动和休息，关心各方面工作人员的健康。所有的领导都要开动脑筋，把工作安排好，组织好，提高劳动效率，减少加班加点。生产集体化了，生活要社会化，要一手抓生产、抓教育、抓学习，一手抓生活。最后还要讲大集体小自由，一万年还要保持小自由，这是一种持久的方针。

△ 下午，出席刘少奇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康生、伍修权作关于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情况的汇报。

**7月1日** 和邓小平会见参加世界工联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印度尼西亚代表、印尼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鲁斯兰。谈话中介绍了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和中苏分歧等情况。

△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对苏共中

央六月二十一日给中共中央意见书〔1〕的答复问题。

**7月2日** 中午，会见波兰驻华大使克诺泰。在交谈中说：关于和平与战争、和平过渡问题，还是准备两手比较好。而且应该把主要力量放在对付战争的一方面。这样，万一爆发战争，就可以减少牺牲。战争爆发与否并不取决于我们，越是害怕战争，帝国主义倒是有可能把战争强加于你。所以还是要动员大家起来保卫和平，制止战争。谈到社会主义国家团结问题时说：我们一定要团结，但是团结必须以马列主义、《莫斯科宣言》为基础。给别人戴帽子容易，但历史最后将会做出裁判，也是最公正的裁判，任何人也逃脱不了这个裁判。

△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答复苏共中央建议的关于兄弟党会议文件起草委员会的问题。

△ 晚，和陈毅、陈伯达、康生等去天津，在专列上向毛泽东汇报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情况。

**7月4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九十六次会议。会议听取邓小平讲国际国内形势问题，介绍中苏两党分歧的最新动态。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党组书记列席会议。

**7月5日—8月10日** 出席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国际问题和国内经济调整问题。会议讨论通过李富春、薄一波提出的《一九六〇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中的主要措施》、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确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钢铁等工业产品的产量；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保证农

---

〔1〕 即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毛泽东同志的《通知书》。



业增产等措施；并决定今后国民经济计划不再搞两本账，不再搞计划外的东西，不留缺口。会议还通过《关于向党员干部介绍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和中苏关系问题的通知》，具体研究了各中央局的组成问题。

**7月5日** 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向会议汇报了出席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会议还听取了部分省市委第一书记汇报工农业生产的情况。毛泽东讲话指出：国外争论的解决，取决于国内工作。现我工业、农业均未过关，必须下决心，立志气，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基层，纠正缺点，把各项工作做好。要缩短战线，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不能百废俱兴，争取在三年到五年内把过关的任务完成好。

**7月7日** 晚，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讨论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问题。

**7月8日** 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在会上报告中苏两党会谈和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会议情况。报告说：出国前，中央交待，处理中苏两党矛盾的方针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多劝，必要的顶”，“后发制人，留有余地”。原来准备通过接触，了解对方的情况，即近距离侦察，不料对方有准备，有预谋，从莫斯科到布加勒斯特，对我党代表团布置了一场突然袭击，结果打成了遭遇战。面对这次政治围攻，代表团第一步，是积极提意见和反驳。第二步，边破边立，一面反驳，一面坚持我们的观点。第三步，用事实反击赫鲁晓夫一系列的错误观点和行为。斗争的收获有两点，一是初步揭露了赫鲁晓夫对我们搞围攻、设圈套

的恶劣手法，二是初步揭露了赫鲁晓夫破坏《莫斯科宣言》、以强凌弱、蛮横无理的老子党面目。在对待兄弟党会议的公报问题上，中央明确指示斗争的最后三手：一是提出对公报修正草案，二是有保留的签字，三是有明确声明，既坚持了原则，又顾全了大局，争取了一部分不明真相的代表。报告最后说：和赫鲁晓夫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因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共是一个大党，有几十年老子党的传统，他们看不起我们。我们既要坚持原则，又要讲究分寸和方法；既要严肃谨慎，又要实事求是。这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有理、有利、有节，留有余地。

**7月9日** 下午，和李富春、杨尚昆应约同邓小平谈计划工作问题。

**7月10日** 晚，列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柯庆施、李井泉、陶铸汇报小组讨论情况，并讨论国际形势、印度尼西亚反华等问题。会议决定由周恩来作一次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的报告。

**7月14日—16日** 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报告。周恩来详细地回顾了共产国际从一九一九年成立到一九四三年解散的历史，以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7月16日** 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将苏联政府关于召回在华专家和顾问（其中包括军事专家和顾问）给中国政府的照会交我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七月二十五日，苏方不等中国政府的答复，就通知中国方面，在七月二十八日至九月一日期间，将在华的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并废除签订的

二百多个科技合作项目。〔1〕

**7月18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听取李富春关于国民经济计划问题的报告。

**7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九十七次会议。会议基本通过周扬准备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稿和大会主席团名单草案。

**7月20日** 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听取中央工作会议各小组汇报今年工农业生产计划完成情况。会议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工农业生产问题。

**7月21日** 晚，从北戴河乘火车回到北京。

**7月22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邓小平等出席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并接见大会主席团全体成员。二十三日下午，陪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接见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

△ 晚，和周恩来、陈毅等出席波兰驻华大使克诺泰为庆祝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六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7月23日** 上午，出席首都各界一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集会，支持刚果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干涉、保卫民族独立的爱国正义斗争。

△ 上午，和周恩来等接见一批在北京的非洲国家外宾，

---

〔1〕 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八日至九月一日，苏联政府共撤回在华专家一千三百九十人，终止派遣专家九百多名，并撕毁三百四十三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二百五十七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

并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7月26日—8月10日** 继续出席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二十六日，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讨论粮食问题。

**7月27日** 零时十分，应约同周恩来谈话。

**7月28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亟待解决的几个国际问题。参加会议的还有康生、陈伯达。

△ 晚九时二十分至次日凌晨一时零五分，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外交、外贸、科学技术、粮食和工农业生产等问题。

**7月29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九十八次会议。会议讨论下半年的生产、基建、农业问题及中共中央《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草稿）》。会议决定由彭真、李富春、薄一波根据讨论的意见对草稿进行修改后，再交中央书记处讨论。周恩来参加会议。

**7月30日**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外交部对苏联驻华大使馆关于召回苏联专家问题的复照》稿。三十一日，外交部向苏联驻华使馆发出的复照指出：绝大多数在华的苏联专家工作合同期尚未满，苏方突然撤走，“显然破坏了两国政府所签订的有关协定和合同，必然会对中国正在进行的建设工作造成一些损失，并且带来一些困难。这种片面破坏协议的行为，在一般国际关系中也是罕见的”，“不论从法律上、道义上、政治上说，都是无法辩解的。”“中国政府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召回专家的决定”，如果苏联政府置之不理，“中国政府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在保留自己意见的条件下，尊重苏联政府的意见。”

**7月31日** 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苏联撤走专家和对苏联贸易问题的报告。

**8月1日** 下午，和邓小平、李富春、杨尚昆等听取宋任穷汇报工作。

**8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百九十九次会议。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草稿）》。周恩来参加会议。

**8月4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次会议。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草稿）》，决定由彭真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加以修改，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同时印发北戴河工作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向党员干部介绍布加勒斯特会议和中苏关系的通知》。周恩来参加会议。

**8月6日** 上午，和薄一波、李先念等出席邓小平召集的会议。会议讨论伍修权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古巴人民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问题；听取中央工作会议各小组讨论文件的情况汇报。

△ 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苏联撤走专家等问题。

**8月8日** 中共中央批复同意中共北京市委关于饮食业实行凭粮票供应的请示。

**8月9日** 晚，应约到周恩来处谈话。

△ 晚，和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到毛泽东处听取周恩来、邓小平分别汇报本日同胡志明会谈的情况，并讨论了越南劳动党向苏中两兄弟党的几点建议。

**8月10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在总结发言中提出压缩基本建设战线，加强农业第一线，工业支援农业等措施。除尖端工业外，

其他工业要尽量为农业服务，对农业有所帮助等。毛泽东讲话后，中央工作会议结束。

**8月11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零一次会议。会议讨论成立中共各中央局，及中央局的组织机构、干部配备和工作问题。十二日下午，会议继续讨论。刘少奇参加会议。

**8月12日** 上午，和罗瑞卿、乌兰夫<sup>〔1〕</sup>、刘澜涛、张德生、王恩茂<sup>〔2〕</sup>出席邓小平召集的会议，讨论新疆问题。

**8月14日** 受中共中央委托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开展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发出。指示说：今年成绩显著，但第二季度，在二十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十八种没有完成产量计划，其中十一种低于第一季度的水平。当前全党的紧急任务是要立即开展一个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要求各级干部克服盲目乐观和右倾松劲思想，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本位主义和铺张浪费，发动群众，千方百计地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粮、钢和其他主要产品的生产计划。指示要求：（一）立即发动群众讨论今年后五个月增产节约的指标，和实现指标的具体措施。（二）继续深入开展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三）在省、市、区党委统一领导下，对一切基本建设项目和生产任务，根据国家计划，分别轻重缓急，进行排队。（四）干部要立即下去，亲临前线指挥生产。（五）大量精简非生产人员，充实生产战线。（六）加强企业管理，广泛开展增产节约的劳动竞赛。（七）坚决贯彻全国一盘棋的原则；所有工业和交通运输部门，都必须进一步加

---

〔1〕 乌兰夫，时兼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2〕 王恩茂，时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第一书记。

强支援农业。

**8月15日** 晚，出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为庆祝朝鲜解放十五周年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招待会。

△ 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向周恩来转交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两封信。一封是对中共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散发声明的答复；另一封是建议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莫斯科会议之前，中苏两党预先交换意见，举行两党会谈。

△ 审阅《人民日报》题为《立即开展一个以粮、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社论稿。十八日社论发表。

**8月16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零二次会议。会议研究向党员干部传达中苏关系的文件问题；听取刘宁一关于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日本“总评”〔1〕十五次大会的情况汇报；还听取了张霖之关于煤炭生产情况的汇报。汇报说：上半年完成计划的百分之四十七，下半年完成任务吃力。干部先是盲目乐观，现在产生了急躁情绪。工人口粮紧张，副食品差，积极性下降。各级干部对任务层层加码，但实际问题没有解决，口硬心不硬；建立了规章制度，但组织工作没跟上去。职工普遍盼望劳逸结合。听完汇报后讲话说：要在开滦煤矿抓一两个典型，通过思想教育、劳逸结合、发动职工家属和人民公社结合解决副食问题，提高群众的劳动积极性。

**8月18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零三次会议。周恩来参加会议。会议讨论当前工农业生产问题，针对今年春旱，受灾面积达六亿五千万亩，特别是八月初辽东地区和吉林西部发生特大水灾的情况，强调生产要抓紧，首先是农

---

〔1〕“总评”，即日本工会总评议会，一九五〇年七月成立，是日本最大的受日本社会党影响的工会组织。

业，基建项目一定要按计划下马，粮食调拨一定要如期完成，口粮要安排到明年夏收前。要求将晋、冀、鲁、豫四省的情况，半个月內查清报告中央。薄一波、王鹤寿、姚依林〔1〕、龚子荣等列席会议。

**8月19日** 下午，在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扩大）上发言。针对在讨论周恩来关于访问亚洲六国的报告时，有的委员对中苏分歧感到迷惑不解和担忧作了长篇说明。指出：大家政治感觉很敏锐，证明新中国的民主党派比有些国家里的无产阶级党派还进步些。我以共产党的身份说，这是好现象。

△ 晚，和刘少奇、周恩来、罗瑞卿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从莫斯科途经北京回国的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一行。

**8月20日** 下午，和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出席首都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二万多名应届毕业生参加的大会，并作大会报告。指出：在当前国际形势大变革和国内处于暂时困难时期，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认清形势，走革命的道路，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和绝大多数人民站在一起。并希望大家服从国家分配，到工农中去，站在革命和生产的最前线，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地认真地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紧急指示》。

**8月22日** 下午，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接见出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

---

〔1〕 姚依林，时任中共中央财政贸易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商业部部长。



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等六个民主党派中央全会扩大会议的代表，并和各党派的主席、副主席谈话。

△ 晚，参加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等在中南海怀仁堂的谈话。

**8月24日、26日** 和朱德、邓小平等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以中共中央名义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会上，周恩来、刘少奇就中苏两党的分歧和性质、中共中央坚持立场、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等政策问题讲了话。座谈会由刘少奇主持。

**8月24日** 晚，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为促进钢铁生产召开的电话会议。会上通报当前钢铁生产总的情况不大好。为保证重点，力争完成今年的指标，会议提出：一是集中力量，保证钢铁生产，把煤、铁集中供二十个重点企业使用。二是缩短基建战线，抽调一些劳动力，把四十个重点煤矿（有运输条件的）产量促上去。三是提高铁的质量。四是清理仓库、铁路码头的货站，把积压的材料有计划地调剂使用。五是抓紧设备维修，防止发生重大事故。在讲话中指出：二十个重点钢铁企业，承担今年钢产量的百分之八十，原材料和煤炭要保证其需要。他们需要的铁，一半靠小高炉生产供应。我们的方针还是土洋并举，两条腿走路。为保证钢铁重点，要把一切非生产人员大力精简下来，转到钢铁战线和运输战线上去。要政治挂帅，做好干部、群众的思想工作。粮食问题，国家已有安排。要动员企业职工的家属，组织副食品生产，和附近的人民公社结合，生产蔬菜等，改善职工生活。总之，要一手抓钢，一手抓粮。钢铁方面，一手抓重点企业，一手抓“小洋群”。薄一波、王鹤寿、张霖之列席会议。

**8月26日** 晚，和林彪、邓小平、王稼祥、杨尚昆到毛

泽东处开会，商定参加莫斯科中苏两党会谈的中共代表团成员的名单。决定中共代表团以邓小平为团长、彭真为副团长。会议还讨论了对苏共六月二十一日给中共中央意见书的《答复书》的起草问题和接待苏共赴越南代表团过境问题。

**8月27日** 在人民大会堂就布加勒斯特会议和中苏关系问题作长达四小时的报告。报告会由杨尚昆主持。中直机关、中央国家机关、中共北京市委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和军队少校以上军官共约二万人参加报告会。报告最后强调：我们必须立大志，树雄心，大力发展粮食、钢铁，大力发展尖端技术，从各方面赶上去。要自力更生，埋头苦干。除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外，要以他们的缺点错误为戒；要和群众同甘共苦，坚持群众路线；要加强全党的团结和全国人民的团结。对苏联和东欧兄弟国家的贸易欠账务必做到今年少欠，明年基本还清。

**8月28日** 下午，和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接见出席统战工作会议的中共各省、市、自治区委的统战部长。接见结束后，出席中央统战部招待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宴会。

△ 晚，和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王稼祥、叶剑英等出席刘少奇在玉泉山召集的会议，讨论参加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国庆和出席越南劳动党代表大会问题。会议结束后，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到毛泽东处商谈接见阿尔巴尼亚赴越代表团问题。随后，一起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去越南途经北京的阿尔巴尼亚代表团。

**8月29日** 下午，和康生、杨尚昆、胡乔木、熊复、吴冷西等出席邓小平在钓鱼台召集的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对六月二十一日《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毛泽东同志的通知书》的《答复书》的起草问题。

**8月30日** 上午，到机场送以李富春为团长的中国党政

代表团赴河内参加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庆典。

**8月31日** 上午，和康生、陈伯达、王稼祥、杨尚昆等出席邓小平在钓鱼台召集的会议，继续讨论中共代表团去莫斯科与苏共谈判的问题和对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通知书》的《答复书》的起草问题。

△ 下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零四次会议，讨论民用机械工业和军工生产部门分开后，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的人事安排问题。在会议结束时说：过去为了集中力量，一机部、二机部、三机部合并是对的，现在有条件了，就再分开。今后不要指望别人给我们什么东西，我们政治上要坚持原则，军工生产上也要下决心自力更生，形成体系。书记处过去对军工生产抓少了，主管部门也有责任。分开后要立即召开会议，由一机部先向中央写报告，提出问题，经中央批准后，分期分批限期解决具体问题。主管部门过去对具体组织工作抓得少，一般政治号召多，要尽快改变；有些厂领导干部不行的换一下。军备是有备无患，现在我们没有储备，要有点战争观念。计划要实事求是，能办到什么，暂时还不能办到什么，都要弄清楚，加以落实。有些材料生产要专厂专责，有关部门要具体安排。质量第一，军事第一。专用机械不要去搞别的。每种产品的出厂，要保证质量，军代表、党委书记都要签字，定为制度。材料、设计、生产、检验四道关都要把紧，不合格的产品军队可以不验收。试验可以大胆，定型后才能制造。

**9月1日** 上午，在政协礼堂出席首都各界人士参加的集会，庆祝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

△ 下午，出席邓小平在钓鱼台召集的会议。会议继续讨论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通知书》的《答复书》

的起草问题。

**9月2日** 晚，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出席越南驻华大使为庆祝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招待会。

**9月6日** 上午，到邓小平处，讨论起草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等国的兄弟党来信的答复问题。

△ 中午，和邓小平到周恩来处商谈与苏共中央会谈的有关问题。

**9月7日** 上午，到邓小平处讨论答复苏共中央的《通知书》的《答复书》的修改问题。

△ 下午，列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书》的修改问题。

△ 晚十一时三十分，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杨尚昆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吊唁威廉·皮克总统逝世。

**9月8日** 上午，出席邓小平召集的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草稿）。下午，继续讨论。

**9月9日** 上午，召集会议，听取谢富治汇报社会治安情况。

**9月10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去机场迎接塞古·杜尔总统率领的几内亚政府代表团。四时，参加会见杜尔总统。晚六时，出席招待几内亚政府代表团的宴会。

**9月12日** 和邓小平、杨尚昆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

年科，将《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1〕交给他。中共中央代表团定于十月十五日起程去莫斯科。

△ 下午，和刘少奇、董必武、陈毅等出席首都各界十万人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的集会，欢迎几内亚共和国总统、几内亚民主党总书记塞古·杜尔及其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在大会讲话中说：非洲各族人民，正在一个接着一个地挣脱殖民主义的枷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几内亚和全体非洲人民最可靠的朋友。

△ 晚，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等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并设宴欢迎塞古·杜尔总统一行。会见结束后，参加毛泽东同刘少奇等人的谈话。

**9月13日** 上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几内亚共和国总统联合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几内亚共和国友好条约》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几内亚共和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几内亚共和国政府贸易和支付协定》的签字仪式。十四日上午，到机场送塞古·杜尔一行去上海访问。

△ 下午，和邓小平到周恩来处商谈中苏关系问题。

---

〔1〕《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着重批驳了苏共中央《通知书》提出的五个问题：第一，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共代表团实行突然袭击，组织围攻。第二，赫鲁晓夫把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撕毁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援助中国建设项目的全部协议，撤回全部在华苏联专家。第三，赫鲁晓夫在中印边境冲突中偏袒印度，指责中国，把中苏分歧公开化。第四，赫鲁晓夫吹捧艾森豪威尔，美化美帝国主义。第五，赫鲁晓夫公然对西德总理阿登纳宣传所谓“黄祸”，并要阿登纳帮助他对付中国。

△ 晚，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二十个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电话会议，谈当前国防工业生产中的问题。赵尔陆<sup>〔1〕</sup>、贺龙作了报告。讲话指出：中央决定一机部分分成两个部时，检查中发现军工产品质量不好，这是无法容忍的大问题。今后一定要按质、按量、按期保证完成任务，完不成应该有交待。有意见请提出来。首先由党委书记负责，发动群众，用三结合的办法保证质量。第二才是军代表负责。保密是有范围的，工人对生产的东​​西，要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党委要指定专人，一年抓几次质量问题，是可以搞好的。以后军工生产单位完成军工任务第一，不能分配搞别的。稀有金属的边角料、废料应该收起来回炉，不得挪作民用。请有关省、市、区党委逐厂进行检查，将结果报告中央。

△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中苏两党会谈的方针问题；听取李富春汇报出席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庆典和越南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

**9月14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代表团对中苏两党会谈的方针、策略；还讨论了中共中央对罗马尼亚工人党、捷克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来信的答复等问题。

**9月16日** 上午九时，和邓小平、杨尚昆、胡乔木、伍修权等在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陪同下乘专机前往莫斯科。陈伯达、康生、廖承志等已于十五日上午先期赴苏，中国驻苏大使刘晓已在莫斯科。到机场送行的有周恩来、朱德、陈毅

---

〔1〕 赵尔陆，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一九六〇年九月起，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等。

△ 晚八时三十分（莫斯科时间为下午三时三十分）到达莫斯科，住在列宁山。

**9月17日—22日** 在莫斯科参加中苏两党会谈。

**9月17日** 上午十时（莫斯科时间），在中共代表团驻地和邓小平等接待苏共中央国际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来谈。双方商定：（一）为利于保密，两党会谈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二）会谈从本日下午一时开始。（三）参加人员限于双方代表团成员。邓小平提出，中方增加顾问二人，翻译四人。安德罗波夫表示同意。

△ 下午一时，中苏两党代表团会谈开始。苏斯洛夫发言，指责中共中央的《答复书》“没有缓和的愿望，集中力量在攻击苏共”，表示“非常遗憾，是危险的”。邓小平发言指出：布加勒斯特会后的两个月内，苏方连续发表近七十篇文章，攻击中共，扩大分歧，又撤回专家，停止《友好》杂志〔1〕出版，挑起边境事件等，究竟想把中苏两国、两党的关系引到何处去？还要采取什么步骤？苏方没有立即回答，提出休会，明天（十八日）星期天也休会，下周一继续谈。

**9月18日** 下午三时，中共代表团去中国驻苏大使馆，商谈周一下午中方发言内容。决定讲五个部分：（一）谁违背了马列主义和莫斯科会议宣言。（二）敌我问题。（三）父子党问题。（四）一系列事实证明苏共的错误。（五）痛陈利害，要求苏方改正错误，达到团结。

---

〔1〕《友好》杂志，是中国方面在苏联出版的周刊，一九六〇年七月六日，苏驻华参赞根据苏共中央指示，请求中国方面停止出版该刊，并通知中共中央宣传部。

**9月19日** 下午二时，出席中苏两党代表团第二次会谈。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科兹洛夫发言后，邓小平依据事实驳斥对方的抵赖和曲解。接着，彭真发言以亲身经历揭露布加勒斯特会议是赫鲁晓夫有计划地对中共代表团进行突然袭击和围攻。

**9月20日** 下午二时，出席中苏两党代表团第三次会谈。邓小平继续发言，列举一系列事实说明苏方不以平等态度对人，听不得批评，动辄给兄弟党扣大帽子，对中国单方面决定撤回专家，撕毁协议。邓小平说：这给我们的计划和外贸都带来了损失，但中国人民决心把这一损失吞下去，用自己的双手和劳动来弥补这一损失。苏方十分被动。会议休息时，中方向苏方提出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晚离开莫斯科回北京。

**9月21日** 下午二时，出席中苏两党代表团第四次会谈。由苏方苏斯洛夫和科兹洛夫发言。苏方为从被动的历史事实中摆脱出来，转向谈现实问题。科兹洛夫提出要集中讨论七个问题，即：现代资本主义的性质、现在的时代、如何动员人民反战、工人阶级争取胜利、民族解放运动和今后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9月22日** 下午二时，出席中苏两党代表团第五次会谈。先由邓小平发言，接着苏斯洛夫表示：同意邓小平所讲的第一部分，即两党愿意团结起来防止世界战争；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中，在对待共同敌人中，团结是重要的。但又表示：这次会谈证明，对当前国际形势，两党存在严重分歧，而苏方坚持《通知书》的立场。邓小平对此答复说：既然如此，不妨把问题推迟到起草委员会会议上去讨论。会谈就此结束。下午四时回寓所。

△ 下午五时三十分，苏共代表团在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



娜大厅，邀请中共代表团共进晚餐。席间互相表示友好。晚餐八时结束。晚十一时，中共代表团乘专机回国。

**9月23日** 中午十二时（北京时间）中共代表团经伊尔库茨克，于下午回到北京。周恩来等到机场迎接。

△ 晚八时三十分至次日零时十五分，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李富春、康生、杨尚昆等，出席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邓小平汇报中苏两党会谈情况。毛泽东说：我们总的方针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持斗争，留有余地。

**9月24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邓小平汇报中苏两党会谈情况；讨论通过国家计委党组、劳动部党组《关于当前劳动力安排和职工工资问题的报告》。

**9月25日** 下午，和刘少奇、邓小平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劳伦斯·路易斯·夏基和主席理·狄克逊，并共进晚餐。刘宁一参加会见。

**9月26日** 上午，和邓小平、杨尚昆同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会谈，介绍中苏两党会谈情况。

**9月27日** 下午，出席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谈二十六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稿的准备情况。出席会议的还有陈毅、康生、陆定一、李井泉、杨尚昆、胡乔木。二十八日下午，继续开会讨论。

**9月28日** 上午，出席邓小平召集的会议。会议讨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稿。周恩来参加会议。

**9月30日** 上午，作为中共代表团副团长和团长的邓小平及代表团成员康生、杨尚昆、胡乔木、廖承志乘专机前往莫

斯科，参加二十六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到机场送行的有周恩来、朱德等。代表团的成员李井泉、陆定一、刘宁一等已于二十九日上午十一时起程。

△ 下午四时三十分（莫斯科时间），到达莫斯科。晚六时三十分，应苏斯洛夫、科兹洛夫之约，和邓小平、杨尚昆去苏共中央大楼，商谈起草委员会的工作问题。苏斯洛夫提出：（一）苏共中央已准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草案》，希望起草工作能在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二）会议明天开始，由苏共代表致欢迎词，决定程序问题。二、三两日休息，研究文件，四日起作一般性讨论。（三）建议成立起草委员会秘书处，中苏双方各派一、二人参加，并当场提交了苏共中央起草的声明草案（附中文译本）。

△ 晚八时，中共代表团去中国驻苏大使馆开会，集体通读苏共中央起草的声明草案。会后与杨尚昆拟定代表团给中共中央的情况报告，打印声明草案，准备明晚派专人送回北京。代表团仍住列宁山。

**10月1日—22日** 出席由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十四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组成的起草委员会会议，为将在十一月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准备一个声明草案。

**10月1日** 下午一时，出席在克里姆林宫圣乔治大厅举行的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苏斯洛夫致欢迎词，邓小平发了言。苏斯洛夫宣布会议日程，由苏方做主席。会议决定以苏联提出的声明草案为讨论基础，由各代表团讨论两天后，四日下午开大会，作一般性发言。会议至三时完毕。随后，巴西、日本、阿尔巴尼亚、印度、阿根廷、朝鲜等国党代表团找我代表团谈话，印度共产党代表高士主动要求和我代表团接触。

**10月3日** 下午，中共代表团在中国驻苏大使馆开会。当晚，出席苏共代表团的招待宴会。

**10月4日** 上午，和邓小平、刘宁一会见印共代表高士。

△ 下午，出席起草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进行一般性讨论。意大利代表、匈牙利代表、芬兰代表、西德代表、蒙古代表发言。

△ 晚，中共代表团去中国驻苏大使馆开会，讨论邓小平明日在会议上的发言稿。接中共中央指示：对苏共在草案中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必须加以有力反驳，然后再提出具体的对策。

**10月5日** 下午二时，出席起草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会议继续进行一般性讨论。越南代表黎笋发言后，邓小平作了七十分钟的发言。接着，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代表发言。

△ 晚八时，和邓小平、杨尚昆同古巴人民社会党执行书记艾斯凯兰特会谈，至次日凌晨一时。

**10月6日** 下午二时，出席起草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阿尔巴尼亚代表卡博作长篇发言，谴责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方的言行是与马列主义不相符合的，并就时代问题、社会主义体系问题、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在争取和平、民主、社会主义斗争中的任务等，包括对待社会主义党、和平过渡、修正主义与教条主义问题对苏共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会上发言的还有法国、东德、英国的代表。

△ 晚，和邓小平在中国驻苏大使馆先后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卡博和日本代表宫本显治。

△ 刘少奇、李富春来电，要求将苏共中央提出的声明草案的俄、英、法和西班牙文本寄给中共中央。

**10月7日** 上午十时，中共代表团在中国驻苏大使馆同

古巴代表团会谈。古巴代表团向我代表团建议中苏两党应继续会谈，解决分歧。认为大会广泛的讨论不会有帮助，因为其他党不能表示意见，可组织小委员会讨论草案，研究分歧意见。小委员会的成员，可以是中苏之外再加欧洲、亚洲、拉丁美洲的一个党。

△ 下午，出席起草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罗马尼亚、阿根廷、叙利亚、巴西、日本、朝鲜和美国代表发言。会议决定秘书处工作下周一（十一日）开始。

△ 中共中央来电告知，赫鲁晓夫十月一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将于明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10月8日** 中午十二时，出席起草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澳大利亚、古巴代表和苏联代表苏斯洛夫发言后，会议主席宣布会议到此为止，还有三个国家的党代表的发言下周一再进行。邓小平当即声明中共代表团要求第二次发言。

**10月9日** 上午十一时，越南代表黎笋等来谈话，劝中方应以和为贵。

△ 晚，中共代表团在中国驻苏大使馆研究邓小平第二次发言稿。

**10月10日** 上午，出席起草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印度、印度尼西亚、保加利亚代表发言。苏斯洛夫说是否需要作第二次发言的问题，会上意见不一致。邓小平表示，中共需要再次表示自己的观点，但如果大家认为不作第二次发言，我们也同意用书面形式交出。苏斯洛夫宣布，有意见可以书面表达，今明两天召开秘书处会议。

**10月11日** 上午十一时至下午一时，和邓小平、杨尚昆去苏共中央招待处拜会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古巴和阿尔巴尼亚党的代表团。晚六时，去莫斯科郊外别墅看望越南劳动

党代表团。

**10月12日** 上午十时三十分，和邓小平、杨尚昆到莫斯科郊外巴尔维哈疗养院看望法国共产党书记处书记杜克洛。杜克洛患心脏病已卧床一个多月。当晚，去中国驻苏大使馆，听取康生、胡乔木汇报秘书处开会讨论修改文件情况。今日讨论时代与所谓“单干”问题，争论激烈。阿尔巴尼亚、越南、日本、印尼、朝鲜、澳大利亚代表和中共意见一致。

△ 中共代表团将两天来起草委员会秘书处讨论进展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电传汇报。

**10月13日** 晚，去中国驻苏大使馆，听取康生、胡乔木汇报秘书处会议修改文件情况。总的情况是大家观点都已摆出来，两军对峙，旗鼓相当，苏方处于被动地位。今日会议前苏方专门找我代表团谈话，提出可以将攻击中共“单干”、搞“民族共产主义”等字样删去，但保留借批南斯拉夫而影射中共的一段。我方坚决反对，会谈无结果。秘书处大会上争论仍然激烈，支持苏方者已有所收敛。当即将情况报告中共中央。

**10月14日** 晚，去中国驻苏大使馆，听取胡乔木汇报秘书处会议上讨论声明稿中关于战争的危险性、核武器的恐怖、裁军等内容时激烈斗争的情况。各国代表的反应是：有人认为形势很好，布加勒斯特会议时的情况一去不复返了；有人主张原则要坚持，次要问题可以灵活对待；有的代表在许多问题上同意中共的意见，但在目前矛盾尖锐的情形下不便发言；苏共谋求妥协，组织了一个由苏、中、日本、西德等六国代表团参加的小委员会，并插以中苏两党代表的协商。

△ 下午五时，赫鲁晓夫由联合国返回莫斯科。中共代表团致电中共中央请示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后的对策。

**10月15日** 晚，去中国驻苏大使馆，听取康生汇报当日

秘书处会议讨论文件的情况。当日会议关于民族主义国家问题争论激烈。有代表说：如秘书处通不过，还可提交大会或十一月的大会。

**10月16日** 上午，中共代表团在中国驻苏大使馆开会，讨论以下问题：（一）声明书草案第五部分关于和平过渡、南斯拉夫问题、反对修正主义和反对教条主义、宗派活动等问题的文字，不能含混过去，必须坚决反对。（二）苏方组织九人小委员会，应警惕其拆散力量的不良企图，有些问题，在大会上争论更有利。（三）明日在秘书处会上应向苏方索要修改后的声明书草案的全文。（四）准备秘书处会议结束时的发言，起草委员会上的发言和考虑十一月会上的发言。

**10月17日** 上午，邓小平决定派陆定一、胡绳、范若愚等先期回国，向中共中央汇报情况，准备十一月会议的文件。并要求他们乘周三（十九日）晚的飞机。

△ 晚，去中国驻苏大使馆，听取胡乔木、康生汇报秘书处当日会议的情况。当日会议讨论声明草案的最后一章，即关于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及反斯大林问题等，是声明书草案的核心内容，争论长达九个小时。

**10月18日** 上午，中共代表团研究准备在秘书处会议结束时的发言稿。

△ 晚，听取胡乔木等汇报当日秘书处会议关于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反对个人迷信及修正主义与教条主义等问题上的争论情况。

**10月19日** 苏方通知：起草委员会秘书处上午不开会。十一时，中共代表团在中国驻苏大使馆开会，讨论邓小平将在起草委员会会议上的最后讲话稿。后又接到苏方通知，下午仍不开秘书处会议。

△ 晚，收到苏方送来经过秘书处会议讨论后修改的声明书草案前四部分，第五部分尚待明日讨论决定。

**10月20日** 上午，去中国驻苏大使馆，阅读秘书处提交修改后的声明书草案的引言及第一至第四部分。修改后的声明书草案吸收了中共代表团不少意见，说明会议上的斗争有收获。秘书处继续开会，讨论声明书草案的第五部分。

△ 下午，中共代表团在中国驻苏大使馆开会，继续阅读声明书草案。刘晓说：苏联科学院有两个研究所同时传出，赫鲁晓夫可能去北京，以换取毛泽东出席十一月会议。此事已报告中共中央。

△ 晚十一时，听取参加起草委员会秘书处会议的同志汇报：今天大会套小会开了整整十二个小时，就当前战争能否从人类社会中根除、反对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等问题，激烈的争论达到了最高峰，结果还是没有达成协议。秘书处会议明天上午将继续进行。

**10月21日** 秘书处工作今天结束。声明书草案在争论中达成协议，将以下几个问题搁置起来：（一）关于从人类生活中排除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二）能否全面肯定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问题。（三）关于集团活动与“派别活动”问题。（四）兄弟党之间关系的平等、协商原则问题。

△ 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卡博谈话。

**10月22日** 中午十二时，中共代表团出席起草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会议由苏方苏斯洛夫主持。苏方波诺马廖夫报告秘书处的工作，说：现在的声明书草案可以说是一个二十六国的草案，其中第一、二、四章是完全达成协议的，第三、五章有几个段落没有达成一致。（一）消除战争问题，中国、阿尔巴尼亚、印度尼西亚、朝鲜有不同意见。（二）关于苏共二十

大、二十一大问题，中国提出修改意见，印度尼西亚代表主张不提两会。（三）关于“个人迷信”，中国有修改意见，阿尔巴尼亚、印度尼西亚支持中国意见。（四）关于南斯拉夫问题，中国建议将“民族共产主义”的提法改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五）集团活动和派别活动，中国代表团不同意这个提法，日本、朝鲜、越南、印尼、阿尔巴尼亚建议另找别的措辞。会上，邓小平作了发言后，苏斯洛夫宣布：通过波诺马廖夫关于秘书处工作的报告；将声明书草案提交十一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讨论。会议同意十一月会议由苏共代表团作报告。下午一时三十分，会议结束。

△ 下午三时，和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中央主席团在克里姆林宫圣乔治大厅举行的招待参加二十六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文件起草委员会各国代表团的宴会。赫鲁晓夫出席招待会。苏斯洛夫和邓小平先后祝酒。招待会快结束时，赫鲁晓夫突然起立发言，言辞粗俗地表示：谁反对他就是反对苏共中央，他不要“为首”，如果共产党主张用国与国的战争进行革命，他就要退出这样的党，等等。邓小平当即发言说：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共产党是主张用国家与国家间的战争来进行革命的，强调以苏联为首是历史形成的，我们不想利用宴会来讨论问题。招待宴会至五时三十分结束。

△ 晚七时至九时，邓小平会见了日本共产党代表，彭真会见了澳大利亚共产党代表，分别交换对起草委员会工作的意见。

**10月23日** 晚十时，中共代表团乘飞机离开莫斯科回国。

**10月24日** 下午一时四十分（北京时间），和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回到北京。在机场迎接的有周恩来、朱德等。



△ 晚，出席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华北、中南各省市市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会议听取邓小平、彭真等汇报莫斯科二十六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情况。

**10月25日** 晚，和周恩来、朱德等出席朝鲜驻华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十周年。

**10月27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邓小平关于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的二十六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起草委员会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决定由刘少奇任团长，率中共代表团出席将于十一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10月28日** 上午，和陆定一、陈伯达、康生等在钓鱼台出席邓小平召集的会议，讨论有关参加莫斯科会议的问题。

**10月30日** 晚，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朝鲜人民军协奏团演出，并接见协奏团成员。

**10月31日** 下午六时至次日凌晨二时，出席刘少奇召集的会议。会议讨论修改刘少奇准备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发言稿。

**11月1日** 上午，杨尚昆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将应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邀请，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三周年庆典的中国党政代表团的名单交给他。中国党政代表团团长是刘少奇，副团长是邓小平，代表团团员是：彭真、李井泉、陆定一、康生、杨尚昆、胡乔木、刘晓、廖承志、刘宁一。四日，新华通讯社发布了中国党政代表团成员名单等消息。

**11月2日** 下午，和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去机场迎接路经北京去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三周年庆

典的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一行。晚，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参加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同胡志明的会见。

△ 晚，出席毛泽东在勤政殿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刘少奇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开会等问题。

**11月4日** 上午，和李井泉、陆定一、廖承志、刘宁一等中国党政代表团第一批成员，乘专机前往莫斯科。到机场送行的有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由于气象变化，到斯维德洛夫斯克后，改乘火车，于六日上午十一时二十分（莫斯科时间）到达莫斯科。代表团团员刘晓已在苏联。

**11月5日** 上午，刘少奇、邓小平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的第二批成员包括康生、杨尚昆、胡乔木等乘专机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三周年庆典，并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到机场送行的有周恩来、朱德、林彪等。下午四时四十五分（莫斯科时间），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在机场迎接。

**11月6日** 中国党政代表团全体成员前往克里姆林宫拜会赫鲁晓夫，并出席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招待宴会。

△ 晚，和刘少奇、邓小平等在克里姆林宫拜会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

**11月7日** 上午，和刘少奇等参加在红场举行的十月革命四十三周年庆典，观看军事检阅和群众游行。中午一时，庆典活动结束。邓小平、康生、胡乔木未参加此次活动。

△ 下午，刘少奇召集全团读苏共中央十一月五日对中共中央九月十日《答复书》的答复，全文八万多字，中文译本共

九十一页。苏共中央的答复，是上午庆典结束后由安德罗波夫交给刘晓的。安德罗波夫并说：希望这不与会议〔1〕联系，会议是会议，答复是答复。四时至七时，出席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圣乔治大厅举行的有千余人参加的招待会，只有赫鲁晓夫举杯祝酒，来客无人讲话。

△ 晚，继续在中国驻苏大使馆研读苏共中央对中共中央《答复书》的答复。鉴于苏共中央的答复集中攻击毛泽东的几个论点，代表团认为必须在会议上公开答复，不能接受苏方“会议是会议，答复是答复”的限制。对于是由刘少奇还是邓小平出面答复，及要修改原准备的发言稿等问题，代表团当即致电中共中央请示。

△ 和邓小平、杨尚昆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阿利雅，介绍拜会赫鲁晓夫的情况，交换对会议形势的看法。

**11月8日** 上午，和邓小平、杨尚昆在中国驻苏大使馆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一副主席鲁克曼和总书记阿吉托罗普。

△ 上午，和杨尚昆在中国驻苏大使馆会见南非共产党代表团和新西兰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威尔科克斯。

△ 中午，中国党政代表团去列宁、斯大林陵墓敬献花圈。

△ 下午，和杨尚昆在中国驻苏大使馆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中共总书记夏基。

---

〔1〕 会议，指即将召开的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此次会议主要讨论由苏共中央起草，二十六国起草委员参与讨论修改，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未达成一致意见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草案》。

△ 晚，中国党政代表团在中国大使馆开会，讨论苏共中央对中共中央《答复书》的答复。苏共中央的答复攻击毛泽东的论点有：“东风压倒西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以及关于中印关系、战争问题的论述等。会议认为如不加批驳，会造成混乱。为留有余地，拟定由邓小平发言。当即致电中共中央请示。

11月9日 上午，和邓小平到莫斯科越南代表团公馆同胡志明、黎笋会谈，介绍苏共中央对中共中央《答复书》的答复。

△ 下午五时，苏斯洛夫、科兹洛夫、米高扬、波诺马廖夫、安德罗波夫等五人，来刘少奇处同中共代表团会谈。苏方表示：（一）他们是受苏共中央委托向中方说明此次会议要持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立场。（二）赫鲁晓夫受苏共中央委托的讲话将是建设性的，没有争论的语言，不涉及答复书的问题。（三）两党的分歧今后还可以讨论，不要拿到这次会上来。米高扬说：希望两党的争论就此完结；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一定要继续下去，专家可以再派去的，外贸方面对中国某些要求是“业务部门”拒绝的，今后可以解决。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先后表示：中国代表团是抱着团结的目的来的，原定在会上讲一篇团结的话。你们的答复破坏了这种可能。你们一面说要团结，不争论，一面发出一百多页（俄文）的答复，这是你们主要的发言，表明你们要团结的话是不真实的。我们读完之后，将决定自己的立场，看来是非得在会上回答不可。争论是你们引起的。

△ 晚，中共代表团将会谈情况报告中共中央，同时决定：十日开始的讨论，由刘少奇、邓小平轮流出席会议，留一部分人修改发言稿。

**11月10日** 下午，中共代表团出席在克里姆林宫圣乔治大厅举行的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由赫鲁晓夫主持，并致欢迎词。会议决定由三十个国家的党各推一人组成大会秘书处。赫鲁晓夫在发言中，分段解释由苏方起草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草案》，一方面高喊团结，一方面为自己辩解，影射攻击中国共产党。他认为：“以苏联为首”的提法不正确，却又要各国“对表”〔1〕；说“要尊重大多数的意见”，却又“不能过分强调民族特点”，语言含糊，话中带刺。讲完后，会场鼓掌。但中共代表团全体成员和全部工作人员静坐不动，没有鼓掌。

**11月11日** 全天出席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听取加拿大、阿根廷、保加利亚、伊拉克、塞浦路斯、黎巴嫩、瑞士、乌拉圭、丹麦、墨西哥、荷兰等十一个国家党的代表的发言。这些发言吹捧赫鲁晓夫讲话，指责中共。

**11月12日** 上午十时至下午一时三十分，出席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听取匈牙利、哥伦比亚、卢森堡、希腊、尼泊尔、南非、委内瑞拉等七个国家党的代表发言。哥伦比亚代表提出要成立一个国际常设机构的建议，和昨天加拿大代表提出建立一个常设委员会来解决纠纷的建议，异曲同工。各代表团纷纷打听中共代表团何时发言，持什么观点。

---

〔1〕 赫鲁晓夫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三日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讲话时曾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应该“不落后也不抢先，形象地说，‘就是互相对表’。”

△ 晚，和刘少奇、邓小平等在中国驻苏大使馆讨论邓小平十四日的发言稿。中共中央定刘少奇在第二线，邓小平、彭真在第一线。

11月13日 晚，中共代表团继续讨论邓小平十四日的发言稿。

11月14日 上午，出席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继朝鲜劳动党代表发言后，邓小平发言。发言分五大段，全篇摆事实、讲道理，说明中苏两党分歧是由苏共挑起的，苏共在国际会议上搞突然袭击，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撤走专家，撕毁两国签订的协议、合同，又把两党分歧首先公开在全世界面前。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大肆吹捧，在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面前说中国的发展会酿成“黄祸”，要阿登纳帮助他们对付中国。赫在兄弟党面前说的“分工协作”、“平等协商”是假话，所谓“对表”就是要大家跟着他的指挥棒走。发言通过事实，表达了团结的愿望，揭露了赫鲁晓夫破坏兄弟党团结的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发言四小时，全场肃静，气氛紧张。

△ 晚，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阿利雅。阿利雅认为邓小平的发言有内容，明确，坚定。

11月15日 出席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全天会议共有八人发言，吹捧赫鲁晓夫，围攻中共。特别是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公开指名说中共搞宗派主义。当晚，中共代表团致电中共中央，汇报会议情况，请示在声明草案签字问题上的斗争方针，提出：及时表示声明草案不作原则修改，我决不能签字，并发表声明，以稳定左派，争取中间，打击右派。

△ 在中国驻苏大使馆和邓小平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

尔科克斯和主席杰克逊会谈。

**11月16日** 出席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午有八人发言，下午有四人发言。阿尔巴尼亚代表霍查在发言中严厉批评赫鲁晓夫。

△ 收到周恩来给中共代表团复电。复电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代表团昨日请示的意见，一切应作最坏的打算，由代表团全权决定。政治局明日将开会讨论。

**11月17日** 全天出席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会上共有六人发言。波兰代表在发言中谩骂阿尔巴尼亚代表，苏共代表带头鼓掌。没有鼓掌的有中国、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南非、英国、印尼、缅甸、马来亚、泰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代表。

△ 收到中共中央电示。电示说：完全同意代表团关于签字问题的意见，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去打算，不签字不等于分裂。

△ 刘少奇拜会胡志明和巴西代表普列斯特斯，向他们说明中共代表团的態度。邓小平同缅甸、马来亚、泰国三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谈话，又会见了阿尔巴尼亚的阿利雅，通报了中共代表团对签署会议文件的立场。

**11月18日** 全天出席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第八次全体会议。会上共有十人发言。上午，罗马尼亚、比利时、巴拉圭、土耳其、危地马拉的代表发言。下午，约旦、蒙古、新西兰、西德、苏丹的代表发言。新西兰代表威尔科克斯在发言中认为：赫鲁晓夫的“无武器、无军队、无战争”的口号是散布幻想，等于说帝国主义的本性变了，资产阶级的本性也变了。新西兰是为和平过渡而斗争的，但有困难，因为不完全决定于自己，在资本主义的中心国家，和平过渡是否可能，

值得怀疑。认为“派别活动”，在文件中以不写为好，中国是尊重苏联的，争取和平的，没有在他们面前攻击过苏联，不能说中国好战，搞派别活动。分歧应该协商解决。

**11月19日** 全天出席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第九次全体会议。巴拿马、印度尼西亚、芬兰、圣马力诺、北爱尔兰、瓜德罗普和洪都拉斯的代表作了发言。印度尼西亚代表鲁克曼主张删去“派别活动”和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两段，取消“民族共产主义”一词，建议像一九五七年发表的《莫斯科宣言》一样，文件只由社会主义国家的党签字，资本主义国家的党自己去作决定。他的发言在会场上有一定影响。会议发言攻击中国党和阿尔巴尼亚党的调子不如以前，气氛开始发生变化。对签字问题议论纷纷。赫鲁晓夫和霍查未到会。

△ 晚，中共代表团在中国驻苏大使馆讨论我方第二次发言的问题。

△ 中共中央函复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同意你们对于不提苏联为首为中心问题所采取的立场。”

**11月20日** 下午，刘少奇和彭真、杨尚昆、李井泉、陆定一在他的住处同波兰代表团团长哥穆尔卡等人会谈。波方对声明草案提出两点意见：（一）把苏共二十大写入声明草案，文字上照抄《莫斯科宣言》，不写二十一大。（二）“派别集团活动”要写上，写法可以用未来式，使人不会误解是指对中国。刘少奇答复：（一）在国际文件中，不能把哪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作全面肯定，奉为共同准则。何况我们对这两次会议都有意见。只写二十大也不能同意。（二）“派别集团活动”，明明是在指责中共。不能使这种反中共的活动合法化。如果写上，中共代表团绝对不能签字，这是中共中央批准的态度。哥穆尔卡无言对答，随即告辞。



**11月21日** 全天出席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第十次全体会议。会议听取玻利维亚、缅甸、哥斯达黎加、马来亚、印度、泰国、厄瓜多尔、阿尔及利亚等八个国家党的代表发言。发言最突出的是缅甸、马来亚、泰国的代表。缅共总书记巴登顶完全不同意苏共的意见，说：“三无”的口号只有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之后才能实现。苏共二十大提出和平过渡时，我们正在进行武装斗争，缅共内部的修正主义者立即提出放弃武装斗争，专搞和平，一时造成了混乱，领导者叛变，游击队中逃兵大增，损失很大。《莫斯科宣言》出来后，混乱逐渐停止。缅共是主张和平斗争方式的，但反动派不会甘心。修正主义是缅共的主要危险，他们以苏共二十大决议来反对缅共。一九五七年，缅、泰、马三国的党曾致信苏共对和平过渡表示过自己的不同意见。巴登顶提出：“集团派别”问题不能写在决议上，可改为加强团结的话语；“民族共产主义”一词应去掉，不能以“派别活动”来压人。

△ 晚十时，中共代表团在中国驻苏大使馆开会，讨论会议情况和中共代表团的斗争方针。

**11月22日** 全天出席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听取日本、多米尼加、锡兰、澳大利亚、尼加拉瓜、海地、秘鲁等国的代表发言。日本代表袴田里见提出：未达成一致的意見不应载入文件，应力求耐心地同志式地讨论一致；分歧不应外传，发展到国际群众组织中去不好；要尊重各兄弟党的独立，常设委员会不能马上成立。下午发言完毕时，会议主席宣布：一般性讨论结束，明日上午继续开会，由赫鲁晓夫发言。中共代表团当即报名，要求作第二次发言。

△ 晚，中共代表团在中国驻苏大使馆开会，讨论第二次

发言内容。

**11月23日** 上午，出席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会议听取赫鲁晓夫发言。赫有意放低语调，但仍不顾会议在一般性讨论中已经在时代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过渡、裁军和民族解放等问题上达成的协议，指责邓小平的发言“不知分寸”，“是对苏共的污蔑和诽谤”，极力主张将苏共二十大、“反对集团派别活动”写入会议的声明书；公然说，中国党许多意见是不对的，主张是错误的，甚至含沙射影地攻击毛泽东。还说，中共目前处境困难，不要为了自尊，不承认自己的错误等等。讲话共一小时四十分钟。赫讲话完毕，会议有组织地鼓掌起立。中国代表团安坐不动，也不鼓掌。朝鲜、阿尔巴尼亚、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缅甸、泰国、马尼拉、新西兰代表也未鼓掌起立。当会议主席宣布发言结束时，中共代表团要求讲话，因已到散会时间，赫鲁晓夫提议可否明天讲，邓小平说可以。旋即散会。

△ 中共代表团回到中国驻苏大使馆，开会讨论邓小平第二次发言稿，直至次日凌晨二时。

**11月24日** 上午，出席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第十三次全体会议。邓小平作第二次发言，集中回答了两个问题：一、究竟我们是坚持了还是违反了《莫斯科宣言》？二、究竟我们的立场是为了维护团结还是威胁团结？驳斥了赫鲁晓夫对中共的攻击和污蔑。发言约四十分钟。苏共主席团成员全体到会。会议休息时，苏方与会者全体出动组织大家发言，气氛紧张。休息后，印度代表高士和缅甸、泰国、马来亚、尼加拉瓜、新西兰、爱尔兰、加拿大等国代表，要求不再讨论。赫鲁晓夫站起来表示，应该让大家发言，苏共代表愿意听下去。从上午到下午，共有二十五位代表发言，主要表明各自的政治

态度。印尼代表鲁克曼发言指出：看来分歧仍然存在，很难一下解决，会议使用的方法是以多数对少数，这不是完全正确的、最好的办法。如果这样，就意味着有国际统一机构存在。一定要写上反对集团活动，没有好处，只意味着有一个发号施令的中心存在。他还指出：危险不在于有分歧，在于用不正当的方法解决分歧。并且提议未达成协议的问题，不写进文件，留待以后讨论解决。他的发言引起全场震动。下午的会议，刘少奇、邓小平未到会。

△ 中共代表团在中国驻苏大使馆开会，讨论会议的情况，并就声明草案签字问题致电中共中央请求指示。

**11月25日** 上午，率康生、胡乔木、刘宁一出席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全天讨论、争论的中心是文件中写不写苏共二十大问题，未达成协议。

△ 晚，中共代表团致电中共中央：胡志明今日邀日本、朝鲜、印度、印尼、澳大利亚、英国、古巴等代表团谈话，共同商定，分别致信赫鲁晓夫和刘少奇，要求接见他们，陈述他们的意见，并建议赫鲁晓夫和刘少奇面谈，以求团结一致。请中央指示。

**11月26日** 上午，出席起草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对声明草案的前四个部分讨论完毕，只剩第五部分。代表团同周恩来通电话，周告知：中共中央今日下午讨论，关于文件签字问题，将和各中央局书记共同商讨后告。

△ 下午四时，和刘少奇、邓小平、杨尚昆在刘少奇住处同苏共代表团米高扬、科兹洛夫会谈。苏方表示，对中国党政代表团会后访问苏联的邀请仍然有效。刘少奇说：原计划会后访苏，这与会议结果有关，我们应在良好的气氛下进行访问。我们在机场已表示了团结的愿望，但苏共十一月五日的信散发

后，情况变了。此次会上，赫鲁晓夫两次讲话，表面讲团结，实际上却散布攻击中共的信，会内会外大规模地围攻中共代表团，会议是在错误的方针指导下进行的，现已走到边沿，如不改变，将受历史的谴责。声明草案，本已基本上获得协议，但你们坚持要写上“民族共产主义”、“集团派别活动”等字句，肯定“二十大、二十一大”，还要搞一个内部决议专门谴责中共。我代表团不能在这样的文件上签字。苏方一再辩解，表示协商是应该有让步的，具体说，“民族共产主义”可以删去或改写；“集团派别活动”可改写，或搞一个内部决定，但苏共二十大不写入文件，将意味着受到了大会谴责。会谈达三小时。

**11月27日** 下午三时，和刘少奇、邓小平、李井泉、陆定一、杨尚昆在中国驻苏大使馆会见越南的胡志明、黎笋，印度的高士，澳大利亚的夏基，朝鲜的金昌满、金一，印度尼西亚的鲁克曼和日本的袴田里见等八人。他们希望中苏两党团结，赫鲁晓夫、刘少奇直接面谈，中苏两党找出道路，使之能达成一致的决议，避免分裂。会谈达三小时。

**11月28日** 上午，出席起草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将声明草案中有关“民族共产主义”内容删去，其余几个有争议的问题挂了起来。刘少奇未出席。会议将近结束时，苏斯洛夫宣布，将几个争议问题报告各代表团团长，起草委员会何时开会，另行通知。

△ 晚，收到中共中央对中共代表团请示电的复示。精神是：要做到仁至义尽，巩固左派，争取中间，暴露右派。在“二十大”问题上可以让步，但绝不能同意写“集团宗派”和作内部决议。

**11月29日** 和康生、胡乔木出席起草委员会第四次会

议。会议先由波兰代表提出不应删去“二十大”、“二十一大”的内容，古巴代表提出修改“集团宗派”的提法，会议多方争论无结果。苏斯洛夫即提出组织由十三国代表参加的小委员会，会议转入小委员会的成员问题的争议。中方提出小委员会中增加一两个党的代表被苏方拒绝后，当即严正申明：亚洲方面只有中国党参加，其他兄弟党一个也没有参加，这太没有道理了。我们拒绝参加。会场空气紧张。彭真随即约科兹洛夫到另室单独谈话，责问苏方用意何在？指出：如果要破裂，请你们公开宣布，我们将发表声明谴责你们。在科兹洛夫连声否认并表示要搞好会议后说：既然如此，我们两人是否可以达成君子协定：第一，不做任何内部决议，不但反华决议不做，以多数压少数的决议也不能做。第二，文件上不能写“反对民族共产主义”、“反对派别活动”这类影射指责中共的文字。第三，要写上协商一致的原则。第四，同意写上苏共二十大，但措辞要修改。科兹洛夫表示：肯定苏共二十大的内容要写上，文字或照抄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或另行商定，“二十一大”可以不提；所谓集团派别活动的内容“虽有意义”，但同意删去；“个人崇拜”问题可以考虑不写；可以写上协商一致的内容；内部决议可以不写。听完科兹洛夫的表态后对他说：我们是在列宁像前达成协议的，我们要负责报告各自的代表团长。同时商定，在中苏双方未谈好和形成文字之前，起草委员会和已经成立的十三国小委员会暂不开会；约定时间由赫鲁晓夫和刘少奇会谈。单独商谈约一小时。中苏代表团各自向本部报告后，起草委员会宣布休会。下午七时回到中国大使馆。

△ 晚，苏方来电通知，赫鲁晓夫明日上午十时在他的办公室会见刘少奇和刘认为需要参加会见的其他人。

**11月30日** 上午，和刘少奇、邓小平同赫鲁晓夫、科兹

洛夫、苏斯洛夫会谈。双方都表示希望结束争论，使两党两国关系恢复到一九五七年以前的水平。刘少奇强调：苏中团结、十二个兄弟国家团结，十分重要。关于刘少奇以国家元首身份访问一事，商定为期五天至一周，陪同访问的有杨尚昆、李井泉、陆定一、刘宁一和刘晓及有关随员，报中共中央后定。

△ 下午三时，出席起草委员会会议，最后商定修改有争议的几段文字。

**12月1日** 上午十一时，出席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闭幕大会。会议通过《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公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简称《莫斯科声明》）、《告世界人民书》，并举行了文件签字仪式。刘少奇代表中共代表团讲话并签字。

△ 下午四时，和邓小平、李井泉、杨尚昆在中国驻苏大使馆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卡博、阿利雅。

**12月2日** 下午一时，出席苏共中央举行的招待各国党代表团的宴会。邓小平在会上讲话。宴会至五时结束。晚，和邓小平率中国党政代表团部分成员乘坐苏方提供的两架飞机离开莫斯科返北京。胡志明和越南党政代表团与我代表团同行。刘少奇等继续在苏联进行国事访问。

**12月3日** 下午一时三十分（北京时间），和邓小平率领部分中国党政代表团成员回到北京。胡志明率领的越南代表团同机抵达。

△ 下午，和邓小平、康生、胡乔木、廖承志在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汇报出席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情况。五时三十分，陪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会见胡志明及其所率的越南党政代表团，并共进晚餐。饭后，共同观看了文艺演出。六日上午，和周恩来、朱德、邓小

平、李富春等到机场为越南党政代表团离京回国送行。

**12月4日** 晚，和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陈毅、贺龙、陈伯达、康生、聂荣臻等出席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的会议，听取萧华〔1〕、罗瑞卿汇报解放军总政治部整风情况。会议开至次日凌晨一时四十分。

△ 在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选区投票选举第四届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12月7日** 下午，出席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邓小平报告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的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的工作情况。

**12月9日** 下午，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李富春等去首都机场迎接刘少奇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回到北京。同机回国的代表团成员还有：李井泉、陆定一、杨尚昆和刘宁一。

△ 晚，出席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的会议，听取刘少奇汇报参加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访问苏联情况。

**12月11日** 下午，出席中国朝鲜友好协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都各界一万人参加的报告会，听取中国访朝军事友好代表团副团长罗瑞卿作访朝报告。会议由中朝友好协会会长李德全主持。

**12月12日** 晚十时十分至次日凌晨一时，列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周恩来、李富春汇报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

**12月13日** 下午，到机场迎接加拿大共产党总书记蒂

---

〔1〕 萧华，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姆·布克和夫人，及同机到达的取道中国回国的日本共产党的袴田里见和西泽富夫。他们都是参加莫斯科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后来华的。

**12月14日** 出席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会议听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关于一年来西藏工作情况的报告。

**12月15日** 上午，和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等在北京车站迎接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及其随行人员。

△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朱德、陈毅等会见西哈努克亲王一行。

**12月16日** 上午，和邓小平、陈毅等出席周恩来召集的会议，讨论老挝局势。

△ 晚，和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陈毅等出席刘少奇为欢迎西哈努克亲王访华举行的宴会。

△ 晚十时至次日零时四十分，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罗瑞卿、韦国清〔1〕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讨论韦国清去越南问题。

**12月17日** 下午，陪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西哈努克亲王一行。

**12月18日** 晚，和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朱德等出席西哈努克亲王为他访问中国举行的宴会。

**12月19日** 下午，参加刘少奇同西哈努克亲王的会谈。

△ 下午，和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等出席首都各界一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

---

〔1〕 韦国清，时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



敦·西哈努克亲王集会。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庆祝中柬两国政府签订中柬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

△ 晚，和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等出席中柬友好协会和全国妇联在人民大会堂为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举行的酒会。当晚，一起观看了中柬艺术家在人民大会堂的表演。二十日上午，前往火车站送周恩来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去外地访问。

△ 晚九时五十分，出席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会议开至次日凌晨二时。

**12月20日** 下午，和康生在人民大会堂向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介绍在莫斯科举行的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情况。

**12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二十三次会议。会议讨论工业生产的整顿和将于二十四日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准备工作等问题。发言说：回国以后，面对工农业生产的困难，感到有压力。农业搞了十二条紧急指示〔1〕，有了政策。解决工业问题，也应先抓政策，不然容易打击面宽。（一）要总结经验。这几年，计划搞大了，下面拼命作战，近两年来休整很少，结果作战挤了休整，日常工作挤了政治思想工作。河南、安徽、湖北，不是工作不好的地方，问题出在日常工作挤了政治，市场上物资短缺，人心较浮动。（二）上下级关系问题。上面交的任务，下面干部有意见，省里两头受挤。煤炭部这几年出了多少煤，但搞了多少基本建设？一对比就看出基

---

〔1〕 十二条紧急指示，即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建和生产不相适应。工业和农业不同，工业、财贸是党直接管，生产任务是指令性的，农业管得比较虚。所以，要让下面给中央提意见。（三）不要一面倒。毛主席一讲话，下面不顾实际情况，一呼隆地搞，这种作风不好。大搞水利中，工地上搞扫盲，不准劳逸结合，当然不行。要养成根据实际条件执行中央指示的作风，一是实事求是，一是群众路线。有不同意见提出来。这些都需要冷静地想一想，总结经验，整顿作风，写出文件，试点后分批进行。

△ 下午，和邓小平同郭沫若等谈郭沫若率中国友好代表团应邀参加古巴革命胜利两周年庆典事宜。

**12月23日** 晚，和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谭震林等出席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的有各中央局书记参加的会议。会议听取农村生活安排和整风整社情况的汇报，讨论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开法。

**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总结近两个月来各地区整风整社的经验，形成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会议确定一九六一年所有社队都必须以贯彻执行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为纲，进行整风整社，彻底检查和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简称“五风”），彻底清算平调账〔1〕，坚决退赔。会议纪要在十二条紧急指示的基础上，又确定了农村工作的若干具体政策。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九六一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

**12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二十四次会议。

---

〔1〕 即一平二调。

会议讨论粮食调拨和外贸等问题。在谈到各地有瞒产问题时说：这是各省留后手，以便好安排生活。现在要少出新花样，好好安排好生活，切实抓好粮食收购。群众“偷”回家的粮菜，要下决心宣布归群众所有，群众就放心了。清仓多出来的粮食也不调走，要留给他们备荒。各省要沉住气，狠狠抓生活。为缓和纸张缺乏，在谈到县报是否停刊时说：先改为三日或五日刊，省报肯定要出版。

**12月27日** 下午，和陈云、邓小平、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聂荣臻等出席周恩来召集的会议，讨论国务院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问题。

△ 晚，出席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第二书记参加的会议。会议听取中央工作会议各小组汇报讨论情况。

**12月28日** 听取有关人员汇报中央煤炭工业会议情况。说：经历了两年大灾荒后，生产还能保持现有水平，这是好的。我们管经济还不熟练。现在煤很紧张。辽宁轻工业停了不少，影响到国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三年大战，煤矿需要休整，但是又要煤，这就要求边战斗边休整。政治思想工作是不是放松了？要经常了解干部及群众的思想活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要执行，但行政方面的事由行政去管，不要由党委包办，否则就成了党委书记一长制。行政管理不健全，必然会由党委代替。职工代表大会还是要开，问题要集中，事先研究好再开。干部下去劳动，要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否则起不了挂帅的作用。规章制度要有破有立，不要等破了、乱了再立。一些发明可以大胆试验，但是要拿稳了再推广。

**12月29日** 上午，到机场迎接来我国访问的古巴哈瓦那市长何塞·利亚努萨。

△ 晚十时十分至次日凌晨一时四十五分，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老挝局势和干部问题。出席会议的还有罗瑞卿、韦国清。

**12月30日** 上午，到机场为周恩来率领的中国友好代表团访问缅甸送行。

△ 下午，出席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第二书记参加的会议。会议听取宋任穷〔1〕、李雪峰〔2〕汇报中央工作会议东北、华北小组的情况。

**12月31日** 出席中共北京市委、市人委邀请的各部门负责人和各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在会上讲话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工农业、文化教育各方面都有很大发展。解放那年，工业产值只有一亿七千万元，今年是一百多亿元；那时大、中、小学在校学生共有二十万人，现在有一百五十万人；机械工业，北京现在已有一定基础。当然，离四个现代化还远，特别是目前我们的生活很紧，全市粮食定量人均减了三斤，肉每人每月只有四两。原因是两年大灾。我国共有十六亿亩耕地，去年六亿亩受灾，今年九亿亩受灾。其中三四亿亩是重灾。有些地方旱情严重，一百多天不下雨，是百年未遇的。现在我们城市的生活比农村好，农村每人每天半斤粮，靠瓜菜代。问题是首都人民没有灾荒的准备，所以灾荒一来，感到紧得不得了。我们不准备再压低粮食定量，要想种种办法把副食品搞好一些，还要克服工作上的缺点。大家要齐心协力战胜灾荒，克服灾荒给我们带来的困难。

---

〔1〕 宋任穷，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

〔2〕 李雪峰，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

---

△ 和罗荣桓、李富春出席邓小平召集的会议，讨论有关干部处理问题。

## 1961年 五十九岁

1月1日 下午，陪同古巴哈瓦那市市长何塞·利亚努萨一行，在北京体育馆观看篮球和乒乓球比赛。

1月3日 晚，陪同毛泽东会见古巴哈瓦那市市长何塞·利亚努萨。四日下午，去机场为古巴客人回国送行。

△ 晚十时二十分至次日凌晨一时三十分，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第二书记参加的会议。会议听取李富春汇报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

1月4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二十五次会议。会议听取李维汉汇报西藏问题。

△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会议听取李富春作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

1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杨静仁关于西藏工作问题的汇报。

1月6日 收阅中共中央转发的中共河南信阳地委《关于整风、生产救灾情况报告》，批示郑天翔、陈鹏、冯基平：“此件很好，可发各县委和郊区委，认真研究，作参考。”信阳地委在报告中提出：在一切社队，都必须一边抓整风整社，一边抓生产救灾。毛泽东在这句旁加写：“一边抓群众生活。”强调这三件事必须结合起来，同时做好。毛泽东并批示：“这是一个好文件，全国三类社都应照此执行。”

1月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中央工作

会议的有关文件。

△ 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第二书记参加的会议。会议听取各中央局的汇报；讨论《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及召开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的有关问题。

1月12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二十九次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邓小平准备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作的《关于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草稿）》；安排八届九中全会的议程。在讨论一九六一年生产指标时说：今年钢定为一千九百万吨，一波〔1〕要抓紧，不要影响农业，煤也要抓。在谈到要防止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时说：斯大林犯了这个错误。

△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八届九中全会各组组长参加的会议。会议讨论全会的安排问题；听取周恩来汇报访问缅甸的情况和老挝局势。

1月13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听取毛泽东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恢复实事求是精神的讲话。当毛泽东讲到工业生产不要追求数量而要提高产品的规格、质量、品种，提高劳动生产率时，插话说：生产率低有三个因素：一、非生产人员多；二、培训人员和学徒多；三、“小土群”、“小洋群”生产技术低。

1月14日—18日 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会议讨论并通过邓小平《关于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会议还讨论了李富春《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一年国民

---

〔1〕 一波，即薄一波。

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通过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强调一九六一年全国必须适当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降低重工业发展的速度，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实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并决定在农村深入贯彻《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后通称为“十二条指示”），进行整风整社。会议批准上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成立六个中央局〔1〕的决定。十八日会议闭幕时，毛泽东在全会上讲话，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努力学会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并希望一九六一年成为调查研究年。刘少奇讲了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问题，陈云讲了市场粮食等问题。

**1月15日** 晚，和刘少奇、邓小平会见并宴请澳大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夏基。十六日上午，和刘宁一等去机场送夏基经广州回国。

△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八届九中全会各小组的汇报。

**1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三十次会议。会议讨论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度粮食包干意见的请示。在讨论中提出：粮食包干要按中等收成的年景包，去年是灾年，现在每日只有几两粮食渡荒，搞包干办不到。若按现在的标准包，一定是包得低，秋后必然要上涨，包了又要失信。还说：现在农村正在贯彻“十二条指示”，整风整社，反“五风”，抓退赔，自留地增加到百分之七，只要这

---

〔1〕 即中共中央东北局、华北局、华东局、中南局、西南局和西北局。



些政策兑现就好办。现在咬牙过几个月，要先把公社的生产稳下来搞好。周恩来、陈云参加会议。

**1月17日** 下午，和周恩来会见并宴请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斯皮罗·科列加率领的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

△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八届九中全会各小组的汇报。

**1月18日** 出席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闭幕会。

**1月20日** 出席邓小平召集的会议。会议讨论修改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公报稿；听取王恩茂关于新疆问题的汇报。出席会议的还有李富春、刘澜涛、胡乔木、薄一波、陈伯达、吴冷西等。讨论修改八届九中全会公报稿时，周恩来到会。

**1月21日** 听取张鼎丞汇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张鼎丞在汇报中说：中央批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合署办公后〔1〕，检察院有些干部认为这样做，势必削弱以至取消检察工作。对此明确指出：关于我国检察制度、检察机关，中央从来没有说过不要，也没有下过不要的指示。三年来你们审查了一百八十万件批捕案件，批准逮捕了其中的百分之八十，顶住了百分之二十，这就证明检察工作起了作用。

**1月23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三十一次会议。会议讨论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后的工作安排、全会精神传达问题。周恩来参加会议。会议决定：周恩来负责联系冶金部和劳动部；陈云联系化工部；邓小平联系石油部和铁道部；彭真联系煤炭部和森林工业部；李富春联系各机械部。会议还

---

〔1〕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批复谢富治的报告中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合署办公，对内由公安部党组负责，两院各出一人参加公安部党组。

决定：邓小平外出视察期间，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由彭真主持。在发言中强调说：中央工作会议后，各地不要再发一批重复会议精神的文件，关键是要抓工作，搞措施。木材、煤炭等重要物资，中央要统一分配。经委工作统归薄一波管，业务性的问题可以直接下达，不要事事经中央批。

**1月24日** 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报送的《关于中央一级机关精简干部情况和分配处理意见》上批：“刘、周、邓、富春、谭〔1〕核阅。拟同意。对于老弱病残的干部要注意妥善安置。”

**1月25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三十二次会议。会议讨论编写高等学校教材、加强理论队伍和铁路运输等问题。发言说：工业生产的规章制度，要先立后破，不可一日无制度；学校的教科书也要先立后破。文教小组要限期选定几种供学校使用。要通知蒋南翔〔2〕，自然科学的书，新的不发，旧的不废，不立不破。要加紧组织编写力量，可以从民主人士和老年干部中找一些人参加编写。哲学教材可由胡绳编写。三月底审定，我负责安排印制。在谈到暂缓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第六卷时说：毛主席讲话的记录，应该学习；但是，有些讲话是他的定论，有些是思考过程中的想法。为了爱护主席，不要乱传。请各位同志注意要真正领会毛主席讲话的精神。

△ 下午，听取张霖之、罗玉川〔3〕汇报煤炭和木材生产的情况和问题。

---

〔1〕“刘、周、邓、富春、谭”，指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和谭震林。

〔2〕蒋南翔，时任教育部副部长。

〔3〕罗玉川，时任林业部副部长。

△ 晚，列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毛泽东离京后的工作安排；听取周恩来汇报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贸易代表团会谈的情况。晚十二时，毛泽东离开北京赴南方。

**1月26日** 下午，出席邓小平召集的会议。会议听取余秋里汇报石油生产情况。邓小平指出：为了克服当前工业战线的困难局面，书记处要用军队作战的办法，统一指挥，从计委、经委、军委抽人成立秘书处，分别联系各部门，及时掌握钢铁、化工、机械、石油、铁路运输和煤炭调运的情况，及时提供给彭真参考。运输的次序是：一、粮食、小农具；二、煤炭、木材；三、出口和市场供应物资；以及冶金、化工等物资，三天碰一次头。要既管政治，又管业务和干部。彭真在发言中强调说：工业战线有些人被困难吓倒了。要在第一季度想尽办法，使产量上去，而不是五月份才上去，否则今年会比去年更艰难，更被动，很可能一千九百万吨钢完不成，一千八百四十万吨也成问题。

**1月27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会上张霖之、罗玉川分别报告当前全国煤炭、木材生产情况和对今后生产的意见。和薄一波分别讲话。参加会议的有各中央局、各有关省委主管工业的书记、煤炭、林业厅（局）长和重点厂矿负责人等。

△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三十三次会议。周恩来参加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当前工业生产各口如石油、木材、煤炭等的工作安排问题。在发言中说：（一）关于木材生产。据报告，北方现有待运的木材三百万立方米，因管理体制和运输能力问题，运不出来。原有的七十二个管理局，一九五八年由森林工业部下放，省里又不管，分散到地、县。运输车

辆，应日发七百多车皮，现至多四五百车皮。建议：（1）所有管理局、林业局，由中央主管部门和省双重领导，将来收归中央。（2）七十二个林业局所有木材，统归省支配，地、县用材再调拨。（3）劳力问题，黑龙江和内蒙古要求抽调一批人下山搞农业，鉴于目前煤矿坑木紧张，待完成运输任务后再调回劳力。（4）运输的次序是，一星期内把木材场待运的木材分类，先运坑木；铁路用煤每月两千二百万吨，半月之内拨足合格的煤。煤矿要求二月底存二十天的备用坑木，可先备用半个月。南方各省，由柯庆施、陶铸安排。（二）关于煤炭生产。上年一季度日产煤七十一万吨，现在只有五十七万吨，许多单位出勤率只有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现要求六十一个大矿生产的煤，统归中央调配。一周内，每个掌子面的生产任务都要安排好。煤炭生产要两条腿走路，一手抓采煤，一手抓掘进，两者要形成比例。会议还要求石油部作出规划，争取一九六四年在松辽平原生产石油一千五百万吨，并把川南的天然气利用起来。

△ 在转发农业部党组《关于越冬作物生长情况和备耕工作的检查报告》上批：“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为了争取今年农业的丰收，各省、市、区党委，特别是县、社党委，必须一手抓整风整社，一手抓生产；一手抓越冬作物的田间管理，一手抓春耕或春耕准备工作。否则就不可能保证今年农业的丰收。请你们务必及早抓紧，注意整风生产两不误。”经报送刘少奇、陈云核阅后于二十九日下发。

**1月28日晚**，同周恩来商谈问题。

△ 下午，和邓小平、杨尚昆听取郭沫若、夏衍<sup>〔1〕</sup>关于率中国友好代表团访问古巴的情况汇报。

---

〔1〕 夏衍，时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

**1月29日** 主持关于煤炭、木材生产的紧急电话会议。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六十一个直属煤矿、东北和内蒙古各个林业管理局的负责人等参加会议。在会上讲了五个问题：（一）煤炭、木材的产量事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如果三月份前煤炭、木材、钢材、化工、运输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不解决，今年完成一千九百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是有困难的。重点要把解决煤炭和木材问题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单位，煤矿要落实到掌子面，林业落实到采伐区。（二）煤炭和林业也要两条腿走路，一是生产，一是生产准备。在煤矿，即一手抓当前生产、掘进；一手抓设备维修，抓装卸、调运。一手抓队伍整顿；一手抓规章制度的建立健全。一手抓数量，一手抓质量。抓今天，又要想到明天。这样，经过一个时期后，就不至于忙乱，就会有秩序地顺利前进。（三）关键在领导和发动群众。领导干部要冷热结合，全面安排，不能顾此失彼。领导同志下去，不仅限于劳动锻炼，而要了解情况，解决问题。要找一两个典型（好的和坏的）解剖两个麻雀，发号施令才有依据。要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指标就可靠了。（四）设备维修，厂矿企业首先要千方百计挖掘潜力，自力更生，解决各种问题。其次是主管领导部门千方百计调材料、增加设备。坐等上级，就把时间拖过去了。（五）中央直属的煤矿和林业局，目前产品由中央统一分配；各省的需要可以集中报中央，由中央统一安排。

**1月30日** 上午，主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会议决定撤销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其业务合并到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准中国和柬埔寨王国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调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孙志远为新成立的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针对有人讲我们国家这么困难为什么还要援助别国的问

题，在讲话中，列举事例说明对外援助是相互的，我们援助了别国，别国也援助了我们。强调说：对付帝国主义，不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还要靠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如果亚非拉的民族革命运动起来了，帝国主义要想打仗就感到困难，我们就比较安全。

1月31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三十四次会议。会议讨论新成立的第三机械工业部的工作问题。在讲话中明确三机部及其所属从一机部分出的军工企业，今后归国防工业办公室直接管理。当前的工作是：（一）关于整风问题。军工企业在整风中澄清政治路线是必要的。目前农村整风整社，中央已制定了“十二条指示”，各省、市、区党委正在大力贯彻。工厂企业的整风，中央还没有制定条例。各部门要全面铺开，城市和农村两面作战，领导被动，工作搞不好。因此，三机部的整风报告，中央暂不批发，而是先摸清所属工厂企业的情况，进行试点。试点大体上按好的、中间的和问题严重的单位分类排队，取得经验。试点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整什么。彭、黄〔1〕的影响不可能每个单位都有，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二）整风、生产两不误。军工企业的根本任务是军用第一，有余力可搞民用产品。民用部分归口由薄一波负责。规章制度，质量标准，新的未立，旧的不要破。科学试验、新产品试制，要放手支持，失败了，再来。但大量投入生产，一定要经国防工办批准，有的要经中央军委批准。设计、试制，过去有外援，现在要靠自力更生，但要实事求是，有些原材料还得靠进口。

△ 晚，陪同刘少奇接见古巴芭蕾舞团团长费尔南多·阿

---

〔1〕 彭、黄，指彭德怀、黄克诚。

隆索和主要演员，并观看了他们的演出。

△ 在谢富治关于公检法三机关党组分开设立的报告上批示同意。经刘少奇、周恩来核定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即恢复单独设立党组。

**2月1日** 上午，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希尔，就中苏两党的分歧问题交换了看法。

**2月2日** 审阅聂荣臻报送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关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南京航空学院、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和西北工业大学，及上海交通大学划归国防科委领导的通知，送刘少奇、周恩来、谭政核阅。六月，中共中央发出此件。

**2月4日** 上午，出席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第一季度粮食调拨和棉花收购等问题。在发言中回顾了我国历史上几次大的自然灾害的情况后，建议：（一）中央发个文件，号召全国上下齐心协力，艰苦奋斗，节约用粮，勒紧裤腰带，半劳动力少吃点，保证劳动者坚持生产，不然会造成新灾荒。（二）从省到村专设一个管粮食和群众生活的书记，有组织地战胜灾荒。停止基层粮食盘点过秤的办法，以安定民心。（三）进口粮食不要期望过高，顶多指望百分之五。

△ 下午，和周恩来、陈毅、李先念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刘少奇召集的会议，讨论援助阿尔巴尼亚等问题。

**2月7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三十六次会议。会议讨论公安工作及当前煤炭、铁道、轻工业生产及运输方面的问题。讨论时发表意见如下：（一）关于对敌斗争，目前要特别注意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隐藏的反革命分子，要抓住时机好好整一整，集中力量调查城乡的敌情，搜集

情况。劳动教养，可以搞个期限，半年到三年。期满以后，表现好的由公安机关介绍进工厂、农场就业，坏的可以延期或判刑。劳教同劳改要严格区别。县以下不准办劳教，农村不得搞行政拘留，刑事拘留必要时可延至三天到五天。捕人权不要下放。（二）检察院的存在与否，不要再讨论，这是中央的事。为了精简，公、检、法三个机关合署办公，但分设三个党组，直接对中央负责。下边的检察机关不要取消。（三）煤炭生产是当前工业生产的中心环节。去年，各煤矿采煤和掘进的进度大体上是平行的，现掘进上不去，要增加点力量。矿工的生活，中央给以保证，所需粮食由姚依林负责调拨，三天后到矿；所需设备和器材，由薄一波、谷牧〔1〕负责，二月份限期补上。出勤率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矿，要表扬；百分之八十以下的矿，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要做好矿工家属的工作，轻劳动和不劳动的，节衣缩食，保证下井的重劳动力吃饱，井下工可由食堂送干粮。总之，中央各部、各省、各矿务局都要尽职尽责，抓紧布置，把指标落实到掌子面、井口、矿务局，三月份恢复秩序，四月份产量稳步上升。轻工业生产，由谭震林和薄一波安排，要讲工农联盟。

**2月8日** 下午，到周恩来处谈话。晚，到刘少奇处谈话。

**2月10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三十七次会议。会议讨论高等学校教科书的编写和钢铁、煤炭等生产问题。在讨论教科书问题时说：几年来，教育改革有成绩，但是对教科书编写工作抓得不紧，北大有百分之二十二课程没有

---

〔1〕 谷牧，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教科书。解决当前教科书的办法是：（一）定<sup>〔1〕</sup>、编、借<sup>〔2〕</sup>。暑假结束前，教育部要准备好教科书。大学中暂时没有教科书的课程要有讲义。要立“军令状”。（二）大学要有相当多的参考书。现在的馆藏图书，借阅限制多，利用系数小。各大图书馆，大学生都应可以借书；如不借给，就查其图书利用系数。（三）鼓励师生结合编写教材，但推广使用，要经过选定。不能因编新而废旧，新的不出来，旧的不能废除。（四）要分工负责。基础课教材归教育部管。地方大学要废旧教材，须经教育部批准。科学、生产方面的革命，不同于社会革命，不应先打烂再说。中宣部、文教小组要召集会议，搞出具体措施，一条一条地定下来。关于学制改革，十年一贯制试点已达到十分之一，不要再扩大了。高中要适当发展。高中一放松，大学就没有合格的生源。部分农村中小学半日制，文教小组要另行研究。以上各项，二月底订出计划，逐一落实。在讨论生产问题时说：工业生产在煤炭生产的阴影下，西北局、东北局、华东局有的部门有右倾松劲情绪，少奇同志讲应发警号了。下星期要召集部长开会，专门批评右倾松劲。冶金部、一机部和铁道部三家要各写一个报告，准备三月初把生产搞上去，搞一个全民增产节约运动。冶金部要千方百计抓紧设备维修，所需材料，各厂打开仓库，互通有无。二月下旬煤上去后，冶金、机械、煤炭要商定方案赶上来。

△ 下午，陪同刘少奇、周恩来等接见中央民族学院政治

---

〔1〕“定”，指从全国各地编的教科书中，每种课程选定一种，统一印制。

〔2〕“借”，指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教科书，短期内编写有困难的课程，可采用苏联的；苏联没有的，可用资本主义国家的。

系干部训练班毕业的学员。

**2月11日** 阅核《关于陈毅副总理兼外长访问印度尼西亚的计划》后，将意见告刘少奇、周恩来和陈毅：“赫〔1〕在一些国家中同美在比赛金钱、物质援助，这是以自己较弱的方面同敌人较强的方面竞赛，我看这是赫的一种下策，不是上策。我们对某些亚非拉美国家给些援助是应该的，同赫的做法和方针根本不同。但，凡是美苏都在给援助的国家，我似应极力防止陷进去。在物质援助方面的力量，我们是无法同它们比赛的，也犯不着去比。因此，我很同意总理在三、四页的批示。”

**2月13日** 下午，和周恩来、陈毅等出席首都各界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集会，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一周年，并观看了首都文艺界的演出。晚，和周恩来、陈云、陈毅等出席苏联驻华大使馆举行的庆祝招待会。

**2月14日** 下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三十八次会议。会议讨论二三月份煤炭供应计划。周恩来参加会议。发言说：最近摸了一下煤炭生产情况。二月下旬日产量如达到五十万吨，打九折分配，不要打得太满。大同矿的设备、粮食都到位了，而出勤率只有百分之七十。当前，第一是要鼓足干劲，第二是要采、掘双跃进，第三是后勤保证，第四是分配打九折。煤上去后，冶金、铁道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对冶金、铁道、机械三个部要发出警号。煤炭部、冶金部要鼓足干劲，同时要沉住气，计划好，安排好，不要急躁，要冷热结合。周恩来向会议通报了各省粮食紧张的情况。会议要谭震林起草一个文件，要各地千方百计动员工人家属，从不劳动者、少劳动者的口粮中挤一点给劳动者吃，克服困难，不要把希望寄托在

---

〔1〕指赫鲁晓夫。

进口粮食上。

△ 下午，和陈毅、谭震林、章汉夫等到周恩米处，讨论老挝局势。

△ 出席陈毅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一周年举行的招待会，招待苏联和各国友人，并一同欢度春节。

2月14日—3月6日 第十一次全国公安会议召开。会议根据刘少奇、彭真的指示精神，制定了《关于当前公安工作十个具体政策问题的补充规定》。补充规定指出：对某些敌我界限不清，介乎两类矛盾之间一时不易划清界限的问题，应当有意识地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划一条“缓冲地带”，可以有效地防止混淆两类矛盾，更准确地打击敌人。四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公安部党组关于会议情况的报告和会议通过的政策规定、决议。

2月17日 上午，约张霖之、安志文、宋养初、李立三〔1〕等讨论煤炭生产问题。下午和晚上的会议，谷牧、吕正操、吕东〔2〕参加，继续讨论。讲话指出：煤炭要生产、掘进双跃进，现最大问题是第一线的人少。抚顺矿务局十万人，但井下只有九千多人。定员十六人的掌子面，只有七人。干部没有办法，工人一肚子气。这种情况，光开会派工作组不行，关键要解决第一线的人力问题。要发动群众整风，让干部、群众提意见，贴大字报，推动局、矿领导。合理的意见，马上解决；不能解决的，说清原因。然后再在采区讨论生产，固定掌子面，固定人员、工具，层层建立责任制。工资问题，计件工

---

〔1〕 安志文、宋养初，时均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李立三，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

〔2〕 吕东，时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

资取消后，不给奖励，一九五八年搞了跃进奖，计时加奖励，但指标层层加码，根本完不成，长期无人过问。今后，超过部定的指标就给奖。通过整风，问题一个个解决。这样，三月份增产有希望了。

△ 晚，到周恩来处商谈问题。深夜至次日凌晨，到刘少奇处商谈问题。

2月18日 下午，和周恩来等出席首都各界五十万人的分头集会，抗议美国、比利时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杀害刚果总理卢蒙巴的罪行。

2月19日 上午，召集安志文、张霖之、王鹤寿、徐子荣等研究钢煤生产、市场供应、财政金融情况和整风问题。在发言中说：一月份经济情况不好，主要原因是农副产品供应少，工业生产惊人下降。煤矿工人的口粮中央已经调拨，下一步要把政治思想工作跟上去。政治思想工作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抓群众中的具体思想问题。比如第一线人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交接班时间长等问题。三年跃进没来得及抓整顿队伍。领导上要主动收集群众意见，解决问题。同时要选若干矿作典型试验，全面整风，各找一个好的和一个坏的，比较研究。到一定程度再大鸣大放，大整大改，边整边改。六十一个重点煤矿要各派一个工作组下去，力量强一点，着重调查研究，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具体问题结合起来，落实到班组一级，只做不吹。开始不用整风的名义，但有整风之实。不然，即使生活、设备问题解决了，生产还是上不去。钢铁生产还要抓“大、洋、群”问题。

△ 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面报告当前工业生产和市场、财政、金融情况。报告说：“现在的工业生产和市场、财政、金融情况很不好，也可以说是蕴藏着危险的。”（一）夏收

以前，“整个城乡的粮食情况极为紧张”，各省区间调入调出“越来差额越大”。有同志建议适当进口一点粮食以应急，报告认为“决不能指望它解决多少问题，不要把作用估计高了，否则是危险的”。渡过灾荒的根本的办法是号召全民节约，增产各种粮食和瓜、菜。“不劳动的人自觉自动地少吃一点，多挤一点粮食给劳动的人吃，轻劳动的人也尽可能挤一点粮食，给重劳动的人吃”；还要挤一点粮食给耕畜、役畜吃，以免“劳动力大为削弱，使耕畜死亡和瘦弱，造成新的农业灾荒和减产”。为此，建议中央发一个指示，一直下达到支部。（二）现在财政、金融和市场供应很紧张。一月份财政收入只及去年同期的一半，银行现金收支差额十二亿元，票子的发行额已到达中央批准的控制线；一月份商品零售额和去年同期比减少二十三亿元，“不仅影响到工农关系，也影响到城乡整个群众的生活，影响到党和国家同全体人民的关系”。因此，当前在千方百计解决煤炭产量的同时，还必须抓紧轻工业即日用品的生产，使钢、铁、电力和化工原料等的生产一同上去，不然市场、财政、金融将发生极大的困难。（三）造成困难的原因，报告认为：一是“两年连续的特大天灾和部分地区和工作单位的‘人祸’所造成的农业歉收”；二是“工业生产的惊人下降”。特别是煤炭、钢铁产量惊人下降。原因何在，其说不一。报告认为干部、群众的意识形态，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具体地说，主要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好好抓，没有好好安排职工生活，而生产中的具体问题和措施又心中无数，没有一一落实”。报告最后说：煤炭产量估计三月中旬可以上去，造成当前困难的问题我们正在研究，将另作报告。

**2月20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工农业生产问题。

△ 中共中央批转煤炭部、粮食部党组关于煤矿工人恢复一九六〇年上半年粮食定量情况的报告。

**2月21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三十九次会议。会议讨论并决定在全国煤炭企业推广抚顺市胜利矿持续跃进的先进经验。讲话指出：胜利矿是政治挂帅同业务具体措施相结合的典型。结合全国煤炭企业双跃进的实际情况，讲话提出以下措施：（一）做好设备维修、后勤供应工作。（二）加强采掘第一线的力量。（三）提高工时利用率。（四）继续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五）建立责任制。掘、采各有责任，煤炭部要向中央汇报采和掘的进度。设备、维修、协作都要搞责任制。（六）工资要以计时为主，计件为辅；奖励要以中央计划的生产指标为准。

△ 下午，主持全国煤炭工业系统领导干部电话会议。在会上讲了三个问题：（一）工业生产形势和煤炭生产的主要问题。指出：一月份全国钢的日产量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四十三个百分点，轻工业产值下降一半多，上海、天津同比只等于三分之一左右。主要原因是煤炭产量上不去。煤矿的掌子面进尺下降；井下回采、掘进力量弱，出勤率低。中央直属的四十四矿，一月份相当一批矿的出勤率只有百分之八十多。为解决实际困难，最近中央决定给煤矿增加十三万人，加强掘进力量；矿工的口粮，照去年十月中央关于保持重体力和特重体力劳动力的粮食定量的决定，也有所增加。今后，很多单位产量再上不去，“看来畏难、松劲、空谈、不切实采取有效措施”是主要原因。（二）现在怎么办？一是各矿务局的采区长、支部以上的各级党委的领导干部要自觉地检查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和自己的思想，从实际出发，既要克服不从客观实际出发的“左倾”主观主义，又要解决不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右倾情绪，

要鼓足干劲，充分利用客观可能和发挥主观能动性，搞好工作。二是要安排好群众生活。办好食堂，保证井下工人、干部在班上吃一顿饱饭，有条件的，要把饭送到井下去；做好职工和家属的思想工作，节约粮食；切实掌握劳逸结合。三是抓紧以下生产措施：调一批干部到掌子面、采区工作，加强第一线的领导力量；充实回采和掘进力量；提高工时利用率；抓紧设备和巷道的维修；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建立责任制和规章制度；落实奖金等。（三）政治挂帅，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这几年主要精力集中在“向地球开仗”上，没有及时整训队伍，很多单位政治思想问题成堆，生活问题成堆，生产中的问题成堆。本应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搞一次整风，但是生产任务紧张，目前只能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办法，放手发动群众揭发工作中的错误、缺点，迅速地一批一批地解决。煤炭部六十一个直属矿中，最重要的有三十个，产量占百分之九十。中央和省、市、区委要多放点力量，组织工作组，帮助下面出点主意，大家主动承担点责任。三月三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将讲话纪要印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中央直属企业党委和中央直属各矿支部以上党委。

**2月22日** 晚十时至次日凌晨一时，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听取周恩来汇报一九六一年基本建设计划安排和一九六一年粮食情况。

**2月24日** 上午，到刘少奇处商谈问题。

**2月26日** 下午，和周恩来等出席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

△ 审改中共中央《关于坚决完成粮食调拨任务保证粮食

收支平衡的紧急通知（草稿）》。在“目前的困难是很大的，但是只要全党动员，一心一德，上下一致，同甘共苦”一句之后加写：“并且使城乡全体人民，都深刻地认清连续两年特大灾情的严重，大家节衣缩食，千方百计地实行瓜菜代，大家自觉地，半劳动的少吃点粮，不劳动的更少吃一点，以保证劳动的人，特别是重劳动的人有必要口粮，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避免因劳动力减弱而造成新的灾荒，这是当前全党和全体人民的共同任务。”

**2月27日** 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煤炭、钢铁、电力和交通运输问题。

△ 晚，到周恩来处商谈问题。

**2月28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四十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务院各工业部门和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共二十一人。针对当前工业系统整风问题讲话说：（一）工业部门整风，生产不能停。现煤炭、电力、轻工、纺织、机械部门生产任务都很紧，整风要围绕完成生产任务进行。（二）三年大跃进成绩伟大，但确有许多问题要解决。大家忙于业务，没有抓活的政治思想工作，有些单位问题成堆。现情况似明不明，整什么问题，靠调查研究。每个部选一两个问题多的和中间状态的单位，发动大家鸣放，不划框框，把所有的问题揭露出来，然后归纳起来。这是很快的调查研究办法。现十一个省市的工业部门已搞了二百九十九个试点，每个部也要搞一两个点，作为镜子照照自己。这样，工业整风就有依据了。（三）整风的方针，除了需要夺权的单位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检查工作，总结经验，改进作风，促进生产。各单位的分类排队要从宽，由领导部门掌握，不下达。群众起来后，就会找出主要问题。（四）规章制度，和一九五八年前比，确有点



乱，这是前进中的乱。过去我们照搬人家的，现在从整个讲不是回到一九五七年以前。大量的的是总结大跃进的经验，加以具体化，形成新的规章制度，同时吸收人家好的经验。（五）工交战线党的基层建设是个问题。煤矿井下党员少，财贸系统基层也是一样。连队没有党组织，班里没有党员，军队就不能打胜仗。

**3月2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听取李先念汇报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大会情况。

**3月3日** 下午，和邓小平等听取周恩来谈外出视察的情况。晚，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听取邓小平汇报外出视察情况；讨论苏联提议的贷款方式给中国一百万吨粮食和转口古巴五十万吨糖的问题。

**3月4日** 上午，和周恩来、邓小平乘飞机去广州，向住在小島招待所的毛泽东汇报工作。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国际形势和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问题，以及苏联提议以贷款方式给中国一百万吨粮食和转口古巴五十万吨糖一事。

**3月5日**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工业生产和市场供应等情况和毛泽东谈人民公社体制问题。会议决定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将公社及核算单位划小。会议决定南方三个中央局（中南、西南、华东）和北方三个中央局（华北、东北、西北）分别在广州、北京召开会议，讨论农村人民公社有关问题。

**3月6日** 中午，从广州打电话告在北京的杨尚昆：主席处已决定将人民公社及生产队的核算单位划小，并立即分南北两地分别召开中央局和省委负责人的会议，北方三个中央局的

会，在北京召开，可由杨尚昆先行通知。

△ 下午，和周恩来、邓小平同机回到北京。当晚，列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周恩来、邓小平汇报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情况，讨论召开北方三个中央局的会议问题。

3月7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四十一次会议。会议讨论和安排当前工作、工业生产和市场供应、外贸内贸分设等问题。会上邓小平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其要点是：（一）二月二十七日，赫鲁晓夫致信毛泽东，拟以贷款方式供给我麦子一百万吨和转口古巴糖五十万吨。毛主席意：粮食不要，糖可接受。（二）划小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的规模。（三）编制国民经济发展的二年计划和七年计划。（四）工业工作要抓整风。同时提出中央不要多发文件，要注意调查研究。邓小平还讲：毛主席对书记处、各部门工作是有意见的。会议决定本月十一日召开中共中央华北局、东北局、西北局负责人及其所属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研究改进人民公社体制问题。周恩来、陈云参加会议。

△ 在陈野苹<sup>〔1〕</sup>关于甘肃省有的公安机关扣留人民群众和干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信件的报告上批示谢富治：此类事“不仅政治上不能容忍，党的纪律、国家法律——不管哪一方面都是不能容忍的，是一种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请告各地参加会议<sup>〔2〕</sup>的同志，以后绝对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和纪律。”

〔1〕 陈野苹，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2〕 指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四日至三月六日召开的第十一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会议将彭真的批示以《对一个简报的批语》为题印发，并于会后发各地公安机关查纠。

**3月10日** 同郑天翔等谈北京市工业交通系统的整风问题。从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中开始，中共北京市委发动全市三百二十七个主要企业六十二万职工，从政治思想、企业管理、职工福利以及贪污盗窃等方面解决了一批问题。为推动整风运动深入，谈话指出：（一）要进一步发动群众，全面地大鸣大放，解决工作中一个指头的问题；建立系统的、条块结合的责任制度；研究改进劳动组织；除生产上的个人奖励外，还可以提百分之十的集体奖。通过鸣放，摸清情况，搞出工业方面的“十二条”。（二）要向三个方面深入：一是密切结合生产，二是改善干群关系，三是纠正消极疲塌松劲，官僚作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资本主义经营风。建立制度，提高队伍素质。先集中力量在四十一个国营大厂开展，两个星期为一个战役。再进一步搞地方国营厂和合并的小厂。（三）政治部是党委的办事机构，在整风中要成为群众之家，可以挂牌子，设接待室。要平等待人，讲民主，有问题和群众讨论，不要训话，更不准打击报复。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华北局转发了北京市委《关于工业交通企业整风运动的情况和当前整风部署向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报告》。

**3月11日—13日** 出席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华北局、东北局、西北局第一书记和所属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即北三区会议）。会议汇报和讨论划小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和工作条例问题。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第一书记和所属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会议（即南三区会议），两个会议的内容相同。十五日起，两个会议在广州合并，改称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3月12日** 下午，到机场欢迎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

维·威尔科克斯访华。

**3月13日** 收阅毛泽东关于认真调查公社内部的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及参加北三区会议同志的信。信中指出：“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也希望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做指导工作。”

**3月14日** 上午，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先念、谭震林及各中央局参加北三区会议的人员乘专机去广州。

△ 晚，在广州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中央工作会议的议程和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等问题。

**3月15日—23日** 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后通称为“农业六十条”）。这一文件对于纠正人民公社社队规模偏大、对下级管得过多过死，和生产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生产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有重要的作用。会议还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

**3月18日** 中午，和陶铸、李井泉、柯庆施、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向毛泽东汇报会议各小组讨论情况。

**3月19日** 下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南、华东小组会上讲话说：“几年来工作出了不少毛病，无论农业、工业、交通等方面都存在，有时工作搞得很被动”，原因出在没有调查研究。总路线是普遍真理，中国这么大，情况千差万别，每个部门、每个单位都要调查研究。毛泽东思想也是普遍真理，也需要与具体情况相结合。大家对毛泽东思想和总路线是拥护的，但是缺乏一种唯物主义者应有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在执行中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在民主革命时期，党曾经犯过几次路线错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毛主席的领导，不犯路线错误是很可能的。农村的问题，毛主席做了系统的调查研究，提出解决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工业也要照这样做。中央书记处的同志，过去也发现过一些问题，但没有抓住调查研究，没有联系人民公社和工厂做调查，作为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会的助手，工作是有缺点的，或者是抓一下又丢掉了。总的是不够的。我也是有缺点的，热多冷少。毛主席对我们的批评是完全对的。

**3月21日** 下午，列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研究《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第三稿。

**3月23日** 凌晨，到毛泽东处谈话。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听取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讲

话。当天，会议印发了毛泽东《关于调查工作》〔1〕一文。

**3月24日** 从广州到武汉。

**3月25日** 上午，和周恩来、邓小平等从武汉乘飞机返回北京。

△ 下午，和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前往中山公园参加陈赓〔2〕的公祭大会。陈赓三月十六日在上海病逝。

**3月26日** 和周恩来、董必武到机场为陈毅出访印度尼西亚送行。

**3月27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四十二次会议。会议听取邓小平传达广州会议情况。在发言中说：书记处做了很多工作，根本问题是没有认真调查研究，许多问题虽也有所察觉，但没有抓紧查清楚，提出解决的办法。一个发现问题，一个走到基层，只有做到这两点，才能当好毛主席和常委会的助手。现在我们马上要做调查研究的组织工作，各部委、各党组也要联系点典型。调查研究是毛主席长期提倡的，是百年大计，但我们发扬不够。这一次，毛主席提出人民公社体制中的两个平均主义，表明毛主席调查研究比我们多。这几年，我们没有很好地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一阵风来了随着转。

△ 下午，同周恩来、邓小平、杨尚昆等讨论老挝局势。

△ 下午，和杨尚昆去看望黄克诚。

**3月28日** 同煤炭部、林业部负责同志谈煤矿整风和木

---

〔1〕《关于调查工作》一文，是毛泽东一九三〇年五月写的。此文后来收入一九六四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及一九九一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

〔2〕陈赓（一九〇三——一九六一），生前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国防部副部长。

材生产问题。

**3月29日—31日** 出席中共中央办公厅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报告会，听取邓小平传达广州中央工作会议精神。

**3月30日** 晚，主持全国煤炭工业系统领导干部电话会议，再次谈整风问题。指出：二月二十日电话会议后，煤炭生产有进步，“但总的进步不快”。三月份，六十一个大矿平均日产煤五十四万多吨，与去年比，减少十六万吨。近几个月来，矿井没有出事故，劳动力总数比去年四月还多；虽然副食品供应差一点，粮食还是吃得饱的。为什么产量仍然上不去呢？三年大跃进，煤的总产量由一亿三千万吨增长到四亿二千五百万吨，成绩是很伟大的。但是在跃进中，领导尽让人家鼓足干劲，没有让人家提意见，大家有一肚子意见。所以“现在应该进行大鸣大放，大整大改。”据京西矿务局试点，在四万多职工中，六天时间，提出了二十多万条意见，平均每人五条。这是多快好省的调查研究方法。采取这个方法整风，应注意几个问题：（一）关键是干部带头鸣放，给领导提意见，促进问题的解决。（二）边鸣放，边整改，以整改促进鸣放。（三）党委、行政领导要有分工，真正做到整风、生产两不误，整风促进生产。经过大鸣大放，思想、生产、生活三个方面成堆的问题解决后，就可以进一步鼓足干劲搞生产等。

**3月31日** 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华北局报送《关于工业交通企业整风运动的情况简报》。简报说：北京市在九十八个主要企业、五十万职工中开展的整风运动，现已从大鸣大放进入大整大改高潮。半个月内，群众提了二百多万条意见，其中关于领导作风方面的占百分之三十左右；生产和企业管理方面如原材料、工具、协作件、配件等供应不及时、质量不合格等占百分之三十左右；生活福利和劳动保护方面的占百

分之二十五左右；政治、文化、技术方面的约占百分之十五。运动的特点是：“群众发动快，风格和觉悟高，效果好。”京西矿务局三月下半月和上旬相比，煤的日产量增加了百分之一一点八。四月五日，中共中央将北京市的简报批转给各省、市、区党委，并指出：要全面调动干部和群众的政治和生产积极性，“不进行全面的大鸣大放、大整大改，问题是不可能迅速获得全面和彻底解决的”。整风运动的关键，“是干部有无思想准备、有无放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整大改的决心，是领导干部有无真正地‘引火烧身’，干部和党团员是否真正带头鸣放”。另一个关键是“边鸣放边整改”，“造成一种群众鸣放越多，领导整改越快越好，大家越高兴，使鸣放和整改互相促进，造成一种干部和群众都欢欣鼓舞的鸣放整改形势”。

**4月1日** 上午，会见加纳驻华大使科比纳·克西。

**4月2日** 审阅《中共中央统战部一九六〇年工作的总结和一九六一年工作的安排》，并代中共中央拟写批语：“中央同意统战部对今年工作的安排，并请你们抓紧下列工作：（一）系统地调查研究各阶层、各类型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他统战对象的思想、政治动向。（二）按照党的方针政策，检查和改善同这些党外人士的共事关系。”

**4月3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四十三次会议。会议决定组织十个工作组分赴东北、华北、西北和河南、山东、四川等地进行农村调查，决定邓小平、彭真去北京郊区顺义县和怀柔县进行调查。讲话强调说：到农村调查，主要是研究解决两个平均主义和改变作风问题，不是代替基层干部工作，要采取做小学生的态度。

△ 出席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作《关于国内外形势和当前任务的报告》。会议通



过决议，批准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友好条约。

**4月4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四十四次会议。周恩来参加会议。会议讨论国家计委党组《关于安排一九六一年基本建设计划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

△ 下午，和周恩来、邓小平、贺龙等出席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幕式，并接见了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各国朋友。当晚，和周恩来等出席贺龙举行的欢迎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各国朋友的宴会。五日，前往新落成的北京工人体育馆观看比赛。

**4月6日** 下午，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集的报告会上向中央党、政、军及北京市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传达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共讲了五个问题：（一）三年的成绩伟大，事实证明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但是有“一两个指头的错误和缺点”。列举三年来钢、铁、煤炭、机床和水利灌溉面积增长的数据后说：“暂时的困难是严重的，具体说，现在粮食紧，副食品、日用品紧，因为轻工业品（原料）主要来自农业。这是关系到六亿八千万人的生活问题。”提醒大家，在遇到暂时困难时，不要忘记伟大成就。（二）关于农业问题。前年受灾面积六亿亩，去年受灾面积达到九亿亩；工作中“五风”很严重，主要是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和平均主义，还有浮夸风，到处搞高指标，敞开肚皮吃饭，造成很大的危害。还有百分之二十的三类队，领导权被反革命和蜕化变质分子篡夺了。中央已制定了解决农村问题的“十二条指示”和“农业六十条”，情况开始好转了。但最少需要两三年才能恢复元气，所以还是要一面增产，一面节约，坚持执行粮食消费方面“低指标、瓜菜代”的原则。国民经济建设要以农业为基础，按农、

轻、重的排列次序安排工作，只有农业过了关，才能主动。

(三) 工业问题。今明两年钢的指标每年一千八百四十五万吨，数量不增，在品种、质量、技术上跃进，“总的方针是填平补齐，配套成龙”。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缩短重工业战线，以加强农业战线。基本建设战线太长，人力物力都分散，只会少慢，而不会多快。因此，要削减六百多个建设项目，继续进行的一千八百多项，要集中力量打歼灭仗，这正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建设。工业战线也要大鸣大放、大整大改地整风，解决“成了堆”的问题。

(四) 市场供应，还会紧张一个时期。只有农业恢复了，才能根本好转。因此大家要咬紧牙关，吃苦耐劳。

(五) 调查研究。产生错误缺点的根本原因是缺乏调查研究，放松了一直坚持的好作风。中央书记处已决定组织十个调查组到农村去调查。学校、企业等各部门都在学习毛主席《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今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样，整个工作很快会有所转变。

**4月7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四十五次会议。会议听取谷牧汇报第二季度工业生产安排和李先念汇报外贸、粮食情况。

**4月10日** 上午，召集国家计委、经委，冶金部、煤炭部、三机部、林业等部委的负责人开会，讨论工业生产安排问题。

△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四十六次会议。会议讨论中央最近的工作安排和企业整风问题。

**4月中旬—5月中旬** 和邓小平率五个调查组，分别到北京顺义县和怀柔县调查人民公社的规模和体制问题。邓小平以顺义县为主，彭真以怀柔县为主。怀柔县有四个人民公社，三十一个生产大队，每个大队平均二十个自然村，一千一百三十

户。怀柔县《关于社队规模问题》的材料中反映，生产大队规模太大，分配上有拉平现象，“三包”〔1〕不好落实，开会多，浪费多，干部不能深入等。十二日，彭真阅后批示刘仁、郑天翔：“从各方面的材料看，怀柔县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太大了，一般地必须划小，改为原高级社为单位。只是把生产队划小，不迅速把大队划小，不能解决问题。”并请刘仁将调查材料印发市委常委各同志阅，另“送小平、富春同志各一份”。又告郑天翔：市委应早下决心，对生产有利。

**4月14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四十七次会议。会议讨论中苏经济关系、对阿尔巴尼亚的军事援助和基本建设战线劳动力调配问题。在讨论基本建设战线上压缩下来的劳动力的安排问题时说：农村不缺劳动力，主要是解决平均主义问题，把积极性调动起来。

△ 午夜，和邓小平、贺龙、李富春、李先念等接见荣获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冠军、女子团体亚军，男、女单打冠军的中国运动员和中国乒乓球代表队领队、教练员、裁判员和参加这次锦标赛的其他中国运动员。

**4月15日** 晚，以北京市市长名义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庆祝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胜利闭幕。在讲话中说：这次世界锦标赛不仅使国际乒乓球运动的技术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而且在增进各国运动员的友谊和发扬崇高的体育道德方面，也做出了好的榜样。

**4月16日** 晚，出席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为庆祝苏联载人宇宙飞船胜利返航举行的酒会，并讲话祝贺。

---

〔1〕 三包，指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和小队之间的包用工、包产量和包肥料的分配办法。

**4月17日** 上午，和罗瑞卿会见老挝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老挝爱国战线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苏发努冯亲王，就解决老挝问题交换意见。

△ 下午，同刚从成都返回北京的周恩来谈工作。

△ 在怀柔县主持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的座谈会，听取先一步到农村调查的刘仁和市郊各县（区）委书记汇报调整人民公社社队规模的情况，并进行讨论。随同赴怀柔的五个调查组人员参加了会议。针对座谈中反映的问题，指出：这次调查研究最根本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调动社员的积极性，解决两个平均主义。人民公社过去的一些做法，不切实际，有损社员的积极性。农民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对他们要执行多劳多得、用政治挂帅和物质利益相结合的办法，调动积极性。社队的规模太大，社员对自己的切身利益“看不见，抓不住，管不了”。一般说，公社的规模以高级社为核算单位比较适应现在的生产力水平。核算单位大了，分配上就互相拉平。根本上解决两个平均主义，还要解决“三包一奖”、合理的评工记分、供给制的适当比例和减少非生产人员等问题。非直接生产的人员多了，劳动工分就不值钱了。解决社队规模问题后，这方面的问题就突出了。又说：办人民公社，我们没有经过详细的调查，没有经过典型试验然后推广。这次调查，要认真“解剖麻雀”，从生产、分配、管理等方面周密研究，找出解决两个平均主义的办法。

**4月18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四十八次会议。周恩来参加会议。会议听取邓小平在顺义县、谭震林在醴陵县调查情况的汇报。会议还研究决定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召开群众大会，支持古巴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雇佣军入侵的斗争。

**4月中旬** 视察北京电子管厂。

**4月20日** 在怀柔县主持召开调查组和怀柔县（区）委书记座谈会。针对大家汇报的情况，在讲话中说：（一）调动农民对集体经济的积极性，在所有制方面，首先是划小基本核算单位和包产单位。西三村大队有五十四户，是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下分三个生产组实行包产，生产搞得好，社员看得见、抓得住、管得了、信得过。这个问题已经看清楚了，就要下决心。（二）在分配方面，只有解决多劳多得，纠正平均主义，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如果干一天“不如老母鸡下个蛋”，社员哪会有积极性！多得不光是钱，还包括粮食、实物。政治挂帅要和物质利益相结合。合理的“三包一奖”办法，是解决生产大队与生产队、生产队与作业组之间的平均主义；公平的评工记分，是解决生产队、作业组与社员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平均主义不符合多劳多得原则，不是马列主义。还要研究如何提高工分值。现在社队非生产人员多，托儿所、敬老院占用很多整劳动力，要尽可能换成半劳动力，充实生产第一线。古人说“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工分值怎么能提高呢？（三）为了解决包工包产、评工记分的好经验，要到群众中去找几个典型，加以总结、推广，不要由工作组去搞，去套。工作组搞的典型经验，是“暖室里的植物”。要在比较自然的条件下，由干部群众自己搞出来的办法，加以比较，用这样的典型经验加以推广。

**4月21日** 上午，到怀柔县西三村大队了解公共食堂和社员家庭生活情况。

△ 下午，和周恩来等出席首都各界十万人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的集会，支持古巴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斗争。在大会讲话说：古巴军民在卡斯特罗总理领导下，奋起保卫祖

国，已经取得重大胜利，完全击溃登陆的美国雇佣军。古巴人民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斗争，也就是中国人民自己的斗争。当日，首都共有六十万人参加示威和集会。

**4月22日** 晚十一时，在住处同周恩来谈话。

**4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四十九次会议。会议讨论当前工业、农业、粮食、教育，以及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等问题。

△ 下午，和周恩来、陈毅等出席首都各界一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的集会，欢迎老挝王国政府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和老挝爱国战线党主席苏发努冯亲王访华。在大会讲话说：中国人民支持老挝人民争取独立、和平和中立的正义斗争，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破坏日内瓦协议、干涉老挝内政的侵略行为。老挝人民一定能够击败外国干涉者的一切侵略阴谋，迅速走上和平中立、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道路，使老挝成为一个独立、自由和繁荣的国家。

△ 晚，出席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宴会，欢迎梭发那·富马亲王和苏发努冯亲王及其他老挝贵宾。

**4月24日** 到怀柔县一渡河大队进行调查，并主持召开北京市郊区十个县（区）委书记参加的座谈会。在谈到解决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准备划小，解决平均主义问题时说：农民的自留地，耕得深，地整得又平又细，土色肥得发黑，集体的地一般比不上它。这是农民在耕地上给我们画的一幅讽刺画，告诉我们要调动农民对集体经济的积极性，要贯彻多劳多得的政策。人民公社在分配问题上要兼顾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的利益。首先，在粮食问题上，要解决好“购”和“留”的比例，即在包产的粮食总量中，扣除社员口粮、种籽、饲料后的余粮，国家收购九成，农民留一成；超产部分，“购四留六”，

这样瞒产私分现象会好一些。留给农民的部分，两个方案：大队储备一成，生产队机动粮留一成，按工分分配六成，按肥料分配二成，即一、一、六、二方案；另一个是二、一、五、二方案。这样，国家、集体和个人都有保障。卖给国家的粮款，大队留二成，小队留二成，按工分分配六成。这些方案，要拿到社员中去征求意见。他们接受了，心里踏实了，搞好集体经济的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另一个问题是供给制究竟供多少，食堂如何搞。这两个问题，牵涉到劳力少、人口多的社员和劳力多、人口少的社员之间的利益矛盾。现在不一定先定什么主意，要认真地摸一下群众的意见。不摸透，决心不好下。

**4月26日** 上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五十次会议。会议讨论煤炭生产、大学教材和公安工作问题。就这些问题发表意见：（一）关于解决部分地区煤炭生产秩序混乱和事故多的问题。指出：三年来问题成堆，看来还是要先整领导。东北、西北、华北各煤矿，未经典型试验，一下子铺开，结果只整下不整上。对好的领导干部，要一边整，一边给他们撑腰。对他们的错误，领导上要分担一部分责任，帮助好人过关。中央、省、市都承担一点，好人就站住了。物质方面也要撑腰，帮助解决矿工必需的胶鞋、毛巾、肥皂等，这样好人就站起来了。领导干部不纯的单位，是夺权的问题。（二）关于劳动力问题。指出：农村劳动力缺不是主要问题，北京市郊一个劳力只负担三亩半地。农业问题主要是平均主义。实行“三包一奖”后，劳动效率和死分死记相比高出一倍。工业劳动力要固定，满三年的临时工，司机、司炉、见习生等，合格的应转正；不够三年的，生产确实需要的，也固定下来；工资增加一些，该升级的要升级，奖金要给。计件工要调整定额，克服平均主义，奖励真正超额的。矿上要增加第一线人员，压缩非

生产人员。(三) 关于解决大学教材问题。指出：在自然科学教材中，只能搞学术批判，不能搞政治批判。毛主席讲过唯心主义也要学，但具体如何学，很复杂，要分析。不能说文科、哲学教材不能百家争鸣。还是三条：一是党的领导，二是各学派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三是向工农学习。不要乱贴标签。(四) 关于公安工作问题。指出：公安工作实际是专政工具，是保护政权的。公安部要重视调查研究，要注意历史，要有点对比。

△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五十一次会议。周恩来、陈云参加会议。会上，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修改“农业六十条”的指示。会议决定五月十五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后因有几省负责同志要求推迟几天召开，五月四日，中共中央通知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五月二十日来北京，起草委员会同志十五日到京。

**4月28日** 到怀柔县梭草大队进行调研。和刘仁召集北京市郊县（区）委书记开会，讨论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划小以及食堂和供给制问题。针对干部和群众对食堂和供给制问题争议较大、顾虑较多的情况，在讲话中说：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主要是生产方式的集体化。公共食堂办不办，办农忙食堂还是常年食堂，是生活方式问题，要客观地、全面地进行调查，从有利于克服平均主义，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的前提出发，比较利弊，破除迷信，不受清规戒律约束。调查时不要带着框框，要真正摸清群众的意愿。也可以办一批，散一批。关于供给制，原来讲三七开，现有人主张二八开，缩小供给部分；有人还主张对五保户、困难户实行补贴，或全部按劳分配，究竟怎么好，也要冷静地看看。要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坚持两



条：一是使劳动者高度发挥积极性，一是要补助五保户和困难户。又向调查组和县（区）干部提出，要进一步调查牲口归大队所有还是归小队所有；是大队所有，小队使用，或折价归小队；耕畜繁殖，小牲口归谁所有；柴山问题，过去没有划分清楚，造成乱砍滥伐，也应明确所有权。要抓典型调查，明确政策。

△ 下午，应约到邓小平处开会，听取杨尚昆汇报去河北省徐水县、安国县调查的情况。

**4月30日** 晚，和董必武、邓小平等出席国务院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招待会。

**5月1日** 和董必武、邓小平等参加首都群众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游园活动。当晚，和董必武、陈云、邓小平等同来自五十多个国家的外宾一起，在天安门城楼观看了广场上的联欢活动和节日焰火。

△ 和董必武、邓小平等出席首都各界一万五千多人举行的大会，为在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中国男、女乒乓球队祝捷。

**5月2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五十二次会议。周恩来参加会议。会议讨论日内瓦会议和老挝形势问题。会议还决定，中央派到各地的农村调查组应于五月八日返京，以便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起草委员会提供材料。

**5月3日** 上午，会见几内亚驻华大使卡马拉·穆萨·桑吉亚纳。交谈中说：“我们要互相学习，每个民族都有优点，每个民族都有向别的民族学习的地方。帝国主义就不承认这一点，说自己是优等民族，说被压迫民族是劣等民族。”

**5月4日** 在顺义县，和邓小平听取中央的五个调查组、

北京市委调查组刘仁、李琪〔1〕和各县（区）委书记汇报调查情况。关于供给制问题。根据怀柔调查的情况，发言说：现有两种意见，一是只补助五保户和困难户，其余的社员按劳分配，目的在于缩小供给的面，提高工分值；二是继续实行供给制，比例三七开或二八开都可以。为此，要刘仁汇报一个典型调查材料，来说明供给制对哪个阶层得益最多。刘仁说：大红门生产大队一九六〇年实行供给制，全大队一百五十一户中，地主、富农十九户，不出勤或出勤少的五十五户，合占农户的一半，在供给支出的十九万元中，他们得益最多。因此有人说供给制是“铁饭碗”，“出懒汉”。如果只补助三户五保户、三户困难户，年支出可减到一千五百元，不到十九万元的百分之一；劳动工分值可由八角提高到一元三角多。邓小平说：供给制并不合乎阶级路线，三七开不搞了，改为补助五保户、困难户。分配政策基本是按劳分配，搞“三包一奖”，评工记分，彻底改造死分死记的办法。关于食堂问题。在发言中明确主张：办和散“完全自由，完全自愿”。愿吃食堂的，按人计算百分之二的菜地归食堂，其余的退给生产队。食堂的开支单独核算，由入伙者负担。邓小平说：吃不吃食堂自愿；吃不吃食堂都给予方便，先定下这个方针，具体的再作调查比较。

**5月7日** 在顺义县主持召开中共北京市委扩大会议，市郊的县（区）委书记列席会议。会议讨论调整人民公社各项政策问题。根据调查所得，讲了以下意见：（一）关于粮食分配。要公私兼顾，有利于调动社员的积极性。至于包产计划变不变，口粮指标是否维持现有水平，都要走群众路线，由核算单位（大队）开社员代表会讨论通过。（二）过去普遍实行的供

---

〔1〕 李琪，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

给制，二八开或三七开，有平均主义的毛病，大家同意取消供给制，实行照顾五保户和困难户的办法。这样，五保户、困难户照顾得更好，省下的开支按工分分配。由公社代表大会决定后实行。对烈属要多照顾，特别是在山区的，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三）大力提倡养猪积肥。市郊至少要三百万头猪，国家要拿点粮食出来，社队要搞一套养猪积肥的补助办法。（四）要有领导地开垦荒地。十边荒地〔1〕纠纷多，由小队统一领导开，不征购，给社员记工分。山区要注意水土保持，不得乱开荒。（五）要恢复农副业生产。顺义县城一万多人口，只有一个百货商店，一个副食店，手工业、家庭副业，像编麦秆、柳条、苇席的都搞掉了，钉马掌的、打铁的、阉猪的都归公社了，因为报酬低，衰落了，没有兴旺景象。调查研究是向群众求真理，供销社、手工业社都要克服官僚主义，把经济繁荣起来。

**5月8日** 在怀柔县，同一渡河、范各庄、西三村、长园和北宅等生产队长和社队干部座谈，听取他们对有关政策的意见。讲话说：（一）对取消供给制，过去思想有框框，摇摆不定，经过调查可以下决心了。但是，对五保户，生产队不能不管；对烈属要照顾，对他们都不能忘记。对奶孩子的妇女、儿童的口粮，也要酌情照顾。（二）小片荒地，生产队要有计划地开垦，分别处理：田边地脚的，给种籽，给工分，土地归生产队；面积较大的，归集体耕种，补给工分和种籽；有损梯田、坝阶会造成水土流失的，收回土地，不给工分和种籽。（三）牲畜、农具，折价给生产队，款项分期归还；牲畜繁殖

---

〔1〕十边荒地，指可开垦和利用的湖边、河边、堤边、江边、水库边、渠道边、山边、田边、路边和村边等空隙土地。

也归生产队，死亡要查明责任和原因，由大队、生产队分别负担。（四）评工记分，一致同意不搞死分死记。一渡河的队长说定额包工，起早贪黑；干日工时，一天只多干四小时。一年早知道，早放下去，社员有奔头。郑州会议后，我们没有一直抓下去，迟抓了两年。

**5月10日** 和邓小平到密云县调查荒山所有制和加快绿化问题。

△ 和邓小平致信毛泽东，汇报近一个月来率五个调查组在北京市郊顺义、怀柔县调查的情况。信中说，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十二条、农业六十条指示下达后，市郊农民生产积极性已有很大提高。但从一个多月的调查情况看，有许多措施尚需改进，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如：（一）北京近郊各县生产队规模都已调整了，社也大部分调整完毕。多数是万把人一个社，大队一般以村为单位，生产队一般是五十户左右。实行责任制，使农民心里有了底。（二）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多数生产队赞成对包产部分“购九留一”，超产部分“购四留六”，包产指标高的队，超产征购的比例，可以低于四成。征购后的余粮，绝大部分应按工分分给社员。（三）供给制，“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坏处很多”。废除供给制后，“只对五保户生活和困难户补助部分实行供给，不仅可以更好地解决五保户和困难户的问题，而且可以大大提高劳动分值，更好地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四）“三包一奖”和评工记分。经验证明，几年来坚持“三包一奖”、评工记分的生产队年年都是增产的；没有执行按劳分配、“死分死记”或“死级活评”的队一般都减了产。（五）办食堂要完全根据群众自愿。“今后要办食堂的，一般应把食堂的经济核算同生产队分开”，食堂不要大了，应办小型的或自愿结合的。（六）耕畜和农具的归属，群众“普遍主张

农具归生产队所有；多数主张牲畜折价归生产队所有”。信中还建议“大力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家庭副业，“迅速恢复和健全供销社的工作”。十三日，毛泽东批示将此信“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 和李富春、王鹤寿、段君毅<sup>〔1〕</sup>、刘澜波、徐达本、罗玉川、孙志远、谷牧、安志文、于光远等座谈煤炭、钢铁、木材的生产布局和运输问题。发言说：今年钢的生产不急于追求数量，而要抓品种、质量、配套成龙。企业布局要合理安排，便于联合经营，如钢铁厂和机械厂，煤矿和发电厂应放在一起。轻工业产品还要考虑原料基地、市场和运输问题。同时，布局要有战备观念，不宜过分集中。木材的生产，要有纵的和横的布局。纵的方面，要采伐和育林双跃进，保持木材生产生生不息。东北和四川南北两线是采育并举，黄河流域，现森林已很少，重点是育林，长期绿化。横的方面，要在林木蕴藏量丰富、运输方便的林区建国营林场，农林结合，各业并举，做到国有、省有、社队和个人所有同时发展。在“八字方针”下，基建要下决心退一些，以便更好地跃进。当前，煤炭首先要保证铁路有一个月的存煤，大的发电厂有半个月的存煤；冶金企业先保证“大洋群”，第二步安排“中洋群”，再及“小洋群”。合金钢和精密仪器的分配，指标到部，由部和地方双重领导安排。

**5月13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五十四次会议。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准备工作、《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修改和工业整风等问题。

---

〔1〕 段君毅，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

**5月15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五十五次会议。会议听取陈国栋关于粮食问题的汇报。周恩来、陈云参加会议。

△ 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农村情况和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等问题。

**5月1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五十六次会议。会议听取赴河南、甘肃、山东、黑龙江四省十个农村调查组的情况汇报。

**5月18日** 上午，召集张霖之、马文瑞、宋养初等开会，讨论煤炭生产和煤炭系统整风问题。

**5月20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五十七次会议。会议听取薄一波汇报工业交通工作座谈会的有关情况。周恩来参加会议。

**5月21日—6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在中央和各地负责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修改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决定取消供给制，规定办公共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会议还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后通称为“商业四十条”）、《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后通称为“手工业三十五条”）。会议提出《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规定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二千万以上，本年内减少一千万。会议决定本年钢产量由原定的一千八百万吨降为一千一百万吨。会议期间，找有关同志继续谈煤矿生产和整风问题。

**5月21日** 中午，设午宴招待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代表团。晚，电话通知杨尚昆：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中央工作会议从二十二日起三天内上午看文件，下午开小组会。

**5月23日** 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就彻底退赔问题讲话。

**5月26日** 约杨尚昆、安子文谈对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的平反等问题。

**5月28日** 和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等到周恩来处讨论粮食问题。

△ 出席邓小平召集的有周恩来、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杨尚昆参加的会议，讨论第三季度和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度的粮食问题。

**5月30日** 审改公安部起草的《关于夏收安全工作的重要通知》稿。在批语中强调：“困难时期公安工作要特别注意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通知稿中“处理粮食纠纷的总的原则”处，加写：“属于集体瞒产私分和社员群众性的乱拿乱摸等人民内部问题，应该由公社的各级党委和行政根据省、市、区党委的指示负责处理，不是公安机关职权范围以内的事；属于反革命分子、地主、富农的破坏和真正的惯偷惯窃分子的偷抢，公安机关应该在党委领导下，依靠群众，加以防止和处理。”还加写了一段话：“如果一个生产队、生产大队或公社的群众成群结队偷抢另一个单位的粮仓、农作物等，应该首先报告党委、行政，通过群众路线解决，公安机关应该在党委领导下做具体工作，不要简单地用专政手段对待。”

**5月31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和压缩城镇人口的报

告。

**6月5日** 下午，和邓小平等到机场迎接中央委员会主席艾地为团长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六日晚，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董必武等会见并宴请艾地一行。

**6月6日** 上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粮食问题的九条办法》。发言说：（一）对人民公社的粮食包产，要因地制宜，有点灵活性，免得包死了，秋后不能兑现，失信于民。丰收的地区愿意包死，余粮全归生产队，我们要包活一点，以备荒年互相调剂。（二）关于粮食进口问题。不能过于指望进口粮食。进口粮食的外汇花多了，就把合金钢等短缺物资的进口挤掉了。如果外汇没有保障，和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不仅会丢人，而且会面临破产的问题。各省同志，特别是我们这些同志，不要太指望这个事情。（三）关于减少城市人口问题。除个别地方外，农业减产并不是因为缺劳动力。农业现在的问题，是怎样真正地、好好地贯彻“农业六十条”，把“三包一奖”、评工记分、定额管理搞好。搞好这些，农村的劳动力还是够的。工业人口是多了还是少了？煤矿原先说缺人，我也信了，补了十万人。现在了解，管理得好的矿，人是多了。有一个矿，按设计是两千人，现有一万一千多人。所有的工业部门人都多。（邓小平插话说：还是我们的老章程，要控制编制人数，控制工资总额）但是光靠工业减人，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工业部门的职工只有两千一百万人，减少城镇人口，需要采取很多措施，不仅工业要减职工，别的方面也要减人。历史上，减人会弄得天怒人怨，但还是要下决心减。

△ 晚，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希



尔，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问题、和平过渡和非和平过渡等问题交换看法。

△ 晚，会见离任前来辞行的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帕里夫蒂。

**6月8日** 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讲话，谈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

**6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五十八次会议。会议讨论刘少奇准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及大学招生等问题。

**6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毛泽东就总结经验、教育干部等问题讲话。

△ 和周恩来、董必武、李富春等到机场迎接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和他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当晚，出席周恩来为欢迎范文同一行举行的宴会。

**6月13日** 和宋任穷、欧阳钦、吴德〔1〕、黄火青商议后，对鹤岗矿务局和黑龙江、吉林两省国营林场的管理体制提出两项办法，请邓小平、李富春、谭震林阅核。两项办法是：“（一）国营大企业的组织机构、行政管理、经济核算等完全独立，与所在地的城市人民公社间的经济来往和协作应等价交换，并且要按国家计划做。（二）黑、吉两省国营林场，仍然维持现在的关系，即中央和省双重领导，计划、投资、分配、调拨仍由中央负责。”

△ 上午，和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等到机场迎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及其率领的政府代表

---

〔1〕 吴德，时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

团。当晚，出席刘少奇为欢迎苏加诺总统一行举行的宴会。

**6月14日** 上午，和刘少奇、董必武、周恩来等出席首都各界十万多人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的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率政府代表团访华的大会。在大会讲话中说：中国和印尼一直为维护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努力。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大大地推进了亚洲和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产生了光芒万丈的万隆精神。当日，还出席了刘少奇与苏加诺互换两国友好条约批准书的仪式和苏加诺总统举行的告别晚宴。

**6月15日** 下午，和周恩来等出席首都各界人士为欢迎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率政府代表团访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大会。在大会讲话中说：中国人民完全同情和坚决支持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爱国正义斗争。相信越南人民一定能获得团聚，越南的大好河山一定能够获得统一。当晚，和刘少奇、朱德等出席了周恩来总理和范文同总理签署联合公报的仪式，并出席了越南驻华大使为范文同总理访华举行的招待会。十六日晨，和周恩来等去机场送范文同等离京赴朝鲜访问。

**6月16日** 晚，和刘少奇、邓小平等陪同毛泽东会见并宴请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艾地及其率领的印尼共产党代表团。二十二日，和邓小平等去机场送艾地等回国。

**6月1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五十九次会议。周恩来参加会议。会议讨论调整工业部署，缩短工业战线，压缩城镇人口以及煤炭生产等问题。在发言中说：这几年进退缺乏全局安排。过去重工业搞得太多，现在调整比例，农业、轻工业要上去。重工业退也要有全局计划，不能冒失。要集中指挥，要把总的方针同具体情况相结合。轻工业、农业究竟需要

什么，需要多少，要摸清情况。很多轻工业没有原料，也还是上不去，转急了，又要翻车。煤的问题，生产上不是劳动力不足问题，是设备赶不上。

△ 晚，去周恩来处谈话。

**6月19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六十次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共中央《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中共中央《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中共中央《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中共中央《关于确定林权、保护山林和发展林业的若干政策规定（试行草案）》，以及《关于举办“抗大”式政治学校训练一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工作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安排一九六一年中小学毕业生的通知》等。在发言中说：商品的价格决定于价值和供求关系。现在是供求关系影响价格，要从增加生产和调整供求关系来解决，不能乱提价。在谈到中小学毕业生升学问题时说：小学毕业生不可能都升中学，高中毕业生更不可能都升大学。普及初中教育涉及一两千万人升学问题，是五年到十年的事。这件事要在解决中小学毕业生升学的通知中写清楚。关于日本共产党国会议员访华代表团要求签署联合公报问题，建议我方可由全国人大组成相应的代表团，同对方会谈和联署。会议决定此事由彭真办理。

△ 下午，出席首都各界一万多人的集会，欢迎以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众议院议员志贺义雄为首的日共国会议员访华代表团。

△ 晚，设宴欢迎索马里共和国首都摩加迪沙市长艾哈麦德·穆德·侯赛因率领的市政代表团。

**6月20日** 上午，出席朱德主持召开的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介绍《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形成过程，说明草案是在毛泽东主持下起草的，是农村初级合作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经验的总结，提请会议讨论和提出修改意见。会议决定派遣全国人大代表团同以志贺义雄为团长的日本共产党国会议员访华代表团进行会谈并签订联合声明。全国人大代表团共六人，由彭真任团长，团员是程潜、张奚若、廖承志、刘宁一和张苏。

△ 中午，和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董必武会见并宴请日共国会议员访华代表团。二十一日下午，陪同毛泽东会见日共国会议员访华代表团。

**6月21日** 下午，率全国人大代表团同日共国会议员访华代表团举行会谈。晚，主持招待会，欢送日共国会议员访华代表团。二十二日上午，代表全国人大代表团同日共国会议员访华代表团团长志贺义雄在联合声明上签字。双方在联合声明中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对日本和中国的侵略；双方表示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互相支持；两国人民必须为冲破美日反动派设置障碍恢复两国正常关系而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人大代表团强调，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美日反动派用任何借口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二十四日下午，去机场送日共国会议员代表团回国。

△ 陪同索马里共和国首都摩加迪沙市长及其率领的市政代表团观赏京剧《群英会》。

**6月29日** 出席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刘少奇准备在首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

**6月30日** 晚，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

小平等出席首都各界一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

**7月2日** 听取公安部党组的工作汇报。指出：公安机关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用专政办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前段有些群众乱拿公物，应该用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不能用专政手段去对付。公安机关处理人民内部的问题，要采取“对己要和”的方针，用批评和自我批评，平心静气地民主商议的办法。大家都在热的时候，公安部门要冷静；大家认为天下太平的时候，公安部门要清醒，注意防止麻痹。人民警察是为人民服务的，每年整一次风很必要，使他们清醒地牢牢记着自己为人民的警察，不能脱离群众。得罪了群众的，侵犯了群众权利、利益的，在整风中就要向群众道歉、认错，改了就好。

**7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六十一次会议。会议听取李富春关于精简职工和压缩城市人口问题的汇报；讨论了工业企业整顿和轮训干部等问题。谈到物价问题时说：物价要稳定，不能跟着自由市场跑。周恩来参加会议。

△ 晚，和杨尚昆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苏方送来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电报，希望陈毅从日内瓦回国路过莫斯科时停留一两天，以便就国际问题，包括法国问题、老挝问题等交换意见。当即向周恩来和毛泽东请示后，对苏方表示同意，并电告陈毅。

**7月6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聂荣臻《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中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和国家科委党组、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后通称为“科研十四条”）。

7月8日上午，在中共北京市委工作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问题的报告。主要讲了四个问题：（一）退赔问题。指出：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度刮了“共产风”，搞了“一平二调”，剥夺了劳动者，破坏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如不彻底纠正，会动摇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基础。“退赔政策必须执行，否则‘六十条’是空的”。退赔不能靠国家贷款，不能搞恩赐，要发动群众，原物在的，要还原物，损坏了的，要赔补折旧费。不这样，就不能提高群众当家作主的责任感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就不能巩固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的信心，不能达到教育干部的目的。（二）农业奋斗目标问题。北京市郊有近一万七千平方公里面积，二百八十万人口，其中山区占一万平方公里。我们的目标是第一步达到人均粮食八百斤、猪一头。凡是荒地都开垦利用，荒山荒滩都实行绿化，以粮为纲，农、林、牧并举。二百三十条断流的河，要疏浚，兴修水利。不能因为过去大办水利犯了“一平二调”的错误，就因噎废食。要使郊区农民有个奋斗目标；多长时间实现，由社、队讨论，提出措施。反对瞎指挥，但不能没有指挥。（三）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问题。调查研究是为了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每个党员和干部，如不搞调查研究，不联系群众，工作就会犯错误。几年来，农村高指标、命令风相当普遍，关键是群众路线问题。“一九五八年，我在《前线》杂志发刊词中指出群众路线和调查研究，是有的放矢的。但是，看到了，说出来，没有做到，就等于没有看到，没有说。这次会上重印《前线》发刊词，目的是引起大家注意，互相督促。”（四）加强党的领导问题。现在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书记挂帅成了书记包办一切；一是分工包干成了互不联系，各把一方。第一书记挂

帅，就是要当好班长，是在集体领导之中，是集体领导的一员，要服从集体领导；如果“只注意分工负责范围以内的事，而不管整个工作，就把集体领导破坏了”，“重大的问题要集体讨论，不能个人决定。”该讲话的第三部分以《坚持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为题收入《彭真文选》。

**7月10日** 上午，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到机场迎接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内阁首相金日成为首的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党政代表团。下午，和邓小平陪同刘少奇、周恩来会见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党政代表团。随后，和周恩来、邓小平、陈毅、李富春、贺龙、罗瑞卿参加了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的会谈。当晚，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席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举行的宴会，欢迎朝鲜党政代表团。十一日下午，和刘少奇、邓小平等参加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仪式；又和周恩来、邓小平等陪同朝鲜党政代表团出席文化部和中朝友好协会举行的歌剧晚会。

**7月12日** 上午，和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席首都各界一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集会，欢迎金日成及其率领的朝鲜党政代表团，庆祝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在大会讲话中指出：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是两国人民伟大团结和战斗友谊的结晶，是中朝友好关系史上新的光辉的里程碑。十二日晚，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席朝鲜驻华临时代办为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举行的宴会。十三日晨，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去机场送金日成首相去外地参观。

△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六十二次会议。会议讨论确保鞍山钢铁公司冶炼设备开工三分之二的生产措施和煤炭分配的计划。针对近日来煤炭的日产量降到四十多万吨的

情况，在发言中说：过去高指标，不是实事求是，现在按农、轻、重次序安排生产计划，也要讲实事求是。周恩来参加会议。

**7月13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六十三次会议。会议讨论全国高等学校调整工作问题。在发言中说：（一）要注意培养师资，教材要提高、充实。（二）重点院校主要是指教学质量，决定于教学水准，不是学生人数，清华大学招新生少一点可以。学校行政后勤人员，搞人海战术也不行。重点院校的专业不一定齐全，而是要有自己的重点专业。（三）新老教师的关系。几年来，新生力量增加了，有成绩，但是，总的说来，学术上还没有超过老一代，还是要老带新。要肯定新生力量，但要切实纠正他们的骄傲情绪。党员、团员一定要学习人家的本领。真正的科学研究，要靠个人努力，集体活动要尽量减少，体力劳动可以搞一点，但当做处罚（手段）是非法的。要给人家读书的时间。

**7月14日、15日** 去京西煤矿、石景山钢铁厂、发电厂了解生产各环节实际存在的问题。在调研期间对陪同的干部说：北京工业要抓紧矿石、煤炭、化工原料，要有自己的矿山基地，煤矿基地。要抓合金钢和轻工日用品。高炉的利用系数上去后，前后左右发生不平衡，是前进中的不平衡，有的要发挥潜力，有的要增加设备。减人的问题，主要减非生产人员，增加直接生产人员和技术力量。要把减人看成是积极措施，减下的人一是加强农业，一是促进技术革命，搞机械化，半机械化，改善设备。

**7月18日** 下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六十四次会议。会议讨论有关《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宣传和交通部直属水运系统建立政治部等问题。讲话说：



(一) 农业方面的错误，有的是根本性的，如所有制不巩固，刮“共产风”，“一平二调”，破坏了生产关系，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社队规模大小，实行供给制，也与生产关系有关，所有制是根本的。有的是个别性的，如公养猪、办食堂等。(二) 人民公社本身应肯定，缺点错误有的是中央规定不当，有的是执行中的错误，如“一平二调”，不能说是政治局同意的。我们主观上的错误要抓紧改，也可以改，但天不下雨，出现大灾是另一回事。贯彻“农业六十条”，整风整社，不靠报纸宣传，主要靠三级干部会。过去土地改革、禁毒也未登过报。(三)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不公布，因为过程还没有完结，但根本性的政策可以宣传。全面调整社队规模、反对平均主义、一大二公等都不讲，违背了按劳分配原则可以从理论上政策上正面讲。要制定宣传提纲，地方报纸也要遵守。

**7月20日** 和杨尚昆听取钱瑛汇报中央监察工作座谈会情况。发表意见说：(一) 在整风整社运动中，该甄别的是工作中犯错误的干部，不包括对蜕化变质分子的处分。可以让大家按中央整风整社若干政策的文件〔1〕讨论。对工作中犯错误的干部，中央从来是治病救人。(二) 当前全党的工作中心，在农村是生产。如果把大家都卷到清算过去的问题中，要吃亏的。监察工作要服从生产。(三) 中央监察机关检查案子是树立标兵，搞清是非。具体问题的处理由中央局、省、地监察部门负责，他们人熟、事熟。这样，工作主动。(四) 制订法规和条例。中国之大，情况之复杂，规定得越死，下面照搬越容

---

〔1〕 指《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纪要指出：“我们同地富反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的矛盾，性质是敌我矛盾，应当按照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对待。”

易出毛病；不如规定几条原则，执行中从实际出发，灵活一些。（五）甄别的时间范围。有的案子发生在一九五七年，有的发生在一九五八年，这部分案子要涉及，所以还是提最近几年。（六）不脱产干部的左右倾“帽子”，今后不搞，过去搞的取消。在实际工作中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现阶段，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一个“三反”，一个反右派，如果不搞天下要丢。（七）监委的干部首先要正派，头脑清楚，党性强。

△ 和杨尚昆听取李维汉、徐冰、平杰三汇报统战工作座谈会〔1〕情况。指出：（一）对民族资产阶级，毛主席说，绝大多数是可以改造好的。这几年大灾，没有肉吃，布也少，关心不够，但他们没有闹，这是对他们的考验。要改善同他们的关系。物质上的照顾秋收后可以办，改善关系马上可以办。政治上的安排，表现好的照旧；想做事的，继续安排；埋头苦干的，提升一些；过去处理不当的，复职；包括他们的家属。他们的子女参军、入军校，看本人条件。（二）定息，过去未领的照发。（三）同意统战部提议，在武汉举办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座谈会，但光是在武汉举行不够，规模恐怕同纪念孙中山差不多，这不只是学术问题。由统战部提出方案与中宣部商议。（四）社会主义学院继续办，每期人数少一点。喇嘛也要收点学生。青海省可由省委出面，在少数民族中做好善后工作。

---

〔1〕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五日至七月三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北京召开八省（河北、辽宁、广东、四川、湖北、陕西、山东、黑龙江）九市（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沈阳、西安、重庆、哈尔滨）统战部长座谈会，制定了《关于继续贯彻对资产阶级人们安排政策的意见》。

**7月21日** 下午，和谭震林、杨尚昆听取全国总工会党组成员汇报省工会主席会议的情况，接见各省工会主席。在讲话中回答了三个问题：（一）农村集体所有制企业中一般不建立工会。因为人民公社中的集体企业多是季节性的，农忙时种田，农闲时做工。如果组建工会，会把农民分成两部分。（二）企业政治部不应和工会合并。工会是群众性组织，组织上是独立的，领导机关由选举产生。工会不是政治部下属的一个机构，但党委可以委托政治部管理。（三）过去提工会监督行政，是把问题简单化了，还是提群众监督。几年来工会工作总的讲是好的，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进行工作，注意和有关方面协作，没闹独立性。但是在“大跃进”中，有人从理论上提出“工会消亡”，城市人民公社试办时，中央委托由全总党组管理和研究。因此全总提出把工会纳入公社的轨道。这是没有把趋势和现实分清楚，引起了混乱。这个问题，责任在中央书记处。工会当前的任务，还是生产、生活、教育。特别是在暂时的困难面前，工会应加强对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劳动纪律教育；工会干部要踏踏实实深入群众，了解和帮助解决群众生活中的某些困难。

**7月23日** 晚，和杨尚昆去周恩来处谈工作。

**7月24日** 和杨尚昆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苏方交来将提交苏共二十二大讨论的“苏共纲领”稿并附中文译文。

**7月2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六十五次会议。会议听取邓小平谈七月十四日至二十三日视察东北的情况；讨论当前工农业生产和粮食问题。会上，周恩来介绍了当前国际局势。

**7月26日** 和刘仁、郑天翔在门头沟煤矿调查生产情况。

了解到当前生产上的主要问题是掘进落后于回采，设备、工具供应差，维修跟不上。一万二千盏矿灯，有七千盏不合格。对一同调研的干部说：（一）掘进、回采要“双跃进”，右手抓掘进，左手抓回采。（二）要采取“精兵主义”，人人有矿灯，人人有武器，修好设备，补齐装备，要有一部分备件，保证正常生产。（三）要把矿工队伍固定下来，然后装备起来；压缩后方，加强前方，不适宜于煤矿工作的，调出来搞农业。（四）基本建设要跟上，老井产量上去了，新井建设就要衔接上来。

△ 晚，出席古巴驻华大使皮诺·桑托斯为庆祝古巴人民武装起义八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7月27日** 在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市政协常委会联席会议上讲话。指出：经过两年水旱灾荒，粮食不足，不但影响衣食，而且影响住房，影响工业，影响各个方面。城市人口现有一亿三千多万，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像我们这样的小手工业式的农业生产力，不可能供养这么多的城市人口，城市人口不能不控制。现在人们的体质弱了，牲畜也弱了，又死了很多，要用很大力量恢复，要有一个过程。当前要做两件事：一是要对干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育。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才十二年，经验还很不够。现在总路线已经有了，还要有许多具体政策。二是进行党的知识的教育。全国现在有一千七百万党员，建国以后入党的占百分之八十，要对他们进行一次党的建设的教育。有了“农业六十条”，干部整了风，又进行党的建设的教育，再作战，就好办了。

△ 和郑天翔去石景山钢铁厂调查。

△ 离开北京赴北戴河。在北戴河期间，多次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7月28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六十七次

会议。会议听取薄一波作《关于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条例（草案）》（后通称为“工业七十条”）的说明，讨论了当前工业生产问题。

**7月29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六十八次会议。会议听取并讨论蒋南翔作的《关于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初稿）》（后通称为“高教六十条”）的说明。

**7月底** 和邓小平收到朱德七月二十九日写给他们并请转毛泽东及有关部门同志的来信。信中对北京市郊区手工业情况提出三点意见：（一）农村手工业和副业生产潜力很大。最主要的是劳动力安排要恰当，分配要合理，要在农业上实行小段包工和建立责任制，以便加快农业建设速度，抽出较多时间参加手工业和副业生产。（二）北京城市人民公社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现在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这既不利于调动生产经营管理的积极性，又重复了“一平二调”的错误。是否在各企业和事业单位之间，实行单独核算、自负盈亏的办法较好。对于赚钱的企业，公社可按合作社办法提取百分之十至十五的建设基金作为各厂增置设备、扩建厂房之用。（三）现在城市人民公社所属企业和事业的工资福利制度很乱，职工在这方面意见不少。如果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办法，各厂就可以根据企业赔赚情况和一定的工资福利标准，酌情自行调整。

**8月1日、2日、3日、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六十九次会议。会议逐条讨论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的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会议还决定由陆定一负责将上述文件修改后立即发给参加八月中央工作会议的人员，以便事先阅读准备意见。五日，和邓小

平、陆定一、康生致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报送条例草案及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执行这个条例的指示稿，并汇报了条例草案的制定过程以及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内容。

**8月7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七十次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国际形势和国内粮食、市场等情况的说明；通过关于八月下旬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

**8月8日—11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七十一、二百七十二次会议。会议听取李富春关于计划会议讨论中的主要问题和一九六一、一九六二两年补充计划安排的说明、罗瑞卿关于军工生产情况的说明、李先念关于粮食问题的说明、姚依林关于市场物价和货币流通问题的说明。

**8月10日、11日、12日、14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七十三次会议。会议逐条讨论《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条例（草案）》，决定由薄一波、李雪峰等根据会上讨论的意见再作修改，并起草一封由邓小平、彭真、李富春、薄一波联名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同志的信，送中央书记处审阅后，一并印发出席八月中央工作会议的人员。

**8月15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七十四次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条例（草案）》。当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将条例草案连同邓小平、彭真、李富春、薄一波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印发给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人员，征求意见。

△ 和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致信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各常委：《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条例（草案）》，主要是解决工业企业内部问题的，由书记处、国家计委、国家经委派出的十一个工作组，分别在北京、上海、天津、太原、吉林等地的工矿企业中调查，多数组历时两个月左右，少数组长达四

五个月。文件起草时，参考了中南局、东北局和十几个省、市党委以及中央有关工业部门的文件，征求了东北局、东北三省的工业管理负责干部、技术人员和老工人、青工的意见后，将当前工业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归纳为八个方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一）“指标过高，任务不定，原料、材料不足，许多企业的生产处在半计划以至无计划状态”。（二）“责任制度废弛，无人负责现象相当严重，许多设备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三）“不尊重科学技术，瞎指挥生产，忽视技术人员、老工人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四）“企业管理的权力过分分散，企业之间的协作关系中断或者被打乱了”等。针对存在的问题，条例草案根据“三年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中的—些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对于技术管理、劳动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的问题，都作了具体规定”，共八十条。为了使企业“有章可循”，较快地“恢复和巩固正常的生产秩序”，建议“提到工作会议讨论修正，然后用草案形式发到各重点企业，一面试行，一面讨论提出意见，以便作进一步的修改。”

△ 和开滦煤矿的干部座谈生产中的问题。与会者反映，生产上不去的原因：一是设备、工具质量下降，且不配套。老的“抚顺灯”（矿灯）维修得好，可用六七年，新灯只能用两三个月；轴承过去可用半年，现因润滑油不好，只能用两三个月；风压机过去可带五个风钻，一分钟打一个炮眼，现只能带动两个，十分钟打一个眼。二是工人体质差。了解情况后，当即嘱矿方就设备的维修、补充，生活问题、政治工作等整理一份材料，并建议冶金部专门有一副部长管矿山的设备工作。

8月16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七十五次会议。会议讨论通过邓小平、彭真、李富春、薄一波给毛泽东及政治局常委各同志的信；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

题的指示（草稿初稿）》，决定提交即将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8月17日** 从北戴河回到北京。

△ 下午，出席首都各界人士和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欢迎巴西合众国副总统若奥·贝尔希奥·古拉特的大会。在大会讲话中赞扬巴西人民维护国家主权、保卫国家资源、发展民族经济文化取得的成就，谴责美帝国主义粗暴干涉拉丁美洲各国内部事务、破坏拉美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的暴行。董必武、朱德等出席大会。十八日上午，和董必武等到机场送贵宾去外地参观。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会见了若奥·贝尔希奥·古拉特副总统。

△ 晚，出席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苏卡尼·卡托迪维约为庆祝印尼独立十六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8月18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和加纳共和国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加纳共和国总统联合公报》、周恩来和恩克鲁玛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加纳共和国友好条约》的仪式。同时分别签署的还有两国政府关于经济技术合作、贸易和支付、文化合作三个协定。

△ 和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首都各界十万人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集会，欢迎加纳共和国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庆祝中国加纳友好条约的签订。在大会上讲话指出：恩克鲁玛总统领导的加纳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上第一个独立国家，在加纳首都阿克拉举行的首届非洲独立国家会议、首届非洲人民大会，对非洲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中加友好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两国合作关系的新阶段。在和非洲人民为独立、自由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中国人民将永远同你们站在一起。十九日上午，和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等去



机场送恩克鲁玛一行前往莫斯科。

△ 晚，会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马利列，就阿尔巴尼亚同苏联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交谈。

**8月中下旬** 和邓小平收阅李先念批转的财政部党组《关于平调退赔中几个问题的报告》。李先念在批语中指出：退赔必须坚决，但是算账和退赔时间就要进一步划清杠杠和分期分批的退赔。

**8月21日** 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在群众和干部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通知》。通知指出：目前粮食、副食品和日用品供应紧张，“天灾是重要原因，工作中的缺点也是重要原因”，“判断总路线是否正确，要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期中进行考察，不应当为一时的现象所迷惑”。但对极少数利用物资紧张、贩运农副产品、从中谋取暴利、扰乱社会经济秩序者“必须坚决反对和取缔”。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要摆事实，讲道理，但“不要搞重点批判，防止简单粗暴”。

**8月23日—9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的工作会议。会议讨论解决工业和粮食、财贸、教育等方面的问题，讨论通过经中央书记处和国家计委、经委调查研究、由邓小平主持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讨论制订了由中共中央书记处准备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会议还通过了由周恩来等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度粮食工作的几项规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

**8月23日、24日、2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七十八次、二百七十九次、二百八十次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草案初稿）》和中共中央《关于一

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度粮食工作的几项规定》，决定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

**8月28日** 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会议听取李先念关于市场、物价问题的报告。

**9月2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会议听取李富春关于工业计划的报告。

**9月3日** 上午，约康生、胡绳、吴冷西等讨论苏共二十二大的党纲。

**9月11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八十一次会议。会议讨论煤炭、钢铁生产和物价管理等问题。会议认为当前工业生产的首要问题是集中力量解决煤炭生产问题。

**9月12日** 将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草案初稿）》批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并附说明：“这是根据常委扩大会和各组讨论的意见修改的稿，已同时分送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如你们认为原则可以，书记处即邀大家共同谈一次通过。”十三日，毛泽东批：“退彭真同志办。”

**9月14日** 下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八十二次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和国家经委党组《关于九月份煤炭分配方案和第四季度煤炭分配意见的报告》及中共中央的批示稿。会议还讨论同意周恩来就粮食、棉花、煤炭、减人简政和计划安排等问题提出的意见。

△ 将中共中央对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对高等学校工作条例的指示和轮训干部的决定三个文件报送毛泽东，并附说说：“这三个文件已于今日下午书记处扩大会议通过。这个会议，除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外，总理也参加了。请核定。”十五

日，毛泽东批示：“即送彭真同志照办。”

**9月15日** 将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指示》稿送政治局常委各同志，并附说明：“六个大区的同志已阅，均无意见，认为很好。”十七日凌晨三时，毛泽东阅后退彭真，并批示：“指示及总则已阅，很好，只在指示有一些小的修改。〔1〕”即将上述文件按毛泽东的批示修改后，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国务院各部、委党组。发文日期改为九月十六日。

△ 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就所有制和分配等问题发表讲话。

△ 晚十时至次日凌晨一时，约刘澜涛、张德生、王恩茂、曾涤〔2〕等谈新疆工作。

**9月17日** 下午，离开庐山，在九江上船去南京转乘飞机，于十九日中午回到北京。

**9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八十三次会议。周恩来参加会议。会议讨论召开全国煤炭生产会议、传达中央庐山工作会议精神及向民主党派人士通气等问题。在发言中说：全面解决煤炭生产问题，需要召集中央直属的六十一个大矿的负责人开会，讨论解决煤矿的掘进、回采、巷道维修、运输和矿工生活等问题，使产量巩固上升；由谷牧、张霖之、罗玉川、程子华、王鹤寿、段君毅、姚依林、宋养初组成领导小

---

〔1〕 毛泽东对这一指示稿的修改，主要是在第一页讲到“这个条例草案的目的，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把我们领导工业企业的经验，特别是最近三年多的经验，系统地加以总结，制定出一个适合我国实际情况和能够更好地为总路线、大跃进服务的，管理企业的规章制度”一段话中，删去了“用毛泽东思想”六个字。

〔2〕 曾涤，时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

组，谷牧任组长，会期两周。明年进一步解决老井延伸、新井配套的问题。当前生产中的缺口问题，要及时汇报解决。周恩来提议，国庆节前要召开一次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座谈会，向他们讲当前国内外形势问题。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在会上讲话。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由杨尚昆和徐冰拟定。政治局、书记处未出席庐山会议的各同志和元帅，由书记处负责传达，各部委党组成员由彭真统一传达。

**9月22日** 上午，和刘少奇等到机场欢迎第一位来华访问的拉丁美洲国家元首、古巴共和国总统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托拉多博士。下午，参加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朱德同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托拉多总统的会谈。

**9月23日** 下午，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持的报告会上，向中央各部委处长以上、国家机关党组成员传达庐山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报告指出：三年大跃进，在钢、煤、电、发电设备和冶金设备、机床等十四种基本工业产品的产量提前两年完成“二五”计划，是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们的国力比两年前强了。总路线、大跃进的成就，时间越久、越长，表现越明显；但是，缺点、错误也是很多的。表现在建设的口子开得太大了，战线拉得太长了，出现了高指标，城市职工三年翻了一番。因为生产任务过重，助长了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加上农业连续两年受灾，出现粮食紧张，工业的燃料、原料、材料供应不上，以致市场商品紧缺，人民吃穿困难，整个国民经济都很困难。这些，我们要负责。许多好同志对总路线、大跃进产生怀疑，应该允许，我们应该听一听。造成缺点、错误的原因，一是我们缺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二是调查研究不够。在讲到责任问题时说：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中说，就领导方面，主要是违背了毛泽东同志历来提倡的科学的

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中央没有责任吗？邓小平同志在庐山的大会上说，“我们书记处是两条：第一检讨，第二改。各部、各地方不要检讨，只要你们改。”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这话是公道的，郑重的。我们书记处都赞成。有些问题，书记处曾有过感觉，但是没有抓住调查研究，系统地解决。所以，毛主席在广州会议上指名要邓小平和我下去调查研究。关于一九六〇年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工业生产方面，高指标没有下调，我们丧失了一年多时间。当务之急，一是落实指标。重点是抓煤和钢。煤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各种品种的钢是工业的原材料。煤和钢的生产指标松了，我们就能抽出人力、物力、财力来突击搞合金钢、特殊钢，增加品种，提高质量；才能延伸矿井，维护设备，填平补齐。只有煤和钢“两马出头，才能带动全局”。因此，中央决定“二五”计划最后两年的补充计划是钢一千五百万吨，煤五亿吨。这样，钢的产量还是超过“二五”计划的一千零五十万吨。二是国民经济农、轻、重之间，工业内部之间要求得大体平衡。强调说：绝对平衡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不能说不平衡是基本规律，把它看得无足轻重。我们每前进一步，就要抓住决定全局的关键来搞综合平衡。在谈到粮食和市场供应问题时说：三年来，全国职工的人数翻了一番，城市人口已达到一亿三千多万，城市人民的供应，增加了农业的负担。中央决定，第一步从城市压缩二千万人口到农村去，争取一九六三年秋收后，不再从国外进口粮食。第二步要千方百计发展手工业、轻工业和副业，缓解市场供应。报告最后说：我们要高举三面红旗，重新对党员干部进行一次教育。“我们全党认识一致了，就可以在新的基础上比较有秩序地多快好省地前进。”

9月25日 下午，出席首都各界十万人欢迎古巴总统奥

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托拉多的大会。在大会讲话中表示：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古巴人民收回美国在古巴的军事基地关塔那摩、保卫革命成果、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大会。

**9月26日** 上午，和朱德、李富春等到机场迎接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出席朝鲜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在朝鲜访问后回国。

**9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八十四次会议。会议讨论煤炭、轻工业产品生产问题和准备十月中旬参加苏共二十二大的中共代表团讲话稿起草等问题。

**9月28日** 晚，陪同朱德会见并宴请副主席瓦什·伊斯特万妮率领的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代表团。

**9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八十五次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代表团在苏共二十二大上的讲话稿和致苏共中央贺电稿以及《人民日报》题为《高举总路线的伟大旗帜，争取新的胜利！》的国庆社论稿等。

△ 陪同刘少奇会见应邀访华的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比·比尔·比克拉姆·沙阿·德瓦和王后等贵宾。

**9月30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八十六次会议。会议听取煤炭工作会议的情况汇报。在讨论时强调：煤炭部要着重抓《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的贯彻落实。

△ 晚，出席周恩来在人大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二周年。

**10月1日** 上午，出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首都军民五十万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二周年的集会。发表讲话说：全国人民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指引下，我们已经提前两年在一九六〇年完成了第

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工业指标，基础工业的设备能力、技术力量有了迅速的增长。三年的自然灾害，虽然给我们带来了严重的困难，但是，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努力奋斗，正在和暂时困难斗争中胜利前进。

**10月2日** 上午，陪同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参观访问北京四季青人民公社。晚，出席刘少奇和多尔蒂科斯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古巴共和国总统联合公报》的仪式。三日上午，和刘少奇等到机场送多尔蒂科斯总统一行回国。

**10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八十七次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毛泽东致苏共二十二大的祝词、中共代表团在苏共二十二大上的讲话稿和出席苏共二十二大中共代表团的人员名单，决定周恩来为团长，彭真、康生、陶铸、刘晓为代表团成员。

**10月4日** 上午，毛泽东批示邓小平、彭真，召集中央局书记柯庆施、李井泉、刘澜涛、宋任穷“于五日来此一谈，使这个‘队为基础’的大问题，弄个明白。如大家同意进行调查，使省、地、县三级在两个月内都有所酝酿，十二月就可以作出决定”。此前，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致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同志的信中提出：“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为此，特请上述同志来京座谈。七日，毛泽东批示彭真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布置各地党委有关负责同志调查研究，进行试点，在十一月底以前，将调查研究的结果和意见报告中央。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

示》，决定人民公社一般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 和邓小平等会见并宴请澳大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夏基一行。

**10月5日** 上午，出席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就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边界条约的决议》和决定由国家主席刘少奇为签订这个条约的全权代表作了说明。会议讨论通过《关于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边界条约〉的决议》，决定刘少奇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边界条约》，自签字之日起，本条约立即生效。

△ 下午，和周恩来等出席刘少奇与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边界条约》的仪式。随后，出席首都各界十万人欢迎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和王后暨庆祝中尼边界条约签订而举行的大会。在大会讲话中指出：去年两国缔结的中尼和平友好条约和这次签订的中尼边界条约，使得两国之间的持久和平和传统友谊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这不仅有利于两国的和平建设，而且对于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也有重大的意义。

**10月7日** 上午，和毛泽东、刘少奇等接见少数民族国庆观礼代表团全体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国庆观礼代表团全体代表。

△ 晚，陪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代表团观看北京市戏曲学校实验京剧团的演出。

**10月8日** 和朱德、邓小平等会见并宴请以奥古斯托·马丁内斯·桑切斯为首的古巴统一革命组织代表团。

**10月9日** 晚，和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等出席首都各界一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的集会，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

**10月10日** 和刘少奇、邓小平等到机场迎接前往莫斯科



参加苏共二十二大途经北京的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第一书记黎笋。十二日下午，和周恩来等同胡志明、黎笋谈话。当晚，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会见并宴请胡志明、黎笋。十四日上午，和朱德、邓小平到机场为胡志明、黎笋送行。

**10月15日—11月1日** 以周恩来为团长，彭真、康生、陶铸、刘晓（已在莫斯科）为团员的中共代表团，应苏联共产党中央的邀请，赴莫斯科参加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十九日，周恩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并宣读毛泽东签署的贺词。周恩来在讲话中指出，苏共公开暴露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分歧和争执的错误做法〔1〕，不能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态度。希望有争执和分歧的兄弟党将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在互相尊重独立和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大会期间，中共代表团与胡志明、金日成等交换了意见，强调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应遵循三条原则：（一）对敌斗争一致，互相支持。（二）兄弟党的内部事务，不能干涉。（三）保持内部团结，兄弟党间的内部事务在内部解决，不能向敌人暴露。二十一日，中共代表团拜谒了列宁、斯大林陵墓并献花圈。二十二日，中共代表团同苏共主席团成员赫鲁晓夫、科兹洛夫、米高扬、安德罗波夫等人进行了长达九个多小时的会谈。中共代表团就苏联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苏共二十大、评价斯大林、反党集团等问题详细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态度。二十三日晚，周恩来离开莫斯科回国，由彭真代理中共代表团团长，继续参加会议。二十四日晚，和陶铸、刘

---

〔1〕 指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报告中，公开污蔑阿尔巴尼亚党的问题。

晓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去列宁格勒访问。访问期间，参观了斯莫尔尼宫、“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和十月革命前列宁的避难处拉兹里夫；会见了在列宁格勒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参加列宁格勒光学仪器工厂职工欢迎中共代表团的大会并在大会上讲话，强调要加强中苏团结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二十七日晨，返抵莫斯科。二十九日，同中国驻苏使馆工作人员及留学生谈话。十一月一日下午，率团回到北京。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到机场迎接。

**10月19日** 致电突尼斯比塞大市政厅主席泰拉，对比塞大市和突尼斯人民为反抗法国殖民军而进行的正义斗争表示坚决支持；代表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和北京市人民向比塞大市受灾人民表示深切的慰问，并赠以价值六万元人民币的医疗器械和医药用品。

**11月2日** 晚，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汇报周恩来回国后苏共二十二大的情况。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向中央国家机关十七级以上干部作关于苏共二十大及当前国际形势和我党对外方针问题的报告。

**11月4日** 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华北局报告：按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市委指定邓拓〔1〕负责主持干部轮训工作。全市一万八千名十七级以上干部，从十一月开始，集中学习，每期八九百人，到明年十月轮训完，其余干部由市委各部分口组织学习。

**11月5日** 晚，出席毛泽东召集的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从六日起召开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主要讨论四个问题：农村人民公社以

---

〔1〕 邓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

生产队为基础问题；粮食征购问题；关于苏共二十二大问题；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是否延期召开问题。

**11月6日** 出席刘少奇主持召开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会议讨论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市场和粮食等问题。在讨论一九六二年粮食包干时，发言说：粮食包干了，中央要的一百八十亿斤粮食，农民才肯拿出来。会议一致同意实行大包干。

**11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书记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李先念报告粮食问题。

**11月9日、10日** 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央国家机关十七级以上干部参加的党员干部大会。会议听取周恩来作关于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

**11月12日**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邓小平等关于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情况汇报。会议决定：推迟召开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十二月二十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后召开县、地、省、中央局四级会议。

**11月13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九十七次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国民经济七年计划和贯彻“农业六十条”等问题。邓小平在会上传达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关于粮食征购、中苏争论、中央工作会议等问题的意见，布置有关工作。

**11月14日** 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会见并宴请参加苏共二十二大后回国路过北京的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

**11月17日** 上午，参加在北京中山堂举行的彭涛〔1〕公祭仪式。为彭涛同志治丧委员会委员。彭涛于十一月十四日逝世。

**11月18日** 会见并宴请以爱德华多·加莱戈斯·曼塞拉为首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议会代表团。

**11月20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九十八次会议。会议听取廖鲁言汇报《农村七年规划大纲》〔2〕的情况。

**11月21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百九十九次会议。会议继续听取有关部门关于煤炭、电力、石油等燃料动力工业七年规划的汇报。

△ 下午，和邓小平、杨尚昆会见参加苏共二十二大后来访的泰国、马来亚、缅甸三国共产党代表团，并设晚宴招待。

**11月22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次会议。会议听取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汇报七年规划及市场问题。

**11月23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零一次会议。会议听取王鹤寿汇报冶金工业部七年规划。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零二次会议。会议听取罗玉川关于南方十省林业会议的情况汇报。

△ 收到毛泽东转发十一月九日邓子恢《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试点情况调查报告》的批示：“这个报告很好”，“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建议各省委第

---

〔1〕 彭涛（一九一三——一九六一），生前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化学工业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2〕 《农村七年规划大纲》，指一九六一年冬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书记处制定的一九六三年——一九六九年发展国民经济的规划。

一书记带若干工作组，采取邓子恢同志的方法，下乡去，做十天左右的调查研究工作。”并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谭震林阅后，交杨尚昆用电报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另印发中央各部委党组若干份。

**11月24日** 和周恩来、邓小平、杨尚昆等陪同毛泽东会见巴西、厄瓜多尔、玻利维亚、萨尔瓦多四国共产党和巴拿马人民党派来中国学习的学员。

**11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组织撰写批判修正主义的理论文章。

**11月28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零三次会议。会议听取段君毅汇报第一机械工业部七年规划。

**11月29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零四次会议。会议听取武竞天〔1〕汇报铁道部七年规划。

△ 晚，和周恩来等出席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富兹·马利列为庆祝阿尔巴尼亚解放十七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11月30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零五次会议。会议听取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三机械工业部和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七年规划的汇报。

**12月1日** 上午，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六次会议通过关于延期召开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决议。会议之前，主持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部分委员座谈会，协商延期召开本年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建议一九六二年一月份召开人大、政协联席会议。

**12月2日** 和夫人张洁清乘专列回山西家乡探亲。当天，在太原市迎泽宾馆和省级各部门负责人座谈。

---

〔1〕 武竞天，时任铁道部副部长。

**12月3日** 下午，和张洁清等在郑林、冯培文〔1〕陪同下，乘专列沿同蒲路南下侯马市。在车上同郑林等交谈中说：这几年，我们“作战”多了，土改、“三反”、“五反”，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没有顾及整训干部，让干部说话的机会少了，提反面意见的更少，党内民主生活存在一些问题。到洪洞站下车，游览了广胜寺、飞虹塔、大槐树旧址等。晚八时，到达临汾县。

**12月4日** 上午，和张洁清等乘汽车到老家侯马市埕上村，探望八十岁的母亲魏桂枝及其他亲属，到父亲傅维山的坟地扫墓，走访了同学和邻里。

**12月5日** 上午，到中共侯马市委机关和市委书记、市长等座谈乡情，解释党的政策。下午，驱车往新绛县参观木制品厂、农贸市场和侯马文物管理站展览的东周文物。晚，观看侯马市碗碗腔剧团的演出。

**12月6日** 上午，去曲沃县参观面积和北京十三陵水库等同、库容七千六百万立方米的浍河水库。该水库的兴建，使曲沃平原二十五万亩旱田变成旱涝保收的良田。又在县领导陪同下，察看方圆六十余华里的三角洲太子滩，了解土地碱化的治理措施，还参观了曲沃的卷烟厂和农贸市场。

**12月7日** 上午，在侯马市政府交际处会议室，与当地领导干部二十多人座谈。下午五时，由陶鲁笏〔2〕陪同，乘专列到运城火东站。在车厢里，听取中共运城县委第一书记和县长汇报情况。八日，参观运城盐池和农贸市场。随后，驱车游

---

〔1〕 郑林，时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山西省副省长。冯培文，时任中共晋南地委书记处书记。

〔2〕 陶鲁笏，时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

览了解州关帝庙。下午，返回临汾。

**12月9日** 上午，在陶鲁笳陪同下，去临汾县参观晋南地区小麦丰产的郭家庄大队。下午，在晋南地委交际处会议室，听取赵雨亭〔1〕、冯培文等汇报后，指出：要有一个奋斗目标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晋南地区解决粮食问题，一是要搞水利。光绪三年、二十六年和民国十八年，严重的灾害，主要是旱。一九五七年，曲沃修了水库，人民非常称赞县委书记张耀廷。二是提倡养猪。三是要正确对待在工作中犯错误的干部。这几年，我们连年作战，教育干部不够，调查研究不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许多东西是中央来的，有些责任要我们负。所以要与人为善，一看二帮，不能一班一班地撤换干部；要正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对就对，错就错，不能说瞎话，不能掩盖缺点和错误。当晚，结束晋南之行。

**12月11日—14日** 在河北石家庄市召集石家庄和保定两专区的藁城、新安、晋县、平山、定县、深泽、安国、唐县、新乐和阜平等县委的领导干部，座谈人民公社生产队的规模和分配制度调整等问题。在会上介绍山西的情况说：主张大队核算、“三包一奖”的和主张小队核算的各占百分之三十；主张“大包干”，余粮全部归小队的占百分之四十。希望大家从实际出发，不受约束地讨论。十四日下午，在座谈会结束时说：核算单位、分配办法，涉及所有制问题。我们革命是为了变革旧的生产关系，但新的生产关系建立后，所有制一定要相对稳定，才能保护生产力。土改以后，我们办互助组、初级社，特别是高级社，土地不分红，办人民公社所有制变动更大。山西的农民反映：抗战时期，动人家一个缸也不行，这几年，锅也

---

〔1〕 赵雨亭，时任中共晋南地委第一书记。

敢砸，房也敢拆。有人说“人不由己，物不自主”，所以人心思定。一九五九年，毛主席提出反对“一平二调”，但是，大家没有认真注意调查研究，没有解决两个平均主义。这一次，中央强调要调整生产队的规模，目的是克服平均主义，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座谈会上，虽然多数县主张划小生产队的规模，下放核算单位，但是，晋县的周家庄生产队，党支部坚强，实行“三包一奖，全奖全罚”已有经验，生产年年增长，不主张划小。劳模耿长锁也主张大队核算。因此，告诫大家：一要走群众路线，认真做调查，生产上涨，群众满意的不要轻易变动；二要因地制宜，不要千篇一律；三要看准了，弄明白了再动手。“希望这次变革生产关系，不要出现生产下降，杀猪宰羊。”

**12月15日** 回到北京。

**12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准备情况、中央书记处关于选编一九五八年以来一部分中央文件和《毛泽东同志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在两条路线上的斗争》给毛泽东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报告。

**12月19日** 出席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八次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作预备性的政府工作报告，阐述国内国际形势。

**12月20日—1962年1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一九六二年的年度计划和长远计划、商业、关于改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和党的工作等六个问题，为即将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做准备。出席会议的主要有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以及中央各部委负责人。



**12月20日** 晚，出席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

**12月21日** 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会议听取邓小平传达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估计，并作的长篇讲话。

**12月25日** 上午，出席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三届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联席会议。会议分别通过：（一）决定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及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于一九六二年三月五日同时召开。（二）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会前分别下乡或在城市参观访问。

**12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国内外形势和一九六二年工作的报告。

**12月29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人民日报》一九六二年元旦社论稿等文章。

## 1962年 六十岁

1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一十一次会议。会议同意杨尚昆关于一月十一日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会务工作安排；讨论中共中央《关于谴责美国政府反共暴行，支持美共正义斗争的声明》〔1〕。

1月11日—2月7日 出席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委、省市区委、地委、县委以及重要的厂矿企业、军队的负责人共七千一百一十八人（后通称为“七千人大会”）。会议的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加强纪律，加强民主集中制，进一步纠正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错误，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迅速扭转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一月二十七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提交了书面报告，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及其产生的原因，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代表中共中央承担了责任。要求全党纠正错误，做好调整工作。三十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会议期间，刘少奇、林彪、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先后在大会或地

---

〔1〕 一九六一年六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共产党为“外国代理人”。美国政府宣布：从一九六二年二月一日起，美国共产党作为“外国代理人”要进行登记。这实际上是宣布美国共产党为非法。美国共产党表示拒绝登记。

方组的会上讲了话。彭真在书记处会上、起草小组会上以及浙江省分组的会议上发了言。会议在坚决贯彻执行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上统一了全党的认识。

**1月1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一十二次会议。邓小平通报了中央工作会议各小组对刘少奇准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的报告稿的反映，传达了毛泽东十日的指示，大意是不要忙于先作报告，征求多数人的意见，文件修改后再作报告。在讨论时发言说：整个报告稿是好的。这几年倒霉就是指标太高，吹得太大。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如果继续反“左”，有右反右，从两面讲就好了。讲到分散主义时指出：它的性质不能都归于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大部分是盲目性，有的是高指标压出来的，有的是瞎指挥，无领导，无政府。讲到工作中的责任问题时提出：总结经验教训时，要把中央和政治局有些常委包括进去。中央的责任，第一是书记处，第二是部分常委。书记处的责任比常委多得多，但各有各的责任。我同意毛主席的意见，他的责任也不要回避。因为有些事他们知道，他们参与，检讨中如果不包括他们，第一，不符合事实；第二，会造成错觉，凡是领导都没有错误。我们都提倡实事求是，领导人如有缺点错误也要实事求是。不讲，不足为训，讲了不会动摇对他们的信赖，反而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威信。这次会上，对各种不同的意见，凡能吸收的都吸收，错误的，在小会上讲一下，实行“三不主义”〔1〕。最近三天，恐怕要搞这个问题。

**1月15日、16日** 听取中央工作会议各小组讨论情况的汇报。与会者对印发的刘少奇报告稿意见分歧，包括许多省级

---

〔1〕 即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

干部在内，认为分散主义不是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有的说，主观主义第一，分散主义第二；不反对主观主义，反不掉分散主义。有的说，这几年，有的是分散主义，有的集中过多，农业减产不是因为分散主义。对造成困难的原因认识也不一致，有的说，天灾人祸，人祸是主要的。比例失调是因为高指标，不从实际出发，根子还是主观主义。十六日，毛泽东决定，会议先谈主要矛盾是什么，统一认识后再写稿子；并决定成立二十一人的报告起草委员会，由刘少奇主持，成员有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柯庆施、宋任穷、乌兰夫、陶铸、刘澜涛、李井泉、王任重等。

**1月17日—24日** 出席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修改刘少奇代表中央向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提交的报告稿。在十八日的会议上，发言提出以下意见：（一）报告应把成绩讲足，错误讲透，这样才能轻装前进。（二）对报告稿中“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问题，认为：分散主义首先是中央，中央各部门有各式各样的分散主义，逼得中央签字；第二才是地方。分散主义不能统统归结为资产阶级思想，如北京市的来料加工〔1〕，有的是给中央各部、军委和天津市干的，因为国家计划任务中，原材料有的只给了三分之一，要靠自己设法解决，这能叫资产阶级思想吗？集中生产和分级管理是矛盾的统一，但不要一讲下放什么都下放，讲集中什么都集中。一九五八年体制下放时，如果规定几条什么不能下放，毛病可能会少一些。现在讲集中统一，也要规定杠杠，地方的合理的积极性

---

〔1〕 指北京第一机床厂利用闲置的生产能力，以来料加工的办法，为别的企业协作生产机床，报告稿中不适当地批评为“资产阶级思想”。

应保留，这样更便于集中统一。（三）一九六〇年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大出口，基本建设搞得过多，对农业的灾情估计不足。一九六一年初，提出“八字”方针，没有措施，指标下不来，调整晚了一年。毛病出在没有调查研究，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四）我们的错误，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其他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三五年过渡和办公共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不良影响。十九日下午，陈伯达在会上说，彭真关于毛泽东的话“值得研究”。进而责问：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针对陈伯达的质问，当即回答说：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种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1月25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并基本赞成刘少奇代表中央准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报告的修改稿。毛泽东对修改稿表示“赞成这个方向”。

**1月27日** 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将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正式印发与会人员，并由刘少奇在大会上作口头说明。刘少奇口头报告的主要内容要点是：前三年农业减产数量相当大，工业生产一九六一年减产百分之四十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减产原因，一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一是一九五八年以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湖南有的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

分人祸”。对“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讲话还纠正和清理了中央和地方在最近几年中提出的不正确的口号和提法，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把重视客观条件视为“唯条件论”等。会上，毛泽东对此后几天的会议作了安排。

**1月28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邓小平准备在大会上作的讲话的内容。

**1月29日** 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的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林彪在讲话中强调：造成这几年的困难，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我们的工作搞得更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毛泽东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并希望把它整理出来。鉴于有些地、县两级负责人对省委领导有意见而不敢讲，不能畅所欲言的状况，毛泽东在会上宣布：延长会期，大家在北京过春节，开“出气”会，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

**1月30日** 下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讲话，着重阐述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等问题，并对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承担了责任。

**2月1日** 为开好即将在广州举行的戏剧创作座谈会，贯彻“双百”方针，同一些剧本创作人员进行座谈。指出：整理传统剧目，要找一些懂得马列和党的政策、又懂得历史和戏剧的人执笔，去掉糟粕，把艺术保存下来。这两年，学校的课本

改动很多，老教员就有了困难。马连良六十多岁了，剧本改得太大，他演出有困难。杨家将的戏，主要突出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杨门女将》改得很好，岳家军的戏也如此，不要写他镇压农民暴动。还有反映古人智慧、谋略的像《空城计》、《群英会》等都可以整理。反映爱情的戏可以写，按中国传统，爱情是高尚的，如《白蛇传》等，但黄色的戏不要提倡。北京京剧团和实验京剧团要为中青年演员写点戏，演革命的内容，使他们得到培养、发展。应当有个计划。

△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华北、东北、华东三个大区开“出气”会的情况汇报。会议决定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延长到春节之后。

**2月2日**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听取西北、中南、西南三个大区开“出气”会的情况汇报。在讨论会议安排时，和邓小平建议把党内生活的紧张空气缓和下来，县以下不再搞“出气会”，逐步恢复党内正常的生活。“出气会”告一段落。毛泽东接受了这项建议。会议决定二月三日由各省负责人作一次检讨报告，就结束这一段的会议。

**2月4日** 晚，和参加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出席中共北京市委、市人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春节晚会。

**2月5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一十三次会议。会议讨论同意周恩来、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要点。在讨论时发言说：这次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放手让县以上的领导骨干对中央提意见，中央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承担责任，有利于上下沟通，增强团结。会议向下传达贯彻时，不要提倡下面向县委“出气”，因为上面下达的任务，都是经过县一级，让县以下“出气”，一个月也出不完，春耕季

节马上到了，生产不能耽误；同时，还可能被地主、富农利用。同时，对周恩来的讲话提纲提出两点意见：（一）精简工作要做好调查研究，要在“五定”〔1〕的条件下，保持精兵，包括老工人和技术人员，同时，中央行政机关的冗员也要减。（二）粮食问题，在全国要动员增产节约，争取提前不吃进口粮。

△ 晚，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拥政爱民联欢晚会。

2月6日 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的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听取邓小平讲话。邓小平讲了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责任和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问题。

△ 参加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浙江组讨论会。在发言中讲了四个问题：（一）这次会议“通气”的目的达到了。（二）坚持民主集中制。上下级、同级要谈心、交心。主要是上级，应平等待人，能倾听不同意见。就个人来说，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就领导来说，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总的原则是要处理好个人与组织、少数与多数、下级与上级、全党与中央的关系。组织决定前，正反面意见都可以讲；决定后同心同德好好执行，不得阳奉阴违，不得进行宗派活动。少数人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不得打击报复，这是党性、党纪问题。上级、同级、下级要互相监督。地方和部队，要互相尊重、支持，要关心解决当地驻军的有关问题。（三）关于前几年工作错误的责任问题，第一，中央负责，第二是省级，各有各的

---

〔1〕 五定，即定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定人员和机构；定主要的原料、材料、燃料、动力、工具的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协作关系。



账，要记取教训。（四）县以上的干部，要把根本问题弄通，认识一致，取得经验教训。县以下不要号召“出气”，但干部有气有意见的要听。对处分错了的干部要平反。全部错，全部平反；部分错，部分平反；不错的，维持原决定。这样，气顺了，思想通了，党员的积极性就会调动起来，党的生活会活跃起来。

**2月7日** 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的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听取周恩来讲话。周恩来主要讲了当前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大会在通过《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关于刘少奇同志报告的决议》后闭幕。

**2月10日** 批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张苏：同意组织到各地参观访问回京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进行座谈，并请和林枫商议，可否请他出席和你们一起主持座谈会。

**2月12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一十四次会议。会议讨论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的工作安排、精减城镇人口和人民生活问题。周恩来参加会议。在谈到平衡财政、控制通货膨胀时说：搞高价商品起了一部分作用，但不能搞多，国营商店不能和自由市场竞争。巩固工农联盟，主要靠工农业产品交换。要下决心解决工业产品下乡问题，收回票子，抑制局部的通货膨胀。在谈到干部问题时说：真正做实际工作的是县以下的干部，上面一个号令，他们执行。但政治运动一来，把多少年的错误、缺点集中起来，算总账，似乎一无是处，一批一批地处理，甚至一人被斗，妻儿受牵连，干部的积极性就没有了。今后不要这样搞。对犯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搞宗派活动，应实事求是，治病救人。在研究地、县级党委精简编制、不设书记处时说：党内有一批老同志，身体不好。在第一线工作不能出全勤的，可以留在监察机关，过问党的政

治生活。

**2月13日** 上午，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董必武等以及首都各界两千五百多人，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公祭李克农<sup>〔1〕</sup>。李克农逝世后，和周恩来、杨尚昆等到协和医院向李克农遗体告别。李克农是二月九日逝世的。

**2月15日** 下午，主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次会议、全国政协三届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联席会议。会议讨论决定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延期召开。还决定会前组织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赴外地参观访问。回京后，由李维汉、林枫负责组织座谈。未外出参观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自愿参加。

**2月18日** 收到周恩来致邓小平、彭真的信，告知据外交部电报反映：自苏共二十二大以来，中苏边境车站的铁路员工及家属在与苏方人员接触中态度生硬，部分人中滋长反苏情绪，甚至在边境来往的列车上查出有反苏的字画等。除已电话通知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新疆四省区党委严肃处理外，来信指示在最近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研究此事，“并立即派出几个检查小组（以公安为首）分至齐齐哈尔、满洲里、绥芬河、大连（有苏联随修船来的海员在港）、二连、集宁等地留住该地一个月，协同有关部门进行逐车的严格检查，并协助当地党政部门对当地员工干部进行解释教育。”当即批示谢富治、吕正操、黄镇、张彦、姚溱<sup>〔2〕</sup>阅，在一两日内一起商讨一下。

---

〔1〕 李克农（一八九九——一九六二），生前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

〔2〕 黄镇，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张彦，时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姚溱，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2月21日—23日** 出席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通称为“西楼会议”）。会议讨论一九六二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问题。会议分析了农业生产下降、市场紧张、物价高涨、通货膨胀等情况，发现当年的赤字高达三十多亿元，困难比“七千人大会”时的估计要严重。会议认为：现在经济上处于非常时期，党的主要任务是大力恢复农业，稳定市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今后十年，前一阶段调整，主要是恢复，部分有发展；后一阶段主要是发展，也还有部分的恢复。二十三日，陈云就当前经济困难的主要表现和应采取的措施作了发言。会议决定由陈云、李富春、李先念向国务院各部委党组传达会议精神和中央的方针。

**2月22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一十五次会议。周恩来参加会议。会议通过：（一）中央精简小组关于国家机关、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精简的建议。（二）中央批转财贸办公室关于财贸职工精简整顿的报告。（三）同意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关于外事部门精简节约的情况报告。（四）成立中央精简小组，由杨尚昆、习仲勋等八人组成，杨任组长。（五）成立国家机关编制小组，由谭震林等七人组成，谭为组长。（六）批转邓子恢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改进国营农场管理工作的措施报告。在发言中说：（一）现在是困难时期，领导机关不宜乱出点子，增加人为紧张；点子可以出，不调查研究清楚，不要出。（二）精简职工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国家一万年也不能搞这么多非生产人员。（三）妥善安置老弱的干部，不要下放有困难的，不要乱处理，搞得天怒人怨（邓小平插话：要采取多种形式安置）。

**2月24日** 下午，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富春、

李先念、陈伯达、康生、杨尚昆等出席刘少奇召集的会议，讨论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报告和口头报告的定稿。

**2月26日** 上午，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参观访问座谈会小组正副组长会议。向会议报告：（一）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原定三月十五日左右召开，现准备改在二十日左右。（二）会议的开法，建议采取“七千人大会”的经验，先用两三天阅读周恩来的报告稿，报告后分小组讨论。为了总结十多年的经验，要让大家畅所欲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实行“三不主义”。讨论时，先以地区编组，再以行业、党派编组。然后再开大会。大会上不可能每个代表都讲，小组会是主要的部分，使大会与小组的“神仙会”相结合。（三）大会准备邀请列席代表参加人大会议，中央四百人、地方四百人，共八百人，以政协的名义邀请。经会议协商同意上述各项安排。

**2月28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一十六次会议。会议决定：（一）由中监委、中组部起草关于加强各级党的监察工作的决定。（二）国家计委、经委当前应抓支援农业和贯彻“工业七十条”等工作。（三）新华通讯社国内各分社改由以总社领导为主。适当增加《人民日报》的发行份数。会议还讨论了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问题。在讨论时说：要埋头苦干，党委抓方针、政策和计划，加强政府工作，在解决实际问题中体现政策。解决城乡关系、工农关系中的尖锐矛盾，关键是搞好生产。毛主席讲，一季开一次党委会，检查工作，总结经验，交换意见。监委的主要精力放在抓新问题上，过去的事搞起来没有头。

**3月1日、2日** 召集冶金、煤炭、机械、铁道等部门的

负责人会议，听取高扬文〔1〕汇报，总结具体的经验教训。讲话说：几年来，有好多事是中央（包括各部）搞的，有缺点和错误，要让人家充分讲，不让讲就有气。领导和部党组同志，对群众的意见要认真进行比较，总结经验，建立新的秩序，不要简单地走回头路。过去是“情况不明决心大”，看起来很乐观，实际不是。工业是实业，要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研究解决。有些问题会有争论，但是问题提出来就好办了。要客观、全面、抓住事物的本质，把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谈到精简问题说：工厂要在“五定”的基础上搞精简。技术骨干力量要保留，实行精兵主义。

**3月3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会议。会议讨论对苏共中央关于苏中关系问题给中共中央信的估计和对策，以及对印尼共产党来信的答复。决定以上两件事均由中联部起草复文；还讨论并决定对老挝问题的意见，由外交部起草一个文件。会议还听取了当日刚从广州返回北京的周恩来汇报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军委常委会议的情况。

**3月5日** 下午，和康生、王稼祥、杨尚昆出席邓小平召集的会议，讨论中共中央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复信稿。

**3月6日** 召集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外事、铁道、公安等部门的有关负责人开会，讨论解决在中苏边境地区群众中控制反对修正主义的宣传、维护中苏人民团结问题。在听了徐子荣、吕正操等汇报后指出：群众性的反修正主义教育，应着重从正面阐明观点，讲清道理。反对国际上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由中央集中掌握，统一组织进行。要使所有干部和群众了解，

---

〔1〕高扬文，时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

现代修正主义必须反对，但是中苏的团结友好，必须努力巩固和发展，对苏联的先进经验必须学习，绝不能把这两方面混淆起来。所有的干部和群众，在接待外宾时，要热情、诚恳，友好、团结，不向对方进行反对修正主义宣传；如果对方主动挑衅，可以简单地表明态度，但不展开争论，同时，立即报告上级，由中央指定的专人处理。地方报刊不要登这方面的文章，可转载《人民日报》和《红旗》的文章。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哈尔滨、广州等大城市和一切设有苏联等国领事馆的城市，对外事工作和宣传工作要抓紧领导和检查，严格控制，堵塞漏洞。十日，又嘱有关负责人将以上精神转告北京市委。

**3月9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一十七次会议。会议讨论召开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的有关问题。周恩来参加会议。会议同意徐冰提出的列席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人员名单，和张苏提出的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会方案。讨论时发言建议各省来一书记，了解情况，回答问题。涉及各部的问题由部答复。会议还决定由李富春率工作组到长春协助企业落实精简节约和贯彻“工业七十条”工作。十日，继续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同意到会的周恩来提议，派谭震林到郑州协同陶铸研究解决河南省的土地碱化、水利纠纷和黄河防汛等问题。

**3月12日、13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渡过春荒，克服当前粮食困难的紧急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厉行节约的紧急规定》等文件稿。会议还讨论并通过中央批转陈云、李先念、

李富春等二月二十六日在国务院各部党组成员会议上讲话〔1〕的批语。在十三日的会议上，讨论和调整了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并同意刘少奇的建议，决定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李富春任副组长。刘少奇说：这只是我们这里的讨论，毛主席不在北京，我们要立即向他汇报。主席同意，文件就下发；主席不同意，回来再议。十六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同意将陈云、李先念、李富春的讲话转发至省军级，同意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十八日，文件下发。

**3月15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中央答复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二日来信的初稿。周恩来等参加会议。

**3月16日、17日、20日** 召集国家计委、科委和冶金部、煤炭部、化工部等部门的有关负责人开会，听取吕东汇报有色金属、徐驰〔2〕汇报稀有金属工业生产的经验教训。讲话指出：前几年的缺点、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情况不明决心大，胸中无数办法多”。为什么号召办食堂，是因为粮食总产量被吹已达到七千亿斤了。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一搞钢，便涉及生铁、煤炭、矿山、运输、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问题。这有个认识过程，在座的恐怕都是如此。违反综合平衡是错误的，这个所谓认识过程就是“缴学费”。总结了经验教训后，坏事变成好事。冶金部通过总结，领导能力应当比过去强

---

〔1〕 指陈云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作的题为《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李先念作的题为《关于当前财政信贷和市场方面存在的问题》的讲话、李富春作的题为《关于工业情况和建设速度问题》的讲话。

〔2〕 徐驰，时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

了。调整工作，也是要以了解情况、调查研究为前提。

**3月17日** 同意外交部关于即将召开的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不邀请外国记者和驻华使节参加的意见，并报周恩来。

**3月19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参加的会议。会议商谈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成员、正副秘书长的名单和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执行主席及有关工作人员名单等问题。

**3月20日** 下午，出席朱德主持召开的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一次会议，汇报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筹备工作情况。会议讨论通过朱德准备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九六〇年四月至一九六二年三月的工作报告稿。

**3月21日** 上午，主持召开参加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的中共党员会议。

△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商讨即将举行的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主要事项。刘少奇通报了不久前召开的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周恩来介绍了将在人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会上，刘少奇还提出资本家定息延长三年，三年后再议的方案。

**3月22日** 上午，出席朱德主持的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二次扩大会议。在会上说明大会的开法、议程等事项，建议重点放在小组会，使会议开得生动活泼，畅所欲言。

△ 下午，出席朱德主持的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预备会议。向会议报告筹备工作和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一次和第五十二次会议（扩大）上协商通过的议程草案等事项。会议通过大会的议程；提案审查委员会成员名单。会议选举产生由



九十三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和大会秘书长。

△ 阅读一封反映精简中的问题的群众来信后，批示刘仁、万里、郑天翔：在精简中请注意“凡是家不在农村的，不要硬把人家的妻、子遣散回乡”。并将此件批送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传阅。

△ 下午，出席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会议推选朱德、彭真等十四人为主席团常务主席。

**3月23日—4月18日** 出席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

**3月24日** 下午，出席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刘仁准备向市委扩大会议作的工作报告稿。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总结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在发言中说：会议要让大家放开讲话。可以讲正面的，也可以批评市委工作中的错误。不要抓人家的辫子。错了，改就是了，不要灰溜溜的，也不要怒发冲冠。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老老实实地改正错误。我们需要在群众中经受锻炼。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包括圣贤，也会有过错。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报告中成绩和错误，都要讲得恰如其分。要联系北京的情况讲，联系实际，才能真正接受经验教训。要全面客观，才能抓到问题的本质，合乎客观实际。全面，有现实的全面，还要有历史的全面。人都有穿开裆裤的时候，事情都有个发展过程。对三面红旗、三年灾害如何估计，可以各抒己见，现在发展过程没完结，势必会有不同意见。现在是初步总结，稿子差不多了，就拿出去。要准备部分推翻修改，或者全部推翻。

**3月26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的《群众反映》刊登的“一干部”来信。信中说：出席北京市委扩大会议的代表，由所住的西颐宾馆供应牙膏、赠送电影票，不符合中央扩大会

议精神。当即批示刘仁、万里、郑天翔等：“是否把招待机关所存牙膏，变相地走了后门。如果确系如此，就不应当了。请严加防止。”

△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周恩来准备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稿，以及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主要统计指标等。

3月27日、28日 上午，在西颐宾馆出席中共北京市委全体会议（扩大）。到会的领导干部八百多人。在刘仁代表市委作工作报告过程中，有以下插话：（一）要认真听取群众意见，纠正缺点错误。傅鹰是爱国的老教授，有话敢讲，只要他说得对，我们就听。忠言逆耳，利于实践。我们不听，人家也不讲了。这几年我们吃了这个亏。（二）北京市建设占地有的说四五十万亩，或者更多。四五十万亩，就相当京郊现有土地的六分之一啊！许多单位的建筑占地过多，院子搞得很大，加上市政道路和农田水利用地，都需要协调，不然郊区的耕地越来越少。城市建设要有科学的布局，用地要经过批准，特别是占用农田。未经批准就是霸占土地。市委、市人委要注意管理。（三）要重视调查研究。在座的都是一个方面的领导，你们要分别找一个好的、中的、坏的典型，蹲点了解基层情况。市委要搞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学校、一两个街道的典型做调查。这方面市委过去工作作风有缺点。（四）一九五八年以来，知识分子有很大进步，很多人真诚接受党的领导，为社会主义服务，做了很大的努力。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是偏“左”，人家改了，我们还不把人家当自己人看。我们要很好地和知识分子合作。学术观点上的争论，不要和政治问题、宇宙观问题混在一起。有的人虽然学术上坚持己见，政治上还是拥护共产党

的。对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不能要求他们很快地改变宇宙观，不要以共产党员的标准去要求所有知识分子。（五）“三不主义”是针对党内和人民内部讲的，对待阶级敌人，就不是“三不主义”问题。完整地说，应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四句话。言者无罪就是“三不主义”。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还要有量的概念，不应把三分错误说成五分。前几年，有同志对食堂、供给制提意见，挨了批判，是非标准不清楚，有过火斗争，都应该改过来。反右倾运动中受批判的，要甄别，全错了的全平反，部分错了的部分改，大部错了的大部改。总之，要实事求是。（六）要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工作。“高教六十条”中确定，系的党支部对行政工作不是领导，是保证监督；“工业七十条”中也确定，车间党支部对行政工作不是领导，是保证监督。这是为了把党组织对高等学校和工厂企业的领导集中到校级和厂级党委会，学校的系和工厂车间的党组织起保证监督作用，以增强集中统一，避免分散主义。（七）要尽量提拔新干部，在青年干部中发现党性好、工作好的提到领导岗位。老干部的任务，一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二是发现、培养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的青年干部。

**3月27日—4月16日** 出席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二十七日下午，和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席大会开幕式，为大会执行主席之一。会议听取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中“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外交政策”部分；通过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补选代表的资格审查报告。二十八日，全体会议继续听取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内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部分。经过分组讨论和大会发言后，四月十六日下午，大会闭幕。

**3月29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一十八次

会议。会议听取陈正人关于河南省土地盐碱化问题的汇报后，讨论决定：（一）对于河南、山东、河北由于引黄灌溉及其他水利设施不当所造成的土地盐碱化后果和当前需要采取的补救措施，同意农业部的结论。应根据因地制宜、群众自愿的原则，交由公社、生产队讨论，平掉水渠，尽可能多恢复一点耕地。原打算用于引黄灌溉的一些水闸，存废问题请水利部研究。（二）河南省农业损失严重，除纠正错误外，需中央拨粮、拨款帮助恢复。同意周恩来关于解决河南当前困难需要拨给的费用和物资的意见〔1〕。（三）河南省委的人事调整，由李富春与中南局商量。（四）各地区、各部门在执行政策中发生的错误，凡属过去几年的，着重总结经验，教育干部，不再追究。凡属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之后所发生的，要认真检查，严肃处理，严重的要执行纪律。（五）河南甄别平反任务很大，拖延太久不利，应采用军队的办法，即除基本上处分对的维持原案外，其他应一律宣布平反。（六）遵照刘少奇意见，今后党内处分干部，必须严格地按照中央规定的干部管理范围和审批手续办事。法律处分必须由高级法院审理。会上，在谈到平反问题时发言说：要采取群众路线的办法，只要群众同意就平反，将来在工作中考查。还说：人大开会期间，各行业坚决不再开“出气会”，集中力量开好人大，讨论总理报告。

**3月31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一九六一年财政信贷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二年如何实现中央“当年平衡、略有

---

〔1〕 一九六二年四月一日，周恩来同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谈话，说中央决定六月底前拨粮三亿九千万斤，救济款两千万元，以利恢复。

回笼”方针的报告》。

**4月2日**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报送的《关于处理、撤销、合并民族自治地方的意见》上批示：“印书记处会议文件。已经撤销和合并的民族自治地方，少数民族人士意见很多，最好趁把大县划小的机会，即恢复一些原来的县，把撤销的民族自治地方也恢复。这样比较顺。”

**4月4日** 出席中共北京市委扩大会议。向各口、各小组召集人讲话：（一）刘仁代表市委作的工作报告是抛砖引玉，可以大改、中改、小改，也可以完全推翻。（二）对工作的估计要实事求是。有不同意见的，还可以去调查研究。缺点、错误主要在领导，不能责怪群众。大家讲透一点，深一点，各种意见都拿出来有个比较，才能达到集思广益，最后求得认识比较全面，比较接近本质。（三）这几年对有些同志的批评、斗争，有过火的。有的被斗错了，或者批评过重了，有气是可以理解、谅解的。对这一部分同志，哪些批评对了，哪些批评错了；或者大部分对了，一部分错了；或大部分错了，一部分对了，都要实事求是。有些事情比较清楚，如反对办食堂，反对供给制，受了批判，应改正。这事由中央负责。（四）老干部第一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第二注意发现提拔新干部，培养助手。每一个单位有几个得力助手，工作就好做了。党的传统总是老一代向下一代传。监察委员很重要，要党性强，有政治威信，处理问题公正，经过斗争考验的同志才能当，不是老了才去当。（五）关于三面红旗，要畅所欲言，可以完全赞成，可以基本赞成，有意见可以保留，这没有什么坏处。经过这次会议，有人担心，提了意见，阴天了，就会被反攻。这种担心事出有因，这几年有这个缺点。有了这几年经验教训，有各种意见要畅所欲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要有统一意志，就要党

的生活有充分民主。工作中要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4月5日、17日** 召集国家计委、经委及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会，听取钟子云〔1〕汇报煤炭生产问题。讲话说：（一）煤炭部当前要集中力量下决心解决煤矸石和灰分高的问题，要以矿区或井口为单位订出提高质量的指标；要找几个重点矿，用工程师、老工人和干部三结合的办法，解决当前的难题，不要扭在过去的是非争论上。过去的矛盾只要不是敌我问题和反党集团问题，而是偶尔对工作持“左”或右的意见，应该有什么谈什么。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总结出一套适合国情的建设经验。（二）要研究几个定额：一是煤矿的基建要通盘考虑。“一五”时期是学苏联的，一九五八年后快得过了火，现在要物色地质条件和设备较好、材料凑手、领导较强的地方总结典型经验，确定基建的工期，争取时间打好煤炭工业的发展基础。二是从实际出发，通过算经济账，制定“三量”〔2〕定额，是储备量多一点好，还是掘进量多一点好？三是设备、材料的消耗定额，要发动群众搞爱护工具、节约材料的运动，在此基础上制定比较合理的定额。

**4月5日** 下午，列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和给印度尼西亚、越南、瑞典、英国、新西兰等五国兄弟党的复信稿。

**4月7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和给印尼共产党的复信。

---

〔1〕 钟子云，时任煤炭工业部副部长。

〔2〕 “三量”，指煤炭工业生产中的掘进量（进尺）、储量和获得量。

**4月9日** 出席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八次会议第二次会议。会议讨论刘少奇三月二十一日在第一次会议上通报“七千人大会”精神的讲话。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今年一月，中共中央开了一个七千人的大会，“对过去的工作，犯了哪一些错误，有哪一些成绩，经验教训多少条，作了一个初步的总结。这些总结，究竟正确不正确，要在今后的实践中去考验”。

**4月12日** 晚，出席朱德主持的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大会发言和议程安排。发言说：现已报名要求发言的共一百一十篇（包括口头、书面和联合发言），原定四天大会发言，非延长不可。建议大会主席团授权常务主席适当延长会议日程；即日起上午、下午均安排大会发言，发言时间一般限十分钟，有的可改为书面发言。会议同意上述安排意见。

**4月15日** 上午，出席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彭真准备在市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要点；安排扩大会议最后两天的日程：十六日，讨论分散主义问题，十七日讨论甄别过火斗争中遗留的问题。

△ 下午，在中共北京市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讲了六个问题：（一）会开得很好。会议本着从团结的愿望，经过批评和斗争，弄清是非，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总结了经验，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交换了意见。对市委的报告，经讨论修改，现在大家比较满意了。缺点是在会上不同意见的交锋还不够。过去很大的教训是领导上不愿听不同意见。这就没有比较，或者犯了错误，很久都不能改正。要把这条教训深深地印在脑子里。要养成一种平心静气地进行讨论、进行争辩的习惯。没有这一点，我们的党内生活就不能说完全正常。要善于区别两类矛盾。民主集中制，是处理人民内部问题的重大原则，但是这

几年两类矛盾有些混淆。(二)对我们工作的估计。报告中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这样估计比较好。成绩是全党全民大家做的结果,缺点错误由市委负主要责任。(三)三面红旗问题。绝大多数同志主张继续高举,市委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站得住脚的,这次会上准备作个决议。有的同志对三面红旗还要看一看,还有所保留,这是容许的。可以让事实来证明。(四)要注意培养选拔新干部。老干部有两个任务:一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二是注意提拔新干部。提拔干部要德才兼备,要看是否忠于无产阶级事业,忠于党的工作,经过斗争锻炼、考验。新老干部要取长补短,互相合作。(五)国民经济发展的综合平衡问题。这不是一个市的范围所能解决的,是全国性的问题,但以农轻重为序的发展方针,市里同样要贯彻,要检查贯彻情况。地方要按照中央的计划安排,可以提出自己的要求,由全国搞综合平衡。(六)认识世界是一个过程,要在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社会主义建设是个新问题,在座的同志要下功夫,周密系统地调查研究,使认识逐步加深。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与民主革命规律不同,老干部和新干部都要从头研究。要坚持真理,有错误坚决改正。该讲话的一部分以《要注意培养提拔新干部》为题收入《彭真文选》。

△ 和周恩来、沈钧儒、李维汉、习仲勋、杨尚昆等在北京嘉兴寺参加马锡五<sup>〔1〕</sup>公祭仪式。马锡五是四月十日逝世的。

**4月16日** 上午,主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第四次扩大会议。会议通过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

---

〔1〕 马锡五(一八八九——一九六二),生前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委员。



一九六〇年国家决算的决议草案和预算委员会的审查报告、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提案审查意见和提案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报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补充名单草案。

△ 下午，和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等出席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式。会议由朱德主持。在听取周恩来对代表们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的问题的答复后，会议一致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会议批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通过关于一九六〇年国家决算的决议和预算委员会的审查报告、提案审查意见和提案审查委员会的报告。会议还决定任命蔡廷锴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 审阅《人民日报》拟于次日发表的题为《团结奋斗争取新胜利》的社论稿。社论指出：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全国人民要在党的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指引下，团结奋斗争取新胜利。

△ 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同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师生合影。

**4月17日、1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一十九次会议。会议讨论对在反右倾、“拔白旗”和民主革命补课中被错误批判干部的平反问题。发言说：现在各地平反的进度比较慢，但问题有各式各样。北京市由中央管理和市委管理的干部共一万多人，这几年受批判的有八十多个人。出席这次市委扩大会议的八百多干部中，意见最大的有十来个人。我们说全错的全部平反，部分错的部分平反，实事求是。问题解决了，大家团结起来搞生产，今后在工作中看表现。又说：如有明明搞对了，借机取闹的人，查清后还要批评他。中组部、中监委要注意，对有些人一给处分，就不全面看他的历史，把大小错误一

凑，算总账，就不像个好人了。总之，对干部要全面看，看长期表现和基本方面。关于困难时期走后门的问题，还是从教育入手，不要简单处理。犯贪污盗窃者，先改正，批判、处理放在后边。走后门的定义有的一时搞不清，检讨了就算了，着重点是今后不许可。干部已经整得很多了，不要搞运动再整一批干部。

**4月18日** 上午，召集国家计委、经委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听取萧桂昌〔1〕汇报工作。在插话和汇报结束的讲话中，谈到以下几点意见：（一）在经济建设中，化工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要考虑全国钢的产量达到两千万吨、三千万吨时，化学工业如何按此口径建设。（二）当前的任务是三项：一是解决最基本的“三酸两碱”〔2〕问题；二是围绕吃、穿、用问题，提供化肥、化学纤维和尼龙及日用制品，支援农业增产，缓和与棉、粮争地。三是努力赶上国际水准。从以上要求出发，化工部应和地质部、铁道交通部门合作，提出一个发展化学工业的矿山建设规划。首先把下放的基本矿山收回来，归化工部管理，地方的矿纳入计划，由化工部统一安排。安徽的铜官山矿区，甘肃的白银山，要集中力量去搞，青海、西藏、新疆的矿区要根据运输能力安排。其次，要准备新的矿点，进行勘探、设计、准备设备，一旦需要即可投入生产。资源的储存，要拉个单子。有些矿石，国家要收购储存，稀缺的贵重的战略物资不要无限制出口。（三）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实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技术上要继续大胆试验，但没有过关的技术不要全面推广。不要把大胆试验的锐气搞掉。有些新技术，

---

〔1〕 萧桂昌，时任化学工业部副部长。

〔2〕 “三酸两碱”，即硫酸、盐酸、硝酸、纯碱、烧碱。

可以买专利，买设备、图纸，请专家和派人去实习。

**4月21日** 为试制小型农用拖拉机以解决目前农村畜力不足问题，致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随信附送程子华〔1〕、谷牧和农机部党组关于用小型动力机械代替人力拉犁、拉车问题的报告，和南京农业机械研究所关于手扶拖拉机试用情况的报告。在信中提出：耕畜、役畜不足是目前农业生产方面，在短期间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大中型拖拉机一时不能制造很多，且在水田里使用还有很多技术问题要解决。因此，解决农业的动力问题，应该坚持两个两条腿走路。第一，一方面大量繁殖、保护耕畜，一方面抓紧制造、补充、推广家用动力机械。第二，一面大力制造大型、中型拖拉机，一面大力制造小型的手扶或牵引拖拉机。提议专门组织一个领导小组，负责试用、选型、试制、定型、生产和推广等工作，由程子华、谷牧、安志文、廖鲁言、王震、陈正人、汪道涵〔2〕、孙志远、贾庭三九同志组成，以程子华同志为组长，谷牧、陈正人同志为副组长。二十三日周恩来批示：“拟同意程子华、谷牧、陈正人三同志。手扶拖拉机如今年第三季可以定型望争取在四季度开始布置生产。”七月十五日，通知领导小组即可开始正式工作，并增加张有萱〔3〕为领导小组成员。

**4月22日** 上午，作为团长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乘火车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友好访问。代表团副团长陈叔

---

〔1〕 程子华，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2〕 汪道涵，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3〕 张有萱，时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通、张治中，团员杨明轩、李烛尘〔1〕、张苏、刘澜波、王平、杨之华〔2〕，秘书长姚溱。

**4月23日** 上午，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抵达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新义州。下午四时，抵达首都平壤，并在欢迎大会上讲话。下午六时，拜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

**4月24日** 上午，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先后到朝鲜人民军烈士塔、纪念苏军功勋的解放塔和象征朝中两国人民战斗友谊的友谊塔献花圈。在友谊塔的留言簿上题词：“用鲜血凝成的中朝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万古长青。”中午，受到朝鲜内阁首相、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日成接见并共进午餐。下午五时，出席平壤群众约两万人在牡丹峰青年公园举行的欢迎大会并讲话。讲话说：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朝鲜人民的反美爱国正义斗争，坚决支持朝鲜政府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努力。朝鲜人民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庄严事业一定会得到胜利。当日，电告中共中央：朝方对我人大代表团的欢迎接待极为亲切热情。金日成委员长对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极为坚决。

**4月25日** 上午，出席在金日成广场举行的平壤市纪念朝鲜抗日游击队创建三十周年群众大会，检阅朝鲜人民军和平壤市、平安南道的工农赤卫队，并发表讲话说：朝鲜抗日游击

---

〔1〕 张治中，时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杨明轩，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李烛尘，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 王平，时任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委员。杨之华，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

队创建纪念日是一个光辉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今天的大会，就是朝鲜人民的力量更加强大的一个证明。晚，观看朝鲜文化省在平壤大剧场为欢迎代表团举行的音乐舞蹈演出。

**4月26日** 晚，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出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在玉流馆举行的欢迎宴会并讲话。

**4月27日** 上午，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参观朝鲜现代化钢铁基地之一——黄海钢铁厂，并在留言簿上题词。晚，代表团乘火车离开平壤前往朝鲜东海岸工业基地咸兴市参观访问。

**4月28日** 上午，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抵达咸兴市，出席欢迎大会并讲话。随后，参观兴南肥料工厂和龙城机械厂。晚，出席咸镜南道人民委员会委员长郑钟基、劳动党咸镜南道委员会委员长李载允举行的欢迎宴会并讲话。

**4月29日** 上午，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参观朝鲜现代化大型维尼龙工厂和广浦牧鸭场。下午，观看咸镜南道艺术剧场和咸兴市各工厂学校业余文艺小组的联合演出。晚，离开咸兴回平壤。

**4月30日** 上午，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回到平壤并参观了朝鲜平壤纺织厂。下午，参观青山里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歧阳拖拉机厂。同日，致电最近荣获“共和国英雄”称号、“一级国旗勋章”和“金星奖章”的农业社女社员金贞顺，赞扬她的英勇行为。

**5月1日** 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出席朝鲜内阁第一副首相金一举行的招待午宴，并参观金日成故乡万景台。

**5月2日** 上午，参观朝鲜革命博物馆和工农业展览馆。下午，接受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的一级国旗勋章。在答词中说：这一崇高的荣誉，不仅是对我个人的鼓励，

更重要的是朝中人民伟大友谊的象征，并以中国人民名义表示感谢。当晚，在玉流馆举行告别宴会。

**5月3日** 上午，出席在平壤火车站广场举行的欢送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团的仪式并致词，随后结束为期十一天的访问乘列车回国。

**5月4日** 下午，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回到北京。

△ 为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朝鲜，《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永恒的友谊》的社论。

**5月5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听取谷牧汇报大区经委主任会议情况。会议决定将汇报提纲和关于物资管理的意见，印发给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5月7日—11日** 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通称五月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关于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草案）》。会议作出全面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的决策，要求按照农、轻、重次序对国民经济进行综合平衡，进一步缩短工业生产战线，大量减少城镇人口和职工，加强农业战线，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姚依林、邓子恢等就有关问题分别作大会讲话。十一日，彭真在大会上发言说：（一）粮、棉要上去，要解决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等价交换问题。现在一面出卖高价商品，一面对农民卖给国家的粮食价格很低，这个办法不能持久。对交售粮食、棉花的农民，要保证按等价交换原则，供应必需的工业品。（二）巩固集体经济，要坚持按劳分配。不坚持这一条，就会出现变相单干，扩大私有部分。北京郊区，农民把集体耕地变成自留地，占用十边地的很普遍。这要作为紧

急任务来解决，不抓好精减城市人口，巩固集体经济，调整也不可能抓好。（三）要抓紧对县以下曾受过批判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这是和调动县以下干部和群众积极性相联系的。中央常委讨论，要树立各级领导核心，首先是县以下。基层的中心是县的领导。对现有的干部要信任，有缺点要帮助，同时中央、省市要考虑，抽调一批能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干部，到农村去加强和充实县、社领导。会议作出全面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和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的重大决策，决定进一步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切实加强农业战线，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等一系列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

**5月8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接见来京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的云南、四川、青海、贵州、甘肃五省的民族参观团，和在北京参加民族工作会议的与会人员，及中央民族学院新疆班的应届毕业生。

△ 晚，为全国人大代表团访朝设宴答谢朝鲜驻华大使韩益洙及使馆人员。

**5月10日** 晚，和全国人大访朝代表团成员出席朝鲜驻华大使韩益洙为代表团访朝归来举行的招待宴会。

**5月12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二十次会议。周恩来参加会议。会议听取刘澜涛汇报新疆中苏边境我方少数民族群众流向苏境的情况，并讨论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方针；决定李富春、李先念向中央机关处长以上干部传达五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

**5月14日** 下午，出席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四次会议（扩大），作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朝鲜的报告，题为《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伟大友谊万岁》。

**5月15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二十一次会议。会议讨论国营农场、供销合作社、渔业生产等问题。

**5月17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二十二次会议。周恩来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家民委分别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全国民族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决定：（一）由统战部根据书记处讨论的意见写成书面报告，并代拟中央批语，送书记处核发。（二）同意乌兰夫、李维汉、徐冰、刘春<sup>〔1〕</sup>关于民族工作会议的报告。（三）关于少数民族牧区人民公社若干政策的规定，请民委修改后再议。（四）关于内地调入、流入青海省各种人员的安置、遣返问题，请谢富治负责，召集公安、统战、劳动等有关部门商定办法，报书记处审议。在发言中说：民族自治州、自治县不宜轻易取消。对已经去世的右派分子，生前改造表现好的，可以摘帽子，活着的也应摘。

**5月21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二十三次会议。会议讨论有关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问题的几个文件。周恩来参加会议。会议修改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宣传通知》；决定由中央宣传部主持起草减少城市人口向农村干部、农民的宣传要点。在讨论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调整教育事业和精简学校教职员工的报告》时发言说：文件是好的。大、中、小学规模太大的，办得好的很少，是否作适当规定。另外，调整收缩，要注意提高质量。把中小学教师成绩考核一下。

**5月22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二十四次

---

〔1〕 刘春，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会议。会议讨论文教口的精简计划和中央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周恩来参加会议。会议同意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调整教育事业和精简学校教职员工的报告》；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提议由马文瑞修改后，送周恩来审阅定稿。在讨论教育问题时说：教职员工龄，为什么只算解放后不算解放前的，不合理。周恩来说：应该算。

**5月23日** 出席刘少奇召集的中央政法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在会上发言说：这几年总的经验教训，是没有把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严格区别开来。这些问题是在实际工作中发生的。今后，公、检、法三机关要按各自的职责办事，遵守法制。

**5月26日、28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二十五次会议。会议讨论国营农场工作条例。在发言中说：农场应定型定员，本身要搞精兵主义。多余的员工分两类，搞集体所有制和专业队。

**5月28日** 在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报告指出：（一）坚持党的民族政策。保障宗教信仰，保持或改革民族风俗习惯等的自由，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但是，近几年来有些地方执行得不够好，个别地方还有违反。例如，在处理叛乱分子时，对于被威胁、利诱、欺骗而参加的胁从分子，认真分析和耐心教育、改造不够。在民主改革中，既要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又要劝导他们按党的政策办事，不要打击面过宽，斗争不要过大，要保护一些人过关。在宗教改革方面，既要废除寺院的封建特权，又要保障信仰自由。信教有自由，不信教也有自由。在被错斗的一批干部中，既有汉族干部，也有少数民族干部，都应该纠正。但对少数民族干部来说，既是干部政策问

题，又是民族关系问题，应该迅速纠正。（二）各民族要团结合作。我们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这是坚固的政治基础，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希望团结的，愿意团结的，都坚决要团结。为达到团结的目的，第一，各族人民，特别是干部，都要提高觉悟，树立坚定的共同目标。第二，在组织上要有一批领导骨干。第三，要贯彻民主集中制。第四，各族干部之间要团结，要相互了解，相互谅解，相互帮助，不要相互猜忌。讲话强调：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许多新问题，在各种建设、改革、运动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点分歧，工作中出点毛病、犯点错误，是难免的、正常的。只要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办事，是愿意把工作搞好的，有错就改正，群众是会谅解的。在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时候，总会有有些人要掉队，我们要耐心进行帮助和教育，尽量争取绝大多数人都能跟着我们一块前进，掉队的人越少越好。（三）我们的任务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解决吃、穿、用的问题。全国六七亿人口，解决吃的问题，每人一年要千斤粮食才行，这不是三五年能办到的。二是要建立独立、完整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因此，各族人民要在毛主席领导下紧密团结起来，彻底纠正错误，克服缺点，鼓足干劲，战胜一切困难。七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该报告纪要，供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西藏工委，中央各部委参阅。该报告以《各民族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为题收入《彭真文选》。

**5月29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二十六次会议。会议讨论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会谈的准备工作，决定邓小平、彭真、王稼祥、刘宁一、伍修权、罗士高〔1〕等

---

〔1〕 罗士高，时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

六人组成参加这次会谈的中共代表团，邓小平任团长。

**5月29日—6月6日** 中共北京市第三届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遵照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总结北京市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统一认识，坚决贯彻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出席大会的代表一千一百五十一人，刘仁代表中共北京市委作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三届代表大会关于市委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产生四十七名委员和二十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共北京市第三届委员会。继续当选为第一书记，刘仁为第二书记。

**6月3日** 和刘少奇、邓小平等同胡志明会谈。刘少奇介绍了国内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双方就越南北方经济建设、南越问题、老挝问题、国际共运等问题交换了看法。

**6月5日** 晚，同中共北京市第三届代表大会代表座谈国内外形势。在讲精简城镇人口问题时指出：现在最大的困难是工农业生产发展不平衡，城市人口过多。根本的问题是现有的农业生产水平养活不了这么多城市人口。前几年，因为浮夸风、高估产、高征购，掩盖了矛盾，我也是现在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们没有计算农业可以养活多少城市人口，犯了错误。怎么办？一是开源，一是节流。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需要有个过程，当前唯一的办法是坚决减少吃商品粮的人口，不然就会把我们国家拖垮。全国精简两千万职工到农村去，这些人下去参加生产，增加农业劳动力，至少能供给自己，减轻农民商品粮负担。此外，工业要千方百计地支援农业，包括化肥、农业机械等。我们支援农业，减轻农业负担，农业发展起来，那时工业就可以慢慢增长，城市人口就可以慢慢增加。讲话强调：解决吃、穿、用问题，建立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工业体

系，所有东西都要自己去创造，我们要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通盘考虑，国家才能兴旺。

**6月6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林彪报告军事情况。

**6月8日** 上午，主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听取谢扶民〔1〕汇报民族工作会议的情况。

△ 下午，和邓小平去机场迎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卡博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

**6月11日—15日** 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之一，和邓小平等同以卡博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多次举行会谈。就国际问题、苏阿关系、中苏关系等问题交换意见。

**6月11日—19日** 主持召开北京市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在会上继续当选为北京市市长。

**6月16日** 上午，和朱德、邓小平等到北京车站迎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朴金喆率领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并在车站举行的欢迎仪式上发表讲话。下午，陪同朱德会见朴金喆和代表团全体成员，并出席晚宴。

**6月17日** 上午，和朱德、邓小平等出席北京市各界一万多人欢迎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集会。在大会讲话说：中朝两国人民是患难与共的友好邻居，是志同道合的好兄弟。两国人民在长期的共同斗争中结成了牢不可破的战斗的最伟大的友谊。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破坏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

---

〔1〕 谢扶民，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 下午，和宋庆龄、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参加刘少奇会见并宴请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全体成员。

△ 晚，和邓小平等陪同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全体成员，观看北京青年京剧团演出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6月18日** 上午，和邓小平等陪同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全体成员游览颐和园。晚，和刘少奇、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正在北京访问的朝鲜国立艺术剧团的歌舞演出。

**6月19日** 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向出席北京市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代表、北京市党代表大会代表以及市直各机关的总支书记讲同心同德克服暂时困难的问题。讲话指出：我们的困难是暂时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有的是违反实事求是原则，缺乏调查研究和典型试验，有的是缺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造成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不长，缺点错误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我们不要因此而忽视我们的建设成就。我们的国家和发达国家比，还是一穷二白。人均只有二亩多耕地，农业机械化程度低，化肥很少，现有的水平只能养活九千万城市人口，但现有的城市人口已达到一亿二千万人，农民不可能提供那么多商品粮，因此要控制城市人口。精简两千万人下农村，才能解决和农民争口粮的问题，不然城乡人民都吃不饱，把农业搞垮了，工业也上不去。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农村要千方百计安置下乡人员。

**6月20日** 上午，陪同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前往武汉等地访问。下午，在王任重和张体学〔1〕等陪同下，参观了长江大桥和武汉钢铁公司。

---

〔1〕 张体学，时任湖北省省长。

**6月21日** 陪同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游览武汉东湖风景区。

△ 下午，陪同毛泽东在武汉会见并宴请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全体成员。

△ 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全体成员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家属的代表，向他们慰问并赠送了礼品。

**6月22日** 上午，陪同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由武汉抵达上海。下午，和曹荻秋〔1〕陪同朝鲜客人参观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和少年宫。晚上，出席曹荻秋举行的欢迎朝鲜代表团和正在上海访问的朝鲜国立艺术剧团的招待会。

△ 收到毛泽东写的信。信中说：“我现决定在武汉住到月底，游长江对我十分有益，我要游七天至十天江。然后直返北京。因此巴基斯坦大使，卡博代表团〔2〕，都在武昌谈话。请你安排。”

**6月23日** 上午，和曹荻秋、石西民、刘述周〔3〕等陪同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出席上海市各界一万多人在文化广场举行的欢迎大会。和曹荻秋等陪同朝鲜代表团参观上海工业展览会。

△ 下午，陪同朝鲜代表团由上海抵达杭州。随即和江华等陪同代表团到都锦生丝织厂参观，并冒雨游览西湖。晚，出席周建人〔4〕为朝鲜代表团举行的欢迎宴会。

---

〔1〕 曹荻秋，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副市长。

〔2〕 指巴基斯坦驻华大使拉希迪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卡博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

〔3〕 石西民，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刘述周，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上海市副市长。

〔4〕 周建人，时任浙江省省长。

**6月24日** 下午，陪同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由杭州返抵北京。

**6月25日** 晚，主持首都各界一万多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纪念朝鲜祖国解放战争十二周年的集会，并致开会词。指出：只要全世界人民进一步团结起来，一致坚决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一致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事业一定会得到最后的胜利。陈毅和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团长朴金喆先后在集会上讲话。

**6月27日** 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就反对修正主义等问题交换看法。

**6月28日** 下午，陪同周恩来会见并宴请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全体成员。

△ 参加龙云〔1〕治丧委员会，为委员。七月二日，和周恩来到龙云家中吊唁。龙云是六月二十七日逝世的。

**6月29日** 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赠书仪式上把文化部收藏的十二种朝鲜古籍赠送给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这批古籍包括有关朝鲜历史、文学、医学等方面的古代刻本、活字本、抄本和彩绘图书等。

△ 晚，和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席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团长朴金喆举行的告别宴会。

**6月30日** 上午，和朱德、邓小平等前往北京车站，送朴金喆率领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回国，并在欢送仪式上讲话。

---

〔1〕 龙云（一八八四——一九六二），生前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

**7月2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二十八次会议。会议讨论干部平反、共青团工作、精简编制、恢复农业生产等问题。发言说：看干部，要从全部历史和关键问题的表现看，不搞细节。谈到恢复农业生产问题时说：这几年，许多问题是下决心太快了，办公社如果从容考虑，可能更好些。现在战线短了，降低指标，还是出问题，就要认真研究。这几年，包括毛主席的话，也不那么灵了，因为其中包括不正确的，许多问题是没有经他反复研究被迫决定的。我们书记处的同志，不要乱出点子。没有调查研究出点子，这是很大的教训。农村粮食征购，价格要合理。征粮部分，价格要定死；购粮部分，因自由市场粮价高，不等价交换，实际成了余粮义务交售，不下决心解决差价问题，集体经济要垮。关于向群众讲困难和缺点问题，提出：讲困难缺点到此为止，应转为积极方面。这是相当重要的事。邓小平接着说：我倾向这样。

**7月3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东北精简情况、全国粮食征购及大企业搞农副业生产等问题。

**7月6日** 上午，出席朱德主持的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六次会议（扩大）。会议通过《关于支持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为迫使美军撤出南朝鲜、实现朝鲜和平统一给世界各国议会的信的决议》。

**7月9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二十九次会议。会议讨论七月下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准备工作。会议决定：（一）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成立由九人组成的起草委员会，由陈伯达主持。（二）起草市场物价问题、粮食问题和改进体制问题的文件，由李先念主持。



△ 下午，到杨尚昆处谈话。晚，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杨尚昆等在钓鱼台为次日晨回国的胡志明饯行。

**7月10日** 下午，和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席首都各界人士在政协礼堂举行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一周年庆祝大会。十二日晚，和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席朝鲜驻华大使韩益洙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宴会，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一周年。

**7月11日—13日** 下午，出席邓小平主持的会议。会议先后听取孙志远、张连奎、王秉璋<sup>〔1〕</sup>关于军工生产问题的汇报。周恩来、林彪、李富春、贺龙、杨尚昆等参加会议。

**7月12日** 上午，会见奉调回国的巴基斯坦驻华大使拉希迪。在谈话中说：如果没有经济上的高度发展，没有经济独立，就不可能有完全的政治独立和自由。我们完全有信心，依靠自己的劳动，把国家建设好。同时希望亚非国家都能在万隆会议精神和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友好相处，互相支援，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

**7月16日** 上午，和周恩来、罗瑞卿、习仲勋等到机场为陈毅率领的出席老挝问题日内瓦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送行。

**7月1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工作集中统一的决定（初稿）》。

**7月18日、1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和全国物价委员会《关于市场和物价问题的

---

〔1〕 孙志远，时兼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张连奎，时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王秉璋，时任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国防部五院第一副院长。

报告（草稿）》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进商业体制的决定（初稿）》。

**7月18日** 在反映北京市甄别平反工作贯彻得不彻底的一封信上批示：“平反应明确干脆，该完全平反的即完全平反，部分错的即部分平反，不应该平反的，应明确说明理由，宣告维持原案。此事请刘仁、陈鹏同志阅处。”

**7月19日** 中共中央紧急下发《关于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包产到户”等问题的通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毛泽东批示印发两个文件请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各同志研究讨论：（一）《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记录》〔1〕；（二）《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

**7月22日** 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向北京市高等院校和中专学校应届毕业生两万多人作报告。勉励同学们：要正确选择人生的方向和道路，遵循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为全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的要求和利益奋斗。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在实践中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要正确处理个人志愿和国家需要问题。总之，要自觉地走历史必由之路。该报告以《自觉地走历史必由之路》为题收入《彭真文选》。

△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三十次会议，听取邓小平传达毛泽东七月十九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批评中央各部门分散主义的谈话。会议决定：（一）从今年七月起到十二月止，中共中央各部门，每月向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写

---

〔1〕 一九六二年六月七日，陶铸和王任重广西桂林专区龙胜县召开的座谈会记录。

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应当由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动手，不要委托秘书起草。第一次综合报告七月底送办公厅转呈（一律用手抄件，不要打字或铅印）。（二）遇有重大问题，或者有重要的设想和意见，应随时主动采用书信或便条的形式向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反映，不能用各部门的简报代替。（三）今后书记处开会，如有重要情况和讨论，除纪要外，还应另写简报向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反映。（四）目前情况下，有关党的方针、政策问题的探讨、辩论和批评，不宜在公开报刊上组织进行。

**7月23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三十一次会议。周恩来参加会议。会议讨论国务院财务办公室准备提交中央工作会议的《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草稿）》。在发言中说：粮食工作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我们的政策不要使老实人吃亏，不要鞭打快牛；二是有的城市人口精简的工作要抓紧。

△ 为解决工业生产中的一些困难问题，中共北京市委在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和华北局的请示报告中说：由于大量精简，人心欠安，又由于没有机动的财力去解决提高质量、增加品种所必需的技术问题，因此，与去年同期比，上半年工业生产水平下降百分之二十四点七，地方工业更严重，下降百分之二十八。为了解决关键性的技术措施，较大幅度地提高质量、增加数量，促进新产品试制等，市委生产委员会同各工业局反复研究，认为，如能拨给一千万元经费，当年就可以增产几千万元。市委同意他们的看法，请予批准。具体项目报告国家计委审查。

**7月25日** 下午，到达北戴河。在八月下旬返回北京前，出席了在北戴河召开的一系列会议。

**7月26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三十二次会议。会议讨论中央工作会议的议程安排。

**7月28日** 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有中央政治局常委、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及王任重、陈伯达、罗瑞卿等参加的会议。毛泽东在谈形势时提出：当前国际国内有一个共同性问题，就是革命究竟由无产阶级领导，还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对我们这些国家来说，就是究竟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资产阶级专政。他认为“七千人大会”后，党内开始出现一些所谓右的苗头。出气的好处是思想活了，同时像“包产到户”等主张也出来了。有的是正确的考虑，有的则是牛鬼蛇神。外事工作方面，也有右的苗头。

△ 下午，出席邓小平主持的有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等参加的会议。会议讨论国务院财贸办公室提交中央工作会议的《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修改稿）》。

**7月30日—8月24日** 协助周恩来主持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国务院七个有关部门负责人，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重庆、沈阳、西安八个大城市的负责人共二十五人。会议主要研究有关调整中的问题，制定相关政策和规定，代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稿，内容包括：一、节约粮食。二、精简职工。三、回笼货币。四、紧缩开支。五、减少亏损。六、解决拖欠。七、恢复生产。八、减少积压。九、增加商品。十、改善生活。

**7月30日** 晚，列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陈毅汇报出席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情况和会见梅农的情况。

**7月31日** 上午，出席城市工作会议。会议听取万晓

塘〔1〕汇报天津市情况。

**8月1日、2日** 上午，出席城市工作会议。会议听取刘仁汇报北京市工商业情况。汇报说：北京市工商业上半年亏损五千六百六十一万元，原因是统一分配的物资涨价，但产品价格不涨，财政不予报销，企业贴钱。若“高进高出”，可以不赔钱，但引起物价上涨，不是小问题。插话说：产品价格要全面研究，确定现行价格较好的办法是根据价值规律进行调整。汇报到群众生活水平有所下降时插话说：这几年我们与工人的关系是紧张的，党如果脱离工农，脱离军属，后果是严重的。

**8月3日** 晚，和陈伯达、杨尚昆列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中央工作会议的开法，决定成立由中央和地方的部分负责人组成中心小组（又称核心小组），成员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毅、陈伯达、罗瑞卿、谢富治、谷牧、陆定一、杨尚昆、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宋任穷、李雪峰、刘澜涛等二十二人。

**8月4日** 下午，和周恩来、邓小平等听取罗瑞卿汇报国防工业问题。

**8月6日—24日** 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粮食、商业等方面的工作。六日，毛泽东在全体大会上讲话，提出阶级、形势、矛盾三个问题。以后又多次在核心小组会上讲这三个问题，阐述阶级还存在，有阶级就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种斗争要贯彻到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会议根据毛泽东的要求，将议题转为着重讨论阶级斗争问题和批判“黑暗风”、“单

---

〔1〕 万晓塘，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天津市委第一书记。

干风”，并以此为指导，为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准备文件。

**8月7日** 嘱王汉斌〔1〕电话通知中共北京市委：（一）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下降，除客观原因外，应着重研究包括制度、规定和办法等主观原因。（二）财政、银行总的不能“无政府”，但所有资金都归银行管理，也会束缚生产；要研究哪些归银行管合适，哪些束缚了生产？（三）填平补齐、基建收尾、支农产品补贴、流动资金等地方和企业应有多少审批权限；原材料、清仓出来的物资地方有无调剂权、权力有多大等。请郑天翔主持对当前工业生产形势作具体分析，并对上述问题速搞出材料候用。

△ 晚，陪同周恩来宴请厄瓜多尔众议院前议长、前内政部长、“人民行动运动”领导人曼努埃尔·阿劳霍·伊达尔哥。

**8月8日** 下午，陪同毛泽东会见厄瓜多尔众议院前议长、前内政部长、“人民行动运动”领导人曼努埃尔·阿劳霍·伊达尔哥。

**8月9日** 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听取各中央局汇报小组讨论情况。

**8月11日** 上午，主持城市工作会议，听取张策〔2〕汇报西安市情况。

△ 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听取各小组汇报和讨论其他问题。

**8月13日** 上午，主持城市工作会议。会议在听取八大城市汇报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提高生产、改善生活、安排就业和体制问题上统一集中与分散管理等问题。讲话说：为了提

〔1〕 王汉斌，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副秘书长。

〔2〕 张策，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西安市委第一书记。

高群众生活，十八类商品（物资）价格不动；城市职工平均每人生活费低于十二元的给予补贴，特困户由工会补助；还要解决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如当临时工。金融、财政权，过去下放太多，调整过程中不收回不行，现在要研究如何搞活。出席会议的有李富春、李先念、杨尚昆、谷牧、李颀伯等十四人。

△ 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会议讨论毛泽东八月六日在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发言说：（一）经济形势。农业去年比前年好，今年又比去年好。基建战线缩短，项目由一千多压到六百多项，高指标下降。大城市和中央直属企业精简基本完成。货币回笼，银根收紧，局面扭转，现要转入以生产为重点。（二）城市工作。一是生产，二是生活，三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生产要定任务，定人员，定原材料、资金和协作关系。职工生活首先是稳定十八种商品价格，补助人均收入每月在十二元以下的职工，恢复某些福利项目。财政、金融工作，要有利于生产。一九五八年后，权力下放过多。该收回的已收回，现要适当放宽，给地方以一部分机动权，如基建投资、基建程序、产品分成、省的机动粮、工资总额、积压物资处理等，都应给地方和企业留有机动。不然不利于生产，会走向反面。（三）任务。第一，城市支援农村，工业支援农业，发展轻工业，保证市场和国防。农业好转后，供给工业的原料也会增加。第二，要从基本条件出发，根据必要和可能有步骤地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填平补齐，不能搞短线平衡。第三，精简职工。尚未完成任务的大企业，要迅速完成，以便转向生产。下马、关闭单位的干部，一部分支农，一部分调整，一部分轮训。城市闲散人员，尽量安排工作，当临时工、服务工，解决工人生活，安定社会。目前企业管理有好转，但主要问题是生产抓得不好，精神状态较差。煤

炭和木材仍是短线，亟待加强。

△ 下午，以北京市市长名义赠给朝鲜平壤市人民一批动物，其中有长尾雉、银鸡、猩猩、野牛、豹、鹞、牦牛、黑鹿和孔雀等。当日下午由北京运往平壤。

**8月15日** 上午，和朱德、陈毅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当晚，出席朝鲜驻华大使韩益洙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庆祝朝鲜解放十七周年招待会。次日，返回北戴河。

**8月17日** 上午，出席城市工作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讲起草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指示稿的意见。在发言中说：缩短基建战线，压缩指标使我们取得了主动。同时，要填平补齐。十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发出。

△ 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听取各组讨论情况汇报。会上，李先念提出粮、棉、油是否可以进入自由市场的问题。毛泽东说：“恐怕不加入不好。”“自由市场既然有，又起交流作用，还不如让它公开出来，起粮食交流作用。”

**8月18日** 收到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彭真、杨尚昆阅的中央军委关于五月至七月的工作情况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总之，党、政、军、民，都是很好的，是天下无敌的。看不出这一个本质，就是机会主义者。”

**8月19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东北小组会议，讨论商业问题。

**8月20日** 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次中心小组会议，听取各小组汇报讨论财贸工作的情



况。

**8月21日** 下午，和李先念、陈伯达列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8月22日** 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李先念、陈伯达及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

**8月24日** 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听取陈毅报告国际问题。会议结束。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在思想上、理论上、政策上为即将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做了准备。晚，离开北戴河回到北京。

**8月26日—9月23日** 出席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会议前期讨论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稿、《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以及国际形势等问题，批评支持“包产到户”的所谓“单干风”；批判彭德怀等要求重新审查历史、进行甄别平反的所谓“翻案风”。

**8月27日** 下午，出席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李先念、陈伯达及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

**8月29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三十三次会议。会议同意李先念、谷牧《关于发行专用信用证券问题的请示》，还讨论了加强党的监察工作的问题。周恩来参加会议。

**8月3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三十四次会议。会议通过《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草稿）》，还讨论了粮食问题。周恩来参加会议。

**9月1日** 晚，和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席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在越南大使馆举行的庆祝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招待会。

**9月7日** 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在工矿企业职工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通知》。通知指出：“目前我国的经济形势正在逐步好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我们应当集中力量搞好工农业生产，争取我国财政经济状况尽快地根本好转。”各单位在精简工作取得很大成绩的基础上，“应当立即把领导精力转到领导生产、领导业务方面来”，并以一两个月时间，针对职工思想上、工作上存在的问题，深入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教育的方式“应当生动活泼，灵活多样”，“循循善诱，耐心解释”。“允许那些思想不通的人保留意见，不要进行批判斗争”。“但是必须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必须服从工作分配，完成工作任务，遵守劳动纪律，充分利用工作时间；不允许迟到早退，不完成工作任务，或者放弃职责，另操副业。”

**9月8日** 上午，会见坦噶尼喀国会议员、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全国委员会前主席瓦齐尔·阿齐兹。

△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三十五次会议。会议讨论粮食、棉花、煤炭、木材的综合发展等问题。发言强调两条方针：（一）发展生产，保障供应。（二）保证农民口粮，少征购，上调多些，进口逐年减少，潜力从地方挖〔1〕。周恩来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会议。

**9月10日** 在全国总工会党组拟于十月十日召开全总执委扩大会的请示报告上批示：“解决职工生活困难问题要实际做，不要在群众中多说，多宣传。一做后，群众自然会知道。”

**9月15日** 下午，和周恩来等出席首都各界群众为庆祝

---

〔1〕 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示：今年的粮食计划应当少购一点，少销一点，多上调一点，少进口一点，多挖地方潜力。

中国人民解放军击落入侵我国领空的美国 U-2 间谍飞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大会。

**9月17日**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中印边境冲突问题。出席会议的还有陈毅、贺龙、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

**9月20日** 下午，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接见出席中国共产党空军第三届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

**9月21日** 下午，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副总理阮维桢率领的越南经济代表团。

**9月22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三十六次会议。会议讨论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有关事项。

**9月24日** 晚，和郭沫若等出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和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举行的宴会，欢迎以阮文孝为团长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在致词中说：越南南方人民正在进行着英勇的、有着高度领导艺术的斗争，他们的每一个斗争都是对我们的巨大鼓舞和支援。中国人民和越南南方人民是亲密的兄弟、朋友和战友。我们的斗争有着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敌人，我们将永远肩并肩地斗争，直到最后胜利。

**9月24日—27日** 出席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共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等文

件。全会肯定了八届九中全会以来贯彻“八字”方针、加强农业战线取得的成效，决定继续实行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毛泽东继续批判所谓“翻案风”、“单干风”和“黑暗风”，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企图复辟。阶级斗争“从现在就讲起，要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党大会就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全会宣布对彭德怀、习仲勋进行专案审查；决定撤销黄克诚、谭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补选陆定一、康生、罗瑞卿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还增选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会上，中央和毛泽东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规定会议的精神只传达到行政十七级以上干部。毛泽东并指出，不要因为阶级斗争而妨碍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样，就使全会结束后，经济调整工作仍能基本上按原定计划继续进行。

**9月25日** 下午，出席邓小平召集的有陈伯达、康生、陆定一、杨尚昆、吴冷西、胡绳等参加的会议。会议讨论修改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稿。

**9月27日** 上午，出席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并在全体会议上发言。要点是：（一）“七千人大会”后，出现了一股“冷空气”。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持三种态度：一是正视检查和改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总结经验教训。这种人不发生立场、方向问题，但缺乏调查研究。二是抓住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标榜自己正确，刮各式各样的翻案风。三是一些右派分子，幸灾乐祸。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有一部分人认为倒退就合乎马列主义，经济发展指标越低越好，速度越慢越好，对生产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过去我们曾犯过瞎指挥、高指标、违反综合平衡和

“五风”等错误，切不要重犯，但不要因为现在有右，又出“左”。（二）三面红旗倒不了。没有人民公社，不依靠集体经济，能渡过三年困难吗？能兴修这么多水利吗？工业方面，是不是跃进要“三比”，钢产量三年内由五百三十五万吨，增长到一千八百万吨，机械设备由四千一百种增加到九千六百种，设备自给率由百分之六十增加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问题是我们搞过了头，口张得太大。因此，不应当把三年困难都推到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上。毛主席提出的总路线、总方针是普遍真理，必须结合实际，全面贯彻执行，要下功夫调查研究，弄清条件，需要发挥创造性，有所发展。除个别人外，过去我们大家接受了毛主席提出的方针，但是没有好好研究，有的没有全面地调查研究，贯彻执行。我就是个。（三）关于“恢复论”。有同志强调“恢复到一九五七年”，这不符合“八字”方针的要求。它一是认为大跃进一切都搞坏了，需要倒退。二是“恢复”以什么为标准？如农业，地区间有差别，有的地区产量一直有发展；有的地方受了灾，灾后提“争取丰收”更为确切。至于工业，更不能提“恢复”的口号，难道说钢的品种，我们要从八百五十种退到三年前的三百二十种吗？我们能从自己设计、自己制造、安装再退到依靠苏联吗？能从总路线、大跃进的道路上再恢复到照搬苏联，搞教条主义吗？总之，“恢复论给不了我们武器和信心”。（四）关于阶级斗争和建设。几年来，一条痛苦的经验是，我们的建设工作常常被国内外的阶级斗争所干扰，特别是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和一九六〇年的反修斗争，某种程度上掉进了阶级斗争的陷阱，今后绝不能重复。这次全会以相当大的精力对付阶级斗争，是必须的、正确的，但是全党主要是县以上干部切记不要再重复这种错误。

9月28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三十七次

会议。会议讨论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计划、各大区各项工作安排和八届十中全会传达等问题。周恩来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会议。

**9月29日** 晨，应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的邀请，作为团长率全国人大代表团赴越南访问，当天下午飞抵昆明。邓小平、郭沫若等到机场送行。

**9月30日** 上午，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自昆明飞抵河内。当即率代表团拜会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下午，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接见了代表团。晚，出席中国驻越南大使朱其文举行的国庆招待会。胡志明、黎笋、长征、范文同等出席招待会。

**10月1日** 上午，率领代表团拜会越南河内市行政委员会主席陈维兴，随后游览河内市容和名胜古迹，并到河内市郊梅易革命烈士墓献花圈。下午，代表团全体成员会见河内市华侨代表。晚，率领代表团出席越南祖国战线中央委员会、越中友好协会和越南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在河内大戏院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三周年大会，并讲话。

**10月2日** 上午，率领代表团参观越南革命博物馆。下午，和代表团部分成员访问河内市郊陈富乡越中友好农业生产合作社。晚，出席长征在河内国际俱乐部为代表团举行的欢迎宴会，并讲话说：中越两国人民之间有着传统的亲密友谊，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实行了全面的友好互助合作。在反对美国侵略、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共同斗争中，紧密团结、互相支持。

**10月3日** 上午，参观河内以自力更生精神办厂著称的陈兴道机器厂。下午，率领代表团同长征为首的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们座谈，互相交流工作情况。座谈结束后，共进晚餐。

**10月4日** 率领代表团部分成员访问越南北方新兴工业城市——越池市。当天下午出席该市两万工人、干部和市民在中心广场举行的欢迎大会，并讲话。随后参观了由中国帮助建设的造纸厂和发电厂。

**10月7日** 上午，率领代表团出席河内各界五万多人在河内大戏院广场举行的欢迎集会。在讲话中盛赞越南人民八月革命的胜利，在东南亚树起了民族解放的旗帜；九年的武装斗争，在越南北方建立起工人阶级领导的民主共和国，进而为祖国和平统一、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维护世界和平，坚持不懈地同美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是在历史的风暴中经受无数次考验，并将永远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走向共同的胜利。随后，到海防市访问。傍晚，到鸿广区拜寨码头访问。

**10月8日** 上午，率领代表团游览了著名避暑胜地下龙湾。下午，出席鸿广区首府鸿基市一万多人的欢迎大会。晚，出席鸿广区行政委员会举行的宴会，并观看了文艺表演。

**10月9日** 率领代表团回海防。途经广安省省会广安市时，受到该市各界数千人的夹道欢迎。上午，率领部分团员访问海防市第四南方干部子弟学校。晚，在河内设宴招待越南党政领导人和各界人士，并讲话。黎笋、长征、范文同等出席。

**10月10日** 晚，率领代表团出席胡志明在主席府为代表团举行饯行宴会。胡志明在致词中请彭真向中国人民、向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转达最亲切的问候。彭真代表中共中央、中国政府、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主席，代表中国人民祝胡志明健康长寿。宴会结束后，宾主共同欣赏了越南艺术家演出的文艺节目。

**10月11日** 上午，率领代表团离开河内回到云南昆明。

**10月13日** 上午，率领代表团由昆明回到北京。到机场迎接的有朱德、邓小平、郭沫若等。

**10月14日** 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在农村干部和社员中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的通知》。通知规定教育的目的：一是通过今年抗灾增产的事实，教育干部和社员群众认清形势，提高信心，搞好“三秋”工作和冬季生产，为明年丰收创造条件。二是以实际事例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反对资本主义倾向。三是教育干部和社员正确认识工农联盟、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关系，积极、超额交售农副产品。通知指出：在进行教育时，必须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原则，不开展批判斗争。特别是“对一些生产搞得不好或投机倒把严重的生产队，县（区）委、公社党委要由主要的负责干部亲自出马，结合整顿工作，进行广泛、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

**10月15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谭震林汇报农口当前工作、一九六三年计划、基本建设投资分配以及第三个五年计划和今后二十年到二十五年的设想。十六日下午，继续出席会议，听取农口的汇报。

**10月17日** 下午一时三十分，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讨论对印度军队的进攻进行自卫反击问题。

△ 晚，举行宴会为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越南答谢越南驻华大使馆，并为即将离京到外地访问演出的越南青年歌舞团饯行。越南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黎新、青年歌舞团团长阮文苍应邀出席。

**10月18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和讨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关于对印度军队



进行自卫还击军事行动的决定〔1〕。

**10月19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赵尔陆汇报国防工业口的基本情况、当年的计划执行情况；讨论了一九六三年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安排等问题。

**10月20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工交工作的汇报。二十二日下午，继续出席会议，听取薄一波关于工交口一九六三年计划安排等工作的汇报。

**10月22日** 收到毛泽东批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传阅并转发各地的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怎样纠正“单干风”的报告。

**10月23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李先念关于市场和外汇情况的汇报。

**10月25日** 出席中共北京市委扩大会议。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会议自十月八日开始，出席会议的共四百八十一人。在听完各小组长汇报后，讲话说：（一）三面红旗的作用，再过五年会看得更清楚。在党的会议上有不同看法都可以讲。讲错了话，也不要紧张，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错改了就好，如认为没有错，还可以保留意见，但要执行党的决议。这是合乎党章的。（二）敌我矛盾有些地

---

〔1〕 印度独立后，接管英国侵占我国西藏的一些边境地区，并不断扩大范围。从一九六一年起，印度先后在中印边界东段和西段，越过双方实际的控制线，蚕食中国领土，建立据点，挑起军事冲突。一九六二年十月十六日以来，侵入“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印军，十七日起已在克朗朗河全线加紧挑衅，发动攻击。十月二十日，中国边防部队忍无可忍，奉命自卫反击。

方是存在的，但不能说对三面红旗有不同认识就是敌我矛盾。邓子恢主张包产到户〔1〕，不能说是敌我矛盾。（三）讲话要看根本的、主要的、决定的方面，百分之八九十对就很不错了；做事情对九错一是正常的，不许有一点儿错是形而上学。（四）谦虚就是实事求是，谨慎也是实事求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圣贤也可能会有过的。“三不主义”对同志都适用，有不同意见应相互帮助，包括领导与被领导。千万不能养成一种风气，要么你对，要么我对，这不是同志式态度。（五）对形势是逐步认识的，估计得有些出入是难免的，搞意识形态的人要联系实际，不联系实际容易架空。做“氢气球”不论自觉或不自觉都不好。联系实际，联系基层，看问题就接近历史唯物主义，分歧就比较少。（六）讨论问题和实际行动要分开。行动要遵守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决议，不得搞无政府主义。在党的会上讨论问题，都可以讲，对中央、毛主席的意见也可以讲，但不许搞秘密小团体。

△ 晚，出席朝鲜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郑凤珪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宴会，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十二周

---

〔1〕 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黑暗风”、“单干风”后，八月十一日，邓子恢在核心小组会上作了声明。毛泽东说：“他在最近几天，已经觉得自己的单干主张是不正确的了，这是值得欢迎的。”但毛泽东重提农业合作化运动中，邓子恢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因而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的错误”，说：邓子恢的声明“是不够的”。一九八一年三月九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中指出：“过去党内对他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应予平反，强加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恢复名誉。”

年。

**10月26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张际春〔1〕汇报文教口一九六二年调整和执行情况、一九六三年安排和指标等问题。

**10月27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韩光〔2〕关于科学口的情况和今后任务的汇报。

**10月28日** 下午，和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席首都各界一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支持古巴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战争挑衅大会。在大会讲话中说：肯尼迪政府对古巴实行封锁，并且调集大批海陆空军，准备直接侵犯古巴。这是对古巴的又一次猖狂进攻。中国人民永远和古巴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尽一切可能支援古巴人民的斗争。

**10月29日** 上午，和邓小平、康生、杨尚昆同刘宁一、伍修权等谈参加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大会问题。

**10月30日** 下午，在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十七次会议上作题为《中越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万世辉煌》的访越报告。

**10月31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李富春关于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汇报。十一月一日，继续出席会议，听取顾卓新〔3〕关于基本建设计划的汇报。

**11月2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李先念关于财政问题的汇报。

---

〔1〕 张际春，时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

〔2〕 韩光，时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3〕 顾卓新，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11月3日** 下午，和邓小平、康生、杨尚昆等会见并宴请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副秘书长阿吉托罗普。六日下午，和邓小平等同阿吉托罗普举行会谈。

△ 将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关于支持古巴人民的反美斗争，建议我国北京、上海等八大城市在四至六日内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的请示报告批报周恩来：“我同意，已报告邓〔1〕，请你核批。我已告市委〔2〕准备，待你批后行动。”周恩来批示：“同意，已交外办照办”，并送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阅。

**11月4日** 晚，和贺龙、陈毅、李先念、罗瑞卿等参加周恩来会见并宴请朝鲜内阁副首相李周渊率领的朝鲜政府贸易代表团。

**11月5日** 下午，和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陆定一等会见并宴请挪威共产党中央主席埃米尔·洛夫林及其率领的挪威代表团。

**11月7日** 晚，和周恩来等出席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在大使馆举行的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五周年招待会。

**11月8日** 下午，在中共北京市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在讲到发展农业问题时说：我们提出发展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并不是因为人民公社没有搞好。农业问题，苏联四十五年没有过关，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十六七年没有过关，我国搞了十三年也未过关。而且我国人口多、耕地面积少，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农业问题。讲话赞成市委扩大会议提出的奋斗目标：力争在七年左右时间内，建立起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的基础，全面发展农业，并以粮食和经济作物并举的方针，在平

---

〔1〕 邓，指邓小平。

〔2〕 市委，指中共北京市委。

原地区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要求，粮食平均亩产四百斤；全郊区年产粮二十亿斤，肥猪一百万头，人均粮食八百斤。指出：搞革命没有奋斗目标不行。我们建党时，几十个人，就喊出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起名共产党。奋斗目标，不是冒险主义，而是鼓革命勇气。在讲到党的生活中批评和自我批评、正确对待真理和谬误问题时说：我们党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错误人皆有之，大小性质不同。所以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三不主义”在延安时期就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前一时期，党内发生抓辫子、打棍子、动不动戴帽子的粗暴斗争现象，这不是对自己的办法。在党内，在人民内部，要靠说服教育，一看二帮；要允许别人讲话，对的、错的都可以讲，这样才可以使我们党少犯错误。“三不”一定要在同志之间普遍实行。大家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有议论，任何事物都是可以分析的。你坚持无产阶级立场，承认马列主义，承认用阶级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如有不足，努力学习改造，何必天天去划这个那个。党的任务是对知识分子争取、团结、改造，帮助大家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11月11日** 下午，在中南海居仁堂同谢富治、张鼎丞、谢觉哉、徐子荣、张苏等讨论政法工作问题和准备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内容。

**11月12日** 出席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在会上讲话说：（一）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任务，一是处理敌我矛盾，一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最重要、最根本的任务是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两类矛盾往往纠缠在一起，要严格地加以区别。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好，会影响团结，影响生产和工作，被敌

人钻空子。对敌斗争则密切关系到社会秩序、国家安危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现在，反革命案件总的数量是减少了。但是，发生在机关、企业内部的比重却显著地增大了。现行反革命，不一定都具有历史反革命身份，凡进行现行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就是反革命。（二）队伍问题。首先，要加强骨干。政法干部不能一点不流动，但领导骨干一定要保持相对稳定。没有一批具有相当的政治理论、政策水平、专业知识和业务经验的领导核心，就不能做好工作。县级以上政法机关，一定要有一些老同志做领导骨干。干部的数量，既要精兵简政，又要以能担负起任务为标准。赞成县的公、检、法三长归省委主管。政法院校要保持一定的数量，把训练干部的工作做好。（三）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党的原则和国家法律规定了三个机关是分工负责，互相制约。公安机关负责侦察、拘捕；检察机关负责批捕起诉；法院负责审判。从不同的工作方面，及时地把办案过程中的问题反映出来，矛盾暴露出来，工作小心谨慎，实事求是，少犯错误。三个机关之间有些矛盾是正常的，应当共同商量，不要闹无原则纠纷。拘留、逮捕、审讯和判决等每一个环节都要按合法的程序由法律规定的机关去执行，其他任何机关包括党委机关在内都不能搞，搞了就违法。不能无法无天。政法三机关在预审、审判中都不准刑讯逼供。中央的公、检、法机关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之下工作，各级地方的三个机关在各级党委领导之下工作。方针问题，政策问题，牵连全局的问题，一定时候的打击方向等重大问题，或者三个机关解决不了的问题，党委要管。如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来。意见不一致，报告上级解决。但是，党委不干涉具体办案，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其他国家机关干涉。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于十月十八日举行，十一月十五日结束。

**11月13日** 上午，同谢富治、徐子荣谈话。谈到公安部最近制订的派出所、治安保卫委员会和工矿企业保卫处（科）的工作条例时说：派出所和治保委员会是城市政法工作的腿；没有腿，发下再好的指示，没人去执行，等于没用。治保委员会无论如何不能取消，而是要和派出所一样地加强。对境外敌人的煽动和干扰，有关部门要共同采取措施。

△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四十次会议。会议议定：（一）今年“三秋”工作结束后，在全国范围开展一个提倡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反对贪污、盗窃国家和集体财产，反对铺张浪费的运动。结合清理党的组织，严肃处理一批重大的贪污、盗窃和堕落腐化案件。由彭真主持代中央起草指示，并请中监委选择若干重大案件，限期检查处理，适时通报，教育全党。（二）今冬明春在全国城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工作。

**11月14日** 审阅《人民日报》为纪念《莫斯科宣言》发表五周年和《莫斯科声明》两周年写的题为《发扬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精神》的社论稿。

**11月15日—21日** 出席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十八次至第七十七次会议。会议听取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手工业合作总社、化学工业部、对外贸易部的负责人报告工作情况。

**11月15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汇报，讨论关于牧区人民公社条例（后通称为“四十条”）。会后，听取杨尚昆汇报全国总工会八届四次执委会会议和全国监察工作会议的准备情况。十六日下午，继续讨论牧区人民公社条例。

**11月22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四十一次会议。会议听取张启龙汇报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的情况。会议

决定：（一）关于干部工作。下放的干部管理权需要收回一些；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交流，应自上而下进行规划和提名，不宜自下而上提名；下放部分干部加强基层工作。（二）基层组织工作。建立农村党支部，应以大队为单位；清理党的基层组织，应在教育提高的基础上，重新登记党员；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吸收一些够条件的人入党；修改党的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草稿）。（三）组织、宣传部门应加强自身的建设。在发言中说：平山、阜平党员最年轻的是四十八岁，多少年没有发展，影响党的战斗力。执政党对党员要严一点，党员首先应是尽义务，尽责任，不能搞特权。艰苦奋斗，党就有朝气了。农民、工人当领导后，不再参加生产就容易变质。

**11月26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四十二次会议。会议听取陆定一汇报全国宣传文教会议讨论的几个问题。会议决定：（一）轮训干部的报告，修改后请中央审批。（二）城市中小学二部制应改为全日制。（三）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无论对内对外，在宣传和解释时，都应当以周恩来一九六二年三月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提法为准〔1〕。在讨论轮训干部问题时，邓小平说：民主集中制，发扬民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永远强调。彭真说：只听一种意见，非常危险。

**11月28日、12月5日、6日** 召集中共中央机关和国务院有关部委的负责人座谈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增产节约、反对贪

---

〔1〕 周恩来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七、二十八日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們看做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



污盗窃、投机倒把等问题的指示稿。先后参加座谈的有孙志远、安志文、王鹤寿、吕正操、钟子云、孔祥楨、段君毅、邓力群、田家英等。会上发言说：中央已决定开展一个运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走后门”、私分等问题。“三反”已过去了十年。再不抓，败坏的人更多。但一搞运动，领导精力分散，至少得半年。十二月五日，各部委负责人发言，一致认为问题确很严重，但近几年生产下降，职工精简，干部群众情绪波动大；赞成先搞增产节约，整顿生产秩序，提高劳动效率，降低成本，增加盈利，然后再开展反贪污盗窃的意见。十二月六日，约袁宝华〔1〕、姚依林、刘明夫〔2〕及安志文继续座谈。提出：文件的题目可以叫厉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盗窃等，重点讲工矿、交通、商业和行政机关。节约的大头是企业，如节约原材料，提高产品质量，减少废品；减少非生产人员和设备维修等。又和余秋里、刘澜波等商谈说：工业战线要转向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明年的任务现还未下达，开展运动，会不会冲击当前生产？当日，还和北京市委及工厂的有关领导干部座谈开展增产节约运动问题。

**11月28日** 晚，出席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雷兹·马利列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招待会，庆祝阿尔巴尼亚独立五十周年和解放十八周年。

**11月29日** 和邓小平等接见参加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和全国监察工作会议的人员。

**11月30日** 上午，到周恩来处谈话。晚，江青来家里谈话。

---

〔1〕 袁宝华，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2〕 刘明夫，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12月1日** 下午，到毛泽东处谈话。

△ 晚，和邓小平等宴请中央主席埃米尔·洛夫林为团长的挪威共产党代表团。

**12月4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四十三次会议。会议听取邓小平传达十一月三十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关于推迟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一九六三年召开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展国际反修斗争和党员重新登记等问题的决定。会议决定《北京周报》改为国际性理论刊物，用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三种文字出版；还通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林枫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

**12月5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四十四次会议。周恩来参加会议。会议听取罗瑞卿关于国防工业的汇报，同意成立第四机械工业部（无线电工业部）；明确国防工业办公室是国务院的办事机构，同时也对中共中央负责。

**12月7日** 上午，和陆定一、康生、陈伯达、杨尚昆、刘宁一等在邓小平主持下，讨论伍修权准备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致词稿。

△ 和周恩来、邓小平到刘少奇处谈话。

**12月8日、9日** 同段君毅、孔祥楨、宋裕和〔1〕、梁膺庸〔2〕、龚子荣、杨波、贾步彬〔3〕等继续讨论起草关于开展增产节约、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运动的指示稿问题。发言说：反对特殊化涉及的面太广。运动的面，限于县以上的工

〔1〕 宋裕和，时任建筑工程部副部长。

〔2〕 梁膺庸，时任化学工业部副部长。

〔3〕 杨波，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研究员。贾步彬，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业组组长。

矿企业和行政单位，县以下暂时不搞。反对行政机关铺张浪费，影响很大，但真正的浪费重点是生产单位，要发动群众搞。群众运动起来后，发现贪污盗窃和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组织专人去搞。

**12月8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四十五次会议。会议听取王从吾和钱瑛汇报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和全国监察工作会议的情况。会议决定：（一）当前要处理几个违法乱纪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件，通报全国，树立正气。（二）甄别工作的范围，以中央已有的规定为准。（三）对机关生产和干部个人生产，应该定出一些制度，以防止侵占农民的利益。（四）派赴各中央局工作的监察小组组长，可以列席中央局的一部分会议。在发言中说：干部特殊化的问题，要找违反制度的典型，不然纠缠不清。雇工、放债，不是特殊化，是违法乱纪。要抓制度建设。在谈到各地的监委同党委的关系时说：一般情况下还是要依靠党委。如有不同意见，要向上级报告。

**12月12日** 和邓小平、杨尚昆、廖承志、刘宁一等会见并宴请日本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伊井弥四郎率领的日本共产党访华团。

**12月18日** 下午，和杨尚昆等在中南海接见出席全国总工会第四次执行委员会会议的委员，并讲话。其要点是：（一）克服困难，搞好调整，要依靠工人阶级。当前我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是前几年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加上天灾造成的。为了克服困难，先后动员近两千万职工下乡，没有出乱子，这是对我们工人阶级的锻炼和考验。留下的人，在供应很紧张的情况下，把生产搞好，也是一个锻炼和考验。（二）实现四个现代化，要靠增产节约。要摆好生活和生产的关系。我

们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生活。从整体看，关键是增产节约。这是社会主义积累的根本来源。要自力更生，建立一个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经济体系。（三）工会是党领导下的工人群众的组织，是党联系群众的纽带，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支柱，工人阶级学习领导和管理国家的学校。它的任务第一是生产，第二是生活。人是有思想的，所以，还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工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四）工会干部要深入群众，跟工人打成一片。我们做地下工作时，和工人不打成一片，不仅是工作问题，还是生存立足的问题。现在我们跟工人的关系不如过去那么密切，就是我们有了点官气。有了官气，就有了阔气，就有了娇气，就有了暮气，弄不好歪风邪气都来了。官气越多，脱离群众越远，在群众中的威信就越低。至于工作方法，要从典型摸起，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五）处理好领导关系中条条和块块的关系问题。在正常的情况下，各级工会主要是党委领导，总工会的领导，也是中央的领导。工作中如果发生了矛盾，地方的工会一方面要向党委反映，一方面要向上级工会反映；党章规定，在一个地方，最高的领导机关是那个地方的党委。在特殊情况下，工会一方面报告上级，一方面还要执行。该讲话的一部分以《关于工会工作》为题收入《彭真文选》。

**12月19日** 下午，出席北京市政协三届一次会议闭幕会并讲话。指出：最近三年遇到连续的特大灾害，加上工作中严重的缺点错误，农业主要是高指标、高征购、瞎指挥，工业是基建搞多了，生产战线太长，职工招收多了，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这两年，从城市动员了近两千万职工到农业战线上去，限额以上的基建项目由一千七百多项，压到六百多项，经济形势

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加深了，改正了错误，取得了经验教训。这对党和人民是很大的考验。在困难面前，很多人坚信我们党能够克服困难，也有些人劲头不是很足，还有些人工作没有劲，甚至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发生了怀疑。有的同志想斗他们，我说不要斗，经过商议讨论，让他们考虑一个时期，有的就会转变过来。现在有些人就已经转变过来了。认识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共产党认识各位有个过程，各位认识共产党也有个过程。今后相处怎么办？“三不主义”还有效没有？当然有效。

**12月20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李先念关于明年财政信贷、外汇、市场平衡、物价等问题的汇报。

**12月22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四十六次会议。会议听取陈正人汇报农机部召开的农业机械和农业科学研究两个专业会议的情况汇报。会议决定：（一）原则同意选定八个型号的拖拉机投入生产。（二）增加人员、经费问题，请国务院农林办公室解决。（三）转发两个专业会议的报告。

**12月23日** 晚，出席中阿友好协会为欢送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农业部部长佩蒂·沙姆布利率领的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举行的招待会。

**12月24日** 上午，主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八次会议。会议通过《关于决定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条约的全权代表的决议》，决定周恩来为签订该条约的全权代表。

**12月25日** 上午，和周恩来等到机场迎接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及随同前来的人员。当晚，出席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欢迎泽登巴尔一行的宴会。

**12月26日** 下午，和刘少奇、董必武等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条约签字仪式。周恩来和泽登巴尔分别代表中蒙两国政府在条约上签字。

△ 下午，陪同刘少奇会见泽登巴尔。

△ 下午，和周恩来等出席首都各界一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集会，欢迎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庆祝中蒙边界条约签订。在大会讲话中说：中蒙两国政府在很短的时间内圆满地解决了四千多公里长的共同边界问题，这说明在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之间，不论存在着什么问题，都可以而且也应该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根据《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处理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中蒙边界问题的顺利解决和中蒙边界条约的正式签订，不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而且对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也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12月27日** 晚，和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蒙古驻华大使敦·策伯格米德在人民大会堂为泽登巴尔访华举行的宴会。随后，到车站送泽登巴尔一行回国。

△ 晚，和周恩来等参加中华医学会和全国政协在政协礼堂联合举办的新年联欢晚会。参加晚会的一百一十多位中西医学专家中，有上海第一医学院院长颜福庆、胸外科专家黄家驷、妇科专家林巧稚、热带病专家钟惠澜、内科专家张孝骞、老中医浦辅周、唐亮臣等，还有刚从海外归来的病理学家侯宝璋等。

**12月28日** 下午，出席首都各界人士在政协礼堂举行的集会，反对美国导演“韩日会谈”、拼凑东北亚侵略集团的阴谋，支持朝鲜人民反对美国侵略、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正义斗

争。

△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程子华汇报一九六三年基本建设计划调整情况。

**12月29日** 同王光伟谈关于开展增产节约、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运动的文件起草问题。说：贪污盗窃，主要搞最近两年的惯犯和集团犯，要算总账，要退赃。运动要建立领导小组，精简任务未完成的单位要抓一段精简。商业系统，人员太多，周转环节多，凡是中间环节多的，都要省掉，条条由商业部负责，块块由党委解决。

△ 审阅《人民日报》拟于次日发表的题为《祝全歼美蒋武装特务的重大胜利》的社论稿。社论说：据公安部公布，从今年十月到十二月，我广东沿海的人民公安机关和人民公安部队、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广大民兵和人民群众密切配合，全部、干净、彻底地歼灭了从海上登陆和从空中降落的九股美蒋武装特务。社论指出：它再一次表明美蒋策划的“任何骚扰破坏阴谋，在我国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紧密团结的、英勇的人民和军队面前，不过是蚍蜉撼大树，是注定要惨败的”。

**12月30日** 向出席北京市工会、共青团、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出席北京市东城、西城、崇文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讲话。在讲了国际形势后，着重讲了发展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和城市支援农村，工业支持农业两方面的问题。指出：我国六亿多人口，一要吃粮，二要穿衣。我们要靠自力更生，增产节约。我们要发展工业，劳动力要来自农村，商品粮要由农业提供，制造日用工业品，百分之七十的原料来自农村。所以，发展工业没有农业不行。一九五七年，我国城市人口共九千多万，去年增加到了一亿三千万，现有的农业不可能提供那么多商品粮，结果城乡人民口粮都很紧张，不得不

下决心从城镇精简两千万人下农村。这个道理，过去认识没有那么深。

△ 下午，出席在政协礼堂举行的庆祝古巴革命胜利四周年和中古友好协会成立大会。

△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薄一波汇报国家经委广州会议的情况。

**12月31日** 中午，和周恩来等到机场迎接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及其随行人员。晚，出席周恩来举行的欢迎宴会。



## 1963年 六十一岁

1月1日 下午，陪同刘少奇会见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及其随行人员。

△ 中午，出席全国政协举行的宴会，招待在北京的七十岁以上的全国政协委员。宴会由周恩来主持。

1月2日 晚，出席古巴驻华大使皮诺·桑托斯为古巴革命胜利四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1月3日 下午，在首都各界群众欢迎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的万人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锡兰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它首先冲破帝国主义的“禁运”，同我国进行了大米、橡胶贸易。感谢锡兰政府和人民一贯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正义斗争。周恩来等出席大会。当晚，出席班达拉奈克夫人举行的宴会。

△ 召集田家英〔1〕、王光伟、安志文、贾步彬等研究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增产节约、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本位主义和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稿。

1月4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邓小平为欢迎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及随同来访的日本客人举行的宴会。

1月7日 在李先念报送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关于西安市

---

〔1〕 田家英，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整顿自由市场的初步情况报告》上批：“拟同意先由财贸办公室发出，使各地领导同志注意这方面的问题。现中央办公厅和五办〔1〕正在搜集和整理这方面的材料，供中央参考。这份材料很值得看。”

△ 在贾步彬报送的《关于天津摊贩市场情况报告》上批：“万里、郑天翔、陈克寒阅后退我。这是一个很复杂和需要周密系统调查和解决的问题。”

**1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四十七次会议。会议讨论的主要议题是：（一）派中共代表团参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问题。（二）同意派一观察小组前往越南。（三）批准全国水产工作会议文件。（四）同意薄一波、李先念意见，今后国务院工交、财贸各部门的年度总结报告，凡需由国务院批转的，可按周恩来指示，由分管的副总理负责批发，一般不送中央审批。

**1月9日** 周恩来从杭州来电话，向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传达毛泽东三项指示：（一）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暂不发表，待赫鲁晓夫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发言后，连同他在最高苏维埃会上的发言一并答复。（二）出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增加几名“秀才”。（三）同意柯庆施建议，二月五日召开有各中央局书记参加的小会，二月十日再召开有省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

**1月10日** 和邓小平、康生、杨尚昆同准备参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团长伍修权、成员张平化、熊复等讨论代表团在会上的致词及其他有关

---

〔1〕 五办，指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即财贸办公室。

问题。

**1月11日** 下午，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举办的报告会上，向出席和列席各民主党派中央全会和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全会的人员作形势报告。其要点是：（一）当代世界五大矛盾和四种力量的发展情况。五大矛盾即：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和人民之间、帝国主义相互之间以及帝国主义统治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四种力量即：社会主义力量、民族解放力量、帝国主义国家内人民的力量和全世界保卫和平的力量相互支持和发展状况。指出：认清了上述情况，就会使我们眼明心亮，站稳立场。（二）中苏两党的原则分歧和由来。核心是要不要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支持不支持民族革命斗争，以及兄弟国家和兄弟党之间，坚持独立自主，平等协商原则和反对赫鲁晓夫集团的大国沙文主义问题。（三）目前反修斗争的情况和前途。一九六〇年，赫鲁晓夫撤专家、撕合同，参加反华大合唱，近来又利用兄弟党代表会的讲坛企图再次组织反华大合唱。我们仁至义尽，以最大努力，消除分歧，增强团结，在分裂问题上不走第一步，但也要有恶化的准备。（四）坚持原则，认清是非。真理所在即利害所在；大是大非，即根本利害所在。不问原则，只讲利害，是剥削阶级的世界观。不要原则，怎能团结，只能是貌合神离；马列主义的原则性和灵活性是统一的，灵活性不能超出原则性。关于多数和少数问题，掌握了真理，暂时的少数会转化成多数。真理不怕孤立，归根到底要相信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

**1月13日** 到机场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副主席约多率领的印尼共产党代表团离京去朝鲜访问。

**1月14日** 将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增产节约，反

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本位主义和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一月十三日稿）请邓小平阅后送刘少奇，并说明此件经中央主管同志共同商议起草，是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总的指示，待运动起来后，再批转典型经验，解决具体问题。“请阅正或者批示修改意见后退我再作修改”。十八日，邓小平批示：“我看大体可以，这个文件须提到工作会议〔1〕，似可先发给各省市同志考虑，准备意见。（此件同时送刘少奇、李富春）。”

△ 下午，和刘少奇、邓小平、董必武、李先念、杨尚昆等召集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负责人以及无党派人士座谈中苏关系等形势问题。

△ 在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会议上，讲同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形势。讲话分析了修正主义向帝国主义妥协、投降，不支持世界人民革命的矛盾性质和危害性，斗争的形势以及好的和坏的两种前途，强调关键问题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搞好，支持世界人民革命。

**1月15日** 晚，观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话剧《红色宣传员》。演出结束后向导演和演员们说：这个戏很好，演得也很亲切动人。话剧舞台上太需要及时地向观众反映现代生活的戏了。京剧、川剧也都可以演现代生活，但不如话剧方便。古典戏如《蔡文姬》、《武则天》，还有外国戏也都可以演，只是这些戏，别的剧种也能演，那就让它们多演。你们的演出力量是很雄厚的，只是要有反映现代生活的剧本。你们应该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力量用到剧本创作和排演现代戏上。并对张

---

〔1〕 指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

致祥、欧阳山尊〔1〕说：应该给他们各方面的条件。对现代戏要求不要过苛，基本上好就可以上演。

**1月16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邓小平招待访问朝鲜后回到北京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二副主席约多一行的宴会。

**1月17日** 出席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研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出现的问题，即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在赫鲁晓夫的号召下，攻击中国党和阿尔巴尼亚党，要求中国党改变立场，停止公开论战的情况，决定修改中共代表团在会上的致词。会后，和邓小平、康生、杨尚昆、刘宁一等对代表团致词进行修改。修改后的致词强调：各兄弟党应该平等协商，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反对搞假团结、真分裂。

**1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四十八次会议。会议决定：（一）由吴冷西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社会党攻击我党的材料编出一版，在《人民日报》刊登。（二）派刘宁一出席亚非团结理事会。（三）确定二月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议程。在谈到戏剧、电影创作问题时说：话剧、电影创作还是应该主要演现代的。

**1月22日** 将经邓小平核阅后的中共中央《关于增产节约、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本位主义和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草稿）》送毛泽东，并报告说：“此件是邀中央有关各口、各部和企业一些负责同志，开了多次座谈会后起草的。刘少奇、邓小平已核阅。拟提〔到〕二月工作会议，并已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征求意见。我们原

---

〔1〕 张致祥，时任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欧阳山尊，时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

来拟以反贪污、浪费等为运动的中心，因为怕影响或放松了生产，现改为以增产节约为中心，并将运动分为三个阶段。此件的任务，是先对运动作了一个总的部署，待运动开始后，还要批转典型经验，发补充指示。请审阅，看是否大体可以，并批示修改意见。”

△ 在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次会议上，报告中苏两党的争论和会谈情况。

**1月24日** 到机场迎送参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后，途经北京回国的党中央副委员长李孝淳率领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

△ 到机场迎接参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后回京的伍修权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

**1月25日** 上午，出席在政协礼堂举行的联欢会，和在北京的部分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欢度春节。联欢会由陈叔通主持。

△ 晚，出席解放军总政治部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拥政爱民春节联欢晚会。

**1月26日** 晚，和刘少奇、邓小平、董必武等接见一百多位中国著名的科学家。随后参加全国科协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联欢晚会，和在北京的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名学者、教授、青年研究工作者以及他们的亲属互致新春祝愿。

**1月28日** 和邓小平、康生、伍修权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黄文欢。

**1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四十九次会议。会议讨论由国家经委起草的《关于工业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决定草案提出：必须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以农轻重的次序及其相互关系，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的方针。在发言中说：增加品种、规格、材料，一万年也有，不是调整的问题，是发展。指标高降低的，这是调整，调整是因为前一阶段有严重的比例失调，调整的后一时期，有些是增加新的，是带有发展的因素，有些不属调整范围。现在调整，还包含有以农业为基础的内容（邓小平插话说：调整任务要有个期限）。现在讲调整是对的，总的要求是有计划、按比例、综合平衡，工农业能按正常秩序进行生产，这就是调整，新建的项目可以放在计划里。这几年有个大发展，但比例发生严重的失调，现在就是要把它改变过来，改变的含义，就不完全是调整。比如煤，一九五七年是一亿三千万吨，经过三至五年调整，达到二亿五千万吨，就是有很大的发展，凡直接为农业服务的工业要作统盘的安排，恢复到正常的生产。三年跃进有成绩，但不是正常的。

**1月30日** 晚，出席中共北京市委和市人民委员会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春节拥军优属联欢晚会。

**2月3日、4日** 召集王从吾、吕正操、段君毅、孙志远、刘澜波、张霖之等座谈落实“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问题。讲话说：要通过运动，调整各单位的领导班子。领导核心要团结，党政一致，才能按党的政策办事；领导核心烂了的单位，要换人。

**2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五十次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准备工作。

**2月6日** 召集王光伟、谷牧、田家英、邓力群和赵汉〔1〕开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增产节约、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本位主义和官僚主义运动

---

〔1〕 赵汉，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的指示（草稿）》的修改等问题。

**2月6日—9日** 出席刘少奇主持召开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以及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会议讨论大中城市集市贸易、粮食、劳动工资、增产节约和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等问题，为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做准备。八日，在会上讲“五反”问题：（一）“五反”必须搞，时机已成熟。贪污盗窃分子有相当数量，干部多吃多占，搞特殊化，不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出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本位主义、官僚主义是温床。因此，“五反”非搞不可。（二）大家关心的问题：一是“五反”从何时算起。一般的铺张浪费、特殊化，抓当前的问题；一般的贪污主要抓一九六一、一九六二两年的，大贪污犯，新账老账一起算。二是怕影响生产，怕打击面宽。还有少数有问题的人抵制、反抗。这是阻力。要右手搞生产，左手抓运动。运动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先解决干部的问题，主动“洗手洗澡”，自觉“下楼”，轻装上阵，领导运动。问题严重，自觉困难的干部，要进行帮助，不能领导运动。群众积极性起来后，运动全面展开，刹一刹各种歪风。要搞典型，取得经验。（三）总的是以增产节约为中心。“五反”运动起来后，面临三条战线：国际上的反修，国内的反修和增产节约；事情很多，以前两项促进生产发展；主要危险是斗争冲击生产，因此要指定专人抓生产。根据讨论的意见，刘少奇提出文件稿再修改一下提交中央工作会议讨论。

**2月7日** 和李先念、柯庆施、陶铸、宋任穷、李井泉出席周恩来召集的会议，商谈有关工作。

**2月8日** 同薄一波、李富春、杨尚昆等谈“五反”问题。指出：工人中有小毛病的，要提出“公物还家”、“爱护国



家财产，爱护公共财物”的口号，自己进行检查。这次运动的危险在于敌我矛盾钻到我们自己的队伍里来了。要先把中央、省市的“增产节约和五反”领导小组成立起来。检查的时间界限一般以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为界。重点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即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 出席朝鲜驻华使馆武官金龙俊大校为庆祝朝鲜人民军建军十五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2月11日**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政治工作会上作报告。报告分析了中苏两党的根本分歧及中共同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性质。指出：我们的方针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一定要坚持马列主义原则，坚持世界人民革命；兄弟党之间要讲团结，实行独立自主；要实行团结—批评—团结，不能只讲团结；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

△ 同聂荣臻、萧华谈话。

**2月11日—28日** 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严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和坚决打击投机倒把、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计划、中小学工作条例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等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说：苏联出了修正主义，这是从上一代孕育的。斯大林有功劳，有错误。赫鲁晓夫利用了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向会议推荐了湖南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河北保定地区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四清）的经验，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督促各地注意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组长康生，副组长吴冷西。

**2月12日**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

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稿作说明：（一）开展“五反”运动的必要性。三年困难时期，工矿企业中有少数干部对三面红旗和社会主义发生动摇。有的利用权力破坏制度，搞特殊化。有人甚至发困难财，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雇工剥削，收房租等等，如不及时挽救，将有更多干部陷于资本主义道路。经过两年调整，特别是“七千人大会”后，根据毛主席新时期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的指示，开展“五反”运动是必要的。（二）运动的目的是整风，是加强教育，解决思想问题。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应掌握的几条杠子：贪污盗窃从一九六一年算起，大的、集体的，要新账老账一起算。铺张浪费，从“七千人大会”后算起。（三）有没有顾虑？我和小平都有。一怕耽误生产，二怕打击面过宽，事后又得搞甄别平反。这次运动与一九五二年的“三反”、“五反”有所不同，新资产阶级分子大多数是在内部。为了避免混淆两种矛盾，妨碍生产，一定要以增产节约为中心，自始至终抓紧增产节约。（四）三月开始准备阶段。主要抓三件事：一、干部主动检讨改正。二、省市区委党委搞好试点，取得经验。三、未完成精简任务的单位，集中力量在四月份完成。（五）有些领导干部烂了的单位，要派人去领导；太弱的，组织力量帮助。（六）充分估计到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抵抗和破坏，要提高警惕，布置各项预防工作。（七）运动的时间不能太长，但要下决心搞彻底，不能草率收兵。处理问题放在后头，不要牵扯主要力量，组织专人去搞。运动大体安排是第一季度准备，半年内结束。三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指出：“最近几年滋长起来的许多损害社会主义的现象，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队伍中间的反

映。一切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活动，实际上都是资本主义势力复辟的罪行，是激烈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2月13日** 中午，到毛泽东处谈话。

**2月14日** 下午，在首都各界一万多人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的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中柬两国的友好关系，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感谢柬埔寨王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和积极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衷心感谢西哈努克亲王和柬埔寨王国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所采取的公正态度以及为促进中印和解和双方直接谈判所作出的努力。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出席大会。

**2月15日** 中午，和刘少奇等陪同毛泽东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并参加宴会。

**2月17日** 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批送谢富治、武新宇〔1〕。对草案提出修改意见如下：（一）现在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因此，除保护公共财产外，必须明确地依法保护公民所有财产。包括一部分生产资料，至于生活资料，不仅在社会主义社会，将来共产主义社会也还会归公民私有。（二）现在反革命犯约有百分之六十的人是在内部，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犯罪分子绝大部分是在内部或者内外勾结，因此，对于一些利用职权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不是应该从轻而是应该从重或者加重处罚。（三）对有些严重危害社会主义的犯罪行为，量刑轻了，会束缚无产阶级手足，是不利的，应该定得适当，待判刑时，可以酌情从宽，这样比较主

---

〔1〕 武新宇，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动。所提修改意见，未来得及仔细斟酌，未来得及和你们商议，请通盘仔细审议。二十八日，在武新宇等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修正稿）》上批：“印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请谢富治主持起草一个说明附上。”

**2月18日** 上午，偕夫人张洁清去机场送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离京前往我国南方各地参观访问。

**2月中旬** 去石景山钢铁厂调查。该厂有职工二万六千人，其中基建队伍四千人，占百分之十五；修理工、医院、学校工作人员合占百分之三十九点三，队伍庞大。在调查期间讲话提出：（一）办工厂没有定员不行，要精打细算，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办法，不能吃“全民”，慷国家之慨。要和办救济事业区别开。（二）学校、医院、商店等要和工厂分开。工厂的党委、行政集中精力抓生产。学校、医院和服务性事业，可以石钢为重点，把附近各厂都组织起来，搞个为本地区十七万人服务的“小政府”，干部从各厂抽，经费由各厂摊，上面设一个精干的党委，把没有活干的人组成集体的合作社，承接各厂的计件活、临时活。（三）在业工人是产业军，不能无纪律。工厂有定员，工人干活要有定额。定员、定额可以有个保险系数。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原材料消耗也要有定额。（四）战争年代实行供给制的一部分老工人，是精华，要按过去的办法包下来，除此以外的人员，工厂按需要定员。（五）全厂有生产小组长一千多人，几乎普遍不干活。群众反映他们是“三不像”：“是干部不穿制服，是工人不干活，是病号又养得胖”，以后每人都要劳动。（六）要在运动中考查干部，条件差一点的要尽量赶上；相差较大的要定时赶上。大家要争一口气，比先进，挖潜力，减少浪费，今年上半年，石钢的利润可能达到一千八百万到二千万元，证明搞“五反”运动的决心可

以下了。

**2月20日—22日** 连续三个下午，和周恩来、邓小平、陆定一等讨论修改《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

**2月23日** 下午，和周恩来、邓小平、陆定一等讨论修改《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稿。

**2月25日** 上午，出席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五次会议。会议通过关于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的协定》的决议，决定批准这个协定。三月二日下午，出席中巴两国政府关于边界条约的签字仪式。

△ 下午，同邓小平谈话。

**2月下旬**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说：过渡时期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社会，我们掌握了政权，但外有帝国主义，内有新生的资产阶级，斗争时起时伏，高一浪低一浪。战斗的基本队伍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司令部是党组织。因此整党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战争时期，入党既要起模范作用，又要有牺牲生命的决心，不坚定的人不敢来。和平时期，有的人革命意志衰退，“模范”不起了，因此要提高党员的标准，一是做先锋队，一是做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模范”不起了，就请他做同情者。同时，要解决制度问题，一是工资差别要缩小，既要反对特殊化，又要反对平均主义；二是联系实际，联系群众，调查研究；三是坚持民主集中制。机关干部要经常参加劳动，能官能民，从工农中来，回工农中去。谈到中苏两党分歧问题时说：斗争的复杂性是因他们掌握了列宁首创的一个大党和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很多制约的因素，斗争既要有高度原则性，又要有高度耐心；战略上要藐视，战术上要重视；

既要坚决又要谨慎；争取不分裂，准备分裂，但我们不走第一步，现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左派力量在斗争中都在发展，赫鲁晓夫集团有许多困难。今后的斗争方式可能是吵一阵，休一阵，国与国的关系保持下去。斗争前途决定于左派力量的发展，决定于斗争政策的正确。在我国国内，关键是搞好城乡社会主义教育和发展经济。

**3月1日** 上午和邓小平、罗瑞卿等同中共中央西北局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负责人谈话。

△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五十一次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一）决定“五反”运动和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间和步骤，由各大区负责具体安排。（二）决定东北、华北、西北的国防线应当逐步建设起来，由公安部商同各大区拟定规划。（三）要求力争及早完成精简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的工作。会议还讨论了调整职工工资、一九六三年基本建设项目、一九六三年粮食增产目标、木材生产、农垦经费、干部培训经费、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等问题。

**3月2日** 下午，在首都各界一万多人庆祝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政府签订边界协定的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中巴两国关于边界协定的签订，是中巴友谊的胜利，是万隆精神的胜利，也是亚非团结精神的胜利。协定有利于两国人民的和平建设和友好合作，符合中巴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是亚洲人民和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所欢迎的。中巴签订边界协定，丝毫也不影响巴印关于克什米尔归属问题的谈判和解决。周恩来出席大会。

**3月3日、4日** 下午，和邓小平、康生、陆定一等讨论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评美国共产党声明》。

**3月4日** 和邓小平、伍修权等会见来访的巴西共产党

(新党)总书记索纳斯、政治局委员林肯一行。

**3月5日** 上午，和邓小平等讨论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修正主义者的一面镜子》。

△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一日来信和意大利共产党一月十一日的来信。

**3月6日** 下午，和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等去机场欢迎老挝国王西萨旺·瓦达纳及王国政府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当晚，参加会见并出席欢迎宴会。

**3月7日** 上午，和吴晗陪同老挝国王西萨旺·瓦达纳等参观北京火车站、北京工人体育场、北京工人体育馆和故宫博物院等。

△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胡耀邦汇报共青团八届四中全会情况。

△ 和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陈毅等陪同毛泽东会见并宴请老挝国王西萨旺·瓦达纳一行。

△ 将聂荣臻送来的、全国农业科学工作会议关于在北京郊区建设一个示范基点农场的建议批送刘仁阅，由郑天翔、赵凡〔1〕办；并嘱：应该让他们能充分发挥其积极性。

**3月8日** 下午，在首都各界一万多人欢迎老挝王国西萨旺·瓦达纳国王的大会上发表讲话。讲话中说：中老两国的友好关系是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的。这种友好关系的不断发展，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刘少奇、周恩来出席大会。当晚，出席老挝国王西萨旺·瓦达纳在人民

---

〔1〕 赵凡，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农村工作部部长。

大会堂举行的宴会。

**3月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李富春汇报第一季度生产情况和第二季度的生产安排。

△ 下午，和邓小平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就中苏两党会谈问题交换意见，并将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一日来信的复信交契尔沃年科。

**3月10日** 上午，去机场送老挝国王西萨旺·瓦达纳一行离京去越南访问。

△ 下午，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接见出席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和医学工作会议的代表。

**3月1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陆定一汇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情况。

**3月12日** 去北京针织厂和北京制药厂视察，了解增产节约情况。

**3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五十二次会议。会议讨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提纲）》和中共中央关于印发这一文件的通知稿，决定修改补充后送毛泽东和刘少奇审定。会议还决定：（一）请陈伯达对苏共二十二大纲领先作系统研究，提出批判意见。（二）关于伊拉克当局对伊共总书记判处绞刑，并大批逮捕和残杀共产党员的问题，由《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表示抗议。（三）对摩洛哥共产党的来信，由中联部起草正式复信。

**3月14日** 审阅《人民日报》拟于次日发表的题为《抗议伊拉克当局杀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残暴罪行》的评论员文章，加写：“我们呼吁全世界一切正义人士向伊拉克当局提出抗议，要求伊拉克当局立即停止杀害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民主人士的残暴罪行，立即释放被捕的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



士。”

△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五十三次会议。周恩来参加会议。会议批准《全国财贸工作会议关于大中城市集市贸易问题的讨论纪要》；同意国家经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三年一二月份工业生产情况的汇报提纲》、周恩来提出的先一步精简中央一级机关编制人员的意见和措施；同意杨尚昆提出的建议：中央一级机关的“五反”运动，由各部委党组领导，归各口检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下设一领导小组，由各口派人参加，彭真主持。

**3月16日** 将国务院批转石油部《关于石油工业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作的初步总结和今年工作要点的报告》送毛泽东，并附说明：“这份报告很好，也比较完备。最近中央又增拨了四五千万元的投资，争取二三年内全部解决品种和基本满足必要的数量。”

△ 下午，和邓小平、陆定一、杨尚昆等为中苏两党会谈准备文件。

**3月17日** 下午，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接见出席解放军炮兵首届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铁道兵技术干部大会和公安部队政治工作会议的全体人员，以及全国农村金融会议、全国财贸联系网联系人会议的全体人员。

**3月19日** 布置田家英编一份定期的刊物，交流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的情况。提出搞两种版本：一是向下发的《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情况汇编》，介绍情况和典型经验；一是供领导参考的《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资料》。材料来源是各地报告，也可以组织人跑一跑。

**3月21日** 下午，接见担任亚非记者会议印度尼西亚筹备委员会秘书长的《社会使者报》总编辑朱奈迪和《希望之光

报》编辑苏哈迪。

△ 在吴玉章〔1〕为调整中国人民大学的领导班子，要求中央派人和几位副校长及有关同志谈一谈，统一认识的报告上批示：“陆定一、安子文、刘仁阅。请陆定一主持商决。”

**3月24日** 约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业组、综合组两位负责人谈话。布置两项调研任务：（一）了解各省有关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的经验。（二）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说：一要跑厂子，联系基层，看运动起来的形势和气氛，干部的领导能力如何？二是读《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既看马列观点的，也看修正主义的。三是研究“麻雀”，搜集苏联有关的文章、报告，基层的材料。四是研究一点日本、美国、西德、法国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快的经验，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谈话指出：我们搞经济建设不如搞革命那样有经验。开始时学苏联，强调集中，没有充分发动群众。一九五八年放手发动群众，但干部领导不了。要揭露问题，分析情况，提出改革意见。要选几种类型的厂子研究，看省区市和中央一级干部领导本领究竟如何？

**3月25日** 和邓小平等商谈答复日本共产党中央来信等问题。

**3月26日** 在中共北京市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其要点是：（一）在阶级斗争中，党是司令部。司令部不纯，革命不能胜利，革命成果不能巩固。对党员要以最高标准来要求，必须在思想上、组织上保持先锋队的纯洁性，这是防修的重大措施。（二）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以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要求我们的工作，实际上是以总路线的标准要求，继续高举三面红

---

〔1〕 吴玉章，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旗，坚持贯彻执行总路线。（三）领导机关两件事，出主意要多谋善断；用人要知人善任。领导干部无论如何要抓两条，一条是挤时间学理论；一条是联系实际。

**3月27日** 下午，和邓小平、康生等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书记米原昶。邓小平就公布中苏两党间的往来信件、中苏两党会谈形式的设想等问题阐述中共的立场和看法。

**3月28日** 下午，去石景山钢铁厂调查增产节约、减少冗员的情况。对厂里的干部讲话指出：工厂是搞生产的，不是慈善机关，不是服务性机构。连公安、消防等政府的事，也由工厂管，所以，厂长、经理有一半时间在外边开会。要研究哪些事该由市政府来管。市政府可以先在这里设一个办事处，找一些能任劳任怨的同志，不搞衙门作风，甘做“管家婆”，为企业服务，使企业领导集中精力管生产。先搞试验，再逐步推广。

**3月29日** 去北京电子管厂调查。

**3月30日** 下午，陪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接见出席商业、化工、煤炭、石油、地质、建筑工程、纺织、交通、水利电力方面的全国性专业会议的全体人员。

**4月1日** 再次去北京电子管厂调查。该厂工人在二十天中，用大字报方式提出许多意见，揭露由于计划不周、材料保管不善、设备不配套、技术管理不严、产品不合格以及任务变动、劳动力调度混乱等原因，造成许多“合法的浪费”，从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共达三千万元，相当于上缴利润的四分之一。

△ 同郑天翔、万里及贾星五〔1〕等研究工厂企业的增产

---

〔1〕 贾星五，时任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秘书长。

节约反对浪费问题，落实全市精简职工任务和学校中设置农业知识课程等问题。提议向中共中央和华北局写两个报告，一是报告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问题。北京市郊虽然没有开放自由市场，但投机倒把的情况也很严重，而且多数和内部有联系。二是报告文件多、干部开会多的情况。

△ 将中央政法小组关于刑法草案的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报送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此件已经过多次修改，我看可以了。拟由人大常委审议后下达试行，将来修改后再提人大通过公布。”

**4月2日** 下午，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接见出席农业机械工业和其他机械工业、冶金工业、木材工业等方面的全国性专业会议的全体人员。

**4月4日** 在中共北京市委举行的报告会上讲目前形势、当前工作和进一步发展郊区农业生产、争取今年的较好收成等问题。

**4月4日、15日** 先后两次同曼努埃尔·若维尔·特莱斯为首的巴西共产党（老党）代表团谈中苏关系、中印关系及民族解放运动等问题。二十日，去机场送巴西共产党代表团回国。

**4月5日** 晚，接见北京市一部分农业劳动模范、农业先进单位的代表和参加农业生产的知识青年。对知识青年说：你们走的是正确的道路，这是千万知识青年的方向，有最广阔的光辉的前途。坚持这个方向，好好劳动，努力学习，在实际斗争中锻炼自己，成为农村中有觉悟有文化的好劳动者。并叮嘱农业劳动模范们要欢迎参加农业生产的知识青年，好好地帮助他们，同他们合作。

**4月12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五十四次会议，

讨论企业中的“五反”运动问题。李富春、薄一波、谷牧和李雪峰出席会议。在会上说：“五反”不会妨碍生产，也不会乱，而是促进生产。运动开始必须抓增产节约，反对生产中的浪费，同时，提倡比学赶帮。不从反生产中的浪费入手，运动搞不起来。首长负责，亲自上前线很重要，一个部要抓几个点，否则领导没有经验，就没有发言权。要放手发动群众。这几年，群众运动出了点毛病，但成绩是主要的。条条块块问题，我们走过弯路：第一个五年计划集中多；大跃进时期放得过散；这两年强调集中才渡过困难。现在，一方面要集中领导，一方面要分级管理，条块结合。精简任务要完成，但不要把精简搞成运动的中心，这会打击积极分子，有技术的老工人要留下来，考虑到将来发展的需要。民主党派、工商联机关不搞运动，但他们在企业中的成员一视同仁。

**4月13日** 在国家经委座谈会上作关于工交企业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的讲话。

**4月17日** 和周恩来会见古巴全国保卫革命委员会主席何塞·马塔。下午，出席首都各界人士为纪念古巴吉隆滩战役胜利举行的集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在讲话中热情赞扬古巴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英勇斗争精神。

△ 去机场迎接加拿大共产党总书记莱斯利·摩里斯和全国执行委员会书记威廉·卡什坦。二十一日下午，同加拿大共产党代表团会谈。二十四日，和邓小平到机场送加拿大客人回国。

**4月19日** 上午，在中共中央统战部扩大的部务会议上讲话。指出：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中央各部都从阶级斗争的高度总结检查工作，统一认识。统战工作中过去中央下发的指

示，有些是毛主席看过的，有些是常委同志或书记处核阅的，有些意见认识有所发展，要以中央最后的指示为准。例如，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五日，统战部给邓小平和我的信中提到：五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消灭阶级；把民主党派的领导成分建立起社会主义核心和左派与中左联盟的政治优势。我批了拟予同意，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也核阅了。同年十月七日，我在批阅全国统战工作四级干部会议给中央的报告时，推翻了自己的看法。因为在反右斗争中，阶级斗争非常激烈，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又指出，资产阶级对新中国是“半心半意”的。小平同志说：人的认识是发展的，看法变了就改过来，按后来改了的办。资本家由剥削剩余价值的人变成劳动者，的确不那么容易。我们一定要有高度的阶级敏锐性，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耐心的工作。但应该看到，每经过一次斗争，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人总是越来越少。同时，也要看到，原有的资产阶级势力逐步被改造了，新生的资产阶级势力在一定的条件下会有所发展。当前，我们在国际上和现代修正主义斗争很尖锐，国内老的资产阶级还存在，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势力泛滥，有人提出“三自一包”，“三和一少”〔1〕，所以，过早宣布消灭阶级，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我粗枝大叶，曾经同意过你们的意见，后来改变了。作为研究发展过程是可以的，但不要采取“打官司”的办法查责任。

**4月21日** 晚上，会见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杜·乔治乌，

---

〔1〕“三自一包”，指自由市场、自负盈亏、自留地和包产到户；“三和一少”，指将有人对外交工作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概括为：对美帝国主义、印度反动派的挑衅、现代修正主义的诬蔑攻击要和，对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国家的援助要少。当时，均作为阶级斗争熄灭论加以批判。

谈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争论问题。

**4月23日** 下午，在首都各界一万多人欢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部长执行会议主席阿里·萨布里的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非洲大陆民族独立运动的风暴正在继续发展，殖民主义的体系正在土崩瓦解，帝国主义任意宰割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大陆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周恩来出席大会。

**4月24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五十五次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办公室，由安子文负责。在听取谢富治、薄一波汇报情况后说：农村先搞社会主义教育，何时搞“五反”，秋后再定，现在集中抓生产，在工交方面也不要妨碍生产。

**4月25日** 到京西矿务局了解增产节约情况。了解到该局的城子煤矿发动群众开展增产节约，反对生产中的浪费，已制定出四十多种原材料的消耗定额，坑木的消耗逐日下降，预计全年可扭亏为盈十余万元。对矿务局的干部说：办工业是具体的，不能大而化之，必须一道一道工序地搞定额，真正的经济效果在这里。反浪费的成果不调整定额就不能巩固；而制订定额必须发动群众，采取三结合的方法搞，不能关在屋子里定。为搞定额，转入“五反”阶段的时间可适当推迟，矿务局要抓好定额，抓减少生产消耗。关于人员精简问题，指出：一九五八年以前进厂的老工人、技术工人，不要精简、工资照发，轮流学习。要看清前途，我们还是要发展的。精简职工是个“暗礁”，搞不好会打击群众的积极性。要把群众安定下来，集中精力搞增产节约，搞先进定额。

△ 将四月十三日在国家经委座谈会上关于工交企业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的讲话纪要送李富春、薄一波，建议不必以中央名义批转，如你们觉得无大不妥当的地方，可以作

为经委会议文件发省市区党委参考。

**4月26日** 听龚子荣汇报中央机关开展“五反”运动进展情况。国务院系统五十四个单位，其中三十八个单位已进入领导干部“洗手洗澡”阶段，十六个单位正在学习、动员，其中工交口抓得较紧，文教口尚未动。中直党委所属二十一个单位中，统战部、中联部、监委、工会、共青团等机关已有正式规划，中宣部尚无计划。初步发现有贪污一千元以上的四十八例。

△ 下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五十六次会议，讨论机关和企业开展“五反”运动问题。讲话说：“五反”运动已到了该下决心的阶段了。中央各单位一部分抓得比较紧，一部分还在学习阶段。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抓紧，搞彻底。企业开展“五反”，从增产节约反对生产中的浪费入手，看来是抓对了。主要是发动工人，一道工序一道工序抓定额，减少浪费。小平同志说，新的跃进就从这里开始。毛主席也同意。反浪费后，要搞一段整改，抓产品合格率和原材料消耗定额，不要急于转到“五反”阶段。领导班子烂了的单位，先搞“五反”，领导班子整顿后，再搞增产节约。现在农业上来了，工业如何跃进？从何抓起？全国只有那么一点钢和煤，要跃进就要资金和材料。我看就从反浪费、抓整改、抓原材料消耗、改进管理，扎扎实实地跃进，从一个新的高涨抓起，而不要先去宣传。从全局来说，还有个填平补齐、综合平衡问题，规章制度问题，多快好省的统一问题。中央和省市委跟不上，会妨碍运动。

**4月27日** 主持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议。在郑天翔传达完二十六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精神后，讲话指出：（一）“五一”劳动节的安全工作要切实检查一下，保卫工作由公安部谢



富治召开会议布置检查，防空也要检查。来华的外宾要友好接待，各国驻华使节要统一安排。（二）商业方面，要准备八月调整工资后的市场供应，有些物品要储备，要准备秋收后农产品上市的收购。不能储备的商品如牛奶，可制成奶粉。（三）农业要好好总结经验和教训，仔细抓下去，抓一万年。河北的“四清”、四川省的贫雇农组织经验值得研究。

△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五十七次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稿和国内经济形势。会议决定：（一）中苏两党会谈的材料准备，由康生组织，抓紧进行。（二）精简职工的计划，必须完成，尽快结束精简工作，以便集中精力抓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三）各省、市、区整顿农村三类队的工作队，统由地方现有编制中调剂解决。

**4月29日** 同邓小平、康生、刘宁一、伍修权等商讨赴朝鲜参加中朝两党会谈的有关问题。

**4月底** 接毛泽东来电话通知去杭州，负责起草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指示。这个文件后来定名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后通称为“前十条”）。

**5月2日—12日** 在杭州参加毛泽东召集的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的小型会议。会前，中共中央先后就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批转了《关于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的考察报告》（三月二十日）、《华北局关于华北区农村建立贫下中农组织的情况》（四月九日）、印发了《中共保定地委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进行“四清”工作向省委的报告》（四月四日）等文件。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指定彭真主持起草关于在农村开展社教运动的文件初稿。

**5月2日** 晨，收到周恩来致毛泽东、彭真信。信中说中

国第一艘远洋货轮“跃进号”在由青岛首航日本时沉没，“待情况弄清后，再发表正式声明。”六月三日，新华社奉命声明：“跃进号”因触礁而沉没。

**5月3日** 和陶铸、柯庆施、李井泉、江华等座谈农村阶级斗争形势和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情况，讨论关于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起草问题。

**5月4日** 继续同有关人员座谈关于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起草问题。发言说：原来考虑写一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后考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同时，写指示又费力，可建议采取改为下发由毛泽东批示各地经验的形式。后柯庆施请示毛泽东，毛同意改为下发批示。

**5月6日** 同李雪峰、李井泉、陶铸、刘澜涛、宋任穷、陈伯达等开会，讨论“五反”问题。指出：新的跃进，要从增产节约、反对生产中的浪费开始，煤矿如节约十分之一的坑木，就可增加二千万吨煤。真正把反浪费搞好，就会促进新的跃进。

**5月7日** 同李雪峰、李井泉、柯庆施、陶铸、刘澜涛、宋任穷、江华、胡耀邦〔1〕等继续开会，讨论“五反”运动中各地反映的情况。

**5月7日—12日** 在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和陈伯达、江华、胡耀邦参加的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第一稿。在七日的会上，毛泽东指出：自从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阶级斗争问题，各省、地、市三级干部会也开了，社会主义教育也搞了，但是没有抓住要点，方法不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要点

---

〔1〕 胡耀邦，正在湖南参加“四清”工作。

就是：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四清”，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这样一套。毛泽东说，他走了十一个省，只有湖南和河北的领导人向他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省不讲。又说：试点很重要。凡是一般化的，不触及贪污盗窃、不触及干部“洗手洗澡”，就不能抓住问题。我们在农村中十年没有搞阶级斗争了，土改搞了一次，“三反”、“五反”是在城市，一九五七年搞了一次，不是现在这个搞法。“四清”是人民内部矛盾，是要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洗温水澡”。有些人实行了退赔，一不叫贪污，二不叫盗窃，伤人不要太多。敌我矛盾就是敌人的破坏，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要发动群众，打击极少数贪污盗窃分子。“有人有顾虑，无非是两条，一怕耽误生产，一怕伤人太多。要使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有利于生产。”“文件不要那么长，要短些，严肃些。”关于组织农村的阶级队伍，毛泽东说：农村里贫下中农大约占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组织起来，就有了中心。不是依靠全民，而是依靠最贫苦的。

**5月8日** 收阅毛泽东对中共湖南省委四月十六日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第二次报告、四月二十二日关于树立贫农优势和建立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问题的报告的批示：“这两个报告都好。”晚，在毛泽东住地召开的会上，汇报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修改问题。表示文件没有写好，并作自我批评说：大家感到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思想跟不上主席，也跟不上下边那些先进单位；对阶级斗争的调查研究做得不深入。毛泽东说：“你们的文件就是平淡，逻辑性也不够，有的长，有的短。”关于深入调查研究，毛泽东说：“什么是调查研究的范围，一个生产斗争，一个阶级斗争，一个科学实验。不然，哪有马克思主义？”关于整党，毛泽东说：“你不

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不搞‘五反’，不搞‘四清’，不把贫下中农组织搞起来，整党怎么搞得起来？”

**5月10日** 将中共中央拟批转河北省委的两个文件送毛泽东和陈伯达，并告：这两个文件中，以中央名义作了两处批注，各中央局第一书记都已审阅过，请核阅（总理〔1〕已审阅过）。河北省的两个文件，作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附件下发。

**5月11日** 晚，和周恩来、各中央局第一书记、陈伯达、江华、胡耀邦等到毛泽东住处开会，再次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毛泽东说：草案还要拿到政治局扩大会上去议一议，请总理明天带回去议。彭真同志可到南方几个省跑一跑。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毛泽东说：不要性急，横直准备搞一年、两年，两年搞不完就三年。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二十日正式下发。文件指出：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要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进攻。

**5月12日** 晨，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及有关人员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要性急，要搞稳一点，不要搞乱了。

**5月15日—6月14日** 到河北、江西、湖南、广西、云

---

〔1〕 总理，指周恩来。一九六〇年五月十日、十一日，周恩来在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上，建议将“前十条”中关于团结百分之九十几改为百分之九十五。毛泽东表示同意。

南、贵州、四川及陕西等地调查研究。

**5月15日** 在河北保定听取定县和高阳县的干部汇报“四清”的具体情况。其间，向当地干部询问了以下问题：（一）“四清”清到何时为止？答：一般清到一九六二年。贪污盗窃可以往前算；借款也要算过去的。高阳县有贪污行为的干部占总数的百分之四点二。（二）贪污盗窃百把元的人，检讨好，又退赔了，还戴不戴“贪污分子”帽子？答：定县反映：群众对退赃退款并不太苛，干部占点便宜，多记点补助工分的“以后不干可以不退”，贪污盗窃的要退，检讨好就过关了。（三）“四清”一年清几次好？答：麦收、大秋各一次好。（四）上中农爱集体、劳动好的运动中咋办？答：定县上中农有一半是热爱集体劳动的，有一些“一直跟着八路军的”。（五）运动后，干部躺倒的多不多？答：不多。实际都想当干部，说不愿干是以退为进。（六）“四清”后干部起模范作用的有多少？答：定县、高阳大约有百分之八十多。（七）“四清”一般占多少时间？答：一个队二十多天差不多。定县反映：运动中受处分的九十个干部中，七十七个去年未劳动过。干部犯错误往往从不劳动开始。定县好劳动力，一年可做二百七八十个劳动日，支部书记可参加一百七十到一百八十个劳动日。高阳县反映，支部书记做一百五十个劳动日问题不大。

**5月17日** 在南昌听取方志纯、黄知真和李定坤〔1〕介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生产情况。他们反映：单干风已刹住，全省七百多个试点单位现正在解决群众中的封建迷信活动，投机倒把活动，干部中的贪污盗窃、多吃多占、特殊化和

---

〔1〕方志纯，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黄知真，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李定坤，时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

松劲退坡等问题，试点尚未结束。总的是不深不透。需要划清的界限是：（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二）投机倒把与正常的集市贸易。（三）封建迷信活动与一般的迷信观念。（四）敲诈勒索与一般的亲朋馈赠。（五）贪污盗窃与多占多分、特殊化。划清这些是非界线，下一步与群众见面，干部放包袱，可以缩小打击面。插话说：要把干部训练好，形成好的核心，再分批进行“四清”。“四清”时，贪污盗窃，情节不太恶劣、检讨得好，又退赔了，可考虑不戴帽子。退赔要坚决，但又不能挖得太苦。

**5月18日** 上午，在中共江西省地县委书记座谈会上讲话。说：毛主席批示浙江的材料指出，如果不搞阶级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我们要同新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富农斗争，又要和内部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行为的人作斗争。绝大多数干部、党员是好的，或基本上是好的，但确有一批干部不太好。解决他们的问题，只能用教育方式，“洗手洗澡”，检讨好了，退赔了，可以不戴帽子，卸掉包袱，共同和阶级敌人斗争。强调“四清”要实事求是，有问题的，要检讨，没有问题的不要检讨。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针对省委汇报中提到的有的地方打击面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八的情况，指出：受到处罚的人最好在百分之一左右。江西的农民说“吃饭靠集体，花钱靠自己，发财靠投机。”如果人民公社只解决吃粮，那也有问题。能否做到农民花钱也基本靠集体。又说：核算单位小了，多种经济和副业搞得少了，这是个大问题。农民收入少，集体经济巩固难。

**5月19日** 听取出席中共江西省地县委书记座谈会的同志汇报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的情况。插话说：有人怕运动

影响生产，怕打击面宽。我们有了经验，过去的缺点可以防止。先从增产节约入手，就为了不影响生产。把处理人的问题放在后期，就是为了到那时，调查研究有了充分材料，脑子也冷静了，再作结论，而且尽量宽一点，就可以搞准，不扩大打击面。决心要大，发动群众要充分，掌握要稳。

**5月21日** 上午，在长沙听取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汇报。了解到去年冬，湖南贯彻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训练干部一百二十万人，制止了单干和投机倒把等“黑风”，整顿干部，订生产计划，现农民到洞庭湖打草积肥的多了，除生猪外，粮食产量可恢复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在听汇报时插话说：问题还是领导要抓住要点，把方法搞对。对于好同志来说，问题在于教育。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结论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纲领，也包括科学预见。现在毛主席已下了决心，搞的时候就要稳，不要出大乱子，小乱子也要尽量减少。有人怕打击干部的积极性，就是要下狠心打击贪污盗窃、多吃多占的积极性，退赔要坚决，但处分要少，法律制裁要更少。

**5月22日** 上午，继续听取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汇报。在汇报到三年困难时期有的县区干部革命意志衰退时，插话说：毛主席讲这次运动主要依靠各级领导，班子烂了的，“三套马车”的，不派人不行。同时，要认识人，没有可靠的、能胜任的核心，会把事情搞乱。在汇报到有人认为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焦点是富裕中农时，插话说：严重的是地主、富农，牛鬼蛇神，但向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是富裕中农。有的试点县，打“黑风”主要对象是一小部分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运动中，总的是打击面不要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是指最后处理讲的。还说：这次斗争，比土改复杂，有些干部犯一点贪污盗窃，检讨好了，又努力退赔，这部分人还是要团结的。过去

区别对待不够，搞得粗糙，我们有责任。下午，座谈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情况。

**5月23日** 下午，听取湖南省财贸系统的干部汇报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情况。讲话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商品如何调拨，如何分配要系统研究。商业部门与居民接触最多，要内行、外行一起结合研究。“五反”运动工程也很大。稳不稳，在于分期分批。过去我们几个大办，口子开得大，吃了亏，要记取教训。要根据领导主观力量和客观需要安排各方面的工作。

**5月24日** 下午，在南宁听取韦国清和安平生〔1〕等汇报。他们说：阶级形势的变化是从一九六〇年下半年经济困难时开始，社会上刮起一股“黑风”，农村贫下中农优势削弱，单干风盛行，连一类二类生产队也受影响。去冬今春，打击了一批坏人，不久重新抬头。现在全省七十五个县中，有二十九县问题多或领导能力弱，二十六个县已开了三级干部会。省委试点的武鸣县，除病号外，七名常委带头作检查，参加三级干部会的县、区干部八百人中，“只有九人”没有多吃多占，有“资本主义和封建迷信行为的占百分之五十二”。在听汇报时插话说：这次运动是土改以来农村一场大的阶级斗争，很多人卷进去了，大多数是好人，如多吃多占，有个量的问题。质的区别，在于量的变化。要到群众中去搞，群众公道。先搞典型，定具体界限，建立制度。这类问题要谨慎，搞不好，伤了“骨头”。所以，运动要有可靠的领导核心。要把干部解放出来，团结起来对付敌人。当然，干部有问题也要检讨，多吃多占的，要退赔。又说：不要着急，总之，不打无准备的仗。

---

〔1〕安平生，时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



**5月26日** 听取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汇报机关“五反”情况。汇报反映运动中暴露的主要问题是：三年困难时期，搞机关生产，把国家分配的物资猪肉、糖、酒等供应给干部家属，或动用国家资金搞机关生产；干部养猪成风，有的甚至出卖猪肉营利；走后门，闹特殊化，涉及面极广。听完汇报后，讲话指出：此风不止，社会主义搞得成吗？对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十年来，干部丧失了警惕性。面对三年困难，自由市场、请客送礼、多吃多占、损大公肥小公，也是“糖衣炮弹”，一不谨慎就掉进去了。一九六一年想抓，条件不成熟，现在陷进去的人多一点。看到问题严重，大吃一惊，但不要惊慌失措。要足够估计我们党的干部是好的，多数是可以教育过来的。办法是正面教育，“洗手洗澡”，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犯错误的人，检讨了，改正了，都在团结范围之内。先把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团结起来，再研究处理百分之五，其中有些也可以争取教育过来。这次运动不仅不要伤好人，而且不要伤基本的好人。要有足够的耐心。

**5月27日** 同韦国清谈话。韦国清说：现在干部认识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但急于求成。玉林县委安排了个日程，三天揭盖子，四天放包袱，最后一天布置工作。交谈中指出：认识有个发展过程，首先是要把县委的思想真正搞通。不要冒冒失失，一着急，帽子也戴了，结论也作了，但没有解决问题。要一面揭牛鬼蛇神，一面有全面估计。要相信干部绝大多数是可靠的。即便是派人去帮助的县，也是为了提高他们，扶持他们。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不依靠各级党委不行。把县、区干部思想搞通，有了领导运动的一套办法，就不会搞乱，即便出点问题，也能改。因此，试点一定要搞。当谈到武鸣县公安局计划要逮捕三百五十人时说：这是以捕人代替发动群众。“五

反”、“四清”主要靠发动群众，不要靠捕人、杀人。要做到一个不杀，该捕的，经过群众斗争后捕。什么叫新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倒把、雇工剥削，实质是新生长的资本主义势力。是贪污就是贪污分子，是盗窃就是盗窃分子，处理时，具体界限要待运动后期才能定，不能给框子。要说框子，就是尽量缩小打击面，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和群众。至于如何对待地主富农的子女，现在的地主、富农，是土改时划的，十多年来，不能说都是没有改造好的。他们的子女，难道比地富本人还难改造吗？主要是看本人表现。

**5月28日** 同广西壮族自治区部分地委书记座谈。座谈的内容包括干部参加劳动，如何组织贫下中农，以及少数民族地区当年土改时和平分田，没有划分阶级等遗留的问题。

**5月31日** 在昆明听取于一川〔1〕介绍“四清”运动进展和生产情况。了解到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省委注意了单干风和投机倒把风，用法律手段制裁了一些不法分子；对集体经济内部两条道路的斗争，则是以发展生产为中心，改善经营管理来解决，发动群众不够。听汇报时插话指出：农村的问题，从表面看是经营管理问题，实际上是修正主义的演变，斗争很复杂，敌人钻到我们肚子里来了，拉拢、腐蚀、篡夺领导权。所以，要发动群众，以阶级斗争制止和平演变。抓住了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民主办社、干群关系等问题就都解决了。并叮嘱：凡是没有可靠的核心领导，对方针、政策、办法不清楚的，不要轻易动手；省委要密切注意试点的动向，控制打击面。

**6月1日** 同云南省玉溪、官渡等县的县委书记谈话，听

---

〔1〕 于一川，时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云南省省长。

取汇报。

**6月2日** 在云南省级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报告说：社会主义时期，农村存在着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纠正了过去瞎指挥和高征购的毛病之后，目前，农村一方面是形势好转，一方面阶级斗争严重、尖锐。因为集体经济还有点自留地，计划经济下还有集市贸易，所以地富反坏、牛鬼蛇神利用三年困难，刮单干风，搞投机倒把，瓦解集体经济。他们还搞封建迷信，联宗族，续家谱，模糊阶级阵线，拉拢腐蚀干部。云南省有些地方，提出“借地渡荒”，自留地面积扩大到百分之二十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要把敌人揭发出来，使好人擦亮眼睛，清醒过来，团结起来，狠狠打击敌人，并且把贫下中农组织建立起来。又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时间不长，很多人思想准备不足，又没有认真学习，所以，迷失方向，以为包产到户可以解决困难。报告号召大家认真学习理论，学习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

**6月4日** 在贵阳听取周林〔1〕汇报。汇报说：全省曾有百分之二十地区搞过包产到户，责任田，刮过单干风。经去冬今春整顿和打击，八十个县中，有百分之七十五制止住了，百分之二十五的县不深不透。有的地方提出要开展以反“暴发户”为中心的“四清”运动。在听汇报时插话指出：暴发户含义不清，我们并不希望穷，而是要共同富裕。这次运动，牵涉到大量内部矛盾，步子要稳一点，处理要区别对待，比如养猪问题，不能一概反对。“四清”要解决的大量问题是内部问题，所以文件不用“反”字用“清”字。有问题，改了就好。针对

---

〔1〕周林，时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贵州省省长。

有的地方对犯错误干部的情绪偏激，甚至要开万人大会斗单干户的情况，提出告诫说：简单化，不能提高大家的认识。惩办主义容易搞乱局面，甚至出现坏人整好人。是非面前不要做和事佬，但有些责任领导上多担些。运动中捕人要尽量地少，非捕不可的，也要放到后期，让他们在运动中当反面教员。

**6月6日** 下午，听取中共贵州省委汇报“五反”情况。了解到据“五反”办公室统计，问题较多的干部占百分之八点五，主要是严重铺张浪费、挪用国家财物，乱搞“协作”，为机关生产换取东西，甚至贪污盗窃。听完汇报后讲话说：这次“五反”、“四清”，就是要整顿一下队伍，共同对敌。运动中要尽量少伤人，但有错误非改不可，“洗手洗澡”后，处分可以宽一些。至于工作职务是另外一回事。这样并不损害严肃性，可以缩小打击面。至于有贪污盗窃罪行的地富反坏，要发动群众斗争，不要简单地一捕了事，与其这样，不如交给群众监督劳动。对一部分老干部必需的物质待遇，要搜集一下材料，“五反”后应考虑建立制度，予以解决。

**6月7日** 上午，同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处多位书记谈话。经过三天调查和看材料，集中谈了以下问题：（一）要对敌狠，对己宽。从揭露的情况看，实际生活中两类矛盾都很尖锐，而且互相交织。干部是掌权的，他们多吃多占，不参加劳动，不但严重影响干群关系，发展下去会使党变质。地富反坏不当权，他们利用我们的困难，拿干部当枪使，拉出去，打进来，还利用封建迷信、投机倒把，腐蚀群众。在运动中，要把打击的重点明确起来，发动群众斗争。对干部的毛病不是不整，而是“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共同对敌。”（二）贫下中农协会是党在农村的依靠力量。它的作用，首先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集体经济，它对生产队管理委员会有协作和

监督作用。(三)对阶级敌人和坏分子,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要发动群众揭发,不能用捕人代替发动群众,非捕不可的,要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依法逮捕。(四)关于政策和策略。有的材料分析,一些人因为经济地位上升了,所以政治上动摇了,这和把上中农看做是“暴发户”都是不科学的。经济地位上升,是靠集体还是靠单干;靠正当手段不是投机倒把;形势好了,上中农还是会跟党走的。总之,在处理问题时,要有两个结合: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严和宽的结合。

△ 听取中共贵州省息烽等八个县的县委书记汇报有关的事件和问题。黔西县委书记反映,凤凰村公社一生产大队支部书记,与地主、伪保长勾结贪污腐化,倒卖马匹,利用区县干部的关系,套购国库粮食,高价出售和造酒。群众告到县区,均不予处理。全大队有七个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插话说:这样的人和一般犯错误干部有本质不同,是阶级斗争的对象。它说明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被夺取的。息烽县委书记反映,据两个大队的统计,十五户地富,八户有程度不同的问题,其中问题突出的三户;另有七户是守法的。插话指出:地富也是可以分化、改造的。对有破坏活动者一打击,贫下中农组织起来,上中农教育过来,集体经济就巩固了。福泉县委书记反映,大队干部有百分之八十八参加劳动,公社一级占百分之八十五;老干部长期脱离生产放不下架子,青年学生出身的干部怕吃苦。插话说:批评干部缺点错误时,要表扬一批干部。干部各有所长,要看基本方面,不要求全责备,表扬他好的方面,但不要吹。大方县委书记汇报干部退赔的情况后,关照他说:退赔要坚决,但不要挖得太苦。

**6月9日** 在中共贵州省委及贵阳市委十五级以上党员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讲国内国际形势,着重讲城乡阶级斗争问

题。指出：当前以城市“五反”、农村“四清”为中心的阶级斗争，是土改后又一次大规模的革命运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阶级斗争的特点是，敌人要利用合法的、隐蔽的斗争方式，用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腐蚀干部，斗争反映到党内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队伍内部。运动中既要打击敌人又要教育犯错误的好人。所以“五反”运动中要注意：一是开始揭不开阶级斗争盖子，一旦群众起来，又觉得多吃多占，搞投机倒把，“错误人人皆有”。领导上头脑要清醒，分清界限，缩小打击面，允许犯错误的人检讨、退赔、改正，“过而能改，善莫大焉”，然后团结对敌。要记住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二是正确对待上中农。他们有劳力，有牲口，有本钱；我们工作搞得好的地方，他们搞单干的只有百分之几，就是有投机倒把行为的，对他们也与对待地主富农不同。他们生活好一些，只要不损人利己，有什么不好！他们是贫下中农的朋友，要教育他们共同富裕，不要把上中农搞得灰溜溜的。三是贫下中农组织是党在农村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群众的依靠。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集体经济也要依靠它。在社、队管理委员会中，贫下中农应当占优势，也要有一部分拥护集体化道路、热心集体经济的上中农参加。贫下中农组织是党领导下的组织，对有违法乱纪、多吃多占毛病的党员，也要起监督作用。四是除了放火、行凶、毁赃等现行破坏分子外，运动中要尽量少捕人。运动中一律不杀人。五是支部书记参加劳动，一定要坚决执行，但又不能操之过急。要按毛主席指示，每年三分之一时间劳动，三年养成习惯，做到自觉、适应。这是一件艰苦的任务。

**6月11日** 下午，在成都听取中共四川省委汇报“五反”运动开展和生产情况。省委认为：一、阶级斗争形势比一九五

七年严重，干部对隐蔽的、分散的、间接的敌情估计不足。二、对人民内部百分之五未经改造的人警惕不够。三、经营管理上有很多两条道路的斗争。四、干部贪污盗窃的面一般占百分之五，基层多的占百分之三十。听完汇报后讲话指出：对贪污盗窃，处理要慢一些。据一九五二年“三反”的经验，开始标准定得严，后来逐步放宽。农村基层干部中，可考虑从宽，检讨好了，退赔就算了。并就当前形势指出：前几年，我们对困难估计不足，现在对形势好转也估计不足，有的地方开始出现新的高潮，领导部门综合平衡要跟上。

△ 晚，听取中共四川省委在新民公社、犀浦公社试点的情况汇报。汇报说：一九六一年新民公社按“农业六十条”规定，体制下放，把集体所有的四百八十头猪下放给农户饲养管理，对养猪户划给饲料地，记管理工分，其中百分之七十二的养猪户为富裕中农。大农具下放到户后，又实行“有啥农具，做啥活路”。富裕中农农具齐全，得的工分多。在试点中，开展两条道路斗争，基层干部作了七次检讨，各生产队干部中有百分之二点五的人受处分。犀浦公社三级干部会上，揭阶级斗争盖子、查两条道路斗争，犯错误的重点干部占百分之五。第二天，在地委书记座谈会上说：体制下放中发生的一些事，是改进管理办法问题，如猪下放饲养，合法不合理要研究，不能打击。

**6月12日** 召集中共四川省温江、内江、江津、宜宾、绵阳、乐山等地方的地委书记开会，座谈如何对待富裕中农、犯错误干部，如何扶持贫下中农等问题。在座谈中插话说：上中农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具有两重性，在运动中，处理不好容易犯错误。对闹单干的上中农，要和地主、富农区别开。运动中一打击地主、富农，贫下中农组织建立，他们就会转过

来。不要把他们当做敌人，只能批评他们“不够朋友”。“暴发户”的名称不科学，靠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发家的，才叫暴发户，靠自己劳动富裕起来的不能算。有些事合法不合理〔1〕，是改进管理办法问题，不能打击。对犯错误干部，除蜕化变质分子外，要治病救人。“洗手洗澡”，批评错误时不能从宽，但处理要从宽。退赔有两个作用，一是满足群众要求，平民愤；二是教育干部。

△ 在四川省级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指出：国内经济发展经过调整后，工农业生产和市场供应好转，但生产关系还不能与生产力相适应，经济计划、综合平衡和商业工作还跟不上新形势。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系统地解决了社会主义阶段如何搞的问题。老的“五反”运动已经过去十多年，合作化以来，又从未进行过“四清”，所以我们的干部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没有思想准备。在困难时期，社会上普遍地发生了搞单干、搞投机倒把、开地下工厂等瓦解社会主义经济的两条道路斗争，斗争也反映到我们党和干部队伍内部。这次“五反”、“四清”，就是为了整顿我们的队伍。为了向阶级敌人开战，还要把贫下中农组织起来，作为党在农村的依靠。上中农是我们的朋友，要在斗争中教育他们，团结他们，共同对敌。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犯有错误的干部，如果确是打进来的敌人，或是蜕化变质被敌人拉出去的，要把他们清除出去；犯一般错误的，要认真地检讨，坚决地退赔，允许他们改正错误，要像医生对待病人一样

---

〔1〕 指有的生产队，为了鼓励社员向集体经济多投肥料，可以多记工分，奖励粮食，上中农地多，肥多，分的粮食比贫下中农多。这是管理办法上所允许并且鼓励的。



对待他们。

**6月13日** 在西安同刘澜涛、张德生等谈话，了解西北各省区生产和“四清”运动开展情况。交谈中说：毛主席说过，在中国不同农民搞好关系，休想存在下去。要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对干部，打击多了，看起来是“左”，实际是右。因为搞不好，是帮了敌人。除了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外，其余五个百分点中，还有二、三、四个百分点是顽固派和中间派，其中也有打击对象，但是，对顽固派是孤立，对中间派，介于团结和打击之间，是争取。比如有人硬是主张单干，怎么办？只能对他又斗争又团结。

**6月14日**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指出：（一）正在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土改以来又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规模很大，斗争尖锐、复杂，打好这一仗，今后搞社会主义就减少了阻力，挖了修正主义根子。（二）要彻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需要进行一场重新教育人的斗争。三年困难时期，党内外有人怀疑集体经济，主张单干；商业方面，不依靠国营商业而乞求于自由贸易，搞投机倒把；有人甚至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根本问题是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没有思想准备，连很多打游击出身的老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面前，也成了“新战士”。所以要重新教育人。（三）要重新组织革命队伍。革命队伍包括党和团、人民解放军、城市工人阶级、农村贫下中农，还有知识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态度不同，所以，要按革命的需要，在斗争中重新站队。（四）放手发动群众，揭露和打击敌人。去年这一段阶级斗争很尖锐，牛鬼蛇神都出来了，问题较严重的生产队占百分之二十，干部被敌人拉出去、打进来，篡夺了领导权。要发动群众揭露和打击敌人，在共同对敌的形势下，对有毛病的干部

要“洗手洗澡”。（五）正确对待三类人。一是上中农，他们是我们的朋友，在没有闹单干的地区是跟党走的；有人也想单干，搞点小投机，但剥削贫下中农、同敌人勾结的是少数，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人民内部两条道路斗争。“仅仅是搞单干的，不能打击，因为我们的法律没有规定搞单干非法，只能同他竞赛。”二是地主出身、富农出身、资产阶级出身的干部，有的马列主义化了或基本得到改造了，有的思想动摇、立场还有问题，要作全面的、长期的考查和分析，要耐心地教育改造他们。三是对犯错误的干部，既要允许改正错误，又要欢迎改正错误。其中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已经交代了、退赔了的，处理宽一些，不丧失严肃性。总之，除了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外，还有百分之四、五的“中间地带”，经过工作，有的可以成为团结争取的对象。

**6月15日** 回到北京。

**6月16日** 下午，和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等陪同毛泽东会见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委员长崔庸健一行，并参加宴会。十七日上午，去机场送崔庸健一行去东北参观后回国。

**6月18日** 到机场迎送途经北京赴越南访问的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朴金喆为首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并在机场共进午餐。二十九日，到机场迎送访问越南后途经北京回国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

**6月21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六十次会议。首先向会议汇报了在冀、赣、湘、桂、滇、黔、川、陕八省所了解的农村阶级斗争形势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关的情况。在安子文汇报“五反”运动的情况后，发言说：（一）处

理贪污分子的标准，等运动后期再确定。现在，可先了解一些典型情况，进行研究；同时，要选择几个犯有贪污行为，但检讨、交代比较好，又坚决退赔可不以贪污分子定罪的典型。（二）对蜕化变质、革命意志衰退的干部，要正告他们非改不可。其中有的是失足的老干部，要鼓励他们从资本主义和封建残余的陷阱中，把腿拔出来。（三）中央各部运动中要防止打击面过宽，要善于引导群众帮助一些同志过关。（四）分配干部的标准是在政治上、思想上、作风上都拿得起来；不称职的要调整。

**6月23日** 和邓小平率领反修文件起草小组成员去成都，准备赴莫斯科参加中苏两党会谈的材料。二十五日晚，接毛泽东来电，要邓小平、彭真等即回京，商谈中苏会谈问题。

**6月28日—30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连续三天下午，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讨论中苏两党会谈问题。<sup>〔1〕</sup>

**6月29日** 上午，参加中苏两党会谈的代表团成员在钓鱼台开会，研究中苏两党会谈问题。

**6月30日** 上午，和邓小平等讨论中共中央准备在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前发表的声明稿。

△ 晚，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代表团在中苏两党会谈中的方针，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苏两党会谈的声明》，并决定次日零时广播。

**7月1日** 中共中央发表《关于中苏两党会谈的声明》。

---

〔1〕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六月十八日，苏共中央声明，拒绝中共中央的建议，并责成苏共代表团在即将开始的苏中两党会谈中坚持苏共立场。

宣布：根据达成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将于七月五日开始在莫斯科举行两党会谈，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代表团团长是邓小平，副团长是彭真，团员有康生、杨尚昆、刘宁一、伍修权和潘自力。

△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准备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调整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和《关于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国家决算草案的报告》。

△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平壤市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姜希源赠送给彭真市长一批珍贵动物，包括豹、河鹿、丹顶鹤、箭猪、海龟、金花鼠等。由万里副市长代表彭真市长接受。二十六日，平壤市动物园副园长宋吉孙等将这批动物护送到北京。

△ 晚，邓小平来家中谈话。

7月4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驳斥苏共中央七月四日声明的中共中央声明稿。

△ 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提交《有关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五反”等若干问题的报告》。报告认为：（一）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对当前出现的“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估量，“各地一致认为是适合他们的情况的，是适时的”，“只是表现的形式和严重尖锐的程度有所不同”。对敌人利用“隐蔽的”、“两面派”手法，腐蚀干部、篡夺或操纵领导权的社队，各地估计：有的地方说百分之十左右，有的说百分之十到二十，现在估计有百分之三十左右。“因运动尚在初步开展，确切情况还没有摸清”。（二）各种形式的单干、投机倒把是“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腐蚀、瓦解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两支毒箭”。

它“最容易麻痹社员，把干部拉下水”。各地对单干风都在抓紧克服，但对投机倒把的危害性尚“估计不足”。（三）单干问题解决后，两条道路的斗争“转移到集体（经济）内部来了”，一是“耕作（靠）集体，副业（靠）单干”；一是经营管理和分配制度的有些办法有利于劳力强、农具多、猪多、肥多的农户，特别是对富裕中农有利。报告认为公社的管理和分配制度等，必须“贯彻阶级路线”。（四）有些领导干部，原来对运动的艰巨性、复杂性和两类矛盾纠缠在一起估计和认识不足，“兜了敌情”后，又产生了“焦急和急躁情绪”，根本没有准备，就想大干。以致侵犯一般的富裕中农，提出打击“单干头”、“暴发户”的口号，分了“暴发户”多余的粮食。因此，“要防止急躁情绪，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这一运动”。（五）防止三个方面发生偏差。“上中农虽然有两面性，但这个阶层是我们的朋友，决不是我们的敌人”，“即便他们犯了严重错误，也不能像对地富、反革命一样斗争他们，要用处理人民内部的方法解决”。对地富、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干部，要根据本人表现好坏，区别对待，把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和敌我问题区别开来。基层干部握有政治和经济实权，犯有大小不同错误者“恐怕不是百分之几或百分之十几，而是百分之几十”，群众一起来，斗争目标往往集中于他们而不是隐蔽的敌人，掌握不好不是扩大打击面就是不能平民愤。因此，运动开始，要使这些“忘本”、“上当”的干部，擦亮眼睛，“洗手洗澡”，和贫下中农一起共同对敌。（六）除领导权被地富篡夺或蜕化变质的社队应派工作组去领导外，一般应该依靠原有组织和干部，“不要重复老区土改整党时‘搬石头’、‘跳圈子’的错误”。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或者是可以教育好的，这是一个根本的估计，是团结干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基础”。此外，报告还提

出要在经济上扶植贫下中农组织，发展农村副业，增加农民收入。报告认为：集体经济组织如不开展多种经营，增加农民收入，不真正做到民主办社，劳动果实又得不到合理的分配，“单干风是不容易彻底克服的。”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将该报告以《中办收文》印发政治局、书记处有关同志。

△ 为保证“五反”运动健康发展，中共北京市委就有关法制的几个问题发出如下通知：（一）对揭发出来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除进行现行破坏活动的由政法机关依法处理外，其余不论案情大小，在运动中概不逮捕。（二）对专案审查对象不要进行拘留。（三）专案审查对象的人身或住所不要进行搜查。个别案情重大、确有消灭罪证、转移赃物可能者应经市委专门机构报政法机关办理手续派人持证进行搜查。（四）专案对象主要由单位内部动员坦白交代，一般不由公安机关传讯。（五）专案对象的调查，如调查对象涉及全国、市和区的代表人物，华侨和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其他知名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等，应一律报请市委“五反”办公室批准。（六）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家属不能任意追查等。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华北局转发此件，供各地参考。

**7月5日** 晨，和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一行共十一人起程去莫斯科。临行前，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及党、政、军、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北京市委等有关领导，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到机场送行。

**7月6日—20日** 在莫斯科参加中苏两党会谈。

**7月6日** 参加中苏两党第一次会谈。晚，出席在中国驻苏大使馆召开的中共代表团会议，讨论苏共代表团团长苏斯洛夫在会谈中的发言。

**7月7日** 出席中共代表团工作会议，讨论次日邓小平在

中苏两党会谈的发言主题。收阅中共中央同意中共代表团发言方针的电报。

**7月8日** 参加中苏两党第二次会谈。邓小平发言系统阐述中苏两党分歧的由来和实质。

**7月10日** 参加中苏两党第三次会谈。苏斯洛夫发言。

**7月11日** 收阅中共中央关于相机回击苏斯洛夫发言的电报指示。

△ 和杨尚昆在中国驻苏大使馆会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

**7月12日** 参加中苏两党第四次会谈。邓小平发言阐明中苏两党分歧集中表现在两大问题：一是要不要革命；二是要不要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指出苏联搞的是分裂主义而不是国际主义。

**7月13日** 参加中苏两党第五次会谈。苏共代表团成员波诺马廖夫发言。

△ 和邓小平、康生两次致电中共中央，请示下一步工作方针。十四日下午，收阅中共中央复电：“星期一讲话〔1〕的方针，完全同意你们的意见。”

**7月14日** 晚，出席中共代表团会议，讨论修改次日在中苏两党会谈中的发言稿；研究当天苏共中央发表的《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公开信指名道姓地攻击中共中央领导人。自此，中苏两党论战进一步升级。

**7月15日** 在中苏两党第六次会谈上发言。首先谴责苏方在会谈期间发表公开信，破坏了双方不发表东西、不互相指

---

〔1〕 指彭真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五日在中苏两党会谈中的发言。

责、不透露会谈内容的协议，公开信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直接点名攻击毛泽东及中共其他领导人，使人有理由怀疑你们通过会谈消除分歧、达成协议、加强团结的诚意。并责问对方：你们急急忙忙地采取这样严重的步骤，究竟想干什么？指出：苏共中央在两党会谈期间发表公开信，是一个极严重步骤，把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推到破裂的边缘。郑重声明，中方保留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权利。并着重就和平与革命的关系问题，驳斥了苏共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学说的实质。发言计三个半小时。后半段的会谈，代表团就在以不公开破裂、争取维持某种形式的联系为限度下，放手批判苏共领导特别是点名批判赫鲁晓夫的错误，在讲完斯大林问题后，建议休会并发表一个简要的会谈公报。

**7月17日** 参加中苏两党第七次会谈。苏共代表团成员安德罗波夫发言。

**7月18日** 中共中央复电中共代表团，同意代表团关于中苏两党会谈毫无结果准备早日回国的意见，提出要争取发表共同公报。

**7月19日** 参加中苏两党第八次会谈。邓小平代表中共代表团建议：会谈暂告一段落，体会到另一个商定的时间再举行。

**7月20日** 参加中苏两党第九次会谈。会上苏斯洛夫表示接受邓小平关于会谈暂停的建议。双方就会议公报进行磋商。下午二时（莫斯科时间），周恩来来电告知中共中央完全同意公报稿。在中苏两党会谈会上通读公报稿。双方都表示同意。会谈结束。

△ 中午，中共代表团在中国驻苏大使馆接见了使馆全体工作人员和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代表。



△ 下午五时（莫斯科时间），在莫斯科郊外别墅，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举行的宴会，八时结束。晚十一时和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乘飞机回国。

**7月21日** 下午，抵达北京西郊机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及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和群众共约五千多人在机场迎接。代表团从机场直赴中南海，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汇报中苏两党会谈情况。

**7月22日** 晚上，和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希尔和夫人。

**7月2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六十一次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工业、农业、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安置城市人口下乡等问题。周恩来参加会议并传达说：毛主席不同意全面铺开社会主义教育，一定要在有工作队的地方才能搞组织阶级队伍。没有工作队搞，一个是夹生饭，一个是出毛病，河南经验已证明。还传达说：毛主席想法是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三年调整，包括学会管理，变成内行，然后来新的高潮，同政治配合，三年埋头，不急于发表什么数字。会议同意周恩来的建议，在国家计委下增设基本建设总局，以加强对基建工作的检查。关于农村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及有关政策问题，由农办继续调查研究。

**7月26日** 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都各界群众庆祝朝鲜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十周年集会。

**7月27日** 晚，和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为庆祝朝鲜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十周年举行的宴会。

**7月29日** 中午，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中国政府主张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

和销毁核武器、倡议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的声明》稿。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该声明。中国政府的声明，是对七月二十五日美国、英国、苏联三国代表在莫斯科签署的《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的回应。

**7月30日** 上午，和邓小平、李先念、杨尚昆、薄一波、谷牧、程子华及吴波等在中南海居仁堂讨论工业问题。

**7月31日、8月1日** 继续和邓小平、李先念、杨尚昆、谷牧、程子华、吴波等讨论工业问题。

**8月1日、3日** 和邓小平、杨尚昆等同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藏原惟人会谈。

**8月2日** 下午，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报告中苏两党莫斯科会谈的情况。会议由陈毅主持。

**8月4日** 下午，和邓小平、杨尚昆、廖承志陪同毛泽东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藏原惟人。

**8月上旬** 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等八省，连降暴雨，北方出现了罕见的灾情。

**8月11日** 在刘仁、郑天翔的病情报告上批：应该尊重医生的意见，因过去太不注意了。

**8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六十二次会议。会议决定：（一）成立中共中央《关于工业发展问题》起草委员会，由邓小平主持，周恩来、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伯达、罗瑞卿、杨尚昆、薄一波、聂荣臻、程子华、李雪峰、刘澜涛、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宋任穷参加。（二）成立航空工业部和造船工业部。

△ 在张子意<sup>〔1〕</sup>关于国家机关领导干部收售文物情况的

〔1〕 张子意，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报告上批示：安子文、张子意：此事可以组织几个熟悉内幕而又客观的同志系统查一下，弄清楚，由你们作出结论。张报告的情况已由文化部党组查对结果。

△ 中共北京市委决定：从各机关、学校、工厂、企业中抽调二千八百名干部参加第一批农村“四清”运动，时间约三个月，下乡前，先集中于市委党校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等文件。

**8月14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六十三次会议。会议讨论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决定成立农业银行，统一管理农业投资和农业贷款。

**8月19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召集的有中央书记处书记及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听取薄一波说明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邓小平主持会议，周恩来等参加会议。

**8月20日—24日** 出席中共中央《关于工业发展问题》起草委员会会议。在二十三日下午的会议上，发言说：（一）今后我国工业发展可以分两步：第一步是三年过渡后，再用十年左右时间，初步建成一个独立的和大体完整的经济体系。同时搞第二步的远景规划，文件应包括这两部分。初步体系是什么目标？粮棉都要包括。工业方面，以钢来说，是否可提两千万吨左右。与此相适应，其他的東西，要围绕着建成初步体系的目标跟着搞上去。（二）摸清基础，先抓基础。基础包括农业、工业、科学实验三个方面，还有技术条件、人才和干部管理经济的水平等。打基础，抓基础工业，目的应当是：（1）解决吃、穿、用。首先是农业为基础。（2）国防必须兼顾。（3）远景发展计划，即实现四个现代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在主要环节和突破尖端技术上打好基础。（三）要总结过去几年的经验教训。例如：（1）工业为什么上不去，因为农业养不

起。农业没有完全过关前，总强调抓农业。(2) 前几年国防工业没有抓紧，去年蒋介石准备窜扰大陆，国防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发展国防工业，也可以带动不小一部分尖端技术的发展。电子工业、石油化工、有色金属等，都要有一个综合机关来抓。(3) 从工业内部看，我们上不去的因素，是燃料、原材料、精密机械、大型设备等。谈燃料要解决矿山问题；谈原材料，就联系到要增加钢材品种，也联系到地质勘探、采掘工业（包括木材、石油等）。采掘工业是重工业的基础。电力和铁路也要注意。如果不抓，工农业上去后还有可能被拖住甚至拖下来。(4) 综合平衡问题。综合平衡没有做好，会造成很大困难。要有横的平衡，还要有纵的平衡。要扎扎实实地从打基础搞起。(四) 协作问题。文件草稿中提出用经济方法管理企业，是一个重要原则。(五) 技术问题，必须迅速坚决地搞系列化、标准化，不然不可能按照总路线的要求发展我们的工农业。(六) 积累问题。根本的是勤俭。农业除粮食外，要大抓经济作物，同时，要搞轻工业。还要尽可能挤出些东西出口，特别是搞以进养出。(七) 管理体制和管理水平问题。管理体制是上层建筑，要合乎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商业管理和工业协作方面中间环节很多，不理顺，不利于多快好省。(八) 干部问题。大多数是好的，但也有不少人，没有钻进去。应当提倡钻、学。钻不进去的应适当调整，要以能够领导指挥好生产战线的作战为标准。(九) 物价、工资问题。

**8月23日** 晚，出席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庆祝罗马尼亚解放十九周年招待会。

**8月24日** 下午，接见出席在日本广岛召开的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访华的锡兰、新西兰、加纳、苏丹、喀麦隆和桑给巴尔等国的代表及有关和平人士。

**8月28日** 中午，同柯庆施、刘澜涛、李井泉、陶铸、宋任穷谈话。

△ 下午，和周恩来、邓小平等去机场迎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及其率领的印尼共产党代表团。

**8月30日** 晚，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出席欢迎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及所率代表团的宴会。

**9月3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陪同毛泽东会见艾地率领的印尼共产党代表团，并进行了会谈。

**9月4日** 上午，在北京一万多名干部参加的欢迎印尼共产党代表团的大会上致欢迎词。周恩来等出席大会。

**9月5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六十四次会议。会议决定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九月六日召开，会期约二十天；决定由谭震林挂帅、廖鲁言、陈正人、谢富治、安子文、田家英等参加，起草一个有关农村工作中若干需要补充的政策性的文件。

△ 下午，到机场迎接前往朝鲜访问途经北京的副议长、印尼共产党第一副主席鲁克曼为团长的印尼合作国会代表团。六日晚，设宴招待代表团，印尼共产党中央主席艾地也应邀出席。

△ 晚，和周恩来、邓小平等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国科学院赠予艾地名誉学部委员称号的仪式。七日上午，去机场送艾地及其率领的印尼共产党代表团去朝鲜访问。

**9月6日—27日** 出席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共一百五十八人。会议讨论了农村工作，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并着重讨论了工业发展方针问题。会议起草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一九六三年九月中央工作会议纪要）》。

**9月6日** 中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在谈话中赞扬勤劳勇敢的肯尼亚人民为争取独立自由，在七十多年的不懈斗争中，给予殖民主义者以沉重的打击。指出：只要肯尼亚人民加强团结，同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再接再厉地进行英勇斗争，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肯尼亚人民走向民族独立的最后胜利。

**9月7日** 上午，到北京电子管厂视察工作。

**9月8日** 晚，和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在人民大会堂出席首都各界人士庆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的集会。

△ 晚，和周恩来等接见朝中友好协会代表团、朝鲜人民军男子篮球队等。

**9月10日、12日、24日** 和邓小平等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巴卢库等会谈。

**9月10日** 晚，出席朝鲜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庆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招待会。

**9月13日** 在《文艺情况汇报》第一百零七号刊登的关于昆曲《晴雯》的评论上批：退江青（我尚未看此剧）。

**9月14日** 和宋庆龄、董必武、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到车站为刘少奇等前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送行。

△ 下午，出席关于工业发展问题的决定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文件初稿。

**9月15日** 中午，去北京火车站迎接访问朝鲜后回到北京的以鲁克曼为首的印尼合作国会代表团。下午，去机场送客人前往越南民主共和国访问。

**9月18日** 和邓小平等同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等举行会谈。二十一日，和邓小平等到机场为艾地一行离开北京去广州

访问送行。

**9月19日**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讲“五反”问题。讲话说：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人数不多，影响不小，这是一条资本主义道路。这件事要彻底搞透，但不要急。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不搞惩办主义。只要检查好，退赔好，可以从轻处理。要保持纯洁的、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我们主要靠群众运动、思想教育，法律制裁是辅助手段。城市里有两种思想：一是资产阶级思想，只顾自己，不顾全局，贪图享受，损人利己，投机取巧；一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满足现状，固步自封，反映在干部身上，就是革命意志衰退。社会主义的城市究竟如何管？要研究，试验。我们的国家机关基本上是无产阶级的，但非无产阶级的东西也很多。城乡差别、工农差别怎么消灭？怎么样使我们的厂长从管理幼儿园、学校、医院等“家务”中摆脱出来，像解放军指挥员那样集中力量把工人阶级队伍带好。这就要改造我们政府的工作。

**9月20日** 下午，出席首都各界一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的集会，欢迎受到苏联当局迫害和被武装押送出境的中国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国际列车全体乘务人员和乘坐这次列车的全体中国人员，被苏联边防当局武装扣留和武装押送出境的我国留苏军事学员；由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无理封闭新华通讯社布拉格分社而被迫撤回的新华社布拉格分社工作人员，以及被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无理要求召回的中国驻捷使馆商务参赞处的工作人员和中国留学生，共一百一十二人。代表中共中央，对遭受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无理驱逐回国的全体人员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亲切的慰问。

△ 和邓小平会见并宴请以日共中央委员竹中恒三郎为团长的日本共产党访华团。

**9月21日** 将安子文送来关于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的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批送周恩来、邓小平、谭震林、杨尚昆核阅，并印发中央工作会议，还提议由安子文根据此内容在城市工作会议〔1〕上讲一次。

**9月23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在京的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参加城市工作会议、计划工作会议的人员及其他有关人员共三百三十一人。会议由毛泽东主持，邓小平作国际问题的报告。

△ 在中共北京市委会议上，冯基平、项子明〔2〕传达彭真最近的指示：（一）来参加我国国庆的外宾，左中右都有，我们要表现大国风度，讲礼貌，讲友谊，就是有人挑衅，也不要小问题上吵闹；游艺节目中，不要影射刺激人，更不要骂人。（二）国际上反修、国内搞“五反”，斗争紧张，加上有自然灾害，更要提高警惕，防止出事；仓库、要害部门要防火防爆，要分片包干，专人负责。各区委要做好街道居民的教育工作，公教人员要负责教育家属。

△ 在关于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同志参观北京的先进典型怀柔一渡河生产队的简报上批示刘仁、郑天翔、赵凡：应当介绍他们看在一一般条件下发展起来好的和差的典型。一渡河大队这样“条件特殊的也可以看一点，但不应为主”。

**9月27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参加会议的还有出席城市工作会议的人员和参加计划会议的各地计委、经委主任共二百六十二人。毛泽东、

---

〔1〕 指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四至十月十二日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

〔2〕 冯基平，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项子明，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办公厅主任。



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在会上讲话。毛泽东说：我们现在“搞农村十条”，城市“五反”，实际上是在国内反对修正主义，打下基础。这中间，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除了文学之外，还有艺术，比如歌舞、戏剧、电影等等，都应该抓一下。现在经济形式已经改变了，是社会主义经济了；上层建筑应该适应这个经济形式，上层建筑的形式也应该有所改变，内容也应该有所改变。

△ 和朱德等去机场迎接印尼国会副议长鲁克曼为首的合作国会代表团由武汉到达北京。晚，陪同朱德会见并宴请鲁克曼及印尼合作国会代表团全体成员。

**9月30日** 晚，和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分别会见印度尼西亚合作国会副议长鲁克曼率领的代表团、阿尔及利亚国务部长阿马尔·乌兹加尼率领的政府代表团。随后，出席周恩来举行的国庆宴会。

**10月1日** 上午，在首都各界五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四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我们的经济情况，一年比一年好。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连续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带给我们的困难，已经被战胜了。在国际事务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者和现代教条主义者孤立中国的愿望相反，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让我们同全世界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为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胜利前进！

**10月2日** 中午，设宴欢送鲁克曼副议长率领的印尼合作国会代表团。晚，出席鲁克曼答谢朱德的宴会。三日上午，陪同贵宾离京去东北参观访问。

△ 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贺龙等陪同毛泽东会见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军事

代表团。

**10月4日** 在沈阳，和宋任穷接见辽宁省和沈阳市群众技术协作活动积极分子。在谈话中指出：群众自觉组织的技术协作活动（辽宁省有七万人）同企业直接领导的“三结合”互相配合，是依靠广大职工群众、自力更生地多快好省地提高我国技术水平的一条很好的道路。

**10月5日** 回到北京。下午，出席日本工业展览会开幕式，剪彩并参观展览会。

**10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六十五次会议。会议讨论《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一九六三年九月中央工作会议纪要草稿）》，拟修改后送毛泽东审阅定稿；同意十一月中旬召开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 下午，出席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零三次会议。会议讨论召开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和会前组织代表视察等问题。会议建议此次人大会议和全国政协三届四次会议同时举行。十日上午，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零四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联席会议。会议议定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三届四次会议于十一月中旬同时召开，并共同组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视察。在会上报告工农业生产情况及南旱北涝的灾情。

**10月9日** 到北京顺义县视察工作。

**10月10日** 下午，出席首都各界一万多人集会，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

**10月11日** 到北京延庆县、密云县视察工作。

**10月12日** 晚，陪同朱德会见坦噶尼喀国民议会议长亚当·萨皮·姆克瓦瓦等一行，并出席朱德举行的欢迎宴会。

**10月13日、14日** 出席中共北京市委会议。会议研究商

业问题。讲话指出：商品价格要管住，不准走私搞鬼。农村要根据城市需要搞副业，要有各种规划。又说：要扩大销售，一个是平利多销，一个是薄利多销。商业是与人民群众接触最多的部门。商业人员要真正搞成为人民服务的队伍。谈到工业产品时说：北京的工业产品要注意质量，学“德国货”，要搞全国需要的、能大量生产的而又与别地不发生矛盾的产品，锻、铸、修理、零配件、小五金等，整个工业要调整一下。干部需要有些闯将，技术要赶最先进的。

**10月15日** 到邓小平处商谈工作。

**10月18日** 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作报告。讲到国内阶级斗争状况时说：许多人在工作中犯错误，原因大致有两条：极少数人是阶级立场的错误；大多数是认识错误，由于没有认真调查研究。你们现在开始学习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十条决定，政治局讨论时，是首先看了二十份材料，结论不仅是从这些材料中抽出来的，而且是从社会调查和十月革命道路的经验中抽出来的。我国现在若干环节和基层单位已有百分之一二十变了质。一直搞多吃多占、投机倒把、贪污盗窃，怎么不是变质呢？哪里还是社会主义！学习马列主义，离开了近代革命史，就不容易理解。老干部对民主革命是比较熟悉的，进入社会主义后，阶级斗争怎么样就不清楚了。人是要通过实践经验才认识的。我们要自我教育，教育人。

△ 在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传达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时，贾庭三传达了彭真在会上的几段插话：（一）我们掌握政权十四年了，但市政府如何工作，怎样管企业，没有解决。北京市在石景山工厂区设三个市政府的临时机构，把医院、学校、治安等工作由政府统一管起来，使厂长们集中精力抓生产，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这是个新问题，其他地方也可以

试验。(二)工作不实际,抓得不紧,像氢气球。(三)看“五反”成绩好坏,要到基层去看,下面没有意见了,就通过了,这是一条标准。到被领导单位去看,和军队一样,检查要到前线去,只练兵看不出来。

**10月24日** 上午,和万里、乐松生等接见以浦部武夫为首的日本工业展览会友好访华参观团第二批人员。

**10月25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接见出席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第二次社员代表大会、解放军全军医学科学委员会全体会议、解放军第三次农副业生产会议、水电部黄河中游水土保持会议、中国水利学会会员代表大会、冶金工作会议、化工部工作会议、建筑工程部工作会议、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纺织部财务工作会议、城市妇女工作会议和农业、基建、财贸统计工作会议的全体人员,以及供销合作社干校的全体学员。

**10月26日** 毛泽东改定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后通称为“后十条”),认为这是一个“重要文件”,并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批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陈伯达、谢富治、杨尚昆、田家英阅,请他们讨论一次。“如认为可,即照办;如认为不可,即再商量。”

△ 晚,和万里等会见以巴依拉姆·赛尔来亚为首的阿尔巴尼亚都拉斯市执行委员会代表团。

**10月31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基本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会上刘少奇建议将文件标题改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

的规定（草案）》。

**11月1日** 会见并宴请比利时参议院议员、前大臣让·杜维阿萨。

△ 下午，会见由塞·迪·班达拉奈克率领的锡兰国会议员团。

**11月3日** 审阅《人民日报》题为《祝再次全歼美蒋武装特务的重大胜利》的社论稿。社论五日发表。

**11月7日** 晚，和周恩来、陈毅等出席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为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六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11月8日** 会见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总检察长阿拉尼特·切拉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视察员索弗克利·巴巴华西里。

**11月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六十七次会议。会议通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十一月十三日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以及准备提交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的有关报告稿等问题。

**11月10日** 在中共北京市委工作会议上作报告。主要内容是：（一）北京的工作要用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来要求，就是用总路线的精神来要求。北京是首都，要在贯彻党的总路线方面起带头作用。首都的干部、党团员，包括思想、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卫生、美术、体育等各界，都应该这样要求自己。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有点成绩就沾沾自喜，器小易盈。（二）北京有很多有利条件。北京是中央所在地，有这么多大学、科学研究机构，技术力量强，知识分子多，到处都有可以学习的东西，过去我们利用得不够。北京工作也有经验，但系统总结推广不够，这是我们领导的责任。北京也有不利的

方面：机关多，脱离生产的人员多，容易产生暮气。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生产力在工厂，在农村生产队，在交通部门，在科学实验场所。领导干部要经常往基层跑跑，参加劳动，交几个朋友。北京外宾特别多。接待外宾总得注意仪表，这就容易滋生官气、阔气。我们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除老的、病的、弱的，都要下去参加劳动。中央常在北京开会，北京的同志不出去，看不到外地的经验。要有计划地组织人到外地去学习。（三）工业产品的质量，要和世界先进的标准找差距，用全国最高标准来要求自己。首先是品种质量、劳动生产率，其他指标也要这样要求。我们要练基本功。（四）郊区农业，已有二十七个公社粮食平均亩产超过四百斤。房山南韩继大队平均亩产八百多斤。农业发展纲要提出的“四、五、八”，证明是能办到的。每个县都要作个规划，什么时候达到亩产四百斤，争取达到人均一头猪。一头猪就是一个小肥料厂。明年要大规模搞绿化，生产队要发展副业，发展经济作物。农、林、牧、副、渔都要搞规划。（五）现在是重新教育人、重新组织革命队伍的时代。在困难时期，开放自由市场，有些人对单干、对投机倒把不清楚，似乎觉得还可以。到底是靠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所以要重新教育人，重新组织队伍。主要是自我教育，自我改造。首先把贫下中农、工人、革命的知识分子组织起来，然后再去教育上中农、小资产阶级。城市搞“五反”，农村搞“四清”，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六）文艺怎样为社会主义服务，是个很大的问题。这几年古的多，洋的多。文艺一定要反映现实斗争，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首先要解决剧本问题。当然，反映现实斗争的作品，思想性、艺术性要结合起来。古戏不是完全不能演，许多剧本应该改良。干部要学点理论。提议同志们下决心多读点书，看几

本基本的理论著作，像《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斯大林论反对派》等。所有从事文化、理论、文艺、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要多接触实际。脱离实际，对我们发展理论不利。

**11月13日** 上午，出席朱德主持的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零七次会议，向常委报告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开法、议程和主席团名单等的草案。

**11月14日** 上午，出席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零八次会议，向会议说明关于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时间的决议草案和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以上两项议程。

△ 中午，到毛泽东处谈话。

△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向会议说明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开法和下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办法。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原则通过准备提交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的《关于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 and 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草案）》、《关于一九六三年国家预算草案和预算执行情况、一九六四年国家预算初步安排的报告（草案）》。刘少奇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反修斗争的两项措施：扩大宣传规模，省级和中央一级报刊均可组织文章，但须经中宣部、各大区党委宣传部门批准；扩大传达范围，从党内十七级以下干部逐步传达到全体人民。

**11月15日、16日** 出席刘少奇主持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作关于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主要议题的报告。会议还听取了周恩来关于国际国内形势和今后任务的报告。

**11月16日** 上午，出席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预备会

议，就大会的筹备工作和议题作说明。会议选出大会的主席团和秘书长。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和大会秘书长。

**11月17日—12月4日** 出席全国政协三届四次会议。十七日上午，出席全国政协三届四次会议开幕式。

**11月17日—12月3日** 出席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十七日下午，出席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式。

**11月18日** 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民主人士入党后的生活待遇问题的请示》上批：“拟原则同意党员不应该再享受对民主人士的特殊待遇，但在处理时，仍应有灵活性，即区别对待，照顾到他们的实际情况。”

**11月2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六十八次会议。会议讨论并原则批准聂荣臻作的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三至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报告》；同意设立国务院直属的专家干部局，统一管理科学技术队伍。在会上谈到学位、职称问题时说：不论是大学毕业的还是工人，能真正担负起工程师工作的，就可以当工程师。这条路要打开。有些老工人有专门技能，能解决复杂的问题，可以当工程师，对工人应该开门。大学生毕业五六年还是技术员，不当家，是很大损失，这方面的问题要解决。

△ 毛泽东审阅谢富治拟在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发言稿《依靠广大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反动势力中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后，认为“很好”，并指示谢富治和彭真，“讲过后，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发到县一级党委及县公安局，中央在文件前面写几句介绍的话，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按毛泽东指示两次修改谢发言稿后，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将中共中央《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



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为新人的指示》稿，连同拟转发的谢富治发言稿和谢觉哉、张鼎丞在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发言稿，以及浙江省委批转的《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批给谢富治，并和谢富治、徐子荣、刘复之商议定稿后，于一九六四年一月十四日下发。

**11月22日** 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华北局报告“五反”运动情况。报告说：从四月开始的“五反”运动，到十月底为止，市级机关已基本结束，预计春节前后，远郊区县，亦可基本结束。报告认为：（一）国家机关、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凡侵吞、盗窃、骗取国家或集体的财物、票证，勒索他人财物，收受贿赂的，都是贪污盗窃行为。对于公私不分、占小便宜，借支挪用等行为，责令退还公物、公款，经批评教育后，不以贪污盗窃论处。（二）上述职工中，凡套购国家或集体的财物、票证，进行倒买倒卖，长途贩运、组织地下企业（地下工厂、地下工程队等），以及其他非法活动、牟取暴利的都是投机倒把行为。因生活困难偶尔进行小量贩卖活动、出售凭票供应的物资、自养的禽畜和自产的农副产品等等，是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的错误行为，不以投机倒把处理。（三）对于实质上属于敌我性质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也要区别情况，分别对待，贯彻教育为主、惩办为辅，揭发批判和退赔从严，组织和法纪处分从宽的精神，一般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因此，在处理以前，要进行一次核定事实、核定时间、核定性质的“三定”工作，并要宣布“三允许”，即允许申辩，允许补充或修正交代的事实，允许举证翻案。

△ 下午，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富汗王国边界条约签字仪式。

△ 下午，出席首都各界一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中国和阿富汗边界条约签订的大会并讲话。指出：中阿边界条约的签订是两国友好睦邻政策的新成就，它为国与国之间通过和平协商解决相互关系中的问题树立了一个良好的范例。这是亚非国家友好合作的胜利，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的胜利。

**11月23日** 为在天津举办的河北省抗洪斗争展览会题词：“学习党政军民干部和群众在抗洪斗争中的共产主义风格和战斗精神。”

**11月27日** 晚，在首都剧场观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话剧《李国瑞》。散场后同演员谈话说：这个戏很好，演得正是时候。全国胜利了，一切工作都在党的领导下，哪个地方的党组织有了官僚主义、骄傲自满、宗派主义，哪里的工作一定出毛病。所以要把党搞好。这个戏告诉观众，党员应当用什么态度对待非党同志和落后分子。群众中总是有先进、中间的和落后的差别，到了共产主义也会有。对于落后分子就是要教育，即使是对贪污分子也是要强调教育、改造。专政的工具不能乱用。

**11月28日** 下午，和李先念会见商业省副相金成根率领的朝鲜商业考察团，并设宴招待朝鲜客人。

**11月29日** 出席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纳赛为庆祝阿尔巴尼亚解放十九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11月30日** 晚，在家里同江青谈话。

**11月下旬** 和邓小平收阅李先念十一月二十三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粮食调运工作，保证按时完成粮食调出计划的通知（草稿）》。李先念在批语中说：今冬明春粮食调运工作极为重要。由于粮食调运不及时，局部地

区可能发生问题。

**12月3日** 下午出席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会。会议通过《关于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计划和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一九六三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 and 一九六四年国家预算初步安排》的决议等。

△ 审定《人民日报》拟于次日发表的题为《为建立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而继续奋斗》的社论稿。

**12月4日** 出席全国政协三届四次会议闭幕会，并在会上讲话。主要内容是：（一）回顾前几年，一是连续三年的严重天灾，一是苏联领导破坏协定、撤退专家，在经济上卡我们，加上我们在具体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经济上造成了很大困难，有些人思想上对社会主义有不同程度的动摇。有的地方搞投机倒把、搞地下工厂、地下包工队、运输队雇工剥削；放高利贷，地主富农倒算；利用宗教进行罪恶活动；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等；思想、主张方面，如“三和一少”、“三自一包”等等。但总的来说，搞复辟活动的只是一小部分人。我们政协绝大多数的朋友，特别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表现是好的或者基本好的，有些人表现得很好。我们常讲“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长期共存，只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共存；互相监督，是监督大家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于犯错误的人，党仍然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主要是自我批评和自我改造。这是党一贯的方针和方法。（二）对形势的认识。经过这次会议，绝大多数人意见一致了，但极少数人还可能有不同看法；对成绩和错误的看法，也不见得完全一致。这里有立场问题，有认识问题。如果属于认识范围，有怀疑可以存疑，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可以继续研究并且待事实来证明。（三）学习改造问题。有些人听到改造这个词就厌倦、厌恶。这种情绪不好。我

们共产党员，就是老党员也要不断地整风，毛主席讲天天要洗脸。马克思讲过，工人阶级要在改造世界过程中改造自身。工人阶级还要改造，其他阶级的人更要改造。（四）统一战线问题。我们的统一战线叫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同广大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这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最大多数人对反动阶级专政的一种联盟。另一方面，又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同民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民主党派以及其他爱国人士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进行自我教育和改造的一种联盟。在统一战线内，还包括领定息的工商界人士、接受民主改革领赎买金的少数民族人士、爱国的宗教职业者、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右派分子等。统一战线的基础既然这样广泛，哪能没有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存在着阶级斗争。有矛盾，有斗争只要不叛国，不进行反革命活动，不搞破坏活动，就以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处理。通过学习、讨论、开“神仙会”，主要是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解决，经过学习改造，大家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互相监督、长期共存。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将该讲话印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解放军总政治部，作为传达这次政协会议精神时的参考。

**12月6日** 下午，接见以外山勘兵卫为首的日本工业展览会友好访华参观团第四批人员。

**12月10日** 到机场迎接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华沙会议后抵京的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

△ 晚，和刘仁等接见北京市农村文艺工作队全体队员，并观看他们演出的话剧《箭杆河边》等节目。在接见时说：你们的方向走对了。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要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服务。并对话剧

《箭杆河边》作者刘厚明等说：不论写的人、演的人，若蹲在城里，不深入农村、工厂、矿山、连队体验生活，是写不出好作品，演不出好戏来的。农民占我们国家人口的绝大多数，我们的文艺应该很好地为他们服务。除了农村文工队，还可以组织工矿文工队为工人服务，也可以到部队、学校演出。这是广大群众的需要，是革命的需要，是文艺工作者应该担当的任务。

**12月12日** 收到毛泽东对《文艺情况汇报》上登载的《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给彭真、刘仁的批示：“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又批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 上午，会见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杜·乔治乌。

△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六十九次会议，讨论书记处日常工作，研究关于反修宣传等问题。

△ 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华北局报告当前郊区农业生产形势和任务。报告说：市郊农村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程中，克服了春季干旱、八月上旬特大暴雨的气象条件下，取得了连续第三个丰收年。预计年总产量较上年增产一成左右；棉花播种面积比上年增加百分之十九，总产量则可增加百分之四十左右；生猪存栏数增长百分之二十六点四（超过了一九五七

年水平)；蔬菜种植面积有所减少，但上市量充足，品种增加，是几年来“供应最好的一年”。至十一月底统计，粮食征购任务已完成百分之九十六点六，棉花完成百分之一百九十九，鲜蛋、鸡鸭和肥猪收购量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六十至八十以上，这表明市郊农业“已经开始全面好转”。报告认为，促使农业增长的主要因素，一是在社会主义教育下，干部参加劳动，作风有很大改进，“五好队”、“五好社员”运动有新的进展。二是大抓现有水利工程、农业机械、电力的管理，机耕、机灌成本下降，化肥、农药用量增加。三是农、林、畜牧兽医、水产、农业机械等技术队伍和科研力量逐步增强，今年新配备的大学毕业毕业生有四百多人。四是城市各部门各有关工厂企业在供应农业生产资料、技术力量等方面给予支持，农业部门、中央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协作的试验项目就有七百九十六个。主要的问题是地区间的差距还相当大；对副业生产缺乏统筹安排；已有的现代化装备尚无完整的管理制度，有的尚未配套成龙，利用率很低；科技推广工作进度很慢；领导干部下乡蹲点少，甚至在成绩面前自满骄傲起来等。

**12月13日** 将毛泽东关于文艺的批示送刘少奇、邓小平、李富春、康生阅，并告北京市委方面已作了布置，中央方面，拟于日内找周扬商议后再说。

△ 将毛泽东对《群众反映》第八十四期的批示批送郑天翔、万里阅。《群众反映》所载《上海有很多人迫切要求给生活出路》一文，毛阅后批示如下：“柯老、丕显〔1〕：此件请阅。此事必须解决，一定要使他们设法就业。即使暂时不能就业，也要支出一笔救济费把他们养起来，以待逐渐设法转业。

---

〔1〕 柯老，即柯庆施。丕显，即陈丕显。

上海共有失业者多少？是否有几十万？请查告。你们对此问题的解决意见如何，请考虑见告。”并批示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我在《群众反映》第八十四期上写了几句话给上海柯、陈二同志，送上请阅。如认为不妥，请退回修改。如以为可用，请交尚昆加封寄出。此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当即嘱刘仁、万里：请注意北京这方面的问题，并照此批示办理。二十一日，将贾星五送上的《关于北京市无业人员的情况报告》批送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

△ 下午，接见朝鲜平壤市园林化指导局局长严昌镛和技术秘书方元植。他们是护送平壤市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姜希源赠给彭真市长的一批珍贵植物来北京的。

△ 晚，和邓小平等接见功勋演员张雄焕为首的朝鲜舞蹈访华代表团，并观看他们和中国舞蹈演员同台演出的朝鲜舞剧《红旗》。

△ 北京市文化局、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北京市属剧院、剧团现代题材剧目观摩演出周圆满结束。七天来，共演出了四十三场，观众五万多人，其中反映现代生活的《箭杆河边》、《汾水长流》、《向阳商店》、《会计姑娘》、《鸭司令》等，受到观众欢迎。在此期间，和刘仁、郑天翔等观看了参演剧目。

**12月14日** 毛泽东将《群众反映》第八十三期所载黑龙江一宣传干部建议农村生产队设立政治委员的来信批示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这个文件请你们看一下。它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否在生产队里设一个政治委员，或者叫政治指导员，或者叫宣传员，派一个不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高小毕业生有的是，初中也可找到），把思想工作在几亿农村人口中抓起来，在城市工业、商业、居民方面也仿军队的办

法从上到下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指导员。此事请书记处议一下。然后常委再议。”

**12月16日** 和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李先念、谭震林等收阅毛泽东致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萧华等关于工业部门学解放军的信。毛泽东在信中说：“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了，现在因为工业部门主动提出学解放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这就到了普遍实行的时候了。”这样做的干部来源，毛泽东在信中提出从解放军选调、由各部门派人到军队的军师团短期学习；到解放军政治学院系统学习和从各部实际出发，修订解放军的一套政治工作条例、办法、付之实行等。毛泽东提请林彪等“考虑一下是否可行”，然后他和中央常委同林彪等谈一下，“把方针定下来。”十九日，即将上述毛泽东给林彪等的信印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各同志。

△ 参加罗荣桓<sup>〔1〕</sup>元帅治丧委员会。十七日前往北京医院向罗荣桓遗体告别；二十二日上午，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公祭罗荣桓的仪式。罗荣桓是十二月十六日逝世的。

**12月17日** 下午，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会见即将回国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全会的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杜·乔治乌。

**12月18日** 将毛泽东十二日对文艺工作的批示及《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印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包括经常列席书记处会议的有关人员）。二十三日，将林默涵<sup>〔2〕</sup>报送参加文艺座谈会人员的名单（共二十五人）送刘

---

〔1〕 罗荣桓（一九〇二——一九六三），生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2〕 林默涵，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



少奇，并报告：“名单已增郭沫若、沈雁冰二同志，并注明了一些同志的职务。名单可否这样定下来，好做准备（暂时不出去，在外地的准备及时通知他们回来）。”刘少奇审阅同意。

△ 在关于制止印制和销售门神、灶马等迷信印刷品的报告上批示张际春：“请你查查，此类迷信品出口已签订了些什么合同，是否必须履行。不出口是否可以？”

**12月20日** 下午，出席首都各界万人集会，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三周年，并和朱德、郭沫若等接见由陈文成团长率领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劳动解放协会代表团全体成员。

**12月22日** 将关于松辽石油会战〔1〕的汇报提纲和座谈会纪要分别报送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并向毛泽东批报：“拟于下星期二（二十四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北京市一万干部，主要是工矿企业干部，听余秋里和康世恩详细讲一次（上午和下午）；星期五（二十七日）再召集中央各部门一万多干部听一次，并根据各方面意见酌量对提纲作一些修改，再发全国各地。已报刘、邓，他们同意。”二十三日，将工业交通部门学习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的报告印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同志。

**12月23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出席首都各界欢迎参加完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回国的大会。当晚，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招待会，和邓小平、李富春、贺龙等接见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荣高棠及十四个运动项目的运动员代表等。

**12月24日** 主持北京市万余干部参加的报告会，听取

---

〔1〕 即大庆石油会战。

康世恩作大庆油田政治思想工作的报告。在报告结束后讲话指出：大庆油田的经验是比较完整比较系统的典型，有了典型，党的方针、政策和各种制度等更有说服力，才能抓得住。过去，在选劳动模范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从根本上，从主要方面来看劳动模范；另一种是要求模范人物完美无缺。这是不全面的，十全十美的劳动模范在客观上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要把城市和工矿企业管好，就不许搞那些官僚机构、衙门式的上层建筑，要使上层机构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使我们的各项工作，做得更加生气勃勃。我愿意做个介绍人，提议大家要比学赶超大庆，向大庆挑战！首先要从北京的机关做起。

**12月26日** 晚，在家中同江青谈话。

**12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七十次会议。会议讨论在全国开展学习大庆油田经验的问题。在谈到石油部的经验时说：石油部及大庆油田职工有一半是转业军人。有一批军队老班长做骨干，又从三十几个单位调来技术人员，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了。领导强调按劳付酬，群众中提倡共产主义风格。大庆是学习《实践论》、《矛盾论》，两论起家。明年要有计划地搞一个学大庆经验的运动，有组织地学习。现在企业的“五反”是如何搞好企业管理，好好解决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会议、报表、文件太多。石油部、大庆油田的经验是，要了解情况，就下去跟班劳动，不需发报表或调人来汇报。调到中央工业部门的政治部主任人选，要有大庆油田那样作风的人。人事工作上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要建立退休制度，解决既不能工作、又不肯退的干部问题。二是提拔干部不看表现，先讲级别，妨碍提拔新生力量。会议决定由彭真起草一个中央通知，指出大庆油田会战经验哪些是普遍适用的、哪些因地制宜，连同石油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一同下发给全国讨

论学习。一九六四年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

△ 上午，接见朝鲜中央广播委员会副委员长金声杰率领的朝鲜广播技术代表团。

**12月28日** 主持有中央各部门五万六千干部参加的报告会，听余秋里作关于大庆油田经验的报告。在报告结束后讲话指出：大庆的经验是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运用《实践论》、《矛盾论》“两论”起家；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总路线，坚持大跃进的精神。他们也出过不少毛病，但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继续执行总路线。他们学习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战斗作风并和石油生产中的科学技术、管理方法具体结合了，因此，实现了大跃进。所谓典型经验，总是基本方面，在根本的重大的问题上解决得比较好、比较系统和全面，并不是说他们没有缺点，而是天天在那里检查改正，才使他们成为典型。这个典型是油田的经验，有若干特殊性。但是，他们的经验，包括他们的教训，也是有普遍意义的。不仅对工矿企业，对商业、财贸、经济部门，包括到我们一切上层建筑，政府的、党的各部门，群众团体，文教部门等，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如果我们真正把大庆油田这些经验，好好运用，进一步提高，与各方面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好好发展，那么不仅我们的工作可以搞好，而且可以防止产生修正主义。

△ 下午，同江青谈话。

△ 晚，在北京市工人俱乐部观看全市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学生第六届文艺创作会演，并接见了部分演员。

**12月29日** 下午，和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接见出席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全国商业厅局长会议、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工作会议、解放军全军后勤工作会议、空军院校工作会

议、空军高射炮兵部队干部会议的全体人员。

△ 在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上讲话。指出：文化艺术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从我自己来说，过去抓得少。搞社会主义不简单，要一步一步地走。在经济上，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在政治上，社会主义革命也取得了很大胜利。文化艺术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基础改造了，上层建筑也要改造。对文艺工作没有系统地解决问题，主要是我们没有很好抓。现在要抓，不管文艺界的哪一个方面，电影、戏剧、小说、舞蹈、绘画，统统都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为社会主义建设、为工农兵服务。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系统地解决，一抓到底，把这一革命彻底完成，才称得是系统的解决。

**12月30日** 签发经邓小平主持讨论改定的《人民日报》一九六四年元旦社论稿《乘胜前进》。

## 1964年 六十二岁

1月1日 中午，和朱德、郭沫若、黄炎培等出席全国政协举行的午宴，招待在京的七十岁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和参事及他们的夫人。并代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祝贺新年。

△ 晚，陪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观看河南豫剧院三团演出的现代戏《朝阳沟》。

1月2日 将工交口各部门、解放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和中共北京市委讨论大庆油田会战经验的情况简报汇编，印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

1月3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会议讨论去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对文艺问题的批示；听取了周扬关于文艺界情况的汇报。参加会议的有邓小平、康生、陈伯达、郭沫若、茅盾、刘仁、郑天翔、李琪，以及中宣部、文化部、北京市委有关人员共四十三人。在发言中说：毛主席的批示，首先是给北京市的，说明我们在文艺工作方面落后，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作品和平共处。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社会民主改革和政治思想方面的斗争中，北京市任务很重，没有系统地解决整个文艺战线的革命问题，我们领导有责任。解决文艺方面的问题，关键是创作。文艺界大多数人是认识问题，只要为社会主义、为工农兵服务就好。年轻力壮的要

下去和工农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年老体弱的，也要和群众建立联系。对过去的作品，要区别对待。现在搞文艺革命，大家要振作精神，分担责任，先从解决认识问题开始，重新教育人，重新组织队伍。

**1月4日—6日** 中共北京市委召集全市文艺界党的主要干部、艺术院校、大学文学系的党员负责人共一百六十二人的座谈会，学习去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对文艺问题的批示，传达刘少奇、邓小平等的讲话，检查工作，总结经验。二月四日，市委就学习贯彻毛泽东对文艺问题批示的情况，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及华北局写出报告。报告反映：北京市文艺队伍三千四百九十一人，其中戏曲占二千六百九十二人，反映新文艺的话剧队伍只有二百三十人，曲艺队伍一百一十九人，解放后培养的青年演员只有二十九人，老艺人占大多数。国庆十周年时的六十九个献礼剧目中，反映社会主义生活内容的只有四个。因此，市委贯彻“写社会主义”的首要措施是“组织大批创作干部深入生活”，全市五十一位剧作家和作家，“大部已在下边体验生活”。报告对抓文艺革命的方法提出了以下意见：（一）排练、演出现代戏，不规定硬性指标，而是根据剧团的情况，鼓足干劲，努力去做。（二）排演现代戏一定要保证质量。（三）剧作者、演员、导演必须亲身参加与体验三大革命斗争。（四）对艺术问题和学术问题，通过充分讨论，统一认识。

**1月5日** 晚，在民族文化宫礼堂观看哈尔滨话剧院演出的话剧《千万不要忘记》。

**1月6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七十一次会议。会议听取薄一波关于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的汇报，并作出相应决定。在讨论学习大庆油田会战经

验时说：各部门要注意通情报，不要这里过了关，那里还去摸索，或本地有好的经验不学，跑到外地去学。谈到企业中设立政治机关时，表示赞成邓小平的主张，配备政治部的干部，一定要年轻，有生气。并说：不按德才标准，只讲资格，要亡国的。

**1月7日、10日** 晚，先后观看了中国评剧院演出的现代戏《向阳商店》和《会计姑娘》。在接见剧院院长和演员时说：你们初步积累了一套评剧推陈出新的经验，应该好好地总结一下，继续朝着这个正确的方向前进。

**1月8日** 在全国总工会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工会主席会议上讲话。主要内容是：（一）工会工作的范围。包括实现党和国家的任务，解决工人本身的思想、生活两个方面问题。大庆油田的经验就是结合查铺、给职工盖被子，关心家属问题等具体事情做好活的思想工作。过去工会不是管得多了，而是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二）纯洁工人阶级队伍。工人中，需要清理的现行敌对分子和坏分子已经很少了，纯洁队伍主要是进行阶级教育，共产主义教育，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纯洁脑袋。农村“四清”，城市“五反”，都是全民性的社会主义教育。在“五反”中，发现有些工人在困难时期拿点公家的东西，做点私活，基本上是“洗手洗澡”，启发觉悟问题，要本着过去从宽，今后从严的精神处理，把精力转到增产节约上来。要学大庆，把工人阶级培养成能打硬仗、能过得硬的队伍。关于工会会员登记的工作，有的地方搞了试点，总结经验后再说。（三）企业的政治机关要和工会工作分工。企业的行政工作，是自上而下的，党的工作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结合的，工会工作更多的是自下而上的方式。所以，建立企业政治机关后，工会工作不会削弱，也不应削弱。

△ 下午，和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杨尚昆等接见出席解放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干部会议、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全国省市自治区工会主席会议、第一机械工业部工厂设计工作会议、成套设备工作会议的全体人员。

△ 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学习讨论《中央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二十三日，市委就学习对照检查后的思想认识，向华北局和中共中央书面报告说：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对北京各项工作，为害甚大”。吃过亏，有过教训，如对农村整风整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见事迟，起步慢，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抓住阶级斗争这个要点”；学习上海等地的先进经验“抓得不紧，措施不力，见效不大”。

**1月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七十二次会议。会议听取韩光汇报国家科委党组提出的有关学位、技术称号等问题的报告和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提出的安置下乡青年的报告。在发言中说：评学位、职称要看对社会主义贡献大小，有没有创造。为社会主义服务应该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要专门讨论一下发展党员的标准。在谈到大中小学如何缩短学制问题时说：现在课程已经很紧，不要以为现在的课程少再增加课程。教科书年年改，教师得现学现教，现在有些大学生看不懂高中的教科书。教科书要稳定。在谈到毕业生安置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时说：安置不要分散，可以去治碱、治山，要有计划地使用他们。下去以前进行短期训练。人多地少、劳动力有富余的地方，去了抢农民的工分，根本不要去。

△ 将介绍大庆油田会战中的共产党员、五好标兵张洪池的先进事迹的报道《他就是我们的“雷锋”》批送毛泽东：“这



份材料很好，拟再派人调查研究后介绍。”

**1月11日** 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在各行各业中普遍开展学大庆、赶大庆运动的决定》。

**1月23日** 上午，会见肯尼亚前任驻华大使亨利·穆利。

△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七十三次会议。会议听取罗瑞卿关于新疆地区备战方案要点的汇报和姚依林、王磊关于商业计划会议和一九六四年商业利润指标计算情况的汇报。会议就各地放高利贷现象仍然存在的问题，请李先念就如何改进银行信贷工作，制止和克服投放高利贷的现象加以研究，提出解决办法。会议同意商业部、人民银行总行等单位提出的关于清理农村社队向国家的赊销款、预付款、购订金的办法，可以批转各地。

**1月24日** 和毛泽东、刘少奇核阅邓小平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中法建交的宣传要点》的通知稿和《宣传要点》稿。

**1月25日** 和毛泽东、刘少奇核阅邓小平批送的《人民日报》社论稿《祝贺中法建交》。

**1月26日** 和刘少奇、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接见出席地质、水利、机械、农业机械、石油、冶金、轻工业、建筑工程、铁道、邮电、气象、科学技术、测绘、统计、银行、财政经营管理、教育、医务、农村读物出版等方面的全国性专业会议的代表，以及出席人民解放军各专业会议的代表。

**1月27日** 在海军党代表大会和驻京部队大校以上干部会上作形势报告。主要讲组织全世界人民反美统一战线问题、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及国内形势问题。

**2月4日** 和刘少奇核阅邓小平批送的外交部关于法国建馆先遣人员来中国和中国建馆人员赴法国问题的请示报告，报

毛泽东批示。

**2月7日** 和毛泽东、刘少奇核阅邓小平批送的外交部关于赴法临时代办的工作方针和任务的报告。

**2月9日** 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次报告学习贯彻《中央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指示》的情况。报告说，一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市委召开书记处和常委会议，讨论检查和安排的情况如下：（一）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来，毛主席指示的“五反”、“四清”，全国学解放军、学大庆以及文艺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等，贯穿着一根红线，“都是为了重新教育人、改造人，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马虎松垮，坐失时机，将犯大错误。（二）城市“五反”、农村“四清”今年必须打歼灭战。目前全市应参加“五反”的一百三十三万人中，已经开展的有一百零四万人。农村“四清”第一批在一百万人口地区开展，三月份可基本结束。第二批一百四十万人地区，春节前训练干部约七千人，春节后进入阵地，保证使阶级斗争和春耕生产两不误。少数暂不开展“四清”的单位，今年内分期分批，全部搞完，明年春扫尾。（三）大力整顿和健全“司令部”的组织。市委书记处已讨论挑选一批思想好、工作好、干劲足、身强力壮较年轻干部到领导岗位上来，以妥善地调整那些不称职的领导干部。“这个手术迟早是非动不可的，因循拖延对事业是不利的”。（四）阶级斗争的锣鼓要敲响，生产斗争（包括科学实验）的锣鼓也要敲响。人的革命化要促进生产的发展。农业生产要在连续两年大丰收的基础上，粮食亩产要有几个县“过黄河”（即超过五百斤），灌溉面积可由去年的二百二十万亩扩大到三百五十万亩左右；工业生产方面，要在品种、质量上打几个歼灭战，最近一千多人派赴上海学习，要在对口的三百六十

八个品种上，一种一种地选，定期检查。市委决定：从市到区和基层，领导班子要分两摊，一摊专管生产，一摊专管阶级斗争，加强集体领导，分工负责；作风上要强调“轰轰烈烈与扎扎实实相结合，冷热结合，不能鼓空劲，放空炮”。

**2月12日** 中午到毛泽东处谈话。

△ 晚，和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等接见出席拥军优属联欢会的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的四好连队、四好单位、五好战士、神枪手、神炮手、技术能手的代表，以及烈属、军属、复员军人的代表。

**2月13日** 和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康生、郭沫若、林枫、杨秀峰、蒋南翔、张劲夫、陆平、朱穆之〔1〕、陈叔通、黄炎培、许德珩〔2〕、章士钊等参加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集的教育革命座谈会（又称春节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说：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可以砍掉一半，用偏题、怪题考学生是对付敌人的办法。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

**2月14日** 下午，到邓小平处谈话。

**2月15日** 上午，会见以斋藤卯助为首的日本地方议员促进国际贸易代表团。

**2月18日** 收阅毛泽东批示：将姚仲明〔3〕报来的艾地与苏共代表团会谈情况及前一次谈判，“应迅即转告十一个左派党，以及澳大利亚、锡兰、比利时、古巴、巴西这些左派党。

---

〔1〕 张劲夫，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陆平，时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朱穆之，时任新华社副社长。

〔2〕 许德珩，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水产部部长、九三学社主席。

〔3〕 姚仲明，时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请你急办为要”。

**2月19日** 将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信的初稿和致各兄弟党信的初稿分别送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核阅。并建议将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的谈话记录摘要附送给兄弟党。

**2月20日、21日** 连续两天下午，到毛泽东处谈话。

**2月21日** 下午，接见全松根为首的朝鲜热力网考察团和梁锡焕为首的朝鲜大型无轨电车考察团，并设晚宴招待客人。

**2月22日** 上午十一时，抵达平壤。下午四时会见金日成等，通报关于同兄弟党最近来往及周恩来访问非洲、中法建交等情况。晚二十二时，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今天的会谈十分融洽，所谈问题都取得了一致看法。我们二十四日返京。

**2月24日** 下午，到毛泽东处汇报同金日成会谈情况。

**2月25日** 晚八时，致电中国驻越南大使馆，请其转告已到河内的邓小平：“关于范总理谈对美斗争拟发表声明问题，已在主席处谈过，同意你的意见。”二十四日，邓小平在中国驻越南大使朱其文报告上，就越南总理范文同提议应针对美国对越南北方发出战争叫嚣，先由越南政府发表一个声明，再由中国政府发表给予支持的声明一事，批：“请彭核。主席处一议。如有指示，电告我们。我的意见，越方不要急于发表声明，等美国叫得更厉害些再说。看来美国在目前就轰炸北越还不至于。”邓小平于二十五日赴河内参加中越两党会谈。

**2月26日** 上午，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出席公祭周保中〔1〕

---

〔1〕周保中（一九〇二——一九六四），生前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

仪式，并任主祭。二十五日，曾到中山堂吊唁周保中。周保中是二月二十二日病逝的。

△ 收阅毛泽东批示：原定老挝王国政府首相富马三月十五日访华事，“以推迟十五天为好，因为周、陈〔1〕在三月十五至二十日之间可能有重要会议要参加。”

**2月27日** 修改中共中央答复苏共中央二十二日的来信。苏共中央曾于二月十二日背着中共中央，致信各国共产党，提出要对中共采取“集体措施”。随后，苏共中央二月全会通过决议，对中共“坚决反击”，以迫使中共停止论战。信和决议均不发给中共中央。为此，中共中央在二月二十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中，批评这是“明目张胆地进行宗派活动，派别活动和分裂活动”，提出“要求”将二月十二日的信同样给中共中央一份。但苏方二十二日来信“拒绝”，理由是中共中央信中使用的是“要求”一词，而不是“请求”。在修改复信中除进一步批评苏共中央外，再次提出：“我们现在遵从你们的意思，请求你们把你们二月十二日发给其他兄弟党的信件也发给我们，是为至盼。”

**2月27日、29日** 和李富春、杨尚昆等陪同毛泽东、刘少奇等在钓鱼台会见金日成，就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来信的复信，征求朝方的意见。

**2月29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来信的复信。复信主要谈了关于中苏边界、援助、苏联专家、中苏贸易和停止公开论战五个问题。同时就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准备工作的

---

〔1〕周，指周恩来。陈，指陈毅。

十月在北京继续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在中苏两党会谈后召开十七个国家兄弟党代表会谈等问题提出建议，请苏共中央给予答复。复信于三月一日〔1〕送交苏方。五月九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和苏共双方自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以来来往的七封信。

△ 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华北局报告关于贯彻执行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集中提出城市建设、劳动就业、开展计划生育和试办职业教育问题，指出：由于过去在城区不能大量拆房，绝大部分新建筑摆在近郊，市内古老破旧的面貌“基本没有改变”，而近郊农民因基建占地，人均土地已从两亩左右下降了一半。同时，建设计划是按条条下达，由各单位分别进行，市政当局很难有计划按城市规划成街成片地建设。因此提出今后新的建设一般应放在远郊卫星镇，不占近郊农田；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单位，应按“分散、隐蔽、靠山”的方针。同时，对住宅、办公用房和生活服务设施等非生产性建筑，逐步贯彻统一计划、统一建设和统一管理指导思想。

**3月2日** 下午，和刘少奇、邓小平等到机场迎接政治局委员扬·格·毛雷尔率领的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代表团。

**3月3日—10日** 参加成员有邓小平、康生等的中共代表团，在团长刘少奇率领下同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代表团进行会谈。罗方希望对迅速恶化的中苏关系做些调解。

**3月5日** 傍晚，陪同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再次同金日成会谈。

**3月6日、7日** 晚，和康生列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研究同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代表团

---

〔1〕 复信签署的日期是二月二十九日，送出的日期是三月一日。

会谈的有关事宜。

**3月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七十四次会议。会议讨论有关四月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准备工作等事项。

△ 列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汇报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代表团提出的延长中罗会谈的有关情况。会议决定同其再进行一次会谈。

**3月10日** 和刘少奇、邓小平收阅毛泽东关于学校课程设置、讲授和考试问题的指示。十二日，批示北京市委大学部和教育部，要他们把在“蹲点”时所了解到的学生负担的情况综合上报中共中央和中央宣传部。

△ 下午，和刘少奇、邓小平等陪同毛泽东会见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代表团，并设宴招待客人。席间，毛泽东说：公开争论是他们（指苏共中央）挑起来的。既已挑起来，就要有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还说：我们这次会谈是好的，因为双方都感到是平等的，彼此都把话讲出来好，这并不伤害我们之间的友谊。今晚是个团结的会见。

△ 晚，和邓小平、康生等陪同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代表团出席文化部举办的音乐晚会。

**3月12日** 上午，和刘少奇、邓小平、康生、杨尚昆、伍修权等到机场送扬·格·毛雷尔率领的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去朝鲜访问。

△ 主持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传达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情况。就教育、文艺、反修、干部等问题讲话。其要点是：（一）关于改革教育。认为毛主席批评学生负担重的原因是教材问题、考试问题和填鸭式的教学方法，涉及到整个学制要研究。所谓书越读越蠢，意思是不要死读书。要由浅入深，启发学生自觉，独立思考，不必要的课程要减少，使学生有时

间休息和读课外书。要召开座谈会，搞典型。先把问题摆出来，不要轻易变动。还可以办“抗大”式的大学，面向农村，培养会计、农机修理的人才，一半学习，一半劳动，由做实际工作的干部任教。可先做小规模的小试验。（二）文艺改革的关键是作者和演员到实际生活中去，要把作家、演员“轰”下去。（三）关于反修斗争。我们的干部对反帝、反封建比较熟悉，反对修正主义就不一定。要善于发动思想讨论，把错误思想暴露出来。“四清”、社教、学解放军、学大庆运动要搞几年。阶级斗争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四）干部队伍要有能担负艰苦任务，能打硬仗恶仗的素质。老干部可离职休养。有些干部不提拔到一定岗位，不能锻炼出来。干部称职与否，主要看能否执行总路线，走社会主义道路，看他能够带多大的队伍。（五）做冷静的促进派。《北京日报》介绍典型，不要形而上学，永远不要忘记一分为二。有些单位学大庆，只讲成绩评功摆好。事物总是在矛盾中运动的。

**3月13日** 下午，去机场迎接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

△ 下午，在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一十四次会议上，就《外国人入境出境过境居留旅行管理条例》作说明。会议批准了该条例。在会上，还对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存在的问题作了分析。

**3月14日** 中共中央下发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三月六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十六期）和毛泽东的批示。这期《群众反映》刊登了北京铁路二中校长魏莲一关于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的意见的来信。毛泽东批示：“此件应发给中央宣传部各正副部长、中央教育部各正副部长、司局长每人一份，北京市委、市人委负责人及管教育的同志每人一份，团中央三份。并



请他们加以调查研究。批示还说：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3月15日** 下午，和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到机场迎接到非洲十国和阿尔巴尼亚以及亚洲三国访问回到北京的周恩来一行。

**3月19日** 同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安子文等研究几个部委的人事变动问题。

**3月20日** 晚，观看北京市文艺工作队演出的话剧《山村姐妹》。在同演职人员谈话时，鼓励演职人员深入生活，从工农群众中汲取养料。说：我们党的工作者、政府工作人员都得下去，教员、文艺工作者也都得下去。人像树一样，总得有根，有土，有地基。不然就长不好。我们的地基就是工人农民的生活。

**3月21日、25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会谈。

**3月23日** 晚，和刘少奇、邓小平、康生等陪同毛泽东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

**3月26日** 下午，列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访问非洲的情况汇报和讨论中苏关系问题。

**3月27日** 观看北京京剧团彩排京剧《社长的女儿》。对演职人员说：一九四三年在延安时，我们就对京剧进行改革，新编了《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历史剧，但没有坚持下来。演现代戏，一九五八年到现在，已有些经验，要好好总结一下。这次要搞好。北京人懂京戏，过去都是眯着眼睛听。所

以改革要慎重一点，有一点不好，就有人挑毛病。需要多少时间，需要多少力量，都可以调整。

**3月31日** 以北京市长名义赠给朝鲜平壤市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姜希源一批植物，其中有椒树、水杉、桧柏等。

**4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七十五次会议。会议听取薄一波、谷牧关于在工交系统建立政治部的情况汇报并作出相应的决定。在讨论政治工作条例时，表示希望尽快总结一点典型经验，包括失败的教训，有了正反面典型，更有说服力。

**4月2日** 和刘仁、郑天翔、贾庭三等到北京市郊区农村及石景山钢铁厂调查。同石钢党委书记周冠五等议论工业生产体制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时说：工业企业改革面临两大任务，一是重新教育人、重新组织阶级队伍；二是上层建筑要适合经济基础。关于领导机关的革命化，总的讲我们的上层建筑是适合经济基础的，也有些部分是限制生产力发展的。企业的管理机构和领导人员要做到两条：一是指挥在前线，二是为前线服务。管理、供应、协作和计划方面的问题，都值得研究一番。

**4月3日** 和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席刘少奇召集的会议，讨论中苏关系等问题。

**4月5日** 上午，去机场迎接赴沈阳参观后返京的日共中央代表团。

△ 下午，会见朝鲜劳动党代表团。

△ 晚十一时，和邓小平、康生率领中共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成员乘火车去西北等地区参观考察。

**4月7日** 在内蒙古考察工业学大庆和开展“五反”运动情况。

**4月12日** 和邓小平、康生等视察兰州化工厂。

**4月13日** 在兰州同汪锋<sup>〔1〕</sup>等谈话。说：（一）搞工业要依靠工人阶级多数，走群众路线。现在学大庆，要在“五反”的基础上搞，有人想用学大庆代替“五反”，或挤掉“五反”，都是错误的。（二）学大庆要注意劳逸结合；工人热情高涨，不计报酬，但领导要讲按劳付酬；群众运动高潮起来后，领导要注意控制。什么运动都是波浪式的，不能老搞突击，才能始终保持饱满的情绪。凡是不能持久的东西，不要学。（三）到大庆、兰炼、玉门<sup>〔2〕</sup>等单位参观的人很多，经委要控制一下，各地要总结自己的典型。（四）老干部要带一、二、三把手，自己多读点书；领导干部要学一门技术，指挥生产才有发言权。

**4月14日—16日** 在西安视察。期间，中共西安市委反映：当前会议太多，穿插的工作太多，冲击“五反”运动，群众有厌战情绪。学大庆、学解放军的运动中不健康的苗头是：急于求成，职工休息时间少，睡眠不够八小时，甚至搞“丰产日”，“大战礼拜六”；出现命令主义；未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在同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等谈话中指出：（一）对三年大跃进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或明或暗地加以否定；一种是一分为二地总结经验教训，在新的基础上，用深入、细致的思想和组织工作，冷静地、扎扎实实地、根据可能和必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前进。（二）几年来，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学习毛主席著作，学大庆，学解放军，群众积极性普遍高涨。但是，有些同志并没有吸取经验教训，不去做扎扎实实的基本工作，而是搞表面的华而不实的轰轰烈烈。在

---

〔1〕 汪锋，时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

〔2〕 指大庆油田、兰州炼油厂和玉门油田。

学毛著、学解放军时，搞形式主义，浮夸作风，召开很多又长、又空、又重复的会议，印发下面办不到的表格，甚至借口群众热情，违反劳逸结合让群众加班加点工作。其结果，冲击了社会主义教育和生产任务，消耗了群众的热情。这不符合总路线精神。（三）要采取几项措施：从中央各部起，深入到第一线去调查研究。一切不必要的会不要开，不必要的文件、表格统统废掉；报纸宣传不要鼓虚劲，推广典型要介绍措施；加班加点要制止，业余时间开会不能过长；要总结本地区的典型经验，必要的外出参观，人数、次数要减到最低限度，不要搞“骡马大会”，旅行式的参观。总之，既不要对群众运动泼冷水，又要爱护、珍惜群众的热情。

**4月17日** 视察三门峡水库。

**4月18日** 上午，和邓小平等乘火车到达山东兖州。乘车到曲阜，参观孔庙。

△ 下午，乘车到达济南。

**4月20日** 上午，回到北京。

△ 将中共北京市委关于会议多、报表多的情况简报八件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传阅。并告这是市委三月六日举办的“三多”〔1〕展览会中选出来的一些典型材料，可以看出当前官僚主义、文牍主义的严重程度。

**4月21日** 和邓小平等约水利部负责人谈黄河、淮河等的治理问题。谈话中提到三门峡工程的改建问题。

**4月23日** 将组织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作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送邓小平核批。通知指出：在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学习解放军、学习大庆油田的运动中，“要做扎

---

〔1〕 三多，指会议多，文件多，报表多。

扎扎实实的、科学的、冷静的促进派”。少数的领导机关负责人，不下去蹲点，进行调查研究，而是召开没有准备的会议，发繁琐的报表、冗长的文件，提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滋长起一股形式主义和浮夸风，是和中央的指示精神相违背的。通知提请各地注意：一要精简会议、报表；二要坚决制止形式主义的宣传报道和广播；三要注意劳逸结合，关心群众生活和健康，保证职工八小时睡眠和一定的业余自由活动；四要在学习外地经验的同时，结合总结本地的典型经验，树本地的标兵；五要继续抓紧进行“五反”、“四清”、社会主义教育。中共中央通知经邓小平核批后，于五月十八日下发。

△ 上午九时三十分，离开北京去太原。

**4月24日、25日** 在太原晋祠宾馆，同陶鲁笳、王大任〔1〕等座谈关于“五反”和学大庆运动中的问题。谈话说：干部参加劳动，对防止修正主义有深远意义。许多干部对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准备不足，进城后，以为革命到了头，做官了。要重新学习，学会一种技术，保持无产阶级本色。指出：过渡时期阶级斗争主要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但许多工人包括老工人，对资本主义剥削认识是抽象的，他们忆苦往往限于农村破产的内容。社会主义时期，划分资产阶级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老的资产阶级，已经赎买了；另一种是新生的资产阶级，搞投机倒把的，是社会主义的敌人。还说：宣传劳动模范也要一分为二。“旗帜”不要神化，任何个人，任何单位所做的工作，分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是正常的。学大庆，学解放军，一要积极，二不要急于求成，搞形式主义，要从实际出发，学基本精神。

---

〔1〕王大任，时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

**4月28日** 回侯马埕上村旧居，探望亲属。

△ 和劳动模范周明山、孟凤鸣座谈。对青年劳模周明山说：读毛泽东著作要学会讲两分法，遇事从实际情况出发。鼓励孟凤鸣说：你实践了一条上学后回农村种地的道路，你看过很多书，但还缺乏政治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锻炼，对许多道理的认识是由抽象到具体，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

**4月30日** 上午，返回北京。

△ 下午，会见弗朗齐斯科尼·多罗为首的意大利总工会代表团。

△ 下午，会见斯达尼斯拉夫·科那尔斯基为首的波兰工会代表团、安东·斯托扬诺维奇为首的罗马尼亚工会代表团和道·桑布为首的蒙古工会代表团。

△ 晚，出席全国总工会等十二个人民团体联合举办的招待会，同在京的国际友人共庆五一国际劳动节。

**5月1日** 上午，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来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和群众联欢。后又分别到中山公园、景山公园等处参加联欢。

△ 下午，会见青山正市为首的日本川崎市议会代表团和木下友敬为首的日本地方自治友好代表团。

△ 下午，会见阮玉蓉为团长的越南南方妇女代表团和青海为团长的越南南方青年学生代表团。

△ 晚，参加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一百多万人的联欢大会，并和周恩来、陈毅等在天安门城楼会见外宾，一起观看焰火礼花。

**5月3日** 上午，去长春视察。

**5月4日** 听取赵林〔1〕汇报全省“五反”、“四清”运动的情况。在插话中指出：（一）“五反”、“四清”，干部参加劳动是中国革命能否坚持到底的一个根本问题，看来没有三五年工夫不成，苏联革命成功四十六年后出修正主义，我们若不搞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二）处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问题，要“两严一宽”，即批判从严，退赔从严，处分从宽。农村“四清”中，犯错误的基层干部，很多是翻身农民，要启发他们的自觉，“洗手洗澡”，治病救人。打击面大了，工作会丧元气。（三）要认真体会中央文件的精神。对处理“五反”中的一般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人，中央指示〔2〕中有几条是赦免的：一是时间从“七千人大会”后算起，一九六一年以前的一般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只要退赃退款，可以不给处分；二是多吃多占，不以贪污论处；三是需要给予党纪、政纪、刑事处分的人数，严格控制在参加运动的干部总人数的百分之一左右。具体处理，放在运动后期。这样，既能挖除产生修正主义的根子，又能减少副作用。

**5月5日** 在哈尔滨听取汽轮机厂、电机厂负责人汇报学大庆运动的情况。说：学大庆出现新气象，把我国革命在党的领导下走群众路线的经验运用到企业管理上来了。战争时期，我们没有管过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学习苏联的经验是必须的，是必经的阶段。一九五八年，毛主席提出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大跃进时，我的脑子也发过热。今天，我们提出领导要做冷静的促进派，也是从实践中得来的，是经过各种实

---

〔1〕 赵林，时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二书记。

〔2〕 指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监委《关于“五反”运动中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报告》（一九六四年一月二日）。

践后比较出来的。十月革命后，苏联企业中出现极端民主化，很混乱，列宁提出过“千百人的意志要服从一个人的意志”。这个时间很短，列宁那时没有工厂工作的实践。斯大林早期是走群众路线的，晚年提出“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那末政治呢？群众呢？我们学大庆，就是讲党的领导，政治挂帅，群众路线。政治挂帅并不是不要技术，不要其他业务，而是说政治和技术和业务的关系。哪一个帅？政治是帅。法令、规章制度，都要有利于发展生产。一九五八年我们破得多了一点，有的不是“迷信”也被破除了。事情总是经过实践才能有真正的经验。现在你们学大庆，学解放军，已经做出了样子。还说：工农群众都在学毛主席著作，你们要领导好，就要好好地学习理论，提高马列主义水平。

**5月6日** 离开哈尔滨去大庆油田视察。

**5月7日** 在大庆油田听取余秋里、康世恩等汇报并座谈“五反”运动开展情况和一年来大庆经验的发展。把大庆的新经验概括为：（一）实行两分法，在高标准、高水平的要求下，找差距。（二）除年终评功外，月评“五好”，帮助后进者进步，练好基本功。（三）除特殊情况下的大战苦战外，平时应劳逸结合，以保护群众的热情。（四）发扬劳动不计报酬、工作不辞辛苦的共产主义风格和贯彻按劳付酬的原则相结合。（五）严格执行合理的规章制度，但不束缚群众的积极性。（六）企业内部集中统一，并按发展生产力需要和各方配合办事。（七）增产节约运动与社教运动相结合。（八）适应大庆新兴企业远离城市的特点，实行工农商学兵结合，组织集体的农副业生产，由职工家属和部分职工参加劳动，产品供应企业职工及其家属。总的精神是强调从实际出发，做冷静的促进派。

**5月10日** 中午，回到北京。



**5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七十七次会议。会议讨论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议题。

**5月15日—6月17日** 出席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农业规划和农村工作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三个五年计划（一九六六——一九七〇）的初步设想、建立各个系统特别是工交系统的政治工作和财贸工作等问题；还讨论了关于三线建设、反修防修、培养接班人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等问题。会前，毛泽东指出：农业、国防是拳头，基础工业是屁股，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会议期间，毛泽东从目前存在着新的世界战争危险的严重估计出发，指出：在原子弹时代，没有后方不行。提出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下决心搞三线建设。会议在讨论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时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提出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毛泽东担心党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并提出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任务。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贫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的指示》和条例草案。

**5月16日—25日** 在北京市职工业余文艺创作会演期间，和刘仁、陈克寒等观看了演出。参加演出的八场节目显示了职工自编自演的文艺创作活动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和小型多样的新面貌。

**5月16日** 在罗瑞卿送来一坦克学校训练时压坏群众麦苗事的报告上批：坦校必需的军事训练地应保证。坦校方面的缺点，军委已做了十分严肃的批评。请刘、郑、冯〔1〕和县、

---

〔1〕 刘指刘仁；郑指郑天翔；冯指冯基平。

区委商议严肃检查自己和社队干部方面的错误缺点。地方干部、群众，必须有全局观念，必须把保证军事训练和支援军队作为神圣职责，那种不顾大局、得占便宜就占点的思想是错误的。问题请你们具体解决。

**5月18日** 在首都各界人民欢迎苏丹共和国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易卜拉欣·阿布德的大会上讲话。指出：苏丹人民经过长期英勇斗争，终于摆脱了殖民统治，赢得了独立。在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外国干涉、发展经济和文化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中国人民将同亚非拉人民一起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为维护世界和平，争取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陪同毛泽东会见苏丹共和国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阿布德一行。

**5月20日** 和陈毅、贺龙陪同周恩来到杨村驻军某部视察、观看军事演习。晚，冒雨观看“夜老虎连”的汇报表演。午夜，赶回北京。

**5月22日** 晚，出席刘少奇、朱德、邓小平为欢迎中央书记雅克·格里巴为首的比利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举行的宴会。

**5月28日** 出席刘少奇主持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会议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等问题。

**6月1日** 下午，和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等去机场迎接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统阿卜杜拉·萨拉勒元帅和他率领的也门共和国代表团。

**6月2日** 出席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

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会议讨论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在会上发言说：“四清”、“五反”运动开展以来，农村问题揭发不少了。现在看来，城市的问题更严重。所以必须城乡“五反”、“四清”联合夹攻。我们搞社会主义，是依靠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如果那些人钻进来了，甚至到了党内，我们的阶级队伍不纯，怎么依靠？城市“五反”要和乡村的运动配合搞，重新部署，分三大批（或三大段）进行。第一大批是县、区以上的党政领导机关、文教领导机关、大中工商企业、高等学校、大医院。第二大批是城市供销社、手工业社、小的工商企业、中小学校（主要利用寒暑假搞）、医务所、体育馆、剧场、电影院。第三批是街道，包括街道集体所有制企业。领导作风革命化，就是干部参加劳动，科室人员到车间去，设计人员参加施工。划分阶级，主要是搞清楚阶级成分、家庭出身、政治面貌三项。运动的过程就是整党整团的过程。最后发展党员，吸收一部分新的分子。党政机关是集中整官僚主义。首先是查文件多、报表多、不必要的会议多，能下去劳动、蹲点，文件报告自然就少了。

**6月4日** 上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会议听取薄一波对中共中央《关于在我国工业系统建立政治机关的决定》和关于工交系统加强政治工作的说明、李先念关于财贸工作的说明。

△ 到机场迎接中央书记雅克·格里巴率领的比利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该代表团在访问朝鲜后返抵北京，继续对我国进行访问。

△ 下午，在首都各界人士欢迎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统阿卜杜拉·萨拉勒及其率领的代表团大会上讲话。说：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永远同阿拉伯人民一道，同亚洲、非洲和全世界

人民一道，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保卫世界和平，奋斗到底。

**6月7日** 出席首都各界人士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欢迎中国登山队登上希夏邦马峰胜利归来的集会。当晚，在中共北京市委、市人民委员会举行的聚餐、电影联欢会上祝酒时说：我国登山运动员在征服了珠穆朗玛峰以后，又征服了希夏邦马峰，这是我国登山事业中的又一个辉煌成就。我国各条战线的人们要认真学习登山运动员们苦练过硬功夫、不怕困难、顽强奋斗的革命精神，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6月8日** 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各中央局第一书记等。毛泽东讲到防止出修正主义问题时，和周恩来一同插话说，下面被敌人掌权的不少。毛泽东接着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

**6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七十八次会议。会议讨论并同意共青团中央拟向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作的报告以及其他有关的决定。在发言中指出：青年的人生观是在二十二三岁时奠定的。学生加入共青团的条件，第一是政治，第二是功课。在大学三四年级的学生中，可以发展一批党员。党性要逐步地培养起来。

△ 下午，刘仁、郑天翔来家中商谈北京市委工作。

**6月11日** 上午，和周恩来、郭沫若等去机场迎接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第二副总统拉希迪·姆福米·卡瓦瓦率领的经济代表团。当晚，参加周恩来举行的欢迎宴会。

△ 上午，和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等送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统阿卜杜拉·萨拉勒率领的代表团离开北京回国。

△ 下午，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及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出席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

△ 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听取刘少奇作反修斗争报告。

**6月12日** 前往机场迎接中央书记安瓦尔·卡迪尔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访问朝鲜后到达北京。十三日下午，会见并设宴招待印尼共产党代表团。

**6月14日** 下午，在首都各界一万多人欢迎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第二副总统拉希迪·姆福米·卡瓦瓦及其率领的经济代表团的大会上讲话。说：中国人民同非洲人民同命运、共呼吸，始终不渝地支持非洲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支持非洲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中国人民同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人民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周恩来和陈毅出席大会。

△ 晚，刘仁、郑天翔等来家中商谈北京市委工作。

**6月15日** 上午，接见越南公安代表团。谈话中强调：党依靠群众，公安机关也要依靠群众。只有真正依靠工人、贫下中农，政权才能巩固。

△ 下午和晚上，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在北京西郊观看北京部队和济南部队的军事汇报表演。

**6月16日** 上午，同坦噶尼喀民族联盟副主席卡瓦瓦（坦桑联合共和国第二副总统）和民族联盟总司库斯瓦依（国务部长）举行会谈。在谈话中说：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不独立，就什么都谈不到。彻底独立就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完全独立。政治独立就是一切政策都由自己决

定。军事独立就是常规军队、保安、警察等一切武装力量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任何外国人不得干涉。如果没有军事上的独立，政治独立就是空的，假的。经济是政治的基础，经济不独立，其他方面的独立也就没有基础。军队、政治、文化都是为经济服务的。

△ 下午，出席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管理处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会上，毛泽东讲了两大问题：第一，地方党委要管军事。第二，要培养选拔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毛泽东阐述了培养和选拔接班人的五项条件：一是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二是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三是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四是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五是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从中央局，省、地、县到支部都要搞几层接班人。

△ 晚，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签字仪式，后出席卡瓦瓦的告别宴会。次日上午，到机场送卡瓦瓦一行去上海参观。

**6月17日** 上午，在中央工作会议华东小组会上发言说：这次会上，毛主席提出工业建设部署分一、二、三线，各省搞地方武装，建兵工厂，以及培养和选拔接班人问题，都是有战略意义的百年大计。在谈到革命接班人的标准时说：赫鲁晓夫自称马列主义者，但他不代表人民群众的大多数，是代表高薪阶层、富农和资本家。最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是真理的标准。依靠少数人，就是搞修正主义。共产党人要能团结人，特别是对反对过自己犯了错误的人，要讲团结，要帮助人。有的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要和他讲团结。又说：民主作风，对掌握政权的党有特殊意义。过去你不联系群众，不讲民主，就站不住脚。现在当了权，谁得罪了支部书记，连饭碗都保不

住。有些人，未张口先看第一书记的眼色，“话到嘴边留半句”。我们从上到下都讲民主，在高度民主基础上，达到高度集中。毛主席常说，党不是“毛氏宗祠”。这话很有道理。没有民主，相反的意见听不到，没有民主作风就没有群众路线。民主作风，就是自我批评。主要是第一书记、省长、司令员、政委这些人，更要有自我批评精神，否则很危险。

△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七十九次会议。会议根据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意见决定：由谭震林主持修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规定》（即“后十条”）和《贫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由彭真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城市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的指示。关于城市划阶级问题，会议提出各大区先进行一些试点，并将情况和问题由各中央局汇总报告中共中央。

△ 下午，出席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总结发言。

**6月19日** 去北京通县视察。

△ 晚，和贺龙、杨成武、刘志坚〔1〕等陪同毛泽东观看广州部队战士话剧团演出的话剧《南海长城》。

**6月20日** 去北京海淀区东北旺公社视察。

**6月24日** 观看北京京剧团革命现代戏《杜鹃山》剧组排戏。在休息时和演员座谈，说：反映工农红军在井冈山斗争生活的戏是好戏，可以站得住。剧本大部分可以先定下来，演员就好琢磨了。剧本不定，五心不定。剧本中有一部分还要改一改。座谈中还对主要人物塑造，红军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等方面提出修改意见。鼓励著名京剧老演员马连良说：你六十

---

〔1〕 刘志坚，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部长。

四岁了，背台词相当辛苦，为了这个也应该表扬你。又对演员说：任何剧种如果不反映现实生活，不反映工农兵，那就是自己取消自己。

△ 晚十一时，江青来家中谈话至次日凌晨一时三十分。夫人张洁清在座。

**6月25日** 中午，郑天翔、李琪、邓拓来家中谈话。

△ 晚，和聂荣臻等陪同毛泽东、朱德等在人民大会堂观看越南人民军总政歌舞团演出的革命历史舞剧《义静烈火》。

**6月26日** 下午，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接见出席公安部队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代表会议的代表，解放军政治学院地方干部大队的结业学员和部队干部大队的学员、中央政法干校的学员。

**6月27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五月八日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上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并批示，将中央宣传部五月八日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给中央的报告草稿连同毛泽东批示，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陆定一、周扬、吴冷西、陈伯达阅。

△ 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接见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全体工作人员和全体学员。

△ 下午，去机场迎接中央副秘书长优素福·阿吉托罗普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

**7月1日** 下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向全体



演出人员、观摩人员和首都部分文艺工作者作报告。报告强调“京剧一定要改革，非改革不可”。说：京剧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不要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服务。要为多数人，为广大工农兵群众服务，不要为旧社会的遗老、遗少、地富反坏右少数人服务。重点要演活人，演工农兵，演英雄人物，演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对敌斗争的现代戏。少演死人，少演帝王将相。要把革命的思想内容同京剧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谐地统一起来。战略上要坚信京剧一定能改好，战术上要重视，从剧本、导演、演唱以至于每一幕、每一场、每一个角色、每一句唱、每一个动作都要十分认真。保证京剧改革好，必须有两个前提：剧作者、导演、演员必须深入工农兵，和工农兵打成一片；京剧工作在思想上要革命化。

△ 晚，听取胡耀邦、胡克实〔1〕等汇报。在谈话中指出：要总结典型经验，从一两个工厂、社队、学校各找一个工作好的和工作差的典型组织，全面的经验就总结出来了。提拔年轻干部，要看大节。大节就是忠于无产阶级事业，忠于党的路线，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大节是根本。我看团中央的风是正的。生活作风是修养和锻炼问题，要在支部生活上引起注意。团的组织是共产主义学校，数量应该大一些。大革命时期，许多青年都是先入团，后入党。团组织要把介绍够条件的团员入党，看成是自己的责任。团的活动要加强，应该活跃起来，要在活动时间、人力、物力方面给共青团创造一些条件。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时期，苏联革命成功四十几年了，还会出现新生的复辟力量，认清这一点，你们的工作就更重要了。

7月2日 毛泽东就军事工作、战略问题召集周恩来、彭

---

〔1〕 胡克实，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真、贺龙、康生、杨成武等谈话，说：看了北京济南部队的尖子分队的表演，很好。要在全军中普及，光有尖子部队是不够的。要很快布置，要抓紧这个工作。战略问题，你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西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准备好了敌人可能不来，准备不好敌人就可能来。

7月3日 晚，会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纳赛。

7月4日 中午，去毛泽东处谈话。

△ 毛泽东将当天的《人民日报》关于北京市怀柔县一渡河党支部提拔新生力量的报道批示彭真、安子文、陆定一、罗瑞卿阅。并批示吴冷西：“要广泛采访、转载，在几年之内做到每县，每社，每个工厂、学校、机关都有报道，但要真实的，典型的。固步自封的反面材料，也要登一点。”

7月6日 中午，到毛泽东处谈话。

△ 将北京市的《文艺战线》第二十七期送毛泽东、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阅。该期刊物报道，北京市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们，分别去矿山、工地、农村深入生活，效果甚好。

7月7日 上午，会见法国驻华大使吕西恩·佩耶。

△ 下午，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八十次会议。贺龙、周扬、胡绳、林枫等列席会议。在会上传达说：毛主席最近抓了文艺、哲学、社会科学问题，认为文艺界“很混乱”，又批评有些协会已经跌到修正主义边缘，发展下去势必要搞“裴多菲俱乐部”；文化部不执行党的政策，不为工农兵服务，建国以来这条战线我们配备不恰当。毛主席甚至说，想把地方搞起来，革中央文化部和几个协会的命。还有学术界，首先是哲学，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论；还有高薪问题。在讲话中强调说：这些都是大的原则问题。过去书记处对意识形态的革

命没有很好抓。批评胡风，批评《红楼梦》研究、电影《武训传》等都是毛主席亲自抓的。意识形态问题都和培养接班人有联系，搞不好，子女后代都被夺过去了，将来要出“裴多菲俱乐部”，反革命复辟，所以书记处要好好地抓。会议决定：第一，按照毛泽东的提名，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五人小组，彭为组长，负责领导各有关方面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指示（后称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第二，公开批评杨献珍在哲学方面的观点；第三，将毛泽东六月二十七日关于文艺的批示和宋任穷《关于农村党支部培养接班人问题的报告》印发党的高级干部。

△ 晚，江青来家中谈话。

7月11日 在康生报送毛泽东、彭真、贺龙、罗瑞卿阅的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两位学员批判杨献珍的发言要点上批：书记处会议已决定，由高级党校写文章揭露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并在适当时期指名批评。

△ 晚，和贺龙等出席朝鲜驻华使馆为庆祝中朝友好条约签订三周年举行的宴会。

7月14日 将沙俄侵占中国领土示意图报送毛泽东，并批写：这是帝俄侵占中国一百五十四万平方公里领土的示意图和说明。斯大林时期占去的唐努乌梁海十七万平方公里不在内。帕米尔中部的一万平方公里也不在内。

△ 上午，去机场迎接周恩来和陈毅访问缅甸后回到北京。

△ 下午，出席首都各界群众在政协礼堂举行的庆祝空军部队第三次击落美制蒋介石集团U-2飞机的重大胜利的大会。

△ 晚，出席法国驻华大使吕西恩·佩耶为庆祝法国国庆

举行的宴会。

**7月15日** 下午，和周恩来、贺龙、陈毅、罗瑞卿、康生、伍修权、杨成武、吴冷西等到中南海颐年堂听毛泽东谈军事问题。毛泽东说：主要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战略问题，敌人从哪里来？第二个战略问题，就是要搞地方武装，有些省要搞一个兵工厂。攀枝花、酒泉两个钢铁基地一定要落实。如果材料不够，其他铁路不修，也要集中修一条成昆路。

**7月16日** 审阅同意发表《关于“合二而一”问题和杨献珍同志商榷》一文，批送吴冷西：“要赶快组织人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研究，并准备一系列的文章，直到大体的结论（先设想个大纲，随着争论发展充实），因为学术理论问题的争论文章靠临时赶不行。请准备。”

**7月17日** 下午，陪同毛泽东、周恩来等接见参加一九六四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全体演员、观摩人员，出席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课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和中央戏剧学院新疆班全体毕业学员。

△ 晚上，陪同毛泽东、周恩来等观看上海演出团演出的京剧现代戏《智取威虎山》。

**7月18日** 中午，打电话嘱项子明转告中共北京市委：据毛泽东最近讲话的精神，市委一要研究军事，二要抓理论。又说，《北京日报》不错，但缺乏政治，办报不要从技术上看，应看政治，有理论文章。《北京日报》不是办报人的报纸，是市委的机关报，市委不抓，可能出毛病。

**7月20日** 下午，和周恩来等出席首都人民纪念日内瓦协议签订十周年、支持越南人民反美爱国斗争的万人大会，中国亚非人民团结委员会副主席茅盾主持大会。

△ 下午，和周恩来、陆定一等会见越南保卫世界和平委

员会、越南亚非人民团结委员会代表团、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越南新闻工作者代表团。

**7月22日** 下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八十一次会议。会议讨论：（一）沿海渔民的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提出分三步整顿队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二）关于成立马列主义研究院问题。根据刘少奇提议和毛泽东、邓小平的赞成意见，会议决定：陈伯达任院长，胡乔木、周扬、胡绳任副院长，请安子文、罗瑞卿从军委系统推荐一名副院长，并由中组部提出干部任免名单。会议还议论了党报的一些倾向性问题。

**7月23日** 毛泽东阅读七月一日彭真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报告后，批示：“此件已阅，讲得很好。”彭的报告整理稿十八日曾送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及林默涵、陈伯达、江青等传阅，二十二日报送毛泽东。同年，《红旗》杂志第十四期刊登了这篇报告。

△ 下午，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接见再次击落美制蒋介石集团U-2飞机的空军某部全体指战员和三个有关会议的代表及全国总工会干部训练班学员。

△ 晚上，陪同毛泽东等观看北京京剧团演出的现代京剧《芦荡火种》。

**7月24日** 听取公安部党组工作汇报。在插话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公安战线也要讲清楚这个问题。

△ 将陈伯达对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和发展新技术提出的书面意见报送毛泽东。八月二日，毛泽东批示：“退彭真办。”陈伯达建议成立钢铁托拉斯和机械制造托拉斯。可先以大区为单位成立子公司，取得经验后再成立全国性的母公司。

**7月25日** 出席中共北京市委工作会议并讲话。讲话说：当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四清”、“五反”搞不彻底的主要原因有三条：一怕伤害干部，二怕犯一个指头的错误，三怕损害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批评干部的“四不清”是挽救干部，不是伤害干部；既要工作，出现一个指头问题是正常的，不能因噎废食；讲团结是有原则的，不应当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不敢进行斗争。要在坚持搞马列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而不是合二而一、和平共处，或者在为少数人、为贪污盗窃、“四不清”分子的小集团利益的基础上糊里糊涂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所有的同志都要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北京市的“四清”、“五反”，发动群众不是过火而是基本上不够，有的地方根本没有发动起来。要真正把工人包括店员、贫下中农、革命知识分子发动起来。领导干部必须深入基层蹲点。要从头到尾搞一两期“五反”、“四清”。讲话强调：按照毛泽东提出的标准培养和选拔接班人是百年大计。从中共中央到支部，从车间工段到连队，都要解决继承人问题。不然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没有组织保障。

△ 出席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传达六月十七日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在谈到国民经济计划时说：这几年按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农业六十条”调整比例关系，经济发展都大见效。一九五八年虽然干劲足，但实事求是不够，冷静不够，犯了点错误。我们取得了经验教训。我们有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又有了调整的经验，可以说认识比较全面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是鉴于苏联出现修正主义篡权的教训。在我国没有像苏联那样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复辟，但三年困难时期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有的地方还刮单干风。个别工厂、商店、农业社，资本主义复辟是

存在的。事实教育我们要防止出现修正主义。“四清”、“五反”是全民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文艺战线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情况复杂，需要大力整顿。为了保证在我国不出修正主义，保证子孙后代沿着马列主义正确道路继续前进，这次中央全会上，毛主席提出革命接班人要有五个条件，这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希望各党派朋友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过好关，努力学习、改造，跟党一条心走到底。

**7月28日** 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六月十五日来信的复信》。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复信。复信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主张召开经过充分准备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团结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坚决反对苏共中央召开分裂会议。中共中央决不参加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

**7月31日** 下午，和周恩来、陆定一等出席一九六四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闭幕式并讲话。讲话指出：现在，京剧系统的、全面的革命刚刚开始，所取得的还只是初步的胜利。京剧工作者要做彻底的革命派，深入工矿车间、农村生产队、解放军连队，了解工农兵的斗争，熟悉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创作为他们所喜爱的艺术作品。又说：戏曲改革中可能出现的反复和一个指头的缺点错误，但只要力戒骄傲，有一支具有坚决为工农兵服务的决心和彻底革命精神的队伍，京剧就会成为社会主义的、工农兵的京剧。

△ 和周恩来出席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首都高等院校毕业生（包括中专、高中毕业生和出国留学学生等）共五万多人参加的大会。周恩来作关于革命和劳动的报告。

△ 晚，和周恩来、李先念等出席首都各界群众为庆祝中

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七周年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的联欢晚会，并接见了参加晚会的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神枪手、神炮手、技术能手、革命军人家属和烈士家属以及北京市民兵的代表。

**8月1日** 上午，电话告中共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全国大学生中，党员只占百分之三点六，比北平解放时北大、清华秘密党员的比率还小，而超龄团员又非常多，说明组织上有关门主义倾向。班级里建立不起党支部，学校党的工作就没有依靠。”又说：“已和周恩来、邓小平商量过，把应届毕业的大学生集训个把月，讨论清世界观、政治路线和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后，发展一批党员；条件还不够而有人党要求的，把材料送给用人单位。”

△ 晚，周恩来来家中谈话。

△ 周恩来同意周扬《关于国庆期间演出大型歌舞“东方红”问题的请示报告》，并批示：朗诵词和歌词在确定后，需送彭真、陈毅、定一、康生四人最后审定。

**8月3日** 下午，和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纳赛、朝鲜驻华大使朴世昌。

**8月4日** 乘火车去北戴河。在八月下旬返回北京前，出席了在北戴河召开的一系列会议。

△ 和邓小平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讨论苏共中央七



月三十日的来信〔1〕。毛泽东说：赫鲁晓夫一触即跳。我们二十八日发出的信，他三十日就来信答复了，把文章做绝了。现在既没有中苏会谈可谈，也就没有什么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需要考虑了。因为他下命令开会，是下决心要分裂了。所以，我们只要对他的来信简单地答复就行了。

**8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八十二次会议。会议决定：“后十条”的修改由刘少奇主持；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城市（包括街道）的社会主义教育由薄一波负责起草指示，争取月底前完成，提交十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国庆节期间邀请外宾来华等问题。

**8月6日** 上午，和邓小平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毛泽东说：现在看来，赫鲁晓夫是决心要开分裂会议了。我们决不参加这样的会。关于要不要邀请左派各党来中国参加国庆十五周年庆祝活动一事，会议认为，在国庆的时候不宜大请左派，更不要开左派党的会，只请他们中的一些人来，也请苏联派代表来，只是惯常的外交礼节，只参加庆祝我们的国庆，不开会，也不争论。

△ 同林默涵谈京剧革命和思想批判工作。说：这次京剧现代戏汇演抓对了，证明了京剧是能演现代戏的，消除了马连良、裘盛戎、谭富英等老演员的顾虑。京剧现代戏，还是在幼年阶段，但是它是有生命力的。我们的责任，就是要继续促进

---

〔1〕 这是对中共中央七月二十八日复信的来信。来信说：苏共中央定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召开二十六国党筹备会议，二十六个党中任何一个党，在十二月十五日以前不派出自己的代表，筹备会议也要如期召开。还说：国际会议大约在一九六五年年中召开。

它成长起来。我们主要是抓方向，抓方针，抓创作，促进京剧工作者同工农兵结合。艺术上的问题，要靠京剧工作者自己去解决，只有他们不断地摸索，自然会得到解决。另一个是抓汇演，一年或者隔年汇演一次，几年搞下来，积累一批剧目，积累许多经验，京剧现代戏才能站得住脚。对当前的思想批判问题，根据苏联的教训和我们自己的问题，使我们认识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我们现在经济基础已经是社会主义的，文艺却落在后面。原因是我们的党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发展起来的，许多人缺乏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这些人并不是主观上反对革命，而是脱离实际，脱离工农群众，不知道社会主义是什么，因而不可能不讲错话，做错事。他们大部分属于好人做错事，同根本站在敌对立场的人有区别。有相当多的人对大跃进运动讲过错话，对大多数还是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与人为善，要看他几年来的表现。有些错误比较系统的要公开批判；同时，好的作品，好的干部也要介绍，要抓好坏两头的情况。文、史、哲、经方面都要搞出材料来。思想战线上的批判、斗争，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两个方面，你们自身也要抓两头，一方面比较系统地学马列主义理论，一方面下去同工农结合。自己说错了什么话，应该交代一下，大家才会心服。

**8月10日** 下午，同邓小平谈话。

**8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八十三次会议。会议讨论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关于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名单（草案）及其他事项。

**8月13日** 和邓小平等陪同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

**8月14日** 下午，同朱德、邓小平、陈伯达谈话。

**8月15日** 和邓小平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决定要起草一个简单的复信，答复苏共中央七月三十日的来信，谴责他们下令强行召开国际会议筹备会的做法。

**8月1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八十四次会议。会议听取罗瑞卿传达毛泽东关于国防问题的指示，并作出相应决定。

**8月19日** 下午，和邓小平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再次讨论并决定不参加苏共召集的二十六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筹备会议。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表示坚决反对苏共召开分裂的国际会议，中共决不参加他们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

**8月20日** 从北戴河回到北京。

**8月21日** 晚，出席罗马尼亚驻华使馆举行的庆祝罗马尼亚解放二十周年招待会。

**8月22日** 上午，接见比利时共产党（马列）党校教材编写代表团。谈话中指出：只要全世界资本主义没有完全消灭，就还存在阶级斗争。苏联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对我们很有教育意义，我们要不断防止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这种斗争可能进行一百年到几百年。

△ 和邓小平会见并宴请新西兰共产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默·威廉斯。

**8月23日** 下午，和毛泽东、邓小平等接见出席一九六四年北京科学讨论会的主席团成员和参加讨论会的全体中外科学家。

**8月24日** 上午，会见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穆罕默德·亚拉。

△ 上午，会见叙利亚驻华大使希拉勒·拉斯兰。

**8月25日** 在程子华关于立即组织基建、地质、勘探人员前去钢铁基地攀枝花开展工作的来信上批示：“建议赶快抓紧把大局调查、部署好，并用战斗精神多点动工，集中力量争取用最快的速度，首先修通铁路。”

△ 和邓小平会见并宴请中央政治局委员爱德华多·加列戈斯率领的委内瑞拉共产党代表团。二十九日去机场送委共代表团离京去越南访问。

**8月26日** 上午，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领导成员弗罗·罗素夫人。

**8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八十五次会议。会议决定由刘少奇主持召开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部署农村“四清”工作和讨论修改“后十条”（修正草案）；决定中央党政机关实行精简，抽人下去参加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中午十一时，到周恩来处谈话。

△ 晚，出席中共北京市委、市人委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首都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集训总结大会。在会上讲话勉励学生，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自觉地同工农兵打成一片，成为革命化、劳动化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 毛泽东批示将刘少奇、陈伯达推荐的河北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的“四清”报告（简称“桃园经验”）印发给即将召开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这个报告提出“四清”工作队下乡，先搞“扎根串联”，对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又依靠，又不依靠”。九月一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在批语中指出：报告是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但各地各大队情况不同，桃园大队的经验只能作为参考。

**8月29日—9月1日** 出席刘少奇主持的各中央局第一书

记会议。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即“后十条”修正草案）。九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印发全党。修正草案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提出有些地区要“认真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是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并且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强调“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可以依靠的依靠，不可以依靠的就不依靠”，等等。

**8月29日** 下午，毛泽东同李富春、薄一波、陈伯达谈计划工作问题。当李富春建议计委、经委合并时，毛泽东同意成立一个决策拍板机构，由毛泽东挂帅，有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彭真参加，六个经济口的负责人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谭震林、聂荣臻、罗瑞卿参加，再加上陈伯达共十二人组成。毛泽东说：搞经济，学会它，要花些时间。现在搞了十五年了，也应该可以做些总结了。

**9月1日** 上午，召集中共北京市委成员开会。

△ 在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讲话。认为刘少奇对农村社教集中打歼灭战的提议，抓到了根本的问题。有很多复杂问题，不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行。现在的斗争情况有三种：（一）有的生产队需要补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课，和平土改地区封建宗派还未打破。（二）原来革命搞透了的生产队，后来我们的干部被敌人拖下水变质了。（三）干部被敌人腐蚀利用，问题很多，但还没有完全蜕化。对情况的估计，还是毛主席讲的三分之一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对党的县委能不能依靠，也

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好的，和党一条心。这几年生产恢复得很好。如果所有干部都很坏，怎样解释好转得这样快？应同他们一起搞。第二种，是完全蜕化的。第三种，干部有问题，要“洗手洗澡”改过来后再依靠。党内阶级异己分子要清洗。斗争开始时打击面窄一点好，宽了不好办，而且要足够估计到农村宗派问题严重。处理慢一点，迟一点比较有把握。恐怕打击面百分之一也可能多了一点。总之，又要搞透，又不要打击面大了，关键在于充分发动群众。

**9月2日** 刘仁召集中共北京市县、区委书记开会。会议根据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精神，部署在通县集中兵力搞“四清”会战，计划全市抽调一万名干部（另加中央机关下乡“蹲点”干部），定于十月初冬麦下种后，陆续进村开展工作。刘仁和邓拓、陈克寒，余涤清〔1〕、贾星五各蹲一个大队作战。并成立“四清”总团部，由已参加过试点的赵凡负责，成立通县“四清”总党委，设办公室、政治部和出版《农村四清报》。

△ 晚，出席越南驻华使馆举办的越南国庆招待会。

**9月3日** 夜，刘仁、郑天翔等来家中商谈工作。

**9月3日—12日** 出席北京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十二日的全体会议上，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继续当选为北京市市长。

**9月4日** 下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三线建设问题。有关人员参加会议。

**9月5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调查组八月二十九日关于《北京大学党员领导干部队伍不纯的一些情况》及中宣部有关负责人批示“看来，北京大学硬是存在着夺印的问题”后，写

---

〔1〕 余涤清，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信给邓小平、康生及陆定一、张子意、张磐石〔1〕。信中指出：“大专学校的高级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党政领导干部的家庭成分和社会关系及个人经历是复杂的，参加革命以后的表现也是各不相同的。其中肯定有些坏人或资产阶级分子。也有些人，虽然是革命的，但又同资产阶级和反动家庭的思想、政治界限划不清楚，或者不能完全划清。”信中同意陆定一的意见，“将此件登《宣教动态增刊》”，并提议：（一）把北大的全部领导干部系统地研究一次，解剖一个麻雀，摸摸底，并解决北大的领导问题，取得典型经验。（二）由张磐石、庞达、刘仰峽〔2〕、徐子荣、宋硕〔3〕五同志组成一个小组，由磐石同志任组长（子意同志最好有时也参加一下）。主要任务是弄清北大干部的政治面貌。

△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八十六次会议。会议讨论并决定中央机关参加“四清”、“五反”运动的人员，到农村去的由中央组织部组织安排；到城市去的由工业交通政治部组织安排等事项。

9月7日 晚，召集刘仁、郑天翔等来家中开会。

9月8日 在冶金部关于三线建设的报告上批：（一）对三线建设的领导班子，要像大军南下时从地方领导干部中为新区抽调整套班子那样，由适当的老企业包干，限期建成。（二）要抓紧尽可能采用新技术和实行设备更新。

△ 去机场迎接参加罗马尼亚解放二十周年庆祝活动后回

---

〔1〕 张磐石，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2〕 庞达，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处副处长。刘仰峽，时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3〕 宋硕，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

国的李先念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

△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向出席北京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市政协三届二次会议委员，出席市工交、运输、基建、财贸系统五好集体、五好职工代表大会的全体人员以及市级机关和党、政、群、学等单位的领导干部作当前形势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的报告。

**9月9日** 去机场迎接日共中央总书记宫本显治一行。十日下午，参加刘少奇同宫本显治的会谈。

**9月11日** 下午，主持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讨论文艺界和学术界的整风问题。

**9月12日** 看望宋床龄。

△ 下午，会见苏丹驻华大使法赫尔·埃丁·穆罕默德。向他介绍我国经济建设情况，阐述我国对外援助和派出专家的原则。

△ 晚，主持召开第五届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加强社会主义建设。

**9月13日** 上午，陪同日共中央总书记宫本显治及其随行人员去杭州会见毛泽东。当晚，宫本显治等经广州回国。

**9月14日** 回北京后，将毛泽东关于邀请有关社会主义国家和亚洲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派代表团参加我国国庆活动的提议转告刘少奇、周恩来等。

**9月15日** 晚，约刘仁来家中谈话。

**9月16日** 召集中共北京市委成员开会。

**9月17日** 上午，同刘仁谈话。

**9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八十七次会议。会议讨论并决定有关国庆节期间接待外宾和《人民日报》、《红



旗》杂志发表社论等事项。

**9月23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讨论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整风问题。指出：去年十二月，毛主席对文艺工作批评，是写给我和刘仁同志的，半年内对意识形态的革命大喝几声。所以，我请少奇同志主持开了会，还攻了一下京剧演现代戏这一关。关于整风问题：第一，先整党内。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如果党内没有人搞修正主义，没有人代表资产阶级，党外的问题就容易解决。每一党员，不管你做什么工作，政治上只有一个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整个文化战线上的党员同志，都要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有错误，赶快改。第二，党内怎么搞法？不是把人一棍子打死。毛主席指示说：还是要进行教育。多数人是好的，或者是可以改好的，要准许人家革命。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第三，从何入手？从作品搞起。在一篇作品里，问题多得很，着重搞大是大非，就是两条道路、两个主义、两条路线，为工农兵还是为资产阶级。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要区别敌我性质和人民内部问题，错误是比较系统的、一贯的，还是偶然的、个别的。人民内部问题还是采取整风的形式。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总起来说，要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两种办法，一是自觉地学习毛泽东著作，破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立无产阶级思想；二是大家帮助。灭资产阶级思想需要有个过程，要经过痛苦的过程；要和风细雨，小会批判，不搞大会斗争。希望大家站在党的路线上，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完成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9月25日** 上午，同刘仁谈话。

**9月26日** 将准备在国庆十五周年典礼上的讲话稿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讲话稿中加写：“在这里，必须指出，我

们还有缺点、错误，还有困难。”“每年每月都有。原有的缺点、错误和困难克服了，新的缺点、错误和困难又会产生，要努力去克服。”“我们的同志和人民，永远不要骄傲，不要固步自封，不要自以为是”，“对外国，永远不要大国沙文主义，一定要尊重别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绝对不能干涉别国的内政，一定要平等相处”。“一切缺点、错误和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中外关系是一定可以遵照正路发展的。”二十九日晨，毛泽东修改后向彭真交待，再按加写的内容多写几句，阐述清楚。二十九日夜，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改写后，再报毛泽东审阅，并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赞成你的意见。”三十日凌晨二时三十分，毛泽东审阅定稿。

**9月27日** 上午，到机场迎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

△ 下午，和邓小平、贺龙等在机场迎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巴卢库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

**9月28日** 下午，和周恩来等到机场迎接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总理范文同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和扬·格奥尔基·毛雷尔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

**9月29日** 上午，会见波兰人民统一阵线全波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书记维托德·雅罗辛斯基率领的代表团。

△ 上午，会见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人民自由报》编辑委员会主席、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科莫钦·佐尔坦率领的代表团。

△ 上午，会见保加利亚代表团团长、对外友好与文化联络委员会中国部主席、人民代表迪米特尔·迪莫夫率领的代表团。

**9月30日** 上午，和周恩来等出席首都各界群众集会，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马里共和国总统莫迪博·凯塔和布拉柴维尔刚果共和国总统马桑巴——代巴。在大会上致开幕词：今天的大会，象征着我们四国人民的伟大团结，象征着亚非十七亿人民的伟大团结。我们的共同历史遭遇和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把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之间的友谊是建立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牢固基础上的。

△ 陪同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先后会见前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庆典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代表团、亚非国家政府代表团、各国友好代表团等。

△ 审阅《人民日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发表的社论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万岁！》

**10月1日** 上午，出席首都七十万人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举行的典礼并检阅游行队伍。在大会讲话中说：十五年来，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我们在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以后，就及时地在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深入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讲话强调：我们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指引下，迅速战胜了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农业战线今年将是我国历史上收成较高的一年，工业战线上，我国已经建立起强大的自力更生的体系，无论是建设规模、成套设备制造、产品的品种、质量、技术都实现了新的大跃进，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一个新的革命和建设的高潮正在全国范围内兴起。讲话用毛泽东加写的话说：

“在这里，必须指出，我们还有缺点、错误，还有困难。”“我们的同志和人民，永远不要骄傲，不要固步自封，不要自以为是”。“对外国，永远不要大国沙文主义，一定要尊重别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能干涉别国的内政，一定要平等相处。”“一切缺点、错误和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中外关系是一定可以遵照正路发展的。”讲话重申：中国人民将永远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团结旗帜，坚持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坚决反对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要危险的现代修正主义，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同全世界革命的人民一道，为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而斗争。

△ 晚，会见印度尼西亚巴厘省省长苏特雅和夫人。

△ 晚，登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同各国贵宾和首都人民共度国庆之夜。

**10月2日** 晚，会见浦部武夫率领的日本地方议员促进国际贸易联盟代表团。

**10月3日** 中午，去机场送乌兰夫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离京，参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庆祝活动。

△ 中午，在机场送匈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科莫钦·佐尔坦率领的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离京回国。

△ 下午，会见前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活动和进行友好访问的各国工会代表团。

△ 晚，邀请帮助我国建设的各国专家和在京的各国留学生、实习生，回国观光华侨，港澳同胞和我国各方面的代表人士，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国庆晚会，观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10月4日** 上午，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

府总理范文同及越南党政代表团。

**10月5日** 下午，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接见参加国庆观礼和在北京开会的各条战线的劳动模范、先进人物和少数民族的代表以及出席解放军空军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四好单位、五好战士代表会代表共二千五百多人。

△ 晚，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会见范文同和他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

**10月6日** 上午，会见塞内加尔非洲独立党左派巴巴卡·尼昂、萨尔·哈利卢。

△ 下午，会见波兰人民统一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书记维托德·雅罗辛斯基和他率领的代表团。七日上午，去机场送客人回国。

△ 晚，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为庆祝国庆举办的晚会，同驻京陆海空军、人民公安部队官兵一起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10月7日** 上午，会见澳大利亚澳中协会自费旅行团全体成员。

△ 下午，和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党中央副委员长、最高人民会议委员长崔庸健为团长，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党中央副委员长朴金喆为副团长的朝鲜党政代表团。

**10月8日** 下午，和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会见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扬·格奥尔基·毛雷尔为团长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九日，和周恩来去机场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回国。

△ 晚上，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观看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剧团演出的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10月9日** 下午，和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会见巴卢库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

**10月10日** 和胡耀邦等出席首都少先队员庆祝北京市建立少年先锋队十五周年大会。在听了少先队员的诗朗诵后，讲话称赞“红领巾”们立志做无产阶级儿女，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决心。会前，接见优秀少先队员和优秀辅导员的代表，并同他们谈话。

△ 晚，和黄炎培、陈叔通、程潜、林枫等接见前来北京参加国庆活动的少数民族参观团、少数民族青年学习参观团和新疆青年作者参观团的负责人，并同他们谈话。这三个参观团来自二十二个省、自治区，包括四十六个民族，共七百多人。

**10月上旬** 收阅李先念致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薄一波等的信。信中说：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原则同意古巴卡斯特罗总统提出的用古巴糖交换我国大米的要求。

**10月11日** 收阅周恩来致毛泽东、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彭真、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等的信，通告据张爱萍、刘西尧〔1〕从现场报告：有关首次原子弹起爆试验“现一切已准备好了”。十月十五日可能出现好的气象，已“同意来信所说一切布置，从十月十五日到二十日之间，由他们根据现场气象情况决定起爆日期、时间，并告我们”。

---

〔1〕 张爱萍，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刘西尧，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10月12日** 上午，同刘仁谈话。

△ 下午，同柯庆施谈话。

△ 晚，同谢富治谈话至次日凌晨。

**10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八十八次会议。会议讨论并同意李富春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对计划工作革命化问题的讨论意见和一九六五年国民经济建设纲要（草案）的汇报，待中央政治局常委审议后定案。周恩来出席会议，并就过几天试爆原子弹后的宣传和政治斗争问题作了报告。

△ 晚，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观看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歌舞剧一团演出的歌剧《江姐》。

**10月15日** 向刘仁、赵凡传达毛泽东的指示：通县地区工作队人数太多，势必发生包办代替，要防止发生“径流”。通县“四清”工作队共二万零二百人，每个队员平均联系六户。总团部为此决定调整部署，扩大运动试点地区，抽调四千二百名队员，另增加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下乡锻炼的一千二百名新队员，共五千四百人，到新开辟的地区，即顺义县六个公社、朝阳区两个公社和通县县城一百三十六个单位的街道居民中进行“四清”。调整后，平均每个队员联系九户。统称通县地区“四清”运动会战。

△ 下午，会见并宴请中央理事会总主席阿·卡里姆为团长的印度尼西亚新闻工作者协会代表团。

**10月16日** 上午，召集中共北京市委成员开会。晚十时，继续开会。

△ 下午五时，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创作和演出的三千多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周恩来当场宣布下午三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

△ 下午六时，和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会见以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哈瓦那省委员会组织书记伊西多罗·马尔米埃尔卡·佩奥里为团长的古巴党政代表团。

△ 苏联塔斯社宣布，苏共中央全体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分别于十月十四日、十月十五日举行会议，鉴于赫鲁晓夫“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任命柯西金为部长会议主席。

**10月17日** 上午，出席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一百二十七次会议（扩大），听取杨成武、乔冠华〔1〕有关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情况报告。周恩来出席会议并讲话。

**10月18日** 下午，同李先念谈话。

**10月中旬** 和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收阅李先念批送的外贸部《关于同东欧谈判原则的报告》。李先念在批语中说：形势正在变化，应当边走边看。外贸部这个报告，似可原则同意。但明年增长幅度还是可能大了些。在谈判中要具体掌握。

**10月21日** 审阅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提议从全国各大区抽调力量，组织较强的工作队，参加北京大学社教试点工作的报告和陆定一批写的“大搞一番，取得经验，训练干部”意见。批示：“同意系统地全面地深入地先搞一两个学校摸摸底，取得经验好分期分批普遍搞。”十一月中，从全国各省调集到北大的工作队员共一百七十多人。

---

〔1〕 乔冠华，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10月22日** 同陆平、张学书、彭珮云〔1〕及宋硕谈话。要他们到一两个系去了解情况，解剖麻雀。又告诫说：对干部队伍要有个基本估计，不然在社教运动中就会迷失方向。

△ 下午，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接见出席全军民兵政治工作会议的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学员、中央团校第十三期学员。

△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赫鲁晓夫下台及中共的对策。

△ 晚，约胡耀邦来家中谈话。

**10月23日** 在全军民兵政治工作会议上作报告。主要讲三个问题：（一）关于赫鲁晓夫下台问题。这是修正主义的削弱，有利于马列主义。现在苏联共产党正在发生变化，各种矛盾因素在进行斗争，局势要继续观察。总之，最后苏联修正主义一定要彻底失败。（二）我们的原子弹爆炸轰动了全世界。西方开始估计低了，现在估计越来越高，就是我们打破美国的核垄断。我们一定要有核武器，而且要有好的核武器，包括运载工具。但是，我们一定不要依赖这个东西。不要把我国的安全放在核武器上。真正打仗还是靠常规部队，靠野战军、地方武装、民兵。没有核武器，人家就拿这个东西吓唬你，所以我们要加快速度来搞。我们不但搞原子弹，而且要把氢弹搞出来，把火箭、导弹搞好，打破帝国主义的核垄断。（三）民兵问题。民兵要和野战军、地方武装一样，完全掌握在忠实于革命、忠实于工农兵、忠实于党的事业的人手里。民兵掌握在我们手里就是一支很大的力量。我们的目标、方针，就是不让一条枪掌握在坏人手里。如果没有全国的社会主义教育，“四

---

〔1〕 张学书、彭珮云，时均任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副书记。

清”、“五反”，划阶级，民兵情况就搞不清楚。民兵的干部要按照毛主席讲的接班人的五条标准选择；拿五条标准要求自己，也要拿五条标准选择干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好了，我们党不但在国际反修正主义斗争上取得了绝对胜利，在国内也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社会还会有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所以，阶级斗争还要进行几百年。

**10月27日** 下午，和主管国际、外交等方面的十余人列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赫鲁晓夫下台后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主动向苏共中央提出派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会议还讨论了十月十八日刘少奇写给毛泽东等的信〔1〕。毛泽东说：你（指刘少奇）提的问题，我看还是放一放。你看像信阳事件那样，都暴露出来了，一下子就搞彻底了。放一二年，问题都出来了。

△ 晚，会见即将回国的缅甸驻华大使吴貌貌觉温。

**10月28日** 听取公安部负责人汇报工作。

**10月29日** 上午，会见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议会党团督导卡利的夫人和肯尼亚内罗毕市首席督察官姆韦塔的夫人。

---

〔1〕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八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并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林彪。信中说：送上公安部和西北局两个文件，请看看。过去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搞得不深不透，坏干部和阶级敌人对贫农、下中农和积极分子打击报复，已经发生很多。现在应当立即由中央和省委派遣干部，组成巡回检查组，到那些已经发生打击贫下中农的地方去迅速处理。凡有比较严重的打击报复贫下中农和反攻倒算行为的党员干部，在调查确实后，一律撤职，开除党籍，情节严重者逮捕法办，个别民愤很大者判处死刑。不严厉处分这些坏人，不能团结群众的绝大多数。请主席召集常委同志就这个问题讨论一次是否可以？毛泽东阅后批示：“已看过。待各同志看完，即开会。”

△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建议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派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并决定由邓小平、彭真赴朝鲜，将此建议转告金日成。

**10月30日** 晨，和邓小平飞抵平壤。下午，和邓小平同金日成会谈。

**10月31日** 上午，和邓小平继续同金日成会谈。

△ 下午，和邓小平乘飞机回到北京。

**10月下旬** 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收阅李先念关于同意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撤销监事会和成立党的监察组的报告，及所附的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报告和代拟的中央批语。

**11月1日** 晚，陪同毛泽东和江青、刘少奇和王光美、董必武、朱德和康克清、周恩来、贺龙，同阿富汗国王查希尔和王后、马里总统凯塔和夫人，观看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演出的舞剧《祇国祭》。

△ 晚，列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邓小平汇报同金日成会谈的情况。会议还听取了周恩来就派党政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庆祝活动同各社会主义国家驻华大使、临时代办通气的情况汇报。

△ 收阅毛泽东对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宋养初十月二十四日关于有些设计单位开展了群众性的设计工作改革运动写给薄一波并李富春的信的批示：“彭真同志，请转谷牧同志：要在明年二月开全国设计会议之前，发动所有的设计院，都投入群众性的设计革命运动中去，充分讨论，畅所欲言。以三个月时间，可以得到很大成绩。请谷牧同志立即部署，并进行几次检查、督促，总结经验，是为至盼！”二日上午，谷牧即召集工交口、国防口的十九个部的负责人开会，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进行部署。二日当天，谷牧写会议报告给彭真并报毛泽东。报

告中说：我准备每两周对这项工作进行一次检查、督促。日常工作，由宋养初同志负责。八日，毛泽东在谷牧的报告上批示：“退彭真同志：请告谷牧，他的这个部署很好。”

**11月2日** 下午，出席首都各界人民欢迎阿富汗国王查希尔和王后的大会并讲话。讲话中赞扬阿富汗在最近举行的第二次不结盟国家会议上采取支持被压迫民族反帝斗争的正义立场，对会议的成功做出了积极贡献。指出：中阿两国的关系是牢固地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基础上的，是互相尊重、平等相待、互相支持的真诚友好的关系。我们两国的睦邻关系，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树立了一个良好的范例。

**11月3日** 上午，主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二十八次会议。会议决定刘少奇为全权代表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马里共和国友好条约》。

△ 下午四时，到毛泽东处谈话。

**11月4日** 去通县，听取“四清”总团部负责人赵凡的汇报。对工作团内部一些不同认识和做法，提出以下意见：（一）对有的分团愿意多留工作队员，不愿意适当减人问题说，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要防止工作队包办代替，不走群众路线。坚持不愿意减人的分团，可以让他们试验一下。但要把道理向他们说明。（二）总团部主张召开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会，向干部阐明党的政策，动员有缺点、错误的干部“洗手洗澡”，主动放包袱。针对有些分团和一部分中央部门下派的蹲点干部认为，这样做不合当前阶级斗争形势，有悖于“桃园经验”，说：只要不搞资本主义，不包庇地富反坏和四不清干部，做法上允许从实际出发，百花齐放。可以分团或大队为单位独立作战，总团部不给框框。（三）要掌握一条，不许耽误

生产。(四)在通县地区的厂矿企业,包括中央的和市属的,一律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1月5日 上午,和刘少奇、邓小平等去机场送周恩来及其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离京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庆典活动。

△ 代拟中共中央批语,向中央各部委各党组,并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转发吕正操最近两月在川黔、滇黔、成昆三条铁路线察看沿线重点工程后,向经委并中央所写的《关于开展群众性的设计工作革命运动的报告》。批语指出:“这个报告很好,附件也可供工交和其他部门参考。铁道部的主要领导同志和一些主要勘测设计人员,最近亲临现场工作和调查研究,发现了大量的重要问题。对过去经验教训作了初步总结,提出了系统的改进工作的意见。这是很可喜的现象。我们建国已经十五年了,工交各部门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和问题都不少,也应该鼓起革命精神,‘下楼出院’深入现场工作和蹲点,好好总结经验教训,抓住关键问题,加以解决,改进工作。”十三日,文件发出。

11月6日 晚,出席首都各界人士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集会,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四十七周年。

11月7日 晚,出席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为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七周年举行的招待会。在会上讲话说:苏联的历史证明,凡是背离十月革命道路的东西,最后一定为苏联人民所唾弃。过去如此,今后也将如此。中国人民对兄弟的苏联人民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欢欣鼓舞,并且真诚地期望,苏联人民在伟大十月革命的旗帜下,不断地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又指出:“这些年来,在我们两党、两国之间,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各党之间,出现了很大的分

歧。这种现象，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足为怪的。因为它是以国内国际阶级斗争为基础而产生的。中苏两国人民，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革命者，总是要团结的。历史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那些企图在我们两国人民之间以及各国人民之间制造分裂的人，只是历史上一些匆匆来去的过客。我们相信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遵循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原则，中苏两党、两国是能够团结起来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是能够团结起来的，全世界一切革命力量也是能够团结起来的，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纽带是世界上任何力量也折不断的。”

△ 晚，会见安哥拉临时政府前外长、人民联盟前总书记萨文比。在谈话中说：知识分子的唯一革命道路是到工农中去，参加实际斗争；真正的革命者只有在斗争中培养出来。

**11月8日** 中午，应邀和夫人张洁清到宋庆龄家中吃饭。

△ 晚，陪同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同金日成会谈，就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苏共新领导中谁是主要人物、苏共新领导今后的走向等问题交换意见。

**11月9日** 和刘少奇、邓小平听取李先念汇报一九六四年的粮食工作和今后外贸工作的一些考虑。

**11月10日** 上午，接见铃木彻众为首的日本各界青年代表团。

△ 晚，列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十一月九日在莫斯科同苏共领导人会谈的情况。鉴于苏方不是友好的表示，并不是向好的方面转变，毛泽东要邓小平起草给代表团的电报，表示这次会谈不发表任何东西，连新闻也不发表。电报次日发出。电报提出：坚决拒绝讨论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绝不参加苏方下

令在十二月召开的筹备会议。

**11月1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八十九次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团的领导权限的规定（草案）》。十三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发出试行。草案规定：“为了及时地正确地处理运动中发现的问题，保证运动取得彻底胜利，中央认为，有必要加重工作团的责任，把所在县的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交由工作团领导。”

**11月12日** 上午，接见副总编辑尼古拉·葛尔布为首的罗马尼亚《火花报》代表团。

△ 下午，接见联盟中央委员会书记西托·奥克塔维昂率领的罗马尼亚劳动青年联盟代表团。

△ 毛泽东阅中央军委十一月四日关于贯彻军委办公会议第七次扩大会议精神的情况报告后，批示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此件可一阅，这是一件大事。请你们注意军事，不要把它忘了。”

**11月14日** 下午，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前往机场，迎接周恩来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庆典后从莫斯科回到北京。随后，到人民大会堂听取周恩来汇报访苏情况。

**11月15日** 上午，约刘仁等北京市委领导谈话。

△ 下午，到刘少奇处谈话。

**11月16日** 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接见出席全国民兵政治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

**11月16日—30日** 出席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的农村面上工作座谈会。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听取汇报，并提出意见。

**11月16日** 和周恩来、邓小平同前往越南访问途经北京

的金日成会谈，介绍苏联新领导的情况。晚，陪同毛泽东会见金日成。

**11月19日** 中共北京市委学习刘少奇给江渭清的信〔1〕后，向中共中央和华北局报告检查右倾思想的情况。报告说：市委“没有吃透中央、主席的精神”，对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错综复杂甚至交织在一起，而敌我矛盾大量地以人民内部矛盾出现，以及两类矛盾互相转化，缺乏系统的认识，凭过去的经验来领导重新教育人、重新组织阶级队伍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具体表现在：（一）盲目地、不清醒地依靠县（区）委、依靠基层党委，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领导权主要交给他们，直到中央大区书记会议后，才明确工作队由市委直接领导，而不是由县委和市县双重领导。（二）错误地运用过去的经验，怕过火斗争，怕犯“左”的错误，怕出一个指头的毛病，怕有“后遗症”，甚至规定一些框框，束缚群众运动。（三）对城乡的“五反”，在群众尚未发动时，先强调实事求是，防“左”不反右，运动搞得不深不透。认为产生右倾思想的原因，一是如刘少奇所说，是犯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官

---

〔1〕 江渭清，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江苏省委第一书记。一九六四年九月八日，江渭清致信刘少奇并附他的一篇讲话稿。九月二十三日，刘少奇在复信中指出，江要各地、市、县委干部学习的一篇讲话，“基本上是教条主义的讲话”。原因在于“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和“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并认为中央各部门和省地县委的负责同志，程度不同地都有这个问题。强调要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参加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毛泽东认为刘的复信“写得很好”，略加修改，于同年十二月二十日以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一封信的指示》，发至全国县团级党委。



僚主义；二是对一九六三年以来社教运动的成绩估计高了，存在骄傲自满情绪。

**11月20日** 将清华大学建成原子反应堆及附设的零功率实验堆的报告送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并附言：“这是在总路线指导下，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产物，是大跃进的产物。”

**11月23日** 致电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由于日本佐藤政府对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无理地采取拒绝入境的措施”，代表团无法参加日共九大的开幕式表示祝贺。“现在，先将我党中央的贺电和我们代表团对大会的贺词发去。”二十五日上午，日共在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全体会议上宣读了中共中央的贺电和贺词，受到全场热烈的欢迎。由毛泽东主席签署的贺电说：“日本共产党和日本人民英勇地站在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前线，为亚洲和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日本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中共的贺词说：“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是绝不会让美帝国主义长期骑在自己的头上的。我们深信，日本人民一定能够把美帝国主义者从自己的国土上驱逐出去，一个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繁荣的新日本一定会出现。”

**11月25日** 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十二月间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召开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等问题和一九六五年国民经济计划。会议还讨论了陈毅拟出访印度尼西亚、缅甸等事宜。

**11月26日** 下午，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听取李富春、薄一波在西南三线攀枝花地区考察情况的汇报。

**11月28日** 上午，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常委会联席会议。会议决定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同时于十二月十二日在北京举行。

△ 下午，列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十一月二十六日收到的苏共中央的来信，针对信中重申的于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召开二十六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筹备会议一事，决定仍坚持中共的一贯立场，反对苏共违反协商一致的原则召开这样的会议。

△ 晚，观看话剧《矿山兄弟》。在幕间及演出后与剧作家、导演、演员交谈，认为这个戏写得不错，在戏里写技术革新这个题材不容易。还说：你们下去和矿工一起生活了，有了感受，很快就开花结果，说明你们有能力。你们隔一个时期再到矿上去，还可以再丰富戏里的正面人物，找矿上的同志帮助你们把台词再加加工。

**11月29日** 上午，和毛泽东等出席首都各界七十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集会，声讨美国和比利时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刚果（利）、屠杀刚果人民的罪行，支持刚果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在大会上致开会词说：美帝国主义是殖民主义的堡垒，是最反动的国际宪兵，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刚果人民的反帝爱国正义斗争不是孤立的，它获得了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支持。中国人民同非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起，坚决站在刚果人民一边，我们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支援刚果人民的斗争。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

**11月30日** 会见阿尔多·贝拉·恩利盖为首的古巴友好代表团。

△ 下午，到毛泽东处谈话。

△ 晚，出席中共北京市委全体会议。会议由郑天翔、赵凡<sup>〔1〕</sup>分别报告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情况，并进一步检查了右倾思想。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许多人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许多人脑子里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残余，革命意志衰退，甚至想用这种错误思想改造党，改造世界，如果不清理整顿不可能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甚至搞修正主义。还指出：通县的“四清”工作队的人数太多，容易包办代替，市委要负责任。农村的阶级斗争很复杂，敌我矛盾和干部蜕化变质一时难于分清，想一锄头挖出个金娃娃，不那么容易，要靠深入蹲点。对蜕化变质的干部，如能变过来，还要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检讨交待好的，真正决心改正，要允许人家革命。

**11月下旬** 和周恩来、邓小平等收阅李先念批送的外贸部《关于从香港中国银行贷款购置远洋货轮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对苏联及东欧之间贸易方针的报告》。

**12月1日** 审阅《人民日报》拟于三日发表的社论稿《祝贺日本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 下午，先后到刘少奇处、邓小平处谈话。

**12月2日** 解放军总政治部十二月二日编印的《政治工作简报》刊登《离职休养老干部的安置情况和问题》一文，反映离休干部政治思想尚未很好解决，住房多数未落实。毛泽东阅后批示：“刘、周、邓、彭、贺<sup>〔2〕</sup>阅，退毛。”当即批示：

---

〔1〕 这次会议上赵凡被补选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彭，指彭真。贺，指贺龙。

“请周荣鑫同志负责邀总政、总参、中组等有关同志商议解决。要从长远打算，将来还要陆续安置着眼。解决的原则是：既要使这些同志在政治生活和物质生活上各得其所，又要不很特殊，不脱离群众；至于财政开支多少倒还是次要的。所需预算可报富春或先念同志批。”

**12月5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国家计委《关于编制长期计划的程序问题》。周恩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四十六人出席会议。七日，国家计委提出书面报告，提出编制长期计划包括第三个五年计划和十五年设想。前者具体些，但仍是纲领式的；后者主要是遵循毛主席的思想，体现战略布局、农轻重方针、积累与消费的关系、自力更生和勤俭建国的方针以及技术革命的奋斗目标，并列出让有待进一步研究、落实的十六个方面，其中包括：财政收支分配和基本建设规模，投资分配，一、二、三线建设，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农业发展，轻工业和市场，国防工业建设，冶金、煤、电、铁路、公路、航运、邮电、机械等各业发展建设，外贸外援，劳动、工资、奖励，教育发展以及财政、计划、教育体制改革等，并提出工农生产的主要指标和四个现代化可能达到的程度。计划明年一二月份搞一些专题研究的长远计划简报中共中央；三四月份拟定纲要，五六月份送中央讨论。十一日，将计委的报告送毛泽东。十三日，毛泽东批示彭真：“这个程序问题写得还好。缺点是粗枝大叶，只见几根骨头，没有皮毛血肉。”

**12月7日** 写信给张启龙、徐子荣、龚子荣、李质忠〔1〕，请他们对有关机密文件加以检查，根据过去中央指示，

---

〔1〕 李质忠，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局长。

把一切应收回的中央领导同志讲话记录和其他文件收回；并检查有些机关泄露秘密文件的责任。

12月8日 晚，到周恩来处谈话。

12月9日 下午，到毛泽东处谈话。

12月10日 下午，到毛泽东处谈话。

12月11日 接周恩来信：“有关国务院副总理新名单，请酌，拟定次序如下：林彪、陈云、邓小平、贺龙、陈毅、柯庆施、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聂荣臻、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宋任穷、谢富治。”

12月12日 晚，到邓小平处谈话。

12月13日 收阅北京大学调查小组十一月二十九日第二次报告。报告反映从九月中以来，根据党员群众揭发学校中存在的阶级斗争问题，及从十一月份开始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阅后，先与陆定一电话磋商，随即致信陆定一：“最好把北大作一个重点，集中力量，彻底地系统地加以调查研究，以便取得在大学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经验教训。”“工作组要发动和团结一切党和非党的革命分子及其他可以团结的人，先对北大一切资产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对一切违反党的阶级路线、党的方针、政策等东西，包括思想、政治、组织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都放手地揭发批判（自然对于正面的东西，也应予以应有的注意），然后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使问题真正得到解决。一切反动的错误的东西如果不破，无产阶级的正确的东西，就不能立，立起来也不会稳固，必须有破有立，才能使运动获得全胜。”信中说：“如同意，请告北大工作队负责人，同时将信请康生、吴冷西、周扬核阅。”陆定一表示同意彭真的意见，并将彭的信登《宣教动态》增刊。

**12月15日—1965年1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批评前一阶段的运动领导对斗争性质不明确，搞人海战术，不走群众路线。会议原定十二月二十八日结束，因毛泽东和刘少奇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认识和做法上有分歧，会议一直进行到一九六五年一月。会议后期，毛泽东主持修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后通称为“二十三条”）。文件肯定：干部的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对有轻微四不清错误或问题虽多但交代好的，要尽可能早一点解放出来；工作队要逐步做到依靠群众、干部大多数，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对运动中某些“左”的偏向作了纠正。但是，文件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他们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甚至有在省和中央有关部门工作的”。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这个文件发至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党组和军委总政治部。

**12月1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周恩来准备向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稿。

△ 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访问苏联和中苏两党会谈的情况报告。

△ 将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案审查、预算、代表资格审查、民族、法案等五个委员会名单草案报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核阅。

**12月16日** 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会议听取陶铸和李井泉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发言。

△ 将全国政协常委会的工作报告稿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核阅。

**12月17日** 上午，主持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联席会议，协商下一届人大和政协会议主席团名单，和政协个别委员的增换、职务调整，决定两会开幕日期和议程。

△ 出席朱德主持的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三十六次会议。在会上就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开法、议程、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民族委员会、法案委员会、预算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和提案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委员名单等草案，作了说明；还对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作了说明。

△ 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会议听取宋任穷和刘澜涛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发言。

△ 将提交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讨论的国防委员会委员名单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核阅。

**12月18日** 出席刘少奇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向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交的政府工作报告稿的说明。会上，就即将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的议程等主要问题作了说明。

△ 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会会议。会议听取李雪峰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发言。

△ 将郑天翔、贾庭三《关于北京市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情况的汇报》核改后分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阅，并附说明：这是郑、贾两同志分别在两个工厂蹲点三个多月，另联系五个工厂所了解的情况，和关于改进基层领导的一些意见。“这七个厂原来都被认为是一类厂，现在一摸，情况都很严重，虽然程度不同。”又说：“这份报告很

值得看。”这个报告说：“主席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我们过去领会不深，现在看，北京市的工交建筑企业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拿主要企业来看，可能不止三分之一”，说明“我们去年领导‘五反’运动，高估了革命的力量，低估了敌情，犯了右倾错误”。

**12月19日** 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会会议。会议听取魏文伯〔1〕和谭震林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发言。毛泽东宣布会议停开几天，再开时再通知。

△ 将刘仁、郑天翔的来信及刘仁在市郊白庙工作队蹲点发动群众的工作报告送刘少奇，并在来信上注：这是刘仁同志口述由他的秘书代笔的一封信，因为他患急性肝炎，于十二月九日住院了。

**12月20日** 上午，出席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开幕式。会上被推选为会议主席团成员。

△ 上午，出席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预备会议。在会上被推选为会议主席团成员，并就会议的筹备工作和议程等作了说明。

△ 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问题。

**12月中旬** 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核阅李先念批送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迟兑现退赔期票的通知（代拟稿）》。

**12月21日** 下午，出席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式。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宋庆龄、邓小平、康生、郭沫若等担任大会执行主席。会议听取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

---

〔1〕 魏文伯，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



告。二十二日，出席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全体会议，听取周恩来继续作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12月23日** 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观看古巴国家芭蕾舞团的演出；并接见芭蕾舞团的团长、艺术指导、古巴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和古巴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团长等。

**12月24日** 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修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未定稿）》。

**12月25日** 上午，出席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扩大会议。在发言中解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精神。

△ 修改中央工作会议二十四日印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未定稿）》（即二稿，共十六条）。

**12月26日** 晚，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召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东北地区各省负责人开会，座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问题。

**12月27日** 下午，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宋庆龄、董必武等接见出席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的委员。

△ 下午，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宋庆龄、董必武等接见参加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的代表和中央民族学院新疆干部训练班的学员。

△ 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会议

听取朱德、陈伯达、董必武、陆定一、赛福鼎发言。这些发言主要谈如何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在陈伯达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在董必武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北京，我说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两个独立王国，你们去猜，我不讲了。

△ 批示在通县“四清”蹲点的邓拓：《四清报》的编者“对于一切正确的批评和建议，要接受；对于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批评，也要欢迎、研究，实事求是对待，并且接受和吸取其中正确合理的部分。我们领导上，千万不可自以为是。”

△ 晚九时，周恩来来家中谈话。

**12月28日** 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会议讨论会议纪要。在罗瑞卿、陈毅、谢富治发言后，毛泽东在讲话中批评了对于社教运动的性质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等提法，说：运动的名称就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晚，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召集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西南地区各省负责人开会，座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

**12月29日** 晚，和刘少奇、邓小平召集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西北地区各省区负责人开会，座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在讲城市划阶级问题时说：土改时，地主是明的，反动分子也是暴露的，现在“四不清”分子是隐蔽的，要靠调查研究，不能去逼，逼出来也不可靠，也可能逼不出来。

**12月30日** 出席刘少奇主持的最高国务会议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讨论国家领导人、政协正副主席、常务委员候选人名单。在会上作了发言。刘少奇就国际国内形势、社会主义教

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等问题作了讲话。

△ 晚，出席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扩大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国家主席、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名单。在会上对名单草案作了说明。

## 1965年 六十三岁

1月1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召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华北地区各省区负责人开会，座谈“四清”和“五反”问题。

1月2日 晚，出席古巴驻华大使皮诺·桑托斯为庆祝古巴解放六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1月3日 下午，出席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会上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当选为副主席，朱德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刘伯承、李井泉、康生、郭沫若、何香凝、黄炎培、陈叔通、李雪峰、徐向前、杨明轩、程潜、赛福鼎、林枫、刘宁一、张治中、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 晚，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批评前一阶段社教运动没有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搞神秘化。说：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

1月4日 下午，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宋庆龄等出席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大会通过《关于政府工作报告、一九六五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一九六五年国家预算初步安排的决议》；通过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选。林彪、陈云、邓小平、贺龙、陈毅、柯庆施、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聂荣臻、薄一波、

陆定一、罗瑞卿、陶铸、谢富治为国务院副总理。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罗瑞卿、程潜、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月5日** 出席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闭幕会。在大会讲话中说：目前我们要集中力量开展城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希望大家以正确的态度来对待运动，下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讲到团结和改造问题时说：发展和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策没有变，“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也没有变。所以要讲团结，就是因为有矛盾，有不同意见。经过批评和斗争，不同的意见统一了，也就团结了。矛盾不断产生，不断解决，这就是运动的规律。每一个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者，就要自觉地认识这个规律，在革命斗争中改造自己，使自己的思想尽可能地符合必然规律，才谈得上有自由，才能从被迫到自觉，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世界。厌倦改造，“凑合”调和，放松改造，拒绝改造，到头来还是得被必然性鞭子赶着前进，或被前进的历史车轮压成粉末。我们欢迎大家讲话，要造成一个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 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毛泽东再次重申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运动首先是依靠群众，再就是依靠放了包袱的大多数干部，第三才是依靠工作队；现在的问题是工作队的人数很多，按兵不动、人海战术。

△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去邓小平处谈话。

**1月6日** 下午，得悉通县乔各庄工作队主张镇压一个双目失明的恶霸，即要万里转告赵凡：一、“四清”运动中现在

一个也不要杀；二、杀人要把材料核实，报市委认真讨论后，再报中央批准；三、用不着以杀人来发动群众，用不着用杀人来吓干部。

1月8日上午，和邓小平、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进一步修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将文件由十七条扩展为二十三条。毛泽东在审阅修改文稿时，加写和改写了以下内容：（一）在界定社教运动的性质时写道：“这两种提法，不说是社会里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党内外矛盾交叉。从字面，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能用；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二）在回溯一九四九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早已提出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后，毛泽东又加写了一句：“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走到斜路上去。”（三）宣布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通称四清运动，取消‘五反’的名称”，内容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包括讲形势讲思想和工作方法，建立贫下中农协会等。（四）关于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标准，毛泽东重申一九六四年六月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的六条标

准〔1〕，并写入文件。

**1月11日** 和邓小平召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十日的修改稿。

**1月13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召集的党内生活会议。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刘少奇发生意见分歧，朱德、贺龙等曾找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刘因此召集党内生活会。参加会议的还有周恩来、邓小平、贺龙、陈毅、罗瑞卿、陈伯达、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谢富治、王任重、魏文伯、李葆华、谭启龙等。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主动找毛泽东谈话，作自我批评。

**1月14日** 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会议通过毛泽东最后审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中共中央印发这个文件的通知中说：“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二十三条”提出：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

---

〔1〕 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六月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搞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六条标准是：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二、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解决了，还是没有解决。三、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四、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建立起来了，还是没有建立起来。五、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就地改造。六、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

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规定：今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称“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1月1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九十一次会议。会议讨论大专院校和工厂社教工作的经验以及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等事项。在会上说：学生主要任务是学习，有什么问题可以向上反映；不能不上课，凭革命情绪乱斗一通；市委工作队不应一进去就把学校党委甩到一边。还说：编《毛泽东选集》的班子，要找一些有理论基础、有前途的人带徒弟，不能老是这几个人。身体不好的同志，参加社教不要勉强去蹲点。党史是否应统一修，防止有的人借编地方党史吹自己。

△ 在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四届二次会议和全国学生第十八届代表会议上作报告。指出：反动势力总是由强变弱，由大变，直至最后灭亡；革命势力总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后打倒敌人取得胜利。因此，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必败，现代修正主义必败，革命必胜。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规律。看问题要全面、客观，要看本质。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我国绝大多数人的共同要求，是现代中国唯一正确、唯一光明的道路。

**1月17日** 下午，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接见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后勤工作会议、全军干部工作会议、公安部队政治工作会议的人员，出席中华全国学生第十八届代表会议、中国农业银行等十个全国性会议的人员。同时接见击落美机有功人员和战士演出队人员。

△ 晚，在家里同李富春、李先念谈话。

**1月19日** 将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当前城乡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分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并报告：最近在社队、工厂、大中学校都发生乱斗和打人等情况，中学已经煞了一下。社队和工厂也已通知工作队和领导干部尽快制止，总结经验教训。干部思想现在很混乱。

△ 晚，到毛泽东处谈话。

1月20日 晨，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当面请示当前社教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信中提出的问题是：（一）怎样纠正一些工作队把社队、厂、校干部扔在一边的做法，比较自然地转入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要既保持和鼓舞工人、贫下中农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士气，又使干部大多数或者首先使较多的人积极起来，同工作队合作搞“四清”，并且使工作队保持社会主义革命的干劲，至少使绝大多数如此。（二）怎样解决工段主任、班组长和工人群众的关系。我想主要是说服教育他们，主动改正错误、缺点，即釜底抽薪。这样可能做到既解决或者基本解决群众的问题，开始改变干部作风，而又不致打击面过宽。（三）在知识分子中开展“四清”运动，只搞大是大非问题，即他们在两条道路斗争中的表现，一般不搞成分、出身、历史问题，不搞生活细节，不追男女关系（在社队企业也一样）。有些小是小非问题，如果需要清理一下，可以让他们在相互交谈中或者在适当的小会上自己解决，不能作为“四清”运动的主题。（四）把目前已经冒头和正在蔓延的浮动、乱斗争情绪导入正路，或者先把它停下来。有的要集中精力搞生产、教学、建设，有的要总结经验教训后，继续搞“四清”。（五）把通县大兵团搞“四清”的问题解决后，拟用少数工作队在别的县如顺义，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实行三结合，搞新的“四清”试点县。因为要从各工作队抽调干部，可能要一二月后才能开始。（六）农村划阶级和建阶级

档案问题。信中又说：“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先打通中央和市委在北京蹲点的工作同志们的思想，统一认识。”

△ 下午至晚上，到毛泽东处谈话，研究当前社教工作的几个问题。毛泽东提出要把“二十三条”用大字印成布告贴出去，使大家有所遵循。

1月21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向在京的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副部长级以上干部九百九十多人作关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些问题的报告。报告遵照中央下发的“二十三条”及二十日晚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讲了七个问题。（一）按照“二十三条”精神，总结经验，把“学校、工厂、农村发生了一些乱斗的现象”这股风煞住。（二）要依靠群众大多数，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三）大、中学校现在要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不要让那些枝节问题，无原则问题，冲淡、干扰、转移斗争目标。（四）工厂“四清”也是抓大是大非。工段长、班组长，数量很大，有的作风不民主，对工人态度不好，不参加劳动或有点贪污。他们大多数是从工人中提拔起来的，群众一起来，首当其冲的是他们。如果一棍子把他们打下去，在厂里依靠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就落空了。要采取正面说服教育，让他们主动改正缺点错误，有些可以退赔。对贪污盗窃集团和坚持不改的把头，另当别论。（五）农村首先要把“二十三条”发到支部。昨晚毛主席指示，要用大字印成布告，贴出去，使大家有所遵循。工作队的缺点是把原来的社队干部扔在一边（李先念插话：一脚踢开），甚至混淆两类矛盾，捆人打人；再就是近两万工作队干部集中到通县，平均每人联系几户，这个布局就是包办代替，繁琐哲学。这不是表示我们领导能力强，而是领导能力弱。不论是哪个工作队的问题，我们领导都有责任。对原有的干部，从县委到生

产队，凡是斗错了的，我代表所有工作队来赔不是，你们可以转达，我们负责。但是，有的干部自己有什么毛病，要“洗手洗澡”，可以到一定范围的群众中检讨自己的“四不清”。这样，既给贫下中农撑了腰，也就团结了多数干部，达到教育的目的。（六）划阶级问题。农村划两头：一头是贫下中农，一头是漏划的地主、富农。工厂里划一头，主要是把过去的地主、富农分子和国民党反动骨干分子划出来，分清阶级阵线，区别对待。知识分子主要看表现，不划阶级。（七）抓紧生产建设。大会由李富春主持。

△ 经毛泽东同意，以布告形式印发“二十三条”。并连夜通知各中央局办公厅，由北京统一制造纸型。

△ 在阅读《北京日报》编印的《情况和问题》时得知：北京拉锁厂个别厂领导在封装参加全国评比的样品时弄虚作假，并对兄弟厂技术保密，受到工人的抵制。批示：“这个厂的工人同志很好，但有些干部的风格表现是资本家的作风，看不出有共产主义气味，应在报上公开指名批评，以教育干部，并且准备等改好了以后，再表扬他们改正后的新作风。”

**1月23日** 将杨勇、万里、武竞天〔1〕等署名的北京地下铁道建设规划报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贺龙和罗瑞卿核阅。并说明这个方案是和李富春、杨成武共同议定的。二月四日，毛泽东批：“杨勇同志：你是委员会的统帅。希望你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失败。随时注意改正。是为至盼！”

---

〔1〕 杨勇，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北京地下铁道领导小组组长。万里，时兼任北京地下铁道领导小组副组长。武竞天，时兼任北京地下铁道领导小组副组长。

△ 在国际饭店向参加中共北京市委扩大会议的干部作报告。报告对当前两条道路的斗争、北京市党的干部状况及通县地区“四清”工作队的工作，作了基本的估价，强调一切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干部团结起来，改正缺点错误，认真贯彻“二十三条”，做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生产两不误。报告指出：这次运动紧紧抓住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这是决定全面的问题。党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不这样估计，运动中也会迷失方向的。北京市今年粮、棉征购比哪一年都完成得快，说明依靠大多数群众和大多数干部，不仅作为理论、而且作为方针也是有根据的。对工作队的工作，应肯定成绩是主要的。他们发现了许多问题，解决了一些问题，煞住了一些歪风，但是把干部扔在一边，没有搞三结合，斗错了一些干部。对被斗的干部，我代表所有的工作队赔个不是，因为我们没有领导好，或者有些规定不完全妥当。要求大家以党的“二十三条”为准，分头总结经验教训，改正缺点错误。

1月24日 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听取余秋里汇报中长期计划的一些设想。

△ 晚，在国际饭店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试点的通县、顺义、大兴和朝阳等几位县区委书记谈话。指出：建国以来，我们对干部和人民群众缺乏系统的社会主义教育，大家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思想准备。经济困难时期，很多干部犯有或大或小的“四不清”错误，有的慢慢变坏了。“四清”运动是教育干部、群众的形式，你们要利用这个好机会，提高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觉悟。对有“四不清”的干部，要反复动员他们，“洗手洗澡”，检讨退赔，放下包袱，和大家一条心走社会主义道路。

**1月25日** 向参加通县、顺义、大兴和朝阳等县区进行社教试点的十一万三千干部和工作队员发表广播讲话，宣讲“二十三条”的精神。在讲话中公开检讨说：干部犯错误，我们应该分担一部分责任，因为我们多年没有认真地搞社会主义教育。“我是市委第一书记，我首先向同志们作检讨”。讲话说：由于搞“四清”运动还没有系统的经验，错误在所难免。不管中央派下来的干部，市里派下来的干部，县、社的干部，不管是谁，有错都得改。硬把错误说成正确，不仅是思想方法不对，党性也有问题。对于一切犯错误的干部，都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与人为善，准许人家革命。对确有“四不清”错误而不肯改的干部，批评斗争是为了帮助他改正错误。并对运动中被怀疑、被斗争的干部说：事物是可以转化的，事实弄清，怀疑解除，应积极起来参加运动；有错误检讨、交代、改正了，就可以从斗争对象转到大多数群众方面来；被斗错了的，要澄清事实，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告诫所有的干部和群众，都不许打人，都不许搞体罚。讲话最后强调：春耕季节快到了，所有的社队干部，工作队，务必抓紧领导生产运动。试点地区，社教运动和生产两不误；面上，中心工作是生产。

△ 下午，到毛泽东处谈话。

**1月26日** 在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四届二次会议和全国十八届学生代表会议上作报告。报告列举事实，启发大家从事物本质去观察和认识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必败，革命必胜的必然规律。对社教运动中揭露个别单位的严重“四不清”问题，要加以分析，不能认为所有的单位都那么黑暗，绝大多数干部还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在阐明党的重在表现的政策时说：对知识分子，不能单纯看他们的出身，而要

看重在表现。过去讲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二十三条”改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就是把地主、富农子女列入团结的对象。“党对待知识分子，对待所有出身于其他阶级的人，都是重在表现”。希望所有青年，不管成分、出身、经历如何，都要根据社会发展规律，根据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来选择自己的方向，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工农兵结合，只要跟党走，就不会迷失方向，就有光明的前途。

△ 和周恩来等出席首都各界一万多人的集会，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特派的由第一副总理兼外长苏班德里约率领的代表团。致欢迎词说：“为了唤起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操纵联合国，苏加诺总统宣布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苏加诺总统的这个决定，使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坐卧不安，但是，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都拍手称快，连声叫好。因为真理和正义是在坚持反帝反殖斗争的印度尼西亚人民这一边。”

1月27日 下午，到毛泽东处谈话。

△ 晚，和周恩来等出席印尼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告别宴会。

1月29日 中午，到毛泽东处谈话。

△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政治局会议今后的工作方法、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尼·柯西金即将来华（访问越南路过北京）会谈和接待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访华代表团等问题。

△ 就通县“四清”工作队队员戚本禹一月二十七日寄来的检讨信，复信戚本禹。复信中说：“我们对一切问题都实事求是，是就是，非就非，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不能正确地解决。”并将戚的来信及复信抄送郑天翔、赵凡、万里阅。上年十二月

二日，《农村四清报》刊登在通县蹲点的刘仁，启发贫下中农消除顾虑积极参加斗争的谈话；同时，《农村四清报》针对不少工作队不发动群众“包打天下”的做法，批评这是“包青天思想”，有悖于党的群众路线。戚本禹为此向中央办公厅《情况简报》编辑组反映，说这是“对桃园、小站那样革命的做法看不惯”，而刘仁启发群众的谈话，则是“当官做老爷惯了”的人，“又放不下架子”的表现。中共中央发布“二十三条”后，陈伯达要戚本禹向彭真作检讨。戚在信中称彭真是“自己（的）亲人”，承认自己“毛病缺点很多”，“要在运动中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

△ 将程子华、徐驰关于《最近时期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情况的报告》报送毛泽东。并告：现在这个三线地区建设有专人负责了。铁道方面、冶金方面也有专人负责了。在冶金方面，现在要迅速确定攀枝花钢铁企业的建设和建成后的主要领导干部。计委、经委正在协商中。

△ 为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党组关于“四清”运动中涉及侦察工作问题的请示报告代拟批语：“中央认为所提意见是对的，请你们注意。对敌斗争的侦察手段，是绝对不准用于党内的。”

**1月31日** 将反映通县试点地区四级干部会掀起放包袱高潮的一份简报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阅。

**1月底** 和周恩来、邓小平、薄一波收阅李先念关于外汇问题的来信。信中说：外贸部党组报告中提到的人民币十元以上才换一美元和一个卢布，这样的出口可以停止。我看不行。理由是国际市场有需要，特别是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一旦停止出口，国内工业不好安排，算总账并不是如此。因此仍要出口。信中还说：同意报告提到的国内统一价格

今年继续办的意见。

**2月3日** 和邓小平等去机场迎接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全国领导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率领的代表团。四日晚，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会见并宴请代表团。九日，代表团离开北京时，和邓小平到机场送行。

**2月5日** 在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四清”工作座谈会上讲话。说：社教工作队下乡四个月，由于前一段工作中发生了乱斗干部的偏向，使工作队、社队干部和群众间出现“顶牛”现象。深入宣传“二十三条”后，矛盾缓解，犯错误的干部，正在检讨、退赔。下一段工作是工作队、社队干部、贫下中农分头开会，重点放在逐步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这一点上，把多数有经验的社队干部解放出来，逐步建立好的领导核心，加强党组织的建设。选干部，一是政治好，一是要能领导生产。

△ 下午，和周恩来等到毛泽东处开会，研究当晚周恩来同去越南访问路过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会谈等事宜。

**2月6日** 下午，到刘少奇处开会。

**2月7日** 下午，和周恩来等到毛泽东处开会。

**2月8日** 下午，和周恩来等到毛泽东处开会。

**2月10日** 主持为支援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一百五十万人集会，并发表大会讲话。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于美帝国主义轰炸和扫射越南民主共和国城乡的罪行，绝对不能置之不理。全中国人民一定要在一切战线上加紧努力、加强准备，来支持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打退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席大会。



△ 遵照刘少奇一月二十日指示，派人去天津、上海听取有关企业的工人积极分子、班组、厂级领导和市委的意见后，对中共中央《关于正确处理工业交通企业中班组长同工人关系问题的通知（修改稿）》再次作修改，于今日报送毛泽东、刘少奇等。十三日，毛泽东批示：“同意，照发。”并在通知中加写：“团结大多数（包括车间级、工厂级及其以上）干部，只整那些顽固不化的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极少数人。”十六日，中共中央将《关于正确处理工业交通企业中班组长同工人关系问题的通知》发至企业党委和工作队。

**2月11日** 上午，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会见访问越南后途经北京回国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他率领的代表团。

**2月13日** 致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请示：与罗瑞卿、安子文商后，拟商调萧望东、赵辛初〔1〕等到文化部任副部长，石西民已到职，任文化部副部长。

△ 主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会议通过八位副秘书长的分工，由第一副秘书长武新宇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主任，其余七位副秘书长均任办公厅副主任。

**2月14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李先念关于国内市场情况的报告、李富春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薄一波关于经济建设的报告和罗瑞卿关于军事工业建设的报告。

△ 致信刘少奇，报告在北京大学“四清”运动中，中央宣传部派出的工作组和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部长“意见不一

---

〔1〕 萧望东，时任南京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赵辛初，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

致”，并附一九六四年八月中宣部调查组根据人事档案整理的校系主要干部家庭成分和个人出身的材料《北京大学党员领导干部队伍不纯的一些情况》，和八月三十日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的批示：“看来，北大硬是存在‘夺印’问题。”信中说校内“现在分歧很大”。

**2月15日** 请刘少奇、邓小平、李富春等核阅《关于工会工作的几点意见》。意见提出：（一）拟先把劳保条例好好研究一下，根据过去和“四清”运动中的经验，同有关单位商议提出修改草案。（二）全总可以多些领导同志下去蹲点，以取得新的基层工作经验，再讨论和通盘解决有人提出的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有关“四清”运动的问题，按“二十三条”办。

△ 晚，和周恩来出席苏联驻华大使馆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五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 晚，召集郑天翔、吴冷西、许立群等开会。

**2月16日** 为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接收不要预备期党员问题的请示报告》代拟批语：“现将中央组织部关于在‘四清’运动中吸收新党员预备期问题的意见发给你们。在农村集体化和‘四清’运动中，经过考查确实优秀可靠的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吸收入党时，可以由工作队党委决定，经分团委或者县委批准，缩短或者不要预备期。”

**2月17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主持召开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研究文化部门当前的社教运动。讲话强调：要以中央“二十三条”的精神统一认识，明确社教运动的性质，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总结经验。北大工作队也要总结经验，研究今后怎么做；不要顶在过去的一些事情上，紧张空气要放松一下。会后，陆定一即向北大工作队作了传达。

△ 晚，和夫人张洁清陪同刘少奇夫妇、周恩来夫妇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尼雷尔和夫人。

2月18日 上午，遵照周恩来的建议，和邓小平、薄一波、李富春、李先念及余秋里等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为加强对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领导，中央决定成立中共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撤销攀枝花基本建设筹备小组，由李井泉任委员会主任，程子华、阎秀峰为副主任，其他委员人选，由西南局提出，报中央批准。

△ 在“四清”工作团通县分团书记会议上讲话。指出：深入贯彻“二十三条”后，在解决干部“四不清”的问题上，工作有很大进展。很多有错误的干部，交代了问题，作了退赔计划，放下了包袱。只有个别单位的支部书记，因民愤很大，还未解放。我们既不能扭住不放，又不许马虎草率，不然还要返工。有了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就可以对付处于少数的地、富、反、坏分子和性质严重的“四不清”干部。斗争的策略就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对待少数人的政策界限是：土改时漏划的地主，要区别对待。表现好的，可以不戴帽子；有民愤、近几年有反革命活动、搞资本主义者，可以戴帽子。反动富农是指最近几年还进行反革命活动的，面不宜宽。定反革命分子者，他的财产是否没收，要依据法律规定。有贪污盗窃、性质严重的干部，如交代好，退赔好，也可以不戴贪污盗窃分子的帽子。告诫工作队的干部说：务必做到生产、“四清”两不误，春季搞不好，不但是今年一年，明年的生活也有困难；同时要把好的党支部建立起来，它可以领导生产，领导贫协，领导各方面的工作，不然，工作队不能脱身。

**2月20日** 上午，出席中国和坦桑尼亚两国友好条约的签字仪式。下午，在欢迎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庆祝中坦两国签订友好条约的首都万人大会上讲话。指出：坦桑尼亚人民的胜利斗争在非洲反帝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为东非民族解放运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坦桑尼亚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这一正义行动。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大会。晚，出席尼雷尔总统和夫人举行的答谢宴会。二十二日上午，尼雷尔总统离京前往南京访问，和周恩来等到机场送行。

**2月21日** 电话告刘澜涛：邓小平和我的意见，陕西省贫协主席，以张德生担任为好，张病期间，可由胡耀邦〔1〕代理。

**2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九十二次会议。会议听取谷牧汇报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和政治工作会议，讨论《一九六五年工业交通工作要点》（修改稿）和《一九六五年工业交通政治工作要点》（修改稿）。会议还讨论了在企业开展一次反对资本主义经营思想作风等问题。发言指出：“四清”还是搞大是大非，内容不要多了。在浮夸风的影响下，前几年差不多的企业都留有后手，搞“小钱柜”。有的是属于必要的储备，这部分可批准它，使之合法化，上了账，以后不得再搞两本账。党内不能一杠子打一批。过去处理过的，没有新问题，就不要再扯。设计革命是设计部门“四清”的主要内容。赞成邓小平提出的，“四清”后，企业要尽快转到生产、企业管理和技术革命方面来。要求党组织把干部、工人的积极性鼓起来。

△ 下午，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接见出席海军干

---

〔1〕 胡耀邦，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

部工作会议、《解放军报》编辑记者会议的人员和第三批战士演出队。同时，还接见了出席工交、财贸、农林、工会等专业会议的代表。

**2月23日** 午后，到毛泽东处谈话。

△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主持召开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讨论文艺界整风问题。

**2月24日** 同意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的方案，提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核阅。中宣部的报告说：根据毛泽东指示，文化部开展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半年来，部长一级的批判已告一段落，经与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商洽，拟调萧望东为文化部第一副部长、中共党组书记，石西民为副部长、党组副书记，赵辛初为副部长、党组成员，颜金生〔1〕为副部长、党组成员兼政治部主任，刘白羽〔2〕兼副部长、党组成员。免去齐燕铭的副部长、党组书记，夏衍的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的职务。四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

**2月27日** 在北京军区党代表大会上作形势报告。报告对正在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指出：“二十三条”是长期经验的总结，是比较完备的。运动的发展，就是重新教育人，重新组织革命队伍。用教育的方法解决“四不清”问题。我们的干部犯严重错误的只是少数。现在政策路线明确，只整极少数顽固不化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多数人经过教育改了就行。关于备战问题，说：军事上要准备打仗。帝国主义花那么多军费，是准备打仗的。但战争的決定因素是人，武器中決定

---

〔1〕 颜金生，时任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

〔2〕 刘白羽，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

因素还是常规武器。原子弹、导弹我们也搞，但是，不要把信心建筑在原子弹上，那会吃亏的。我们要建筑在六亿五千万人民的革命斗志上，要一、二、三线全面布置，准备好了就好办了。京津是重要地区，首脑机关在这里，要做好准备，包括地方武装和民兵都要争取时间抓好。

△ 下午，到毛泽东处开会。

**2月28日** 中午，到刘少奇处谈话。

△ 下午，到毛泽东处开会。

**3月1日** 参加周恩来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还有杨成武、吴冷西等）到河内，同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劳动党中央代表团（成员有黎笋、范文同、范雄、武元甲等）会谈。周恩来在会谈中说：对苏共新领导，我们认为不能只看一次，而要多看一看。经过这几个月，现在看得很清楚了。苏共新领导执行的就是赫鲁晓夫主义，根本不可能改变。二日，代表团回到北京。

△ 在赴越南行前，将陆平、彭珮云一月二十三日在中共北京市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稿和持不同看法的工作队副队长二月九日在北大工作队党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稿一并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阅。陆平和彭珮云的发言内容是批评社教工作队在北大抛开原校党委的干部，搞唯成分论，乱斗干部的错误做法。北大党委六名书记被斗了五人，十四名常委被批判八人，连党委书记、副书记向中共北京市委的请示汇报也被诬为“翻案”，搞阴谋活动。

**3月2日** 下午五时，和周恩来到毛泽东处汇报同胡志明会谈情况。

△ 晚，陪同刘少奇会见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六日晚，和刘少奇、周恩来出席阿尤布·汗总统举行的告别宴会。

七日上午，到机场送阿尤布·汗回国。

**3月3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九十三次会议。会议讨论半年来文化界、教育界和思想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会议还决定成立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在发言中说：去年九月间五人小组开会讨论，认为运动中还是要搞大是大非，不要搞唯成分论。现在看，这一时期的文艺批判有很大成绩，很见效，理论上也批评了一些代表人物。但也有些问题，搞得人家不大敢写文章、写剧本了，连新华总社有一阵一天只来四五篇稿子，这个现象值得我们警惕。弄得郭老、吴晗、范老<sup>〔1〕</sup>等都紧张。这些同志基本是好的，政治上同我们一直是一道的。对在全国范围指名批判的，要经中央批准，要保护一批人。学术问题，错了允许讨论。要注意有些人不是研究学问，靠攻别人找岔子出名。多数在学术争论中有错的人，要他们自己清理，不要随便展开批判。文艺作品、电影、剧本基本好的就行。一般的缺点、错误，可在内部小组会上谈一谈。只要方针对了，好多人就跟着改过来了，根本一条是要求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小是小非在小组里去处理，不要搞得大家都灰溜溜的。学术界也是这样，人家过去讲得不对的允许改正，批评要同志式、友谊式的，不是一棍子打死别人，使自己一举成名。要全面看干部，最主要的是看长期以来他的党性、立场表现，既看到他的缺点，也要看到他的优点。要从全面、从整个历史表现来看一个人。工作队到一个单位要先调研，弄清问题。现在比较多的是一去就先说那里烂了，似乎发现那里的缺点越多，工作队成绩越大，搞完了他又走了，这样很危险。“四清”要挖资本主义的根子，但要肯定我党基本是好的。

---

〔1〕 郭老，指郭沫若。范老，指范文澜。

要肯定全党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否则，就只有工作队自己好。要防止片面性，好就好得不得了，坏就坏得不得了。这一条在文化部门更要防止。领导如不实事求是，就要出大乱子。总结，要讲清是非，该领导担责任的也要担起来才行。不做调研，先做结论，这不行。文化界有些年老体弱的人不要他们下乡去。一个加强领导，一个学好主席思想，一个联系群众，有这三条就好办。《英雄儿女》是好片子。一点缺点没有不可能。不破不能立，不立也破不了。因此，对批评要有个控制。在谈到北大“四清”问题时说：我曾派人摸过底，认为北大不会有夺权问题，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结果，工作队把市委抛在一边，关系搞得不正常。要召集北大总支以上干部开会，总结一下，把运动落脚到改进教学工作。工作队的批评是帮助他们，但工作队也有缺点。

**3月4日** 下午，到毛泽东处谈话。

**3月5日** 派万里去北大，召集校党委及各系党总支书记以上干部开会，总结前一段工作，解决北大党委和工作队之间的分歧问题。万里传达说：书记处认为“二十三条”以前，北大工作队的毛病是和校党委没有结合，扎根串连，找毛病，这是普遍性的问题。“二十三条”下达两个月了，工作队没有认真总结经验。书记处的结论是：北大是办得比较好的；陆平是好同志，工作中犯有某些错误。

△ 和刘少奇、周恩来等参加首都各界为欢迎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举行的万人集会。在大会上讲话说：我们亚非国家，不论是大国或小国，都应该互相尊重，平等相待，不同于帝国主义对亚非国家的侵略和干涉；都应当在平等的基础上，友好解决有关争端，答应的话，应该兑现，不能出尔反尔，不能采取强加于人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在讲到美国三天前对



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疯狂的空袭时说：不管美国侵略者怎样疯狂，也挽救不了它在越南必然失败的命运。

**3月6日** 安子文从山西临汾来电话请示：已经摘了帽子的地主、富农，社教运动中如何划阶级。经请示刘少奇后，电话答复：“这些人虽不戴帽子，但暂不改变成分，可以不按地富待遇。待考查一时期后，再考虑改变成分问题。”并将处理情况告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

△ 下午，和邓小平等到机场迎接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央主席希尔和他率领的澳大利亚共产党代表团。九日晚，和邓小平设宴欢迎澳大利亚共产党代表团。

△ 下午，和邓小平到机场迎接新西兰共产党主席默·威廉斯和夫人。

**3月7日** 阅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的来信，批示李琪等酌处。并叮嘱：“要使他的积极性能够发挥。至于如何发挥，请你们酌定，并复他。”

**3月8日** 经请示刘少奇后，同意中共陕西省委要求，将中共中央三月四日转发的《北京市委关于通县试点地区“四清”运动最近情况的报告》发到农村“四清”工作队。

**3月11日** 下午，列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将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评莫斯科的分裂会议》一文的初稿。三月一日至五日，苏共新领导不顾各方的反对，召开了只有十六个共产党的代表和观察员参加的所谓“协商会晤”，阿尔巴尼亚、越南、印尼、中国、朝鲜、罗马尼亚和日本等七个党拒绝参加。编辑部文章的中心是揭露苏共新领导为执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而召开的一次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十三日下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会议通过这篇

评论文章。

**3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九十四次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批准余秋里关于长期规划工作的汇报和谷牧关于设计革命运动情况和今后打算的汇报，决定这两个汇报修改后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会议还讨论了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评莫斯科的分裂会议》的评论文章。

**3月13日** 上午，和邓小平到机场迎接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维·乔·威尔科克斯。十九日上午，到机场送威尔科克斯和希尔率领的澳大利亚共产党代表团离京回国。

**3月14日** 中午，和邓小平去朝鲜，征求金日成对《评莫斯科的分裂会议》一文的意见。十五日，回到北京。十六日，写信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报告在平壤同金日成会谈的情况。

**3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继续讨论《评莫斯科的分裂会议》一文。

**3月17日** 上午，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王伟、杨海波等及全国总工会负责人马纯古、陈少敏等谈工作。

△ 上午，和邓小平、康生乘飞机去武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讨论修改《评莫斯科的分裂会议》一文。

△ 下午，和邓小平、康生从武汉将对《评莫斯科的分裂会议》稿的处理意见电话告在京的刘少奇、周恩来和陈毅：文章基调不变，字句略有改动，将在此定稿。

**3月18日** 继续在毛泽东处研究修改《评莫斯科的分裂会议》一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将文章的题目改为《评莫斯科三月会议》，文内四个部分分别加上小标题：（一）这是一个什么会议；（二）苏共新领导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三）回答几个问题；（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革命的轨道上团结起来。

下午，和邓小平等从武汉回到北京。

△ 晚九时三十分，到刘少奇处谈话。

**3月20日** 上午，会见外交部长哈桑·穆拉维德率领的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友好代表团。在谈话中说：亚非国家政治独立后，就要搞经济建设。没有经济基础，独立是不完全的。经济建设首先是搞农业。解决吃饭、穿衣，我国近百年来受人欺侮就是因为工业落后。所以，又非要搞工业不可。

△ 晚，去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馆吊唁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乔治乌—德治逝世。

**3月21日** 上午，到刘少奇处开会。

△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定稿《评莫斯科三月会议》。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该文。

**3月22日** 上午，和刘少奇、邓小平等去机场送周恩来赴罗马尼亚参加乔治乌—德治葬礼。

**3月23日** 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放映和批判电影《林家铺子》、《不夜城》的通知上批示：“影片《不夜城》应当批判。对有错误的影片、戏剧，最好不要一上演即批判。等上演一个时期干部群众看看，议论议论，然后再用提出问题讨论的方式，进行批判。这样对观众鉴别、批判能力的锻炼提高和教育的效果会更好些。”当日，中宣部的通知下达。

△ 同全国总工会和共青团中央负责人谈群众工作问题。指出：这两年，工会和共青团群众工作不够活跃。工会国际工作任务很重，时间比国内群众工作占得多。国际工作必须做，但主要任务还是国内群众工作。工会工作需要整顿和加强。现在有的地方要成立“革命工人协会”、“社会主义工人协会”，用来代替工会。为什么有人提出工会消亡问题？我看就是因为

工会群众工作不够活跃。如果厂矿企业的工会领导干部真正由群众选举产生，又不脱离生产，或者大部不脱离生产，同群众的关系很密切，又搞好了基层工作，真正发扬工会的三大民主，职工代表大会很活跃，对群众中的问题了解得很快，解决得很好，工会真正成为活跃的群众组织，谁还考虑要不要工会？谁还会提出工会消亡？所以要从加强基层群众工作着手来解决这个问题。要认真总结一两个好的基层工作经验，加以推广。共青团现在的范围太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战线上很多愿意为社会主义奋斗的青年没有入团。如果超龄团员离团，团员数量比党员还少。所以，青年群众的工作也要加强。要把青年、少年、儿童都组织起来。工会、共青团的加强整顿工作都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去搞，在“四清”试点中去取得经验。

**3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九十五次会议。会议听取李先念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粮食规划问题、钱正英关于河北水利规划问题的汇报，讨论并决定有关粮食工作和根治海河等问题。

△ 同李楚离<sup>〔1〕</sup>谈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并请他转告中监委：在处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犯有错误的干部时，要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作结论要留有余地。要真正接受过去若干次运动的教训，就是在运动火头上处理得常常偏重，留下许多后遗症，事后搞甄别平反。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就是不要搞过头了，欠人家的账，人家到处申诉。比较明显的是反右倾中对好多人处理过头了，搞了两年甄别工作，用了很大人力。搞过头了，好多人不能工作，首先受损失的是党。“三反”

〔1〕 李楚离，时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打老虎，弄出不少假老虎，也是有教训的。革命者都有自尊心，搞过了，造成他们对党离心离德。延安审干时有三分之一搞过头了，直到去年还有人写信骂街。我们这次不要搞过了，宽一点比重一点好，当然也要实事求是。中央监委审批“四清”案件时要注意这方面。对犯错误的干部下放后，党还要一看二帮，不要放在一边不管。当他有错误不改正时，要严肃批判。但当他承认错误后，就要帮助他改正，要真帮。

△ 晚，观看巴基斯坦民间舞蹈团在民族文化宫的首场演出。

**3月25日** 以北京市市长的名义邀请非洲国家驻华使节、外交官观看话剧《非洲战鼓》。

**3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九十六次会议。会议听取赵尔陆汇报工作，决定：（一）同意国务院国防工办《关于一、二线省、市、区后方建设规划的报告》。（二）通过中共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及其常委的名单。在谈到一、二、三线建设时说：明后年地方投资也纳进来。

**3月28日** 去机场迎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会副主席黄文欢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他们是到罗马尼亚参加乔治乌—德治葬礼后途经北京回国。

△ 将常溪萍〔1〕三月十九日致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康生和张子意的信，及二十日常与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同志的谈

---

〔1〕常溪萍，时任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副部长、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委员会副书记。他在致刘少奇、邓小平等的信中和同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同志的谈话中，反映北大社教工作组的主要领导人不执行中共中央“二十三条”指示，和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二月十七日会议、特别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三月三日的指示精神持抵触态度，拒不检查和纠正错误。

话纪要报送中共中央书记处，并在谈话纪要上写道：“直到最近，就是说‘二十三条’已经下达这么久了，中央书记处也专为北大开过会了，有的同志还有错误怕检讨，而且听不得不同意见。”三十日，邓小平批示：北大工作队负责人“对‘二十三条’是患得患失的，抵触的。似乎要考虑改换工作队的领导”。“再这样顶牛下去，北大工作要受损失。”四月一日，建议陆定一将常与中办同志的谈话纪要登《宣教动态》增刊。

**3月29日** 上午，和邓小平会见并宴请黄文欢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三十日，到机场送越南党政代表团回国。

**3月30日** 同意并报邓小平、刘少奇核定中央组织部关于第一期“四清”结束后，恢复中央财贸各部所属五所干部学校的请示。

**3月31日** 上午，主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会议通过《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友好条约〉的决议》；设立以谷牧为主任的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

△ 同意袁任远〔1〕关于农业部领导工作的检查报告，并批示：农业部下去蹲点的副部长和局长，“原则上可以在四月二十日回来抓业务，少数工作队工作正紧张，确实离不开的，应该等这期‘四清’工作告一段落再回来。还有，在‘四清’过程中，不宜轻易采用大会形式，因为它容易发生逼、供、信的偏向。必要用大会形式时，也要注意好好领导。在运动过程中，要放手对大是大非问题揭发批判。作结论时，必须特别注意实事求是。”

△ 为中共中央批转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省市自治区工

---

〔1〕袁任远，时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

会主席会议的报告》代拟批语：请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注意抓紧领导各级工会，特别是基层工会的职工群众工作。并且适当调一些能联系群众、会做职工群众工作的干部，加强地方工会的领导。”四月三日，文件下发。

**4月2日** 下午，在有全国设计工作会议的代表、中央各部有关会议的代表、国务院和北京市有关机关及大专院校的负责人共二万八千多人参加的大会上作报告。报告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一）新中国经过十五年的奋斗，现在已经有了相当的物质条件，又有了很宝贵的经验教训。当年孙中山曾经讲过要“迎头赶上”世界，我们更要树立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雄心壮志。（二）十五年来，我们成功的经验固然很重要，有的时候失败的教训对人的教育更深刻。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关键是自己当做客观事物对待，全面地、实事求是地看问题，目的是找出经验教训，清理思想方法的毛病，使大家鼓起干劲，去掉毛病，把工作做得更好。如果先追查错误由谁负责，要人人过关，检讨什么苏联的框框、资本主义的旧框框，大事小事都往“纲”上提，都搞成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问题，那就乱了，不利于我们的事业。（三）设计工作首先是坚持质量第一原则。在适用、经济和适当注意美观的前提下，实行两个“三结合”，一是干部、专家和群众的三结合，一是设计、施工单位和使用单位三结合，以克服脱离政治、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弊病。凡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环节，从各种具体制度到工作方法、工作作风，都要坚决地改掉，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革命。（四）设计队伍革命化问题。设计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其中年龄大一点的高级知识分子，出身成分好的恐怕不是很多。对于知识分子，不能搞唯成分论，要重在表现，要看实践。在

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个人的表现怎么样，这是根本的。出身成分不好的同志应该注意和剥削阶级家庭在思想上划清界限；对于青年，主要是进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进行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教育。知识分子革命化，一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二是跟工农兵结合，三是深入实际。对设计人员来说，就是下楼出院，到施工现场，到革命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前线去锻炼。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思想上要努力克服个人主义和本本主义两个“敌人”。只有不计较名利，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尊重科学，才能在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上做出贡献。该讲话以《树立雄心壮志，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题收入《彭真文选》。

△ 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民族饭店召开北大社教工作队部分骨干座谈会，检查总结工作队的工作。会上，陆定一代表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宣布撤销原工作队主要领导人的职务，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为领导小组组长。新成立的领导小组成员是：许立群、陆平、戈华、彭珮云、常溪萍、宋硕、刘仰峤、侯西斌、庞达。

△ 晚，和刘少奇等观看河北省话剧院演出的话剧《战洪图》。

**4月3日** 下午，和刘少奇、邓小平、李先念等接见出席国家经济委员会、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冶金工业部、第四机械工业部、第五机械工业部、邮电部、林业部、物资管理部、第二轻工业部、教育部分别召开的一些会议的人员。

**4月4日** 晚二十二时十五分，收到外交部报告：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向我驻苏大使潘自力提交了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给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信。信中称：美国将扩大对越南的轰炸，包括河内、海防等大城市，不仅炸军事设施，且炸工



业、交通。苏方建议，苏、中、越三国立即举行高级会晤，商讨对策。地点随便何处都行。要求我速答复。二十二时三十五分，向刘少奇、邓小平报告后，即电话报告在武汉的毛泽东。五日，按中央指示，以特急电请越方于近日派人来南宁或武汉商谈。

**4月6日** 中午，和刘少奇、邓小平到机场迎接周恩来一行回到北京。周恩来在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后，又访问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联、巴基斯坦和缅甸等国家。同时迎接访问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尼泊尔后同机回国的陈毅等。

**4月7日** 到刘少奇处开会。

**4月9日** 召集中共北京市委部分成员开会。

△ 李先念将余秋里关于调整一九六五年基本建设投资方案的报告和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为中共中央代拟的《关于推迟收兑退赔期票的通知》稿批送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审阅。十七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发出该通知。

**4月12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威胁我国安全的新形势和我必要的对策。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十四日，该指示发出。

**4月13日** 召集郑天翔等开会。

**4月14日** 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十五日，返回北京。

**4月15日** 晚，住进北京医院。

**4月18日** 在首都各界一万多人纪念第一次亚非会议十周年举行的集会上发表讲话。说：曾经被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任意宰割鱼肉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已经成为觉醒的、先

进的和战斗的大陆。这是当代的一个伟大的变化。它说明占全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各国人民群众一定要革命，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一定要解放，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一定要灭亡。这是任何反动势力都无法抵抗的历史发展的必然的趋势。现在需要在全世界展开一个把美国侵略者赶回本国的广泛运动，这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大政治任务。

△ 和邓小平到机场迎接黎笋为首的越南党政代表团。黎笋等是访问苏联回国途经北京。十九日，陪同刘少奇、邓小平会见并宴请越南党政代表团。

**4月19日** 会见并宴请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布加勒斯特州委第一书记格奥尔基·尼古拉率领的罗中友好农业生产合作社代表团。

**4月26日** 将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室整理的《全国医药托拉斯成立后的新情况》报送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阅，并附建议：“这个材料反映了在成立托拉斯过程中一个侧面的问题，值得注意。我因为现住医院中，尚未找人了解全面情况。现在已经成立十几个大托拉斯了。看来需要把这批试点经验加以总结后，再考虑推广建立第二批。”二十九日，毛泽东批示薄一波等：“迅速、周密地解决。”

**5月1日** 上午，和刘少奇、朱德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群众联欢活动。晚，出席联欢晚会。

**5月2日** 到刘少奇处开会。

**5月4日** 在京郊“四清”工作团分团的党委书记会上讲话。讲话强调工作队当前的工作中心是抓农业生产，“四清”运动的一切成果要从这里表现出来。讲话针对前一段通县地区的“四清”试点中，基层干部撤换了百分之四五十，斗争中发生了一百七十多起打人事件，造成工作队、贫协、运动中新当

选的干部和落选的干部之间关系紧张，心存疙瘩的情况，提出建议：除了混进干部队伍的地、富、反、坏分子之外，上述四种人在一起开会，交心、谈心，解开疙瘩；对的坚持，错的改正。然后大家拧成一股劲，轻装上阵，团结生产。指出：对于基层干部，总体上要和郊区农业的成绩联系起来看，前三年，年增两亿多斤粮食，能说社、队干部一半以上都是坏的？那么讲，我们党不是建立在沙滩上了吗？只找基层干部的缺点、错误一面，不看他们成绩的一面，就是有片面性，就是形而上学。又说：一部分干部犯错误，他们自己要负责，我们领导也有责任，要替他们分担一部分，不说这话不公道。总之，现在要抓生产，为抓生产，先要把思想问题解决，把人的关系改善。

△ 和周恩来出席首都一万多名工人的集会，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伟大斗争。

**5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九十七次会议。会议讨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二十周年活动的安排等问题。在讨论对“四清”运动中落选干部的处理时说：各地都有过火斗争问题，作结论要实事求是。有的同志确有错误，应该受处分，但不要轻易说成是反党集团。对高等院校的改革问题提出：各方面都反映理、工、医、农三年基础课必须学好，再学一年、半年专业基础课。理工科有教科书，文科大部分不发讲义，据说是发了讲义，教师课堂上没得讲了。我根据书记处一九五八年的决定，要求文科一定要印出讲义。有问题，可以搞“互助组”，但不登报批判。

**5月10日** 约集李楚离、乔明甫〔1〕、谷牧、刘裕民、赖

---

〔1〕 乔明甫，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际发、刘秀峰，李运昌〔1〕和龚子荣等谈话。谈话中说：党的生活应该搞得活泼些，在党内讲话不要有顾虑，开会不要都做记录，搞得很拘束。把大家一致的意见记录就行了。党内批评要抓大问题，不要抓生活细节。我们党在大革命时期，李立三、王明路线时期，党内生活有缺点，抓生活细节很厉害，把许多小事提到原则高度进行批评。那套办法是旅莫支部带来的。延安整风时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提出党内生活的准则，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达到新的团结；要弄清思想，团结同志；一看二帮。建国以来，又强调了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现在发展了这个思想，提出：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二十三条”又提出对干部要严肃、积极、热情。这样可以把全党团结起来。“四清”运动搞完了，应该出现毛主席所讲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才算运动真正搞好了。在运动中，对干部搞错了，搞重了的，工作队要道歉，以消除隔阂，团结同志。被批判的人，要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不记私恨的胸怀。审查“四不清”干部，根本问题是为的要搞三大革命运动。看干部的原则

---

〔1〕 刘裕民，时任建筑工程部部长。赖际发，时任建筑材料工业部部长。刘秀峰，原建筑工程部部长。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八日，中央“四清”工作队和建筑工程部“四清”运动领导小组联合向中共中央写出报告，表示完全同意一九六四年八月中央关于撤销刘秀峰部长、党组书记职务，下放锻炼的决定。随即被下入到郑州第二砂轮厂任人事福利厂厂长。一九八〇年四月，中共中央批复国家建委党组报告，同意撤销一九六五年对刘秀峰的结论及处分决定。李运昌，时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

是德才兼备。德，就是拥护毛泽东思想，高举总路线，为社会主义奋斗到底。才，就是有一定的政策思想水平、工作能力，能完成任务。要从大的方面看，不要只看细节。

**5月11日**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关于一九六五年基建计划调整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党组《关于适应备战形势，调整一九六五年国家预算报告（草案）》、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工业交通系统建立政治工作机关的决定》。

**5月12日** 出席首都人民为抗议和声讨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多米尼加举行的十万人集会。在大会讲话中强调：中国人民完全拥护毛泽东主席和我国政府的声明，决心同多米尼加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道，把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坚决进行到底。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席大会。

△ 夜，到周恩来处开会。

**5月14日** 和邓小平等在钓鱼台起草毛泽东主席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的贺电稿，并将电稿传给在长沙的毛泽东。二十日，毛泽东签名定稿。二十三日，贺电在《人民日报》发表。

△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姚依林关于财贸问题的汇报、林枫关于赴苏联参加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庆祝活动的汇报和陆定一关于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加德国解放二十周年庆祝活动的汇报。在会上说：长远计划必须搞，没有综合平衡，生产不好搞。

**5月15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叶林〔1〕关于工业生产、李富春关于小三线建设问题的汇报。

---

〔1〕 叶林，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 将毛泽东关于十大关系的讲话录音稿送毛泽东并说明：这是根据你当时讲话的录音整出的原始记录。是我所看到的记录中最完备的一份。记录稿同时送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陈伯达、康生、罗瑞卿。

**5月19日** 率领中共代表团赴印度尼西亚，参加印尼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的庆祝活动；同时率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应印尼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副主席艾地的邀请进行友好访问。两个代表团当日离开北京抵达昆明。代表团成员有：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刘宁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广东省省长陈郁等。

**5月21日** 晨，率领中共代表团及全国人大代表团乘专机离开昆明，在缅甸仰光短暂停留，中午抵达雅加达。在机场，受到印尼共产党中央主席、印尼政府统筹部长、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副主席艾地等的欢迎。

△ 下午，率领中共代表团全体成员拜会了艾地等印尼共产党领导人。

**5月22日** 晚，率领中共代表团在雅加达分别会见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副委员长朴金喆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为首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二十三日下午，再次会见日共代表团。

**5月23日** 上午，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雅加达十万人庆祝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的集会。

**5月24日** 上午，率领中共代表团在艾地陪同下，向卡利巴塔英雄公墓献花圈，并参观印尼共产党党史展览。在留言簿上写道：“谨向在印度尼西亚革命斗争火焰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印度尼西亚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密切联系群众的、英勇战斗的和在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中坚决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纯洁性、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革命原则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致敬！”参观后，出席艾地举办的宴会。

**5月25日** 上午，在印度尼西亚“阿里亚哈姆”社会科学学院发表讲话，主要讲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实表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竭力否认亚、非、拉人民反帝斗争的伟大国际意义，他们硬说亚、非、拉地区不是矛盾的焦点，不是和不可能是现代矛盾的中心，不可能成为目前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半年多来，尽管苏共新领导以“革命”、“团结”、“反对帝国主义”的词句在政治上修饰打扮，他们的本质还是顽固地坚持苏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和苏共纲领这一整套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所实行的，是一条彻底革命的路线，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路线，坚决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路线，维护世界和平的路线。

△ 下午，率领中共代表团在雅加达雄牛广场主席台观看艾地等印尼共产党领导人检阅印尼人民青年团一万名团员组成的受阅队伍。

△ 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拜会印度尼西亚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副主席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

**5月26日** 率领中共代表团，同前来参加印尼共产党建党四十五周年活动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一起，受到印尼总统苏加诺的接见。艾地及其他印尼共产党领导人接见时在

座。

△ 率领中共代表团及全国人大代表团先后拜会及会见印尼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主席、副主席及第一副总理等。

△ 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庆祝印尼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招待会上致贺词。贺词赞扬印尼共产党在反抗荷兰殖民主义者的残酷镇压下，坚持地下斗争二十年；二战期间，又和日本法西斯占领者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战后，它同全国反帝爱国力量一道，以武力赶走了荷兰殖民者，在建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历程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5月27日** 上午，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在雅加达独立宫会见了印尼总统苏加诺。

△ 上午，率领中共代表团在艾地的陪同下，参观了茂物附近的“埃戈姆”农业和农民运动学院，并对学院的全体师生发表讲话。晚，出席印尼共产党举行的文艺晚会，观看大型歌舞《光荣归于党和民族》。

**5月28日** 率领中共代表团和全国人大代表团部分团员从雅加达乘飞机抵达东爪哇的泗水访问。晚上，在东爪哇省长官邸会见了当地政府领导人。刘宁一等前往南苏门答腊的楠榜进行友好访问。

**5月29日** 上午，和部分团员在泗水会晤市长穆拉赫曼和市政府、市议会的其他领导人。

△ 和部分团员观看了泗水劳动人民为庆祝印尼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举行的文化大示威。示威队伍由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妇女和艺术家等组成，长达十公里，示威历时五个小时，沿途高唱革命歌曲和表演革命舞蹈，观众达几十万人。

**5月31日** 下午，率领代表团回到雅加达。

**6月1日** 上午，会见印尼合作国会领导人苏巴米亚、明



曼贡少校。在谈话中强调：亚非反帝反殖力量，不管政治、宗教、哲学信仰、社会制度如何，都应该团结起来，因为帝国主义在占领一个国家时，是不问你的信仰如何，一样进行剥削与压迫的。因此，我们很支持你们按苏加诺总统的倡议，加强纳沙贡的团结。

△ 下午，会见印尼最高评议会第一副议长沙多诺、副议长萧玉灿。

6月3日 在万隆参观第一次亚非会议的会场——独立大厦，并在留言簿上题词：“发扬万隆会议精神，发展全世界新兴力量，增进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之间的伟大友谊。”

6月4日 晚，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出席印尼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举行的招待会，并发表讲话。

△ 以北京市市长的名义，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平壤市大熊猫、河马、黑鹿、马熊、相思鸟等珍贵动物。

△ 晚，在雅加达举行告别招待会。在讲话中对印尼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接待表示衷心感谢。

6月5日 下午，率领中共代表团和全国人大代表团乘专机回到昆明。途中在仰光作短暂停留。在离开缅甸时，致电问候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奈温。

6月6日 晨，在昆明招待所会见正在当地访问的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黎德寿。上午十一时许，乘飞机抵达北京。

6月10日 中午，和朱德、邓小平到机场迎接周恩来出访巴基斯坦和坦桑尼亚回到北京。

6月11日 下午，在家中同周恩来谈话。

6月13日 夜，在家中同周恩来谈话。

6月15日 和周恩来、陈毅、李先念、薄一波、贺龙、

罗瑞卿等在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拟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有关问题。

**6月16日** 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在杭州听取余秋里、谷牧关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的一些问题的汇报，并研究三线建设、一二线生产、城市建设和农业生产等问题。毛泽东在听汇报时指出：编制计划要考虑三个因素：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十七日上午十一时，回到北京。

**6月18日** 在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扩大）会议上作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印度尼西亚的报告。指出：印度尼西亚全国人民正在为政治上的独立自主、经济上的自力更生、文化上具有民族特色而努力奋斗。在今后的岁月里，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友好合作关系及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必将在共同的斗争中不断巩固和发展。

**6月19日** 和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到机场送周恩来一行离京访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6月21日** 下午，召集李先念、薄一波、罗瑞卿、余秋里、谷牧等开会，研究落实毛泽东六月十六日杭州讲话精神。

**6月25日** 下午，主持首都各界人民纪念“六二五”朝鲜祖国解放战争十五周年和“支持朝鲜人民反美斗争月”大会。在开会词中指出：美帝国主义至今霸占着南朝鲜，阻挠朝鲜的和平统一，加紧拼凑东北亚军事联盟，进一步威胁亚洲的和平。与此同时，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扩大侵略战争。但是，美国侵略者在英勇斗争的越南人民面前，失败的结局决不会比在朝鲜更好一些。董必武、邓小平等出席大会。

△ 下午，和董必武、邓小平会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朝鲜拥护和平全国民族

委员会委员长康良煜率领的朝鲜人民代表团。

**6月29日** 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举行的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领导小组扩大会上讲话。指出：北大的社教试点，在工作队的领导下，有一段时间，主要偏向是一部分同志否定一切，漆黑一团。工作队没有系统地调查研究，就否定一切，抓住人家斗，以致学校党内、干部思想很分歧，局面显得乱。在试点单位，暴露了问题，取得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应该估计有很大收获。但是，工作队主要领导人固执己见，对“二十三条”，对中央的一些意见，总是置之不管，这就犯了错误。北大虽有很多严重问题，两条道路斗争很激烈，但应该肯定它是党领导下的学校，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对陆平，“我向毛主席讲是好人犯错误，没有讲量。毛主席马上讲，好人犯了一些错误”。讲话指出：如何贯彻中央“二十三条”指示精神，解决北大的问题呢？要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从检查工作、总结经验教训入手，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的目的。解决思想问题，宜用和风细雨的方式，开小会或个别谈，大会方式害多利少。即使是对修正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观点比较系统的人，只要他愿意改，还是采取小会帮助的方式。在运动中，要解放思想，加强党性。对大是大非，一要坚持真理，二要不怕打击报复，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态度，也是测量党性的一种标志。党员干部应自觉地检查自己，在此基础上互相帮助。对“政治挂帅”、“政治是灵魂”的口号，讲话解释说：挂“帅”要有队伍；“灵魂”要附于躯体。高等学校的“四清”，必须密切结合教学的实践，并且落实在教学改革方面。抛开教学工作，政治挂帅也难搞得好的。讲话还说：在高等学校里，唯心论、形而上学等都是可以讲的，不然学生怎么知

道唯物论和辩证法呢！问题是，不要偷梁换柱，把这些东西灌输给青年，腐蚀青年一代。关于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讲话遵照“二十三条”中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新提法和重在表现的政策，解释说：过去毛主席讲团结百分之九十，现在讲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就是把地主、富农的子女，资本家的子女，放在团结对象里面；重在表现，就是看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不搞唯成分论。这是一个时代的战略方针。讲话强调：通过运动，要健全校和系两级党的领导核心。最后，将讲话精神归结为三点：一是把大是大非弄清楚，把已经成熟的问题解决；二是北大党的组织要在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三是抓紧教学。参加会议的包括全体北大“四清”工作队员、北大党员干部和有关党员。

**6月30日** 上午，接见苏约诺上校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志愿人员访华代表团。

**7月1日** 下午，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董必武、贺龙等接见军事、公安、农业、农垦等专业会议的代表和公安干部学院、政法干校的一批学员。

△ 下午，和朱德、邓小平等出席北京地下铁道一期工程开工典礼。

**7月3日** 上午，到邓小平处开会。

**7月5日** 在河南省的农业规划上批示：“请省委抓紧调动农民积极性，抓紧具体措施，三年指标勿定高了。”

△ 和刘少奇、邓小平等听取工交系统“四清”试点座谈会筹备小组的汇报。

**7月7日** 下午，和朱德、邓小平等到机场迎接周恩来访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后回到北京。

**7月9日** 出席朝鲜驻华大使朴世昌为庆祝朝中友好合作

互助条约签订四周年举行的宴会。

**7月10日** 批示宋硕：“原则同意北大党员干部整风会议的方案，时间以安排在把毕业生思想鉴定等工作搞完后为好，但不要安排我再讲话了。”十一日，督促陆平抓紧两件事：一、北大应届毕业生一千八百人中，符合党、团员条件的离校前是否已经发展？二、学生分配工作结束后，应集中一段时间抓紧党员干部的整风工作。

△ 下午，到毛泽东处谈话。

**7月12日** 批复江青，表示对电影问题的意见：“已送萧望东等看过了。”

△ 上午，和朱德等到机场迎接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黄文欢率领的越南国会代表团。下午，陪同朱德会见黄文欢一行。十三日晚，和朱德、邓小平出席欢迎黄文欢一行的宴会。

**7月14日** 下午，出席首都人民欢迎乌干达总理阿波洛·密尔顿·奥博特的大会并讲话。讲话说：亚洲和非洲所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一定要起来革命，一定要求得到彻底解放。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一定要灭亡。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整体，是相互支援、相互策应的。周恩来等出席大会。

△ 晚，陪同黄文欢和越南国会代表团观看京剧现代戏《南方来信》。

**7月15日** 出席首都人民欢迎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黄文欢率领的越南国会代表团的集会并讲话。讲话重申：中国人民坚决地、毫无保留地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爱国斗争。不管美帝国主义把侵略战争升到什么级，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狂风巨浪，中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朱德等出席大会。

**7月16日** 陪同毛泽东、刘少奇会见黄文欢及其率领的越南国会代表团。

**7月17日** 晨，和朱德到机场送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四次代表大会。

△ 晚，和朱德出席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为黄文欢和越南国会代表团访华举行的招待会。

**7月18日** 接到毛泽东批示陆定一、康生、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阅处的关于在艺术教育中使用模特儿问题的批示：“此事应当改变。画男女老少裸体 Model 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当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请酌定。”毛泽东的批示写在中央美术学院几位教师的信上。对以上批示，建议等邓小平、康生回来后议处。八月一日，批示请杨尚昆邀请几个有关同志研究一下，是否发个指示。

**7月20日** 上午，和周恩来等到首都机场迎接从海外归来的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和夫人郭德洁。晚，参加周恩来主持的欢迎李宗仁夫妇的宴会。

△ 晚，陪同刘少奇、周恩来会见索马里总统亚丁·阿卜杜拉·欧斯曼等。

**7月中旬** 和谭震林审阅李先念关于提议由薄一波任新成立的《经济消息》领导小组组长的报告。

**7月22日** 上午，主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关于一九六四年国家财政决算和一九六五年财政预算的决议。在会上向常委介绍上半年工农业生产和财政收入形势，说明编制今年预算的指导方针，一是集中力量搞国防建设；二是发展基础工业；三是发展农业，逐步改善农民

生活。还说：由于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战争不断升级，我们必须加强战备，继续援外，城市里的非生产性建设项目，只能每年搞一点，先解决吃穿用。

△ 下午，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接见出席军事、农林、农业机械、水电等专业会议的人员和一些院校的学员。

7月23日 晚，和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索马里总统亚丁·阿卜杜拉·欧斯曼举行的宴会。

7月24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到机场迎接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革命政府部长会议主席奈温将军和夫人。

7月25日 上午，陪同奈温和夫人，到北京市郊区红星人民公社参观。下午，出席缅甸驻华大使为奈温和夫人访华举行的招待会。二十六日晚，出席奈温举行的宴会。

7月26日 上午，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学习代表团。在谈话时说：任何一个兄弟党，不仅需要总结自己的斗争经验，同时也需要学习国际斗争经验。其他国家的经验只供参考，而不能照抄照搬，否则就会使革命受到很大的损失。

7月27日 中午，陪同毛泽东接见李宗仁先生及其夫人，并参加招待李宗仁夫妇的宴会。

7月28日 上午，和朱德到机场迎接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后回到北京。

△ 将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批转的谷牧关于设计革命运动的报告补送毛泽东，附信说：“这份报告批发的时候，你正害感冒，未专送阅。不知已阅过。”并加说明：报告转发时，中央肯定全国各设计单位经过“四清”，最后把思想革命落实到设计工作的改革上去，是比较好的经验，可供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文化、教育、卫生、科学研究部门参用。二十九日，毛泽东批复：“已经看过，此件很好。但似应发到地委、中等工业

(城市)市委以及重要工厂党委。各大小设计院都要印发。请酌定。”根据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于十月三日发出通知，扩大了转发范围。

△ 将登载《有些地区粮食征购任务过重》的《群众反映》第五十二期分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李先念等阅，并批示：“请中央办公厅或农办派人去了解一下，果系事实必须坚决纠正。”

**7月29日** 上午，会见哥伦比亚共产党（马）总书记彼德罗·瓦斯盖斯和中央执行委员卡尔洛斯·阿里亚斯。就哥伦比亚党的“十大”决议进行交谈说：哥伦比亚的革命队伍如何组成，谁是当前主要的敌人，谁是巩固的或不巩固的同盟军，都是要以本国的经济结构、阶级分析和政治情况来决定；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两者的区别和联系，是分两步走还是毕其功于一役，也要从具体情况出发来确定。还联系中国的情况阐明确定敌友我的重要性及发展过程。

**7月30日** 请吕正操转告余秋里：注意抓紧川汉铁路和川豫铁路的选线和复查工作，以便修筑成昆铁路的施工力量腾出来时，“转川汉线先打洞子。两线定线后，邀中南局和各有关省负责同志一起议定”。

**7月31日** 上午，会见阿根廷“统一革命团体运动”政治和外事书记大卫·迪芬培克。谈话中说：反动统治是不会自动把政权交给人民的。革命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要扎扎实实发动群众，特别是农民。毛泽东思想是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

**8月1日** 下午，和周恩来、邓小平等到机场迎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率领的印尼共产党代表团。



8月2日晚，陪同艾地率领的印尼共产党代表团出席文艺晚会，观看京剧现代戏《红灯记》。

8月3日、4日 参加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以艾地为首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举行的会谈。中共代表团的成员还有周恩来、邓小平。三日晚，出席中共代表团举行的宴会，欢迎印尼共产党代表团。

8月5日上午，和陈毅、康生陪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会见并宴请艾地及印尼共产党代表团。六日上午，和周恩来、邓小平等去机场送艾地率领的印尼共产党代表团回国。

△ 晚，设宴招待黄文欢和越南国会代表团，宴会后陪同黄文欢等观看反映越南南方人民反美斗争的评剧《南方烈火》。七日上午，到机场送越南国会代表团去蒙古人民共和国访问。

8月6日下午，出席周恩来主持的全国政协欢迎李宗仁先生及其夫人郭德洁女士的茶话会。在致词中赞扬李宗仁先生在海外十六年，毅然回国参加爱国反帝的行列，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说这是李宗仁先生一生的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抉择和转折点”；重申共产党和国家对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员、各方人士的一贯政策，是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来去自由。凡是愿意回来的，愿意走爱国反帝道路的，我们都欢迎。

△ 同刘述周〔1〕谈话。七日，又同徐冰、平杰三、刘述周及刘春谈话。在两次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后，党外人士震动很大。目前形势对他们够紧张了，要有意识地松弛一下。要讲清楚，社教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

〔1〕 刘述周，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道路的当权派，只整党内不整党外。三年困难时期，有些党外人士讲过一些怪话，对他们还是正面教育，不予追究。有的人意识形态上和我们有斗争。思想改造的弦拉紧了，又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物质上还要照顾他们，有了进步也要表扬。就是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还是要一看二帮。对资本家的政策，不要忽“左”忽右，特别要注意，运动后不要一脚踢开。有些人老了，不能工作，就另立编制，给钱养老。两件事，一不要乱摘资本家的帽子，二不动高薪。可以向各省、市打个招呼。

**8月7日** 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向首都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八万五千多人作题为《认真学习马列，同工农相结合，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报告。勉励大家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走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工农兵结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动力而不是阻力。号召大家按照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服从组织分配，到最困难、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在实践中磨练成为符合五个标准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8月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百九十九次会议。会议听取胡克实和马纯古关于共青团和工会工作的汇报。在听取胡克实汇报时插话说：在农村，适龄团员占青年的百分之二十五比较好。工人中可以更高些。商业、学校都可以更高些。早发展青年人入团好。早几年入团入党，总是受教育多一些。全国团员可以发展到三千万到四千万不算多。少先队更要大些。今后要规定，青年团要做地富子女的工作，要做富裕中农的青年的工作。爱好文艺的，可以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可以结合自己的爱好学习毛主席的文章。青年中有共同的东西，如都要搞劳动，都要搞社会主义。但共性中允许有个性。不要一切都一样化，要多样化。学习毛选要根据自愿组织起来学。根据他的政治水准、文化水准和业务需要加以组

织和指导。

**8月10日** 晚，出席庆祝一九六五年北京国际乒乓球邀请赛胜利闭幕并欢送各国乒乓球代表队的宴会。在讲话中说：邀请赛是友谊比赛，是互相观摩、交流经验的比赛。希望各国运动员之间开展一个你超我赶，相互帮助，相互学习的运动，以便更快地提高乒乓球运动的技术水平。

△ 同意共青团中央召开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并在团中央的请示报告上批注：（一）专业作家也有辅导和培养业余作者的任务，专业作者和业余作者的关系须讲得适当。（二）现有的文艺工作者应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体验生活。

**8月上旬** 到北京郊区县视察工作。

**8月11日** 上午，列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罗瑞卿汇报林彪关于如何贯彻执行毛泽东诱敌深入战略方针的指示等。下午，继续开会，中央书记处书记参加会议。在讨论中发言说：现在和过去不同了，战争初期要争取时间疏散物资。毛泽东接着说：是要争取时间，能争取半年时间就大体够了。物资可以预先搬走，搬不走的就主动发给人民。会上，毛泽东还谈到彭德怀的工作问题，说：我赞成分配彭德怀一点工作，可以让他到三线去当第四副指挥〔1〕。彭真同志可以去和他谈一次嘛！

△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听取陈正人汇报农业机械的经营管理等问题。

**8月14日** 和夫人张洁清到机场迎接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和夫人，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砂间

---

〔1〕 一九六五年冬，彭德怀到四川任西南三线建设总指挥部第三副总指挥。

一良和夫人来华访问和休假。二十八日，陪同邓小平和夫人卓琳会见并宴请袴田里见一行。

**8月16日** 出席北京市政府召开的小麦生产会议，并在会上讲话。北京市郊区一百万亩水浇地小麦平均亩产三百斤，是新中国成立后增产幅度最大的一年。房山县南韩继生产队小麦平均亩产四百八十四斤，市北生产队等亩产达到五百三十四斤或更多，形成了互相学习，彼此赶超的局面。讲话指出：抓先进典型，抓比、学、赶、帮、超，这正是毛泽东所提倡的突破一点、推动全局的工作方法。市郊各县区都存在着先进的生产单位，市、县、区各级领导要注意发现，帮助总结经验，用先进经验去指导实际工作，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结合。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生产目标，不是靠行政命令，简单地压指标，而是发动群众，根据实际情况，参照先进经验，订出切实可行的计划，鼓足干劲，力求实现。

△ 下午，和康生、罗瑞卿、杨尚昆、安子文、林枫、乔明甫等出席邓小平召集的会议。会议讨论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的一批干部的工作分配问题。

**8月17日** 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等接见一批出席解放军各军种、兵种和公安部队举行的专业会议人员，出席水利、金融、供销合作、对外文化工作和对外贸易等专业性会议的人员，以及击沉两艘美制蒋军军舰的海军舰艇部队的代表。

△ 批示杨尚昆、平杰三：安排好李宗仁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并赴东北参观。

△ 和周恩来出席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查禾多和夫人为庆祝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二十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8月19日** 晚，会见澳大利亚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出

席第十一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澳大利亚代表团团长维克多·詹姆斯牧师。

△ 在中直机关党委请求撤销的报告上批示：“拟同意这样试一个时期再作最后决定”，并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核阅。十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央办公厅成立临时党委。

**8月22日** 到唐山煤矿视察工作。

**8月24日** 到北京房山县视察农业生产。

**8月25日** 上午，和贺龙、康生、罗瑞卿、杨尚昆、林枫、安子文等出席邓小平召集的会议。会议讨论彭德怀等二十四人的工作问题。同日，邓小平将安子文报送的《关于彭德怀等二十四人工作问题的请示》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核批。

△ 将毛泽东在一九四一年延安整风期间写的《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文稿送罗瑞卿，并告：另一件关于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路线问题的《历史决议》〔1〕容后送上。这些文稿“是主席批送（给）几位同志看的原稿，现在他作了些修改，他还在斟酌。各件阅后请退我”。

**8月26日** 下午，陪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

---

〔1〕《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和毛泽东代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的《结论草案》（又称《历史决议》），都是一九四一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后，毛泽东写的，后来，因整风尚未结束，《历史决议》未提交政治局讨论，两个文稿搁置了起来。当时毛泽东只给刘少奇、任弼时看过。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二日，中央档案馆发现后，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加以说明，在中央内部传阅。

平接见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日本二十三个青年代表团。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讲话指出：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是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任何力量也阻挠不了。中日青年肩并肩地站在时代的最前列，将战胜一切障碍，把中日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发扬光大。

**8月29日** 将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在南方各省培养提拔本地领导干部的报告呈送毛泽东。毛泽东在报告中加写：“北方老干部在南方的革命和建设中立下了很大的功劳，这点必须肯定。但在提拔新干部问题上注意不够，现在应当改变这种情况。”

**8月31日** 上午，会见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后回到北京的黄文欢和他率领的越南国会代表团。九月一日上午，到机场送黄文欢一行回国。

**9月1日** 下午，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的群众大会。在讲话中重申：“只要美帝国主义不停止对越南的侵略，不把它的侵略军队撤出越南南方，中国人民就不会放弃在支援越南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的斗争中所承担的国际义务。不管美帝国主义把战争扩大到哪一级，也不管要付出多少代价，中国人民都将坚定不移地同兄弟的越南人民站在一起，誓与美国强盗斗争到底。”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出席大会，并会见了越中友协代表团、越南电影戏剧代表团、劳动青年代表团。

**9月2日** 下午四时，到毛泽东处谈话。

△ 报告毛泽东：经周恩来批准，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订购一套轧制薄板的全连续式轧机。并送上有关材料，说明薄板是我们钢材中最短缺的一种。有了这套轧机，和我国现有的万

能轧机设备安装起来，可以满足现阶段我国薄板的需要。

△ 晚，出席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为庆祝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9月3日** 下午，主持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的群众大会。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出席大会。

**9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钱信忠的汇报，基本同意卫生部党组《关于把卫生工作的重点转向农村的报告》。

△ 晚十一时，周恩来、罗瑞卿来家中谈话。

**9月6日** 上午，和陆定一出席新华广播电台〔1〕正式播音二十周年纪念会，并参观了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二十周年展览会。接见在广播事业局工作的外国专家时，赞扬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感谢他们对中国人民广播事业所做出的贡献。

△ 下午，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周扬、萧望东等关于文化工作的汇报。

△ 晚，同许立群、陆平、邓拓、宋硕、彭珮云等谈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的工作。

**9月7日** 出席北京市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在大会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决定国家命运的根本问题，一定要搞彻底。全国农村的社教，尚需两年，北京市郊集中力量今冬明春就差不多了，然后把力量转向城市的工商业战线。文艺、教育、卫生战线，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干部，先参加一期或两期农村“四清”，参加一期工厂“四清”，对工农业战线的阶

---

〔1〕新华广播电台，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在延安成立。一九四五年正式播音。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更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级斗争情况有些了解，回来解决本单位的问题，可能事半功倍。这次运动主要是整在党内的新资产阶级分子，或搞复辟活动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原来的资本家，已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国家给他们定息，这是合法的，和现在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分子，干部中的蜕化变质、闹单干、严重“四不清”分子不同。此类问题严重的人，据运动中揭露的材料分析约占干部人数的百分之三，说明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但社教运动不能松劲，不然细菌是会发展的。至于思想方面的问题，是学习教育问题，主要是正面教育，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与人为善，一看二帮。

**9月9日** 下午，和郑天翔、万里、陈克寒、赵凡等接见出席北京市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商业战线的部分代表、应邀列席的商业先进单位代表和商业先进工作者，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 晚，出席朝鲜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郑凤圭为庆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9月10日** 去机场迎接柬埔寨王廷驻金边代表、金边市市长狄潘率领的金边市市政代表团。十一日晚，会见并宴请该代表团。十六日上午，去机场为代表团赴外地访问送行。

**9月11日** 上午，代表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向彭德怀宣布去四川担任三线建设委员会的副总指挥。在座的有乔明甫和贾震〔1〕。后将谈话情况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贺龙、康生、罗瑞卿、李井泉等报告。

△ 中午，到周恩来处谈话。

△ 下午，出席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第二届全国运动

---

〔1〕 贾震，时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



会开幕式。

△ 晚，到毛泽东处谈话。

**9月12日** 出席中共北京市委扩大会议。讲话提出当前郊区农业发展上的几个问题：（一）两个战略方向。即平原抓水浇地、拖拉机耕、电力灌溉；一百多万亩山地，有的整成梯田，有的种核桃、栗子等木本粮食等，潜力很大。今后五至十年，平原争取亩产粮六百斤，山区四百斤。（二）两种做法。一种是用总路线精神武装社员，以自力更生、穷干苦干的办法发展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工业支援农业；另一种办法是靠国家投资，等拖拉机、等化肥、等电灌，或者是靠国家贷款、投资、靠别人义务劳动，这是好吃懒做者的要求。要学习南韩继生产大队、山区的富合沟和德田沟生产大队的先进经验。别人的先进经验要学，自己的先进经验也要树立起来。（三）领导农业的方法。工业是集中的，农业是分散的；每块地的土质、水肥条件、适合种什么有差别，所以产量指标带有很大的参考性，订了指标不等于解决了问题。实现指标，还要靠比、学、赶、帮、超。要找到先进经验，突破一点，介绍给大家，带动全面。比较，是人类认识问题的基本方法，比出先进后，还要因地制宜，一看二帮、一赶二超。这是领导农业的基本方法。（四）“四清”要切实抓紧，由主要负责同志抓。

△ 晚，出席柬埔寨王国驻华大使张岗和狄潘市长为金边市市政代表团访华举行的宴会。

**9月13日、14日** 视察北京郊区县农业生产情况。

**9月15日** 晚十一时，到毛泽东处谈话。

**9月16日** 晚，听取平杰三汇报本月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统战部部长座谈会的情况。提出以下意见：（一）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是违法行为和现行的资本主义活动。“四清”

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民主人士中如没有现行反动活动的，不整他们。（二）民主人士多数是跟党走的，但不等于他们思想没有问题。资本家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间大两头小”。前几年困难时期，有人说过怪话，经过教育有所改变。运动中，主要是正面教育，有条件的，下去参观“四清”，搞点“三同”〔1〕，在实际斗争中接受教育，不搞斗争会。“三和一少”、“三自一包”，是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不是现行资本主义活动。党内有这种思想，一定要清理。对党外人士，是改造世界观的教育问题。城乡“四清”运动开展后，他们思想上的弦已经很紧了，当前的方针是要松一松，但统战工作不能削弱。

**9月17日** 下午，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陪同毛泽东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砂间一良和他们的夫人。会见后设宴招待日本客人。

**9月18日—10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计划和长远规划，并批准国家计委提出的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强调省、地、县、社四级党委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各地区、各部门必须在继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时，掀起一个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会议同意“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方针。会议在讨论财贸问题时，同意稳定征购、三年一定、藏粮于民的指导方针，并决定在“三五”期间，拿出二百亿元来调整物价，降低农业生产资料和部分生活资料价格，使广大城乡人民首先是农民获得好处。会议决定在经过“四清”的地方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争取农

---

〔1〕 三同，指和工农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村人民公社每一个生产队都有党小组或党员。

**9月中旬** 和周恩来、邓小平收阅李先念批送的商业部《关于一九六六年棉布分配的意义的报告》。

**9月23日** 凌晨一时，到毛泽东处谈话。

△ 上午，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讲话首先指出：文化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领导责任主要是中央没有及时地抓，没有坚持地系统地加以解决，书记处要负责。从文艺、学术工作来说，很多人脱离实际，脱离工农兵，没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上层建筑要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原则，文化艺术为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服务的原则。讲话还阐述了文化艺术界开展整风的几个重要问题：（一）分清是非，治病救人，是延安整风的方针，分清是非要区别两类矛盾。敌我矛盾，是劳动改造，强迫改造；人民内部矛盾，是一分为二，与人为善，一看二帮。（二）区别政治问题和学术、艺术问题。作品中不是同历史发展方向对立的问题，不要轻易地下敌我问题的结论。学术和艺术上的问题，应研究讨论。一个作品，基本正确，基本好，就应该肯定，应该爱护，应该帮助修改提高。（三）批判必须有破有立。对于一切错误的东西，反动的东西，必须坚决地破，破就是革命。但是，没有立，也就不能真正彻底地破。学术、文化艺术方面的一切批判，最后都要除旧布新，落实到建设方面。要使我们的学术、文化艺术繁荣起来，不是使它萧条。（四）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不论你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还是文艺工作者、普通老百姓，这个地方只能服从真理。该讲话中涉及文艺整风的部分以《关于学术讨论的几个问题》为题，收入《彭真文选》。

△ 上午，和刘少奇、邓小平参加毛泽东同彭德怀的谈

话，并劝说彭德怀接受毛泽东的任命，去西南三线建设总指挥部就任副总指挥。谈话后，毛泽东留彭德怀和在座诸位共进午餐。

△ 将陈伯达整理的一九五六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记录稿报送毛泽东，并附建议：“这篇讲话，虽然是在十年前讲的，但因为它系统地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根本规律，对今后工作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我们建议早日定稿发表或者先在党内发表，如何？请批示。”十月十日，将《论十大关系》印发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及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或与会的一位负责同志、党中央各部部长或代理部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小计委各同志阅。

**9月24日** 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委会六月九日关于党校副校长杨献珍的问题和处理意见的报告，批示彭真：“都看过了。”同日，中央批示同意撤销杨献珍的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和校委会委员的职务，另行分配工作，并批转了党校报告。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中央党校为杨献珍彻底平反。

**9月27日** 上午，去机场送贺龙率领的中央代表团赴乌鲁木齐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

△ 下午，和刘少奇、朱德会见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主席哈鲁尔·萨勒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代表团。二十九日，设午宴招待哈鲁尔·萨勒一行。

**9月28日** 上午，和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朱德等到机场迎接参加我国国庆活动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晚，陪同刘少奇会见和宴请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

△ 下午，出席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第二届全国运动会闭幕式。

**9月29日** 上午，和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今日柬埔寨”展览的开幕式。

**9月30日** 上午，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内务部长卡德里·哈兹比乌为团长的阿内务部代表团。谈话中向客人介绍了我国社教运动情况。

△ 上午，陪同毛泽东和刘少奇接见正在北京访问的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马里、古巴、罗马尼亚、越南等国来宾。

△ 下午，审阅《人民日报》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的国庆十六周年社论稿。

△ 晚，出席周恩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六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9月底或10月初** 收阅李先念致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信。信中说：根据群众反映，地方建设楼堂馆所成风。这股风一定要刹住。

**10月1日** 上午，出席首都各界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六周年集会并讲话。指出：我国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文化革命，文化、教育、医药卫生和科学事业正在贯彻执行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很多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深入群众，出现了一片新气象。从一九六六年起，我国将要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我们要继续高举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旗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动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向前发展。

△ 晚，会见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省省长穆赫塔尔和夫人。

**10月2日** 到机场送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一行回国。

△ 中午，和邓小平等接见并设午宴招待参加第二届全国

运动会的各体育代表团的负责人和部分优秀运动员。

**10月3日** 下午，和周恩来等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柬埔寨王国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刘少奇和西哈努克亲王分别代表本国在联合声明上签字。晚，出席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的宴会。

△ 下午，会见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副主席、国防学会主席威路约·普斯波尤多少将和国防学会主席助理尔·苏博诺海军少将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国防学会代表团。

**10月4日** 上午，和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等到机场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前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

△ 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临时人民协商会议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朱德和哈鲁尔·萨勒主席分别代表本国签字。

△ 下午，为日本工业展览会开幕式剪彩。

**10月6日** 在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农村“四清”工作队作息时间问题的通知（草稿）上批示郑天翔：农活很忙的时候（这种时间是一段一段的）社员群众也不能多开会，更不能开长会或者搞多少业余活动——包括集体学习在内。有事要解决，往往是利用田间、场里劳动中间和休息时，或者在地头或者饭前饭后，或者睡前用极短时间商议解决。七日，又嘱：此通知经（市委）书记处通过后，先作为草案，发到分团委、公社党委以上党委征求意见后，修改定稿。

△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四百次会议。会议讨论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一些问题，并对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物价调整、粮食和计划生育等事项作出决定。谈到水利和农业机械时说：小农业机械的价格，要考虑公社和大队能买得

起，不然没有出路。谈到干部退休和更新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工作的，一律退休。在此以前参加工作的老革命要包下来，时间上要划一个杠。赞成培养和使用年轻干部，“三门”干部〔1〕必须到基层至少工作两年。干部下基层蹲点，也要老中青三结合，不然发生战争时应付不了。“四清”运动中建立的贫下中农协会，是群众组织。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

**10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中央工作会议的安排问题。

**10月8日** 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谈阶级斗争问题时说：马克思的学说，就是阶级斗争的学说，政治经济学也是阶级斗争的理论。毛泽东还在会上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可以批评一下？彭真回答：可以批评。毛泽东说：让下面批评嘛。

**10月10日** 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对政治形势作了更加严重的估计。他说：小三线很重要。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如果中央搞得不对，不是讲小的不对，而是讲大的不对，如果出了赫鲁晓夫，那有小三线就好造反。

**10月12日** 上午，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就党的建设问题发言说：主席多年批评党不管党，“四清”后管起来了。党的工作、生产工作都是硬任务。无产阶级专政，不管党怎么行。出不出修正主义，还是在党。党里面不出修正主义，别处出了也不大要紧。还说：要敢于提

---

〔1〕“三门”干部，指从家门进学校门，再从学校门进机关门，没有经过基层工作锻炼的干部。

拔新生力量。基层组织建设，我们抓迟了几年，生产队要有个党小组。会上，余秋里、李先念、朱德、周恩来分别就“三五”计划、粮食和财贸问题、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和国际形势问题讲话。同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结束。

△ 晚，和周恩来、董必武接见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歌舞团并观看他们的演出。

**10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四百零一次会议。会议讨论有关三线建设、人事安排、农业生产和“四清”运动等问题。谈到青藏铁路的修建时说：现在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那些路将来总是要修的。谈到干部下乡蹲点时说：省委同志身体不好的，蹲点时就住在县里，不要勉强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谈到“四清”中地富子弟、中农子弟可否加入贫协时说：中农子弟，可以加入贫协。地富子弟表现好的可以入团入党，为什么不可以加入贫协！

**10月16日** 下午，和邓小平、罗瑞卿、李井泉、程子荣、廖志高、李大章、阎红彦、贾启允〔1〕等出席刘少奇召集的会议。会议讨论彭德怀的工作安排，宣布中央分配彭德怀到西南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彭德怀参加了会议。

**10月18日** 将延长资本家定息问题的报告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并批告：已征求各中央局负责同志意见，他们倾向于延长定息期。建议政治局常委在最近开会议定。

---

〔1〕 廖志高，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大章，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省长。阎红彦，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云南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贵州省委第一书记。



**10月20日** 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整理稿送林彪，并附言说明：这是由陈伯达主持，根据原始记录整理的。不仅保持原来讲话的风格，而且尽可能用了原话。这虽然是十年前讲的，但因为它系统地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规律，是长期的工作指针，故已建议毛主席给予指示，再加整理后发表，或先在内部发表。

**10月中旬** 收阅李先念对《关于目前党员情况和今后六年接受党员意见的报告》的修改意见。

**10月25日** 下午五时，到毛泽东处谈话。

**10月26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第四百零二次会议。会议听取赵尔陆关于国防工业工作会议和国防工业政治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

△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我国政府不出席第二次亚非会议和最近印尼局势的通报。

**10月27日** 下午，约李宗仁夫妇、傅作义、张治中等十三人来家中谈话，并设晚餐招待客人。

**10月28日** 上午，召集刘仁、郑天翔等开会。二十九日下午，继续开会。

**10月29日** 上午，和周恩来、邓小平同杨尚昆谈话。十一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免去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调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

**10月30日** 上午，出席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听取刘春汇报新疆的工作情况。

**11月2日** 在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就当前国内外形势发表看法。

**11月3日** 将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安排告杨尚昆并请办理：“此次政治局扩大会，拟开两次，第一次六日开，

先听报告（可照大名单通知），会后分组讨论。下次政治局扩大会将座谈。名单以定在三十人参加即可。目前大家看文件（共七件）。”

**11月5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陈伯达、周扬、胡绳等关于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的方针任务和中共党史编写工作的请示报告，决定马列主义研究院以研究党史和毛泽东思想为中心任务；还讨论了基本建设会议纪要，通过中央组织部提请中央任免的干部名册。关于党史编写问题，讲话说：政治局常委讨论过多次，毛泽东提名由董必武为主任，陈伯达具体主持，周扬、胡乔木和田家英参加。关于三线建设，讲了六点意见：（一）参加施工的除铁道部外共有六百七十万人，队伍比解放军大，要在建委的计划和领导下，进行整顿。参加施工的野战军，由中央统一管理、调度，先在西南、西北试点。确定方针，一个部一个部地商议，有步骤地搞。（二）物资供应以计委为主，由计委、经委、建委共同领导，物资部统一供应，送货上门。打破地方、条条的行政限制，按生产可能和必须，节约百分之十，把死材料变成活材料。（三）跨年度的大中项目，看准了的，要把包括物资供应在内的计划安排到位，打破年度计划的限制，一直搞下去。（四）逐步提高装备，装备的资金来源靠节约；手工劳动部分，要改进劳动组织，提高熟练程度，提倡改革。（五）大三线工作要抓紧。西南局三线委员会由中央局书记负责。西北、中南、湘、鄂、豫也要成立。建委要建立政治部，基层建立党团组织。小三线要抓小钢铁、小材料，各省抓紧安排。（六）新上项目要控制。突破计划，拉长战线，是最大的浪费，造成人为的紧张。材料分配不能寅吃卯粮，要有些储备，同时要抓质量，开展节约运动。

**11月6日** 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城市半工半读教育制度问题。

△ 晚，观看北京市工农群众业余创作演出，演出结束后接见演员和业余作者。

**11月10日** 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1〕《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文章诬称剧作者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通过历史人物海瑞的形象，替被打倒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鸣冤，代表他们的利益，“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打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是一株毒草”。这篇文章是一九六五年初江青在上海与张春桥〔2〕、姚文元共同策划的，整个写作过程在秘密状态下进行。同日，范瑾请示郑天翔是否转载此文。郑让他请示邓拓。邓拓电话请示正在天津的彭真。彭真说待他回京后再说。

**11月12日** 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经天津赴上海。

**11月12日—26日** 《解放日报》、《浙江日报》、《新华日报》、《福建日报》、《安徽日报》、《江西日报》先后转载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

**11月13日** 由天津返回北京。

△ 邓拓召集李琪、范瑾等开会，商定从高校等单位抽调一些人员成立《海瑞罢官》问题讨论和写作组，由邓拓任组长，组织写批评吴晗的文章，并决定向《文汇报》了解姚文元文章的来由。但范瑾等询问一无所获。

**11月15日前** 主持召开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研究是否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出席会议的有刘仁、郑天翔、万里、

---

〔1〕 姚文元，时任《解放日报》编委会委员。

〔2〕 张春桥，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

邓拓、及李琪、范瑾等。会议认为，从学术观点上批评吴晗是可以的，从政治上全盘否定吴晗是不能接受的。会议对是否转载姚文元文章没有作出决定。

**11月15日—18日** 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再次讨论城市半工半读制度问题和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计划及建设重点问题。

**11月15日** 将陆定一关于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问题的来信送刘少奇、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阅。

△ 《光明日报》总编室编印的《〈光明日报〉情况简报》第三百六十二期刊登十四日《吴晗看了姚文元批评〈海瑞罢官〉一文后的反映》。吴文写道：“姚文元说我的《海瑞罢官》作品产生于一九六一年‘刮风’的时候，这是错了。我的《论海瑞》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的《人民日报》上。《海瑞罢官》是一九六〇年写的，我没有那么大的本领预见到一九六一年要‘刮风’。”又说：“姚文元这样批评我，我也不怕。不过我觉得这样牵强附会的批评，乱扣帽子，这种风气很不好，谁还敢写东西，谁还敢写历史。”吴表示：不准备写答辩的文章，正给市委写个报告，直接送给彭真同志。毛泽东在旅途中看了这篇材料后批道：“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

**11月中下旬** 毛泽东在上海期间，得知首都各报对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均未转载，便要上海人民出版社将姚文印成单行本，向全国发行。二十四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新华书店征求订数。二十七日，北京新华书店电话订购五千册。二十九日，北京新华书店又用电报正式答复同意订购。

**11月18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接见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十五个日本青年代表团，以及在京的日本共产

党中央书记处书记砂间一良、日本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和夫人、日中友协常务理事三好一、日本民主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佐佐木一司。

**11月22日** 上午，为法国工业展览会开幕剪彩。

**11月23日** 中午，在家宴请专家王家骅、徐荫群、张孝骞、邓家栋、曾宪久、林巧稚、李洪迥等。

**11月24日** 将关于党内称同志称呼问题的通知批送周恩来、罗瑞卿：“在十月间，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书记处会议上，中央局同志们提议中央发这样一个通知。请你们阅正。再送常委其他同志审阅。”

△ 将《关于干部蹲点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草稿）》批送周恩来：“此件初稿，曾送各中央局第一书记或负责人看过。现在根据他们和别的同志的意见，又作了修改，请审阅后送毛主席审阅。”

**11月25日** 上午，会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纳赛，介绍我国正在开展的大小三线建设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

△ 晚，会见和田一夫为首的日中友协学习活动家第三次访华代表团。

**11月26日** 主持召开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讲话指出：对吴晗肯定要批评，但是吴晗的问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不属于敌我矛盾。要组织队伍写文章，对的要肯定，错的要批评。对姚文元文章也是如此。要树立良好风气，不要一批判什么人，就臭了。会议认为，如果必须转载姚文元文章，则应加上按语“表明我们的态度”。

**11月27日** 上午，会见凯山为首的老挝爱国战线党代表团。

△ 为广播事业局题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把我们的广播办得更好，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事业服务得更好。”

**11月28日**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1〕，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集首都各报刊负责人开会，布置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要求二十九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三十日，《人民日报》理论版转载，文前均加上编辑部的按语。《人民日报》的按语经周恩来和彭真修改审定，强调：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按语的精神是把《海瑞罢官》作为学术问题讨论，贯彻“双百”方针。《北京日报》的编者按指出：对吴晗写的《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其他文章，“有不同的意见应该展开讨论”。《解放军报》的按语则认为：《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必须进行批判。《光明日报》十二月二日转载姚文。

△ 将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军队干部参加地方社教安排的请示报告印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并军区政治部，代中共中央拟批语：中央同意总政治部十一月二十五日关于部队干部参加“四清”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现在发给你们，请照此办理。

△ 下午，和周恩来、朱德等接见一些专业会议和其他方面的人员。

**11月29日** 上午，召集刘仁等开会。

---

〔1〕 指周恩来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从上海回到北京后要彭真通知首都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

**11月30日** 会见高棉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布特·平姆。双方交谈了国际形势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

**11月下旬** 《光明日报》总编室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三百六十七期反映，对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有以下看法：翦伯赞〔1〕认为姚文元乱来一通，是吓人的，不利于百家争鸣。沈尹默〔2〕说，姚文元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罗稷南〔3〕认为，讨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没有意思，只能引出一批拍马屁和好出风头的人。也有人认为姚文元观点正确，但是这样来谈当代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似乎有副作用。还有人认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直接反对现实生活的，和其他的历史小说不同。这个《简报》毛泽东阅后批退江青。

**12月1日** 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同周恩来谈话。

**12月2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收到毛泽东在中共兰州军区党委会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上的批示。毛泽东在批示中说：“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阅后按照毛泽东的批示将此件转发到各军区、各军兵种、各军师党委，供他们参考。

△ 中午，和周恩来、朱德出席李宗仁为向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表示谢忱的宴会。

**12月3日** 上午，会见凯山为首的老挝爱国战线党代表

---

〔1〕 翦伯赞，历史学家，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

〔2〕 沈尹默，诗人、书法家，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上海市文联副主席。

〔3〕 罗稷南，翻译家，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

团。

**12月6日** 将毛泽东最近在华东各地所作的重要指示分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林彪、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陆定一、康生、谢富治、贺龙、聂荣臻、罗瑞卿阅。

**12月8日—16日** 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期间，留守北京主持中央工作。此次会上，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1〕等诬陷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随后，罗瑞卿被调离军事领导岗位，由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职务。

**12月8日** 《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所写《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不指名地批判翦伯赞和吴晗的“反动历史观”。

**12月9日** 晚，和胡耀邦、蒋南翔〔2〕等出席共青团中央和中共北京市委联合召开的首都青年纪念“一二·九”运动三十周年大会。大会休息时，同大学和中学生代表、青年教师、科学技术人员、下乡知识青年的代表谈话。

**12月10日** 晚，在全国青年业余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讲话。讲话提出五点希望：（一）文艺的方向和道路问题。希望大家永远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在党的领导下，运用文艺的武器，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服务，沿着这个方向走到底。不要搞个人主义。（二）希望在工农中把根子扎深、扎稳。要从工农兵的生活中吸收营养，积累材料。你们来自工农兵，这就是你们发展壮大的根

---

〔1〕 叶群，林彪夫人。吴法宪，时任解放军空军司令员。李作鹏，时任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

〔2〕 蒋南翔，时任高等教育部部长。



子，你们永远不要脱离工农兵这个土地。（三）要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观察生活，反映生活。否则，会走弯路。要精读《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著作。随着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各方面的经验的丰富，对社会生活的理解就会更深化。（四）要不断前进，不断革命。有的人身子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头脑还留在资本主义社会或者封建社会。要不断前进，不断革命，永远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五）关于业务问题。一是，提高创作技巧和艺术水平。要多读书，多看别人的作品。人类文化遗产中，有正面的、积极的，有反面的、消极的。各种各样的作品都可以看，不看就没有比较。二是，要学习、吸收工农兵的语言，然后加以精炼，加以提高。群众的实践是文学艺术的源泉。该讲话的一部分以《青年业余作家要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进》为题收入《彭真文选》。

**12月12日** 《北京日报》、《前线》杂志发表署名向阳生的文章《从〈海瑞罢官〉谈道德继承论》。文章是在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讨论批判吴晗的基础上由邓拓写的。

△ 晚，出席肯尼亚驻华大使科斯克为庆祝肯尼亚独立两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12月13日** 下午，邀集在京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建及工商联的正副主任委员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正副秘书长召开座谈会。会上着重讨论两个问题：（一）建议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四届二次会议延至一九六六年上半年召开，主要原因是有关一九六六年的工作方针及战备情况和年度工作计划，有待人大常委会会议定。（二）私营企业改造后，资方的定息是否需要再延长的问题。在座谈会结束时说：毛主席、刘主席、周恩来总理离京前

商议，考虑到工商界大中小户几十万人，为了照顾各方需要，倾向于定息再延长两三年，个别不需要的，可以放在那里。还指出：现有的劳保条例是照抄苏联的，全国三千六百万工薪人员中，有临时工二千万人，按条例不能完全享受劳保，要根本改革。当前的社教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种人在党内也是极少数人。运动将来也不会转到党外人士。对地富子女，工商业者子女，党的方针是重在表现四个字。

**12月14日** 出席中共北京市委工作会议。在郑天翔、万里（刘仁因病请假）报告后发表讲话。其要点是：（一）强调老干部在联系群众，培养提拔新生力量方面的重要作用，告诫老干部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革命化，站在前线领导革命。（二）加强党在基层的核心作用。工会、贫协都是我们的阶级群众组织，支部是我们的堡垒。（三）依靠群众，坚持民主集中制。（四）总结经验教训。（五）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扎扎实实地备战。对去年毛主席提出的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指示，北京市还没有落实；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严厉批评，我们都没有总结，我是认识晚了。告诫市委的领导干部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把自己当做客观事物对待，并提议大家自我清理一下三年困难时的精神状态，是否有过信心不足或动摇；现在形势好了，工作上去了，是否器小易盈，容易自满。在会议休息时，对吴晗说：你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脱离工农兵，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吴晗表示：我是有错误的，愿意检讨，愿意到工农兵中去。

**12月15日** 下午，看望宋庆龄。

△ 刘少奇为印发《论十大关系》一文致信毛泽东。信中

说：“此件我又看了一遍，觉得对于一些基本问题说得很好，对现在的工作仍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建议将此件作为内部文件发给县、团以上各级党委学习。”“望主席再看一遍，并批交小平、彭真同志办理。”十八日，毛泽东批示：“送交小平、彭真同志照少奇同志意见办理。此件看了，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此意请写入中央批语中。”

**12月17日** 下午五时，同刚从上海回到北京的邓小平谈话。

△ 晚八时，到刘少奇处开会。

**12月19日** 下午，出席首都各界群众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五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讲话说：南越人民在同美帝国主义直接较量中不断取得的新胜利，又一次证明了美帝国主义的本质是纸老虎。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已做好一切准备，决心同越南人民一道，为最后战胜美帝国主义这个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做出自己的贡献。相信不管美帝国主义把侵略越南的战争扩大到哪一级，不管在越南人民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多少困难和曲折，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英雄的越南人民！

**12月20日** 对如何公开发布提前还清欠苏联的全部债务提出三个方案，请周恩来批示。三个方案是：一、现在发新闻；二、一九六六年元旦社论中宣布；三、似乎在明年政府工作报告工作之类文件中宣告较好。

△ 晚，出席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团长陈文成为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五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12月21日** 毛泽东在杭州对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

思奇、关锋〔1〕说：戚本禹的文章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 下午，向当日逝世的黄炎培遗体告别。随后，离开北京赴杭州。

**12月22日** 和康生、杨成武等在杭州见毛泽东。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吴晗的《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当即报告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

**12月23日** 应约到毛泽东处单独谈话。毛泽东说：吴晗的问题，两个月后作政治结论。毛泽东还提到调查罗瑞卿问题，要彭真回北京后找公安部和中央军委同志谈，注意“地下活动”。并说：在党内军内永远不准搞地下活动。

△ 将中共中央书记处十一月五日会议纪要呈报毛泽东。二十五日，毛泽东批示：“此四件已阅。退彭真同志。”

**12月26日** 抵达上海，对张春桥说：吴晗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反右派斗争时都是左派，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吴本人也写了检查，准备公开发表；邓拓是左派，他署名向阳生的文章，北京市委书记处讨论过的。

**12月27日** 《北京日报》发表吴晗的公开检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文中承认有错误，但同时也引用史料同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歪曲据理力争。被江青、康生等斥为“假检讨、真反攻”，指责《北京日报》发表时未加按语，是对吴晗的“包庇”。

---

〔1〕 关锋，时任《红旗》杂志编委会委员。

**12月28日** 返回北京。

**12月29日** 《人民日报》发表周扬主持署名方求的文章，题为《〈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篇文章和邓拓的文章，是对“清官”和“道德继承论”的观点进行学术性的批评。

**12月30日** 出席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会议历时二十天，于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八日结束。会议期间，和周恩来、邓小平分别向会议作报告，并和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

△ 《人民日报》转载吴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

△ 将郑天翔起草的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扎扎实实开展农业战线的比学赶帮超运动》的报告送毛泽东。

**12月31日** 和杨成武同罗瑞卿谈话。

△ 审阅《北京日报》题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突出政治，是各行各业一切工作的纲》的一九六六年元旦社论稿，退《北京日报》负责人范瑾。

## 1966年 六十四岁

**1月2日** 上午，去机场送来我国疗养和访问的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纳·桑穆加塔桑及其家属去我国南方访问。

△ 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军队的有关负责人共三十多人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开会，听胡绳传达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杭州同陈伯达等谈话的内容。针对学术理论界对姚文元的文章有不同看法，在讲话中强调要采取“放”的方针，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指出：这个批判现在刚刚开始，思想斗争是长期的，不是几篇文章就能解决。现在要“放”，展开这场讨论，展开越宽越好，是什么问题就讲什么问题。在讨论中不要戴帽子，要摆事实、讲道理。还说：为了贯彻毛泽东提出要缩短大学的学制，要搞半工半读，课程要少而精的指示，已在北大、人大选定两个系，实行三年制半工半读，下乡或下工厂办学，打歼灭战。

**1月3日** 和李富春同罗瑞卿谈话。

**1月4日** 下午，萧华、杨成武、刘志坚来家中谈话。

**1月5日** 阅一份关于纪录影片《北京农业大跃进》放映后福建、浙江等地的反响的材料。批示：“北京市郊区工作有很大成绩，但千万不能自满，落后的方面、地方还很多，请注意。”

**1月6日** 为准备召开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和周恩来听取

谢富治的汇报。周恩来对保密工作提出几项具体要求：（一）要敢于负责，该过问的要过问，要管理。（二）已调离的人，不要过问、打听以及干预原单位的事情。（三）对已经调走的干部，原单位不能再给看文件，要收回出入证。（四）老首长关系要不得，不该问的不要问，不该说的不要说，要把工作关系和同志关系严格区别开来。（五）中央办公厅要搞一个工作制度，使大家自觉遵守。（六）召开一次全国保密工作会议，同即将召开的公安会议一起开，由彭真主持。

**1月7日** 下午，同叶剑英〔1〕谈话。随后，同萧华、杨成武、刘志坚谈话。

△ 因备战需要，请李富春酌批建设中央后方档案库，并批示：要在后方建库，搬去的，一般应限于真正重要和必要的〔档案〕，不能什么都往后方搬。

**1月8日**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蒋南翔汇报全国半工半读高等教育会议情况。在讨论半工半读高校的办学方式拟采取上山下乡或与工厂相结合时，发言说：要有一个统一的安排。要搞各种各样的典型，步子不要太快。在物质生产方面可以大跃进，培养研究原子能的人才，靠半工半读是不行的。三个月训练出一个大夫，我不相信。关于学制，准备大多数学校由五年缩短为四年，第一学年都下去参加劳动。少数学校搞四年制试点，试验后再推广，不要通通搞。我们有了政权，千万不要灵机一动，就下决心。有了成功的经验，都改成四年制也可以。尖子学生跳班问题，不要门门都得五分才允许跳班，要放宽。对全日制高等学校搬到农村去办学

---

〔1〕 叶剑英，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军事科学院党委第一书记。一九六六年一月八日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问题，发言说：这次在主席那里谈时，主要是文科院校搬几个到农村去，每个学校搬一两个系，促进革命化，但也不能太多。一切新事物，都要先经过试点，再普遍推广。要小心，免得把事情搞乱。

△ 将上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今年一月三日两次同罗瑞卿谈话的情况报告周恩来和邓小平。

△ 函告北京市委王镇武、韩伯平〔1〕并郑天翔，他使用的北京牌手表，和别的同志用的，均出了故障，而且故障不尽相同，“看来（质量）还没有过关，还不能过硬”。并嘱：“凡是坏了的，应该免费负责修。”

**1月9日** 参加公安部党组会议。在讲话中指出：在党内不准搞侦察，我们是一个也没有搞的。党内永远不准搞窃听器之类的东西。一万年不搞，就是不开这个例子。〔2〕

△ 下午，和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接见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农业部、建筑材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化学工业部和高等教育部在京召开的一些会议全体人员，以及解放军济南部队前卫文工团的全体人员。

**1月14日** 在外交部召开的第四次驻外使节会议上作国内形势报告。讲学习毛主席著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建设与

---

〔1〕 王镇武、韩伯平，时均任中共北京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副主任。

〔2〕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林彪等人诬指罗瑞卿、杨尚昆和公安机关在党中央领导人住处安设窃听器。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彭真会同有关省市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和公安部负责人，在北京、杭州、上海等中央领导人经常居住的地方检查是否装有窃听器，结果毫无发现。这次检查结果由有关负责人联合签署上报中共中央，并告公安部党组。



备战问题。

**1月15日** 下午，去邓小平处谈话。

**1月17日** 向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报送第六批特赦战犯名单，并附说明：“此批名单着重特赦那些改造特别好的和一般表现好又年老病重的犯人共五十八名，占现押战犯百分之十一点四。”

**1月18日** 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报告。讲形势、备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学习毛主席著作问题。

△ 将陈伯达编的毛主席语录目录送毛泽东阅，并附说明：这是请陈伯达主编的，可先看看目录，明日即可印出大字版送上。将分发中央和地方的小组征求意见，最后由书记处主持，在此件和总政、中宣部编的几个语录本中，选一个作基础，修改定稿。

**1月19日** 上午，参加公安部党组会议。讲话说：公安工作是中央直接抓的，是我联系的。经我过手的任何大事情，都是报告政治局常委同志的。上海会议后，为了调查罗瑞卿有否搞“地下活动”，毛主席曾和我谈，头一次是同康生、杨成武一起谈，第二天又和我单独谈话，并要我回京后找公安部和军委同志谈，注意“地下活动”，在党内军内永远不准搞地下活动。讲话强调：公安工作要依靠大多数人，不能只依靠少数人，要反对神秘化和孤立主义。过去统治阶级都是以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现在，我们的阶级关系变了，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专政对象不到百分之五了，为什么还要搞那套神秘主义的办法呢？我们再搞神秘主义确实是愚蠢的。秘密工作要有，那是用来对付少数反革命的，绝不许用来对党对人民群众。关于反对神秘主义和孤立主义的问题：（一）不是干部决定一切，而是依靠群众；不是技术决定一切，而是靠政治挂

帅；不是垂直领导，而是党委领导。（二）永远不许在党内搞地下活动，不允许背着党做什么事，也不准在党内搞侦察活动；不要讲小话，听小话。搞这个，如果被坏人利用，还可能上敌人陷害好人的当，蓄意把好人说成坏人，中敌人挑拨离间的诡计。（三）永远不许对党封锁，任何大事都要报告党委，使中央、主席及时了解公安部的情况。（四）永远不在党内开杀戒，也不许搞肉刑、逼供等剥削阶级迫害人民的办法。井冈山时期，毛主席就主张废除肉刑。讲话说：三月公安会议要解决这些问题，现在开始酝酿，检查工作。要按毛泽东思想建设一套公安工作，给后代留下好榜样。又说：总的讲，罗瑞卿当公安部长时，还是执行了中央、主席方针的，只是个别问题有出入。可以做这个基本估计。那时，你们公安部的文件，不仅我动过手，很多是主席亲笔改过的，有些是主席看过的。

**1月20日** 晚，和刘少奇、宋庆龄、周恩来、邓小平等在人民大会堂参加首都军民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春节联欢晚会。

**1月上中旬**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召开的小型作战会议期间，和周恩来、叶剑英到会讲话。

**1月21日** 上午，和周恩来等出席全国政协举行的春节联欢会。在讲话中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在改造社会中，同时改造我们的思想，奋勇前进。

**1月23日** 和邓小平、李富春接周恩来的来信。信中说他去天津治手病，凡有关外交、国防紧急事件送小平批办，国务院日常请示件由李富春处理。

**1月2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河北抗旱问题。

1月26日 上午，萧华、杨成武、刘志坚来家中谈话。

1月27日 审阅李先念当日急送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核批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粮食工作几个问题的通知》稿。

1月28日 将陈伯达编的毛主席语录分别批送李井泉、宋任穷、刘澜涛：此件和人民出版社及总政本，请阅后将意见告我，下月初将选一种本子作基础，加以修改定稿。

1月30日 和周恩来、邓小平约罗瑞卿谈话。

△ 中午，谢富治来家中谈话。

△ 将吴晗一月二十日的来信及随信送来的一九五九年九月吴晗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论海瑞》一文的原稿送周恩来、邓小平阅。《论海瑞》发表前，吴曾送胡乔木修改。为此，二月十八日，又将胡乔木的修改稿批送刘仁、郑天翔阅。

1月31日 收到陆定一送来郭沫若致中国科学院党组的信，信中要求辞去中国科学院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等职务。当即将郭沫若的来信和吴晗的来信一并上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并告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和北京市委刘仁、郑天翔。报送时，在批语中写道：“这次学术批判，涉及面很宽，对一些人震动很大，对思想改造有推动。”

△ 和邓小平收到周恩来的信，及随信退回拟以中共中央名义批发的批判罗瑞卿错误的文件。周恩来在信中建议：“改由总政直接发下，作为内部文件，还可稍留余地”。〔1〕

---

〔1〕 文件中，列举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有三句话：“军事就是政治”，“军事政治同等重要”，“军事政治要轮流突出”，周恩来嘱秘书查核，经查核均非罗的原话，而是林彪概括提出的。所以周恩来建议文件改由军委总政直接发下。

**1月春节期间** 同王从吾、李运昌和马国瑞〔1〕谈中央监委的工作。说：监察工作应当抓大问题，抓路线方针、阶级斗争、两条路线问题，也就是抓大是大非问题。大问题抓住了，小问题可以迎刃而解。看人要全面。一个人做工作多少年，好的方面不管，光看缺点，什么人也有不少问题，你把它集中在一块儿就不像样了。对犯错误同志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这是毛主席一贯的思想。处分人的时候，要留有余地，可写可不写的不要写。档案材料中似是而非的材料不要往里放，似是而非的材料要从档案里抽出来。知情人在时还好说，知情人不在，这些材料别人看了，很难作出正确的判断。过去延安整风，我有教训，有些人搞错了，以后做了纠正，直到现在人家还有意见。这件事我不知检讨了多少次。大会揭发批判，本人不容易申辩自己的意见。大会上一讲开，就控制不住。犯错误者有意见，要允许申辩。一个罪犯还允许上诉，一个党员不允许申辩，是违反党章的。监委要维护党章。有些单位不经上级批准，就宣布撤同级干部的职，这是违反党章的。

**1月下旬** 和周恩来、邓小平审阅了李先念报送的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推广唐山地区按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经验的报告》。一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各地转发了该报告。

**2月1日** 中午十一时三十分，到邓小平处谈话。

△ 将许立群于一月十八日、二十二日、二十八日及三十

---

〔1〕 马国瑞，时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

一日送来有关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各方面的动态情况共七份〔1〕，连同许的信汇总上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以及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陆定一、康生、吴冷西等各一份，并报告中央，拟于后日（三日）召开五人小组会讨论后向中央报告。五日，毛泽东在材料目录上批示：“江青：这批材料阅后，暂存你处。”

**2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在讨论下半年召开一次全国报纸工作会议时说：报纸如何宣传毛泽东思想，怎样以毛泽东思想办报，要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关于保密问题，指出报纸公开报道新技术多了一些，有些不该公布的公布了。有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也不必公开登报。

△ 将张劲夫同郭沫若谈话的纪要分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又将报刊上对《海瑞罢官》、“清官”等问题的不同意见的情况简介分送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范瑾、李琪、姚溱、王力、胡绳、范若愚阅。

△ 江青得到林彪的同意，从本日开始到二十日，在上海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

〔1〕 七份材料是：（一）一月十七日下午，许立群召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及《新建设》杂志等六家编辑部负责人座谈《海瑞罢官》的情况和问题。（二）一月二十六日，许立群给彭真的信，报告春节期间和张春桥通电话的内容。（三）一月二十八日，许立群摘报关锋、林杰、戚本禹文章中联系到《海瑞罢官》和庐山会议的一些提法的请示。（四）郭沫若给中国科学院党组请求辞职的信。（五）关锋一九六二年发表的几篇杂文和邓拓的一篇杂文。（六）关于上海演出过的《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纤》。（七）参加演出《海瑞罢官》的演员马连良、谭元寿的公开检讨。

**2月3日** 主持召开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小组成员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周扬因病缺席）以及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等共十一人。会议围绕印发的七份材料所反映的情况和问题，讨论了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性质、方针和队伍等问题。在会上指出：已经查明吴晗与彭德怀没有联系，《海瑞罢官》与彭德怀也没有联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现在像郭老这样的人都很紧张了。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会后由许立群、姚溱执笔写成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通称为“二月提纲”）。

△ 经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核阅，转发中共北京市委、上海市委关于加强干部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两个文件。并遵照刘少奇的建议，将中南局《关于深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定》批送《人民日报》发表。

**2月4日** 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草案分送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及陆定一、康生、吴冷西、许立群、胡绳审阅修改。并在提纲上注明：“此件因时间匆促，来不及在五人小组传阅和商酌”（指周扬未阅），他们均批示或圈阅。

**2月5日** 代表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汇报当前学术讨论的情况和问题。毛泽东当时在武汉，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周恩来、邓小平等出席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周扬缺席），以及许立群、胡绳等十一人。会上，对提纲作简要说明后，由主要起草人许立群汇报情况。会议同意《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决定由彭真等向毛泽东汇报。提纲指出：对吴晗

《海瑞罢官》的批判所展开的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他学术领域，斗争是长期、复杂和艰巨的，不是靠“几篇结论性文章或者给某些被批判者做出政治结论”，就可以完成任务的。提纲还提出：领导运动要坚持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全国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所提倡的“放”的方针；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以理服人；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不要不准革命；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等。会议同意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设立学术批判办公室，由许立群、胡绳、吴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等组成，许立群为主任。胡绳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

**2月6日** 收阅毛泽东在武汉对王任重二月四日关于印发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稿等问题的请示信的批示：“彭真同志：请商在京常委及康生、陆定一、陈伯达诸同志，修改一遍，并考虑是否应中南局的要求印发给县、团级同志看（只发中南局，作为试点，别地不发）。”此前，毛泽东于三日将该讲话稿交王任重阅读并加修改。四日，王任重提了修改意见，认为在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中，“正确执行民主集中制，是引导这个高潮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有迫切的意义”，建议重新印发。毛泽东在批示中说：“看来此问题很大，要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

**2月7日** 上午，向北京市贫农下中农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全市民兵第二次代表会议的代表们讲当前形势、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和生产等问题，并和彭绍辉〔1〕、刘仁等同两会代表及列席会议的各先进单位的代表及劳动模范合影留念。

△ 审定《人民日报》于当日发表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长篇通讯。九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学习焦裕禄的通知。通知说：河南省兰考县前任县委书记焦裕禄是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对革命无限忠诚，为人民鞠躬尽瘁，表现了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应有的优秀品质。号召全市干部、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学习焦裕禄，做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

△ 下午，和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等到刘少奇处开会，讨论周恩来准备第二天在外交部召开的第四次驻外使节会议上的讲话稿。

△ 晚，审阅余秋里准备的关于三线建设情况向中共中央的汇报提纲。批：关于三线的情况，他们正在听汇报和作进一步的布置，容后另送政治局。

2月8日 晨，和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及许立群、胡绳等乘专机去武汉。在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同意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毛泽东对汇报提纲没有立刻表示不同意见，但问：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呀？彭真回答：吴晗当然有政治错误，但和彭德怀没有牵连。毛泽东说：吴晗可以照样当他的副市长。他就不紧张了。吴晗的问题两个月后再作政治结论。毛泽东指出：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绝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可以解决的。在谈到这场学术讨论两个月以后做结论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两个月以后也做不了。在谈到有人提出要批评郭沫若、范文澜时，毛泽东说：这两人

---

〔1〕 彭绍辉，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



今后还要在学术界工作，以让他们表示一点主动，做一点自我批评为好。在谈到关锋一九六二年在《光明日报》发表的讲道德继承的杂文《人之有技，若己有之》（署名何明）中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写篇把杂文讽刺一下也可以，不要急于批判。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写点杂文不要紧。汇报结束后，代拟中央的批语，电传到北京。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中央批示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党组、党委，总政治部，“望照此执行”，并指出：“这个提纲的内容，应当向党内主管学术讨论工作的同志，和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同志传达并组织讨论。在讨论时，应当把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作为学习文件。”

**2月11日** 将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稿修改后上报毛泽东，并在报告中写道：“我们大家（任重同志参加）讨论了两次，提了些小的修改意见，供参考，请核定。”讨论修改工作是在武汉进行的，参加的有康生、陆定一、王任重、田家英和吴冷西、胡绳、许立群等。建议修改之处是：（一）文稿第二点，讲民主集中制部分，加上“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二）文稿第三点，讲在人民内部应实行民主的“占了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改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把地主、富农的子女列入团结的范围。十二日，毛泽东批示：“彭真同志：都已看过，照此办理。”当天，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发到县团级党委。

**2月12日** 和康生等十四人从武汉乘飞机到上海。请陈丕显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转交江青。

△ 和康生、刘宁一等在上海宴请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总书记宫本显治率领的日共代表团。十三日下午，和日共代表团会谈。十四日下午，去上海机场送日共代表团去广州。

△ 接谢富治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对中央领导同志在杭州住房的安全检查，有两个方案。一是以地方的公安部门为主，公安部派一般干部和技术人员协助；二是以地方为主。谢倾向于第一方案。十三日，徐子荣等六人到上海。当日下午，徐子荣即按第一方案去杭州协同检查。

**2月13日** 晚，在上海瑞金招待所同江青谈话。

△ 电话告萧望东：文化部二月二日下发各省市文化局关于今年京剧现代剧目问题的通知，即送两份，其中一份给江青。

**2月14日** 和在苏州的林彪处电话联系，告刚从毛泽东处来，明（十五日）拟去苏州探望林彪。

**2月15日** 和吴冷西、许立群等七人乘坐汽车由上海去苏州，探望林彪。康生等七人飞回北京。

**2月17日** 上午，乘飞机返回北京。

**2月18日** 上午，同邓小平谈话。

**2月19日** 上午，去中山公园中山堂吊唁陈叔通逝世，并参加公祭活动。陈叔通是二月十七日逝世的。

△ 中午，和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接见空军部队一九六五年一月以来击落来犯的美蒋飞机的作战有功人员。

**2月20日—3月1日** 率领许立群、胡绳等十一人乘飞机去四川，视察三线建设工程。乘车沿盘山公路往返六百多公里，先后视察了德阳重型机械厂、电机厂、自贡天然气大会战、盐井、攀枝花铁矿、金沙江、雅砻江铁路公路架桥工程、

西昌分钛实验厂等。陪同视察的有阎秀峰、周颐〔1〕等。在渡口市，还接见了各地、各部门前来参加三线建设的工业系统积极分子二百五十余人，并和他们共进晚餐，观看文艺演出。

**2月28日** 在成都召开三线建设问题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李井泉、程子华、阎秀峰、廖志高及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

**3月1日** 中午，乘飞机从成都返抵北京。

△ 将钟子云关于以老煤矿包新矿区建设的意见批送余秋里酌处。

△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办公室整理发出《学术批判问题座谈会讨论简况》。简况集中反映了“二月提纲”发出后有关各方面的座谈反映。

**3月2日** 中共北京市委安排吴晗去昌平区参加“四清”运动，化名李明光。

**3月3日** 上午，和邓小平、康生等去机场迎接总书记维·乔·威尔科克斯率领的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晚，出席欢迎新共代表团的宴会。

△ 下午，和刘少奇、邓小平、康生等同宫本显治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会谈。

**3月4日—8日** 和邓小平参加审查罗瑞卿问题的中央工作小组〔2〕会议，为小组成员。会议由叶剑英主持。四日，将公安部党组《关于传达讨论罗瑞卿错误问题报告》分送中央工

---

〔1〕 阎秀峰，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周颐，时任中共四川省委副秘书长。

〔2〕 中央工作小组，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为审查罗瑞卿的“问题”而成立的。

作小组的叶剑英、萧华、杨成武阅；五日又分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并印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军委常委、中央工作小组成员及罗本人。在揭发、批判罗瑞卿所谓“错误”，及中央工作小组起草向中共中央并毛泽东《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稿的过程中，一再讲要实事求是，有一条是一条；是三分错误不讲七分，不讲过头话；批判会上的发言，不是每一句都是结论，做结论时要考虑事实有否出入，根据够不够。如果讲的都是结论，还要工作组做什么！罗本人如认为材料中个别的事实或者若干事实有出入，能举出事实和证据，我们可以把它取消。

**3月5日** 下午，和邓小平、康生等同维·乔·威尔科克斯率领的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举行会谈。

**3月6日** 同意翻印毛泽东对学校课程和讲授、考试方法改革问题的批示，并嘱各省市应认真研究和检查、逐步解决。

**3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李先念、姚依林汇报财贸、商业和市场情况。谈到树立先进典型时指出：有的典型人物，在全国出了名，柜台上却见不到，越红越见不到。要从本地找典型；在宣传方面，要扎扎实实，一分为二，先进人物不是一点缺点都没有。就是宣传焦裕禄，也该如此。谈到各部门要求追加基本建设投资时说：脑子不要发热。

△ 下午，和邓小平等陪同刘少奇会见维·乔·威尔科克斯率领的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

**3月11日** 晚，许立群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来北京询问“二月提纲”中说的“学阀”何所指的情况向彭真作了汇报。在电话中告许立群：第一，没有具体指是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疮疤就是谁。第二，上海《文汇报》发

表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招呼，也不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通气？上海市委的党性哪里去了？许立群将彭真的答复用电话转告了杨永直。

△ 下午，和周恩来等去机场，送宫本显治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前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

**3月12日** 周恩来致信刘少奇、彭真、陈毅、李先念、康生：今午去天津参加中共华北局会议，讨论备战、小三线、抗旱、粮食增产和学习毛泽东著作等五个问题。会期五天。会后拟在河北、北京各地调查、学习一个月，并提出在刘少奇、陈毅等出国访问期间，可将中央掌管的外交、国防工作交彭真负责。“需要我回京时，请彭真同志给我打电话，随告随到。”

**3月17日—20日** 出席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陈伯达、康生，还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十七日下午的会议，主要谈罗瑞卿问题。在十八日会上，毛泽东说：关于毛泽东思想“最高最活，不要那样提。也不要提顶峰”。在讨论其他问题时，毛泽东插话说：我在去年九、十月份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就造嘛。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谈到学术批判问题时又说：我的意见，还是要打倒什么翦伯赞呀、侯外庐〔1〕呀等等一批才好，不是打倒多了。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帝王将相派。二十日的会上，毛泽东在谈到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时说：过去我们是蒙在鼓里的，许多事情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现

---

〔1〕 侯外庐，历史学家，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在，大学、中学、小学大部分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富出身的人垄断了。这是一场广泛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各个方面，请各大区注意一下，学校、出版、报纸、文艺、电影、戏剧各方面都要管。不要压制青年人的文章，好的坏的都不要压，对坏的要批评。现在要保几个，郭老、范老〔1〕是要保的。我们的政策是不要压年轻人，让他们冒出来。接班要那些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坚决的，有政治经验的。

3月17日 毛泽东将《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标题改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退给江青，并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这个纪要，是二月初江青在上海邀解放军总政治部几个人起草后，交由张春桥和陈伯达改写而成的。林彪按照毛泽东的批示，写信给中央军委常委，征求对纪要的意见。二十四日，毛泽东进行第三次修改，批：“增加少数文字，或者改了几个字”，请江青“酌定”，并将原件退给江青。纪要错误地认为十六年来文化战线“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我们一定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毛泽东加写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毛泽东还加写了“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

---

〔1〕 郭老，指郭沫若。范老，指范文澜。

地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中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3月18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 下午，同陈伯达谈话。

△ 晚，到毛泽东处开会。

**3月19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 晚，在周恩来处开会。

**3月20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 返回北京。

**3月21日** 去机场迎接访问朝鲜后到达北京的、以宫本显治总书记为首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二十六日，在首都各界一万六千多人欢迎日共代表团的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北京市和全国人民在讲话中向日本共产党、日本工人阶级和日本人民致以崇高敬意。

△ 晚，在周恩来处开会。

**3月22日** 主持艾思奇的治丧工作，为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二十五日，去中央高级党校礼堂参加追悼大会，并向艾思奇遗像献花圈。艾思奇是当日逝世的。

**3月24日** 在关于人民大会堂安全检查情况的报告上批示周荣鑫〔1〕：“要作为一个重大的政治性问题，严肃认真检查和处理，丝毫都含糊不得。请你抓紧解决。”

**3月25日** 将《北京市委简报》第二十九期送毛泽东。简报反映：北大法律系学生查阅一千五百卷史料，证明海瑞“平冤狱”完全是假的。在简报上附言：“我觉得这种做法好，

---

〔1〕 周荣鑫，时任国务院秘书长。

方针对。”

**3月26日** 上午，和朱德、周恩来、康生、郭沫若等去机场送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前往巴基斯坦访问。

**3月27日** 和周恩来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联合公报（草案）》稿报送毛泽东。这个联合公报草案稿是双方代表团起草小组根据双方三次会谈内容起草的。毛泽东当天对这个草案稿作了修改。

**3月28日—30日** 康生去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彭真和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扣押”关锋、戚本禹等“左派”的文章，彭批评《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文章不向中宣部和五人小组打招呼等。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毛泽东同康生谈话。毛泽东说：北京市委、中宣部包庇坏人，要解散。为什么批评吴晗不能联系罢官，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告诉彭真，不要包庇坏人了，要向上海道歉。学术批判要走群众路线。三十日下午，毛泽东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张春桥、江青等谈话。毛泽东说：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并严厉批评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泽东说：十中全会作过决议，要在全中国搞阶级斗争，为什么学术界、历史界、文艺界可以不搞阶级斗争？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并催问：彭真是否已向上海市委道歉？说：“我历来主张，中央不对时，地方攻中央。”“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指示康生将讲话电告周恩来、彭真。并每天催问是否告诉彭真了。

**3月29日** 上午，出席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在会上介绍成昆铁路从一九六四年复工到今年三月四日



接轨，在复杂的地形下，挖隧道，架桥梁，工程提前九个月完成，将于七月一日正式通车。并说明特赦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使他们进入一个“新的改造阶段”。

△ 晚十时，周恩来到家中谈话。

**3月31日** 和周恩来等听取康生传达毛泽东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在上海同康生、张春桥和江青等的三次谈话。四月一日深夜，两次给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打电话，澄清责问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情况。

△ 和周恩来向毛泽东报送《中共中央批发王任重同志关于政治挂帅问题的意见〔1〕》稿。四月上旬，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央批示指出：任重同志的发言，是讲政治挂帅的，他的意见提得很好。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现在实行的一些奖金制度等，是不符合政治挂帅精神的。我们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是靠工资、工分以外的物质奖励，而是靠毛泽东思想，靠政治挂帅，靠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之是靠人们的政治觉悟的不断的提高。此件于四月十日发出。

△ 和周恩来向毛泽东报送《中共中央对湖北省委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的批示》稿。四月上旬，毛泽东批示：“同意。”此件于四月十日发出。

**4月1日** 将中共中央转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批语稿报送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已阅，同意。退彭真同志。”十日，纪要发出。这个纪要和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并于二月十二日由中央批

---

〔1〕 即王任重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在中共湖北省委常委会议上关于政治挂帅问题的发言稿。

转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在政治上完全对立。<sup>〔1〕</sup>

**4月2日** 晚上，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信中说：三十一日康生回京，传达主席指示。与彭真、康生商定，拟开书记处会议，遵照主席指示，提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旗，彻底批判文史哲方面的反动学术思想，彻底揭露这些学术权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并按此方针，起草一个中央通知，送主席审阅。同时，指出前送主席审阅的五人小组报告是错误的，拟由书记处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议，邀集上海、北京有关同志加以讨论，或者进行重大修改，或者推翻重写。

△ 向毛泽东写出一个简短的报告，检讨自己思想跟不上，“二月提纲”有严重缺点和错误。并说：我脑子很乱，还有些问题没弄清楚，现在只能先写这些。

**4月3日** 主持召开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议。会议提出邓拓的杂文集《燕山夜话》、邓拓、吴晗、廖沫沙写的《三家村札记》应该批判，并决定成立三人小组，由刘仁、郑天翔、万里负责，下设办公室，由李琪、范瑾、张文松和宋硕负责。会上议定：对邓拓的批评分两步，先党内，后公开批判。允许讲话，摆事实，讲道理，邓拓自己也可以讲。同意邓拓辞去市委书记处书记职务，到基层去工作。决定向中央写正式报告，接受批评，明（四日）开市委会。四月六日，中共北京市委关于

---

〔1〕 一九七九年五月三日，中共中央批准同意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请示，撤销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击、迫害、错误处理的人员和文艺作品予以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

邓拓的问题向中共中央提交报告，并附邓拓的检讨。

4月4日晚，到邓小平处谈话。

△ 致信李先念，表示同意李先念四月二日来信中提出的对苏联不接受中国出口的二十吨猪肉的处理意见。并请李先念要求有关部门以后出口猪肉要注意检查和保证质量。

4月5日 将中共中央处理罗瑞卿问题工作小组草所拟《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草稿）》送邓小平，并告：“此件他们在改。我提出了一些意见给他们。罗瑞卿错误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等，提议删掉，还有些地方要改改。我请他们告林总这是我个人看后一些初步意见，供参考，供林总考虑。我提议删掉的，已划出来，他们改后，将送你和总理审阅。”〔1〕八日，将叶剑英、萧华、杨成武修改后的报告草稿送周恩来。

△ 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文化部整风的报告批送周恩来、邓小平、康生核阅，并告：已和许立群、林默涵二同志商议，拟把其中有些问题分别写文章在报刊上公布。那样看的人还多些，作用可能更好些。要下发，可由中宣部酌量自处。

△ 召集吴冷西、许立群、姚溱、胡绳、林默涵、陈浚〔2〕、关锋及刘仁、郑天翔、万里、李琪、范瑾、张文松、宋硕等开会，研究学术批判问题。检讨说：在学术批判问题上我没跟上主席，犯了经验主义，情况变了，还想继续用一九五七年的办法“放”。我的严重错误就在这里。从现在开始，在学术批判的做法上，要放手大搞全民战争，正规军、民兵都要

---

〔1〕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这个文件指责彭真“在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上，对罗瑞卿同志的错误，采取了缩小、掩护、包庇、支持的态度，并且企图给罗瑞卿同志待机翻案做种种准备”。

〔2〕 陈浚，时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

上，烧到谁就是谁，不要受任何约束，打破清规戒律。还说：邓拓同志思想上错误的东西不少，但他对三面红旗是拥护的。

**4月6日** 下午，和邓小平到周恩来处谈话。

**4月8日** 将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学术批判问题的报告》批交刘仁和市委书记处同志斟酌后上报中共中央。

**4月9日、11日、1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周恩来、陈伯达、吴冷西参加会议。会上，康生传达毛泽东三月底三次谈话中对彭真及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批评和指示。康生、陈伯达等针对彭真的所谓“严重错误”进行批判，彭真被迫作检讨。根据毛泽东谈话精神，会议决定：（一）拟以中央名义正式通知撤销五人小组的“二月提纲”，由陈伯达起草通知。（二）拟决定成立以陈伯达为首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为中央起草关于文化革命的文件并报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十二日，和周恩来、邓小平联名（邓小平执笔）写信将会议情况及由陈伯达起草的《中央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一并报告在杭州的毛泽东。信中写道：彭真和到会的一些领导人“对这次重大错误都作了初步检查”，“一致同意主席的批评和指示”。信中还就解决罗瑞卿问题、三线建设和五年计划问题拟请安排听取汇报。

**4月10日** 主持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议。刘仁提出：加强《北京日报》的学术宣传工作，停办理论刊物《前线》。郑天翔提出：哲学、历史、经济三个学会停止活动。

**4月14日** 召集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及李琪、范瑾、张文松、宋硕等开会，继续研究公开批判邓拓问题。说：邓拓是市委领导集体成员之一，又是市委书记处书记，要公开批

判，得经中央批准，不然不合组织原则。问：四月八日给中央和毛主席的报告是否写了“当否，请示”？有同志回答说：没有写上。得知这个情况后说：有漏洞，应该写上，请中央批示。是否再写一个报告？与会人员多数主张赶快公开批判，别再请示。此时接周恩来电话，即退出会议。

△ 和周恩来、邓小平接到毛泽东于上午九时从杭州写来的信。信中说，周恩来、邓小平和彭真十二日联名上报的信及附件，“收到阅悉”。为修改陈伯达起草的关于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稿和中央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请康生、伯达同志和其他可能去上海的起草组的同志于今日（十四日）或明日去上海，同上海同志商量一下文件问题，然后请康生、伯达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间或十七日上午来此地。你们可于十六日来此，各中央局是否要来人，请你们酌定”。

△ 上午，毛泽东在陈伯达报送的四月十二日通知稿上“有一些修改”，“送恩来、小平、彭真、康生同志”斟酌。

△ 晚八时三十分，周恩来到家中谈话。

△ 晚，召集刘仁、郑天翔、范瑾等继续商议批判邓拓事。

**4月15日** 主持召开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讨论修改准备在次日见报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和《前线》批判《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两书的编者按。在会上给邓拓打电话，告之明天公开批判《燕山夜话》。在会上发言说：我在文化革命上犯了路线错误，已在中央书记处作了检讨，以后还要检讨。明天要到主席那里去。说完随即离去。会议继续讨论。郑天翔说：和彭真研究，先重登两书中几篇文章，供批判。同时，由李琪、范瑾等起草的编者按十六日见报。

**4月16日** 和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毅

及各中央局负责人到达杭州。到杭州后，通过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转告，请求和毛泽东见面，只需谈二十分钟。没有得到回复。

△ 《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刊载了吴晗、邓拓、廖沫沙在《前线》和《北京晚报》上发表的五篇杂文，并发表题为《〈燕山夜话〉究竟宣扬了什么》的批判文章。《前线》杂志和《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表示：发表了这些文章而又没及时地批判，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头脑中有着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以致在严重的斗争中丧失了立场或者丧失了警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总社当天广播了这个按语。当晚，新华总社通知撤销。这件事被康生等称为“四一六”事件。十八日，康生说这是假批判、真包庇，假装自我批评。十九日，以中央书记处名义，通知首都各报都不要转载，各高等院校、各机关、各基层单位停止执行中共北京市委布置的“制造混乱”的措施。

**4月16日—24日** 出席毛泽东在杭州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集中批判彭真，同时讨论撤销“二月提纲”和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出席会议的还有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叶剑英等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刘少奇于二十日出访回国后出席会议。会议印发了揭发彭真、陆定一的七个材料，并批送中共北京市委全体委员阅。毛泽东在讲话中批评彭真说：《芦荡火种》在北京只准演三天，延长一天也不行，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毛泽东问邓小平：你看怎么样？邓小平答：我和彭真同志的工作关系是正常的。毛泽东又问周恩来。周恩来答：我找北京市的人，要找什么人就找什么人。毛泽东接着对彭真说：这是对你的批评帮助，不要紧张。在毛泽东批评时始终没有说话，会后向周

恩来进述《芦荡火种》演出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并告诉他原来已经委托万里安排好了在京演出的场次。周恩来问：会上你怎么不说话呢？回答说：我不好当面顶撞主席。二十二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讲话中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朝里有人，比如文化局、宣传部等等。斗争要逐步地展开，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批评一二个。军队也有。所谓朝里，不光中央，部门，包括各区、各省市。朝里那样清，我不相信。讲话批评彭真和五人小组搞的“二月提纲”，说：“二月三日急于搞一个五人小组文件，迫不及待。在武汉谈整左派，我不同意。”认为“各地方党委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会议期间，彭真作了检讨。当检讨到“二月提纲”的错误，刘少奇、周恩来插话表示他们也有责任时，当即表示：这个提纲错了，应由我个人承担责任，与刘少奇、总理、小平同志和其他同志无关。他们没有也不应承担。还说：说我搞阴谋，我不是那样的人。主席也说我是阳性子。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对彭真说：“不要紧张，帮助你。”“事情总是可以审查清楚的。”二十四日，会议基本通过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决定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这次会议为即将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做了准备。

**4月23日** 上午，叶剑英等同彭真谈话。下午，李井泉等同彭真谈话。

**4月24日** 下午，林彪同彭真谈话。主要批评彭真在东北工作时期犯了路线错误。彭真说：是路线性错误。林彪说：你把这个“性”字去掉。谈话之后，彭真对别人说：东北问题我在七届四中全会上检讨过了，当时林总对我的检讨很满意，

还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我们之间的误会从此消除了。我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怎么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4月26日** 晚，在李雪峰、宋任穷“护送”下，乘火车离开杭州，到上海后改坐飞机，二十七日晨返抵北京。在路上，有人建议彭真给毛泽东写信表示一下态度。彭真说：你的建议很好，应该这样做。可是我现在脑子很乱，有许多问题一时还想不清楚，理不出头绪来。几次提笔，未写下去。

**4月28日** 毛泽东在同陈伯达、康生的谈话中，继续严厉批评彭真和中共北京市委，说北京市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真按照他的世界观来改造党，事物走向反面，他已经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要求对彭真的错误“彻底攻”。

**5月4日—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当时在杭州，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情况则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会议在很不正常的气氛中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五日下午和六日上午，召开座谈会，由康生传达一九六二年以来特别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后，毛泽东批评彭真、陆定一，提出要解散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开展文化革命的一系列讲话。六日下午和七日上午，张春桥讲一九六二年以来的斗争，矛头对着彭真、陆定一、周扬等。十一日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

**5月4日** 向刘少奇、邓小平提出北京市的工作，他以后不管了。刘少奇、邓小平表示同意。

**5月7日** 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李雪峰到中共北京市委接替彭真的工作。十一日，李雪峰率领中共中央华北局工作组到中共北京市委。

**5月15日**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首都工作组。叶剑英任



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王尚荣任主任。首都工作组负责首都的安全保卫工作，直接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负责。

5月16日上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宣布停止和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职务；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后通称为“五一六通知”）。〔1〕这个通知是四月中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建议由陈伯达为首的起草小组起草，按毛泽东指示，由陈伯达、康生在开会前专程去上海和江青等共同研究、修改后提交会议讨论的。毛泽东改写和加写通知稿时，言词严厉，号召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

---

〔1〕 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是集中代表“左”倾方针的文件。

一点”等。同时加写：“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彭真看了“五一六通知”后对女儿傅彦说：赫鲁晓夫式人物不是指我，我不够格。

**5月1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攻击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大谈宫廷政变问题，诬称中国共产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还称“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 上午，在彭真家中的工作人员和三名警卫战士共八人被调离。

**5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简短检讨发言中承认自己有错误，但坚决拒绝林彪强加的罪名。说：至于搞政变、颠覆中央、里通外国，我连做梦也没想到。至于我同罗瑞卿、陆定一有没有反党联系，请中央审查。

**5月22日** 谢富治带人到家中通知，中央决定不再给他看文件，并要求把与罗瑞卿、陆定一来往的文件拿走。彭真说：连纸片都拿走。谢富治电话请示后，即用吉普车把家中的文件包括工作日记等全部收走。从即日起，被软禁家中，失去人身自由。

**5月23日** 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决定：（一）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二）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职务，撤销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长职务等。（三）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调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他们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由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 李雪峰在北京饭店主持召开中共北京市委工作会议。宣布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的通知，撤销刘仁的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职务。六月四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任命李雪峰为第一书记，吴德为第二书记。

**5月2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审查委员会，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专案审查。

**5月25日** 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在康生的指使下，联名贴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康生将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底稿送给在杭州的毛泽东。六月一日，毛泽东批示康生、陈伯达：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当晚，新华社向全国播出。二日，《人民日报》刊出，并发表《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污蔑北大的共产党组织是“假共产党”、“修正主义的‘党’”，煽动群众起来彻底摧毁“黑帮”、“黑组织”。全国许多城市的大中学校很快出现了以共产党组织负责人、校长、教师为对象的“斗黑帮”的混乱局面。

**5月28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宣布重新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为副组长，关锋、戚本禹、姚文元为小组成员。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通知，在陈伯达病假或今后离京外出期间，由第一副组长江青代理组长。后来，这个小组逐步取代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机构。

**6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授意和改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 交出中南海的出入证。

**6月** 中共北京市委在西苑饭店召开北京市农村“四清”工作团会议，会上批判彭真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一日、一月二十三日、一月二十五日、二月五日、二月十八日、五月四日关于“四清”运动的讲话及一九六三年七月四日给毛泽东、中共中央写的《有关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五反”等若干问题的报告》。七月二十二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批判“彭真关于‘四清’运动的六篇讲话”的通知，并附上《彭真关于“四清”运动的六篇讲话》。

**7月9日** 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成员康生宣布成立彭真专案小组并主持召开彭真专案小组第一次会议。康生提出“彭真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审查的任务是搜集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的“材料”。康生提出他“设想的几个问题”，要专案小组去寻找材料。

**7月18日** 经康生审定，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写出《工作初步安排》，工作重点是“搜集材料、熟悉材料，提出彭真反党事实的题目。”此后专案小组办公室多方寻找诬陷彭真的材料。

**7月27日** 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群众大会上造谣说彭真、贺龙搞“二月兵变”。他说，今年二月底、三月初在北京，彭真、贺龙他们策划政变，计划之一是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驻部队，而且看过房子。八月二日，邓小平在中国人民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当着康生的面明确地说“没有这个事”，“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别人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

**8月1日—12日**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

定》（后通称为“十六条”）。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原来的七人扩大为十一人，增加了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改组后的政治局常委的名次排列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会议没有重新选举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但除林彪外，原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中央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会议增补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政治局委员，增补李雪峰、宋任穷、谢富治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改组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撤销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补选谢富治、刘宁一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全会认为从“揭发的大量事实证明”彭真的“错误性质是极端严重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会后，彭真对女儿傅彦说：“我们要一起做到两条：第一，谁也不许自杀；第二，不管发生什么，不许反对毛主席。”

**8月14日** 林彪将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整理的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阴谋政变的种种迹象》报毛泽东。该报告造谣说：近两年来彭真极力抓武装力量（北京公安总队），在部队中扩大个人的影响，力图把首都各要害部门的警卫置于彭真等亲信的掌握之中，如人民大会堂、中山公园等。“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不但是有思想、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而且在搞反革命政变方面，也做了很多准备，有很多异乎寻常的做法。”

**8月18日** 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向康生等报送《关于

“畅观楼事件”〔1〕的材料》，造谣说：“‘畅观楼事件’”是彭真亲自策划的篡党篡国的地下活动”。十九日，康生将此材料送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等。

**8月20日** 康生主持召开彭真专案小组第二次会议，康生在会上提议：“用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名义，出些题目，要彭真交代问题。”康生在会上要专案小组重点查彭真“在东北一段反林总〔2〕”，搞“桃园三结义〔3〕”；要“搞个彭真问题大事记”，要“以中央的那个大事记〔4〕为纲”。他还造谣说彭真

---

〔1〕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二月间，为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同时也为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做准备，中共中央书记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组织选编了一九五八年以来一部分中央文件和《毛泽东同志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在两条路线上的斗争》。彭真也据此布置北京市委组织一部分同志对一九五八年以来中央各系统下达的与北京市工作有关的文件，进行清理检查，同时对北京市委下发的文件也进行了清理，以备在全面检查北京市工作时作参考。这项工作于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在北京西郊动物园畅观楼进行，最后整理出了一份《中央文件摘要》。因中央书记处已完成对这段时间中央文件的检查工作，这份《中央文件摘要》没有上报，一直放在文件柜里。彭真专案小组无视事实，把这件正常的工作，诬蔑为是彭真策划的篡党篡国地下活动的“畅观楼事件”。

〔2〕 林总，指林彪。

〔3〕 桃园三结义，是林彪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中污蔑、攻击彭真时提出的。林彪说：彭真在东北“搞桃园三结义”。诬指彭真、林枫、吕正操三人在东北局工作时结成“联盟”反对林彪。

〔4〕 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采取秘密手段对付中央”，“进行地下活动”，“他的女儿托人送一箱文件〔1〕到乡下”等问题。二十九日，康生批准专案小组办公室于二十七日拟出的所谓六个“问题”。

**8、9月间** 根据彭真专案小组意见，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文化革命委员会编写出《彭真在中央指出他的“汇报提纲”错误后的反党阴谋活动大事记》初稿。康生审阅后批：“基本可用，要求再加补充。”

**9月5日** 给汪东兴写信，并请转李富春、谢富治。

**9月23日、24日** 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人员连续两天同彭真谈话，责令他交代家庭及政治历史问题。二十七日，写出家庭及政治历史问题的材料交专案小组办公室。

**9月30日** 康生在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的《专案简报》第九号上批示，斥责专案小组办公室人员九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与彭真谈话“考虑不周”、“陷于完全被动”，提出：“以后每次去同他谈话前，要先做准备，先考虑策略和方法问题”，“要他写详细的自传”。

**10月3日** 根据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的要求，写出《初步检查》。

**10月17日** 根据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的要求，写出《我的自传》。

**11月18日** 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看了《我的自传》后，要求详细写三次被捕经过。为此写出《关于〈我的自传〉的补充》，详细说明一九二四年秋在太原被拘留、一九二七年春夏之际在天津法租界参加工会会议时被法工部局抓去，以及一九

---

〔1〕 所谓的“文件”，其实是彭真自己写的自传草稿和一些照片。这些草稿和照片傅彦托人拿到安徽保存，后被受托人上交。

二九年在天津被捕的情况。

**11月28日** 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首都文艺界“文化大革命”大会上宣读经林彪同意的讲话，公开点名批判彭真、刘仁、郑天翔等原北京市委领导人，号召造反派要对他们组织批斗。此后，被轮番残酷批斗。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到一九六八年七月被关进秦城监狱前，被批斗二百余次。

**12月3日** 毛泽东阅新华社电讯稿《首都革命文艺大军举行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批示：“退总理：已作修改，请再酌。”周恩来十二月二日的送审报告说：“这一报道已经文革小组通过，并经林彪同志同意，现送请主席审批。在第七、九、十三页中，有三处指名批判了一些人，是否合适，请主席批告。”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这三处所点的一些人的名字，包括：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陈克寒、李琪、赵鼎新、陆定一、周扬、林默涵、齐燕铭、夏衍、田汉、阳翰笙。这篇新闻稿发表在十二月四日《人民日报》。

**12月4日** 零时，被一些大学的造反派从家中劫走。夫人张洁清当即电话报告周恩来。北京卫戍区执行周恩来命令，于六日把彭真送到卫戍区某部驻地监护起来。

**12月12日、29日** 和刘仁、万里被押到北京工人体育场批斗。

**12月14日** 写出思想汇报。其中说：我确实没有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企图，确实没有搞政变的企图，这是实实在在的。

**12月24日** 和红卫兵对话。说：我的问题在中央会议上都交代过了，我没什么可隐瞒的。

**12月26日** 和红卫兵对话。说：我在敌人的狱中没有问题。没有一个人因为我的口供而遭被捕，没有一个机关因为我的口供而遭破坏。我没有损害党的利益，我同敌人作了坚决斗



争。

△ 根据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的要求，张洁清写出《我的自传》。

△ 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全国红色造反者总团”部分代表时，江青大叫：“完全可以斗争彭真一次！”此后，批斗彭真的规模扩大，批斗次数更加频繁。

**12月27日** 康生召集中央专案工作人员开会，讲话中诬陷彭真“搞那个处理叛变自首的决定〔1〕”是“招降纳叛反动的组织路线”；还诬指彭真“在畅观楼搞地下活动”。

**12月31日** 被押到通县群众大会批斗。

---

〔1〕 一九三六年四月，刘少奇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要被关押在国民党“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草岚子监狱）的一批共产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程序出狱。这一决定经中共中央批准由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具体实施。在作出这一决定时，彭真没有参加。同年夏末，彭真接任北方局组织部长后，继续执行这一决定。

## 1967年 六十五岁

1月1日—4日 连续受到红卫兵的逼问。坚决否认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否认所谓“畅观楼事件”。在受逼问过程中，遭到殴打。

1月4日 被押到北京工人体育馆群众大会批斗。

1月5日 从批斗大会回到住地后说：开会时把人家压在地上，拧得人家都趴下了，这叫什么文斗。文斗是讲理，把事实摆出来。

1月10日 江青在接见“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北航红旗”等群众组织讲话时，诬指彭真、林枫、吕正操是“桃园三结义”，是“在东北结成的一个反对林彪同志的、带有封建性的反党小集团”。江青的讲话记录稿于十三日送林彪。林彪批示：“同意。”

1月11日 被押到北京工人体育场批斗。

1月14日 面对红卫兵逼迫写交代材料的斥责，一再坚持说：我的历史和错误都给中央和毛主席谈过了。有些问题在这里不能谈、不能写，这是组织原则。

1月20日 受到中央办公厅红卫兵审问，被指责包庇陆定一的错误。

△ 针对彭真专案小组强加的四项“罪行”，写出《关于“彭、陆、罗、杨”和“畅观楼事件”等问题》的申辩书。明确提出：“我确实没有同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搞不利于党

的阴谋活动和组织，我确实没有同他们搞反党、篡党、篡军、篡政、篡文的秘密罪恶活动。我决没有要任何人私自‘审查’毛主席和中央指示、批示或讲话等。”“这不是我‘坦白不坦白’、‘交代不交代’的问题，是实际上我确实没有这些罪恶活动。”针对所谓“曾出卖地下党负责同志多人”的诬蔑，申辩书以确凿的事实说明“我被捕后，没有任何同志因我的口供被捕，没有党的任何机关因我的口供遭受破坏，并且尽力维护了组织的安全。决没有曾出卖地下党员负责同志多人的情况。”

**2月1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文艺团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提出：“必须彻底揭发和清算彭、陆、罗、杨反革命集团的罪恶。”

**4月8日** 林彪在给江青并报毛泽东的信中说：彭、罗、陆、杨专案，是否可统交伯达、康生、谢富治、萧华、杨成武、戚本禹负责，请主席批示。

**4月10日** 被押到清华大学批斗。

**4月14日** 康生致信聂元梓，要其“组织调查组，系统地调查彭真、刘仁的问题”。聂元梓成立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揪叛徒兵团”（即新北大公社第二战斗队），炮制了“彭真、薄一波、安子文、胡仁奎、李伦特务案”的诬陷材料，报康生。康生将此材料批送给彭真专案小组。九月，彭真专案小组援引“第二战斗队”提供的诬陷材料，写出《彭真包庇国民党大特务胡仁奎、李伦进行特务活动，并通过胡、李与蒋介石、阎锡山暗中勾结》的诬陷材料。

**4月20日**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谢富治任主任。当日召开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谢富治在讲话中以“旧北京市委的主要负责人”不点名地列举了彭真从抗日战争前到解放战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文革”中的所谓

“罪行”。

**4月22日** 受到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人员的审问，讲述了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七年在北方局工作情况。

**4月23日** 被押到中国科学院批斗。

**4月24日** 被押到北京大学批斗。

**4月26日、28日** 被押去一些组织开的大会，接受批斗。因连续遭批斗，身体极度虚弱。

**4月** 康生在同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谈话时，对《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宣言（草案）》发表意见，提出：“应宣布旧北京市委的罪状”，“要点彭（真）、刘（仁）、郑（天翔）的名，宣布他们的死刑”，“要揭彭真的盖子，大会一开就接着搞彭真”，“要一针见血地宣布彭真的死刑”，“全面批判彭、陆、罗、杨的罪状。要列出几条，这就可以震动全世界”。“刘、邓就是彭真，是一码事”。

**5月16日—20日** 受到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人员连续审问所谓历史问题。

**5月17日** “五一六通知”在全国各报公开发表。《北京日报》发表社论《打倒彭真！》。

**5月18日** 《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联名发表《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诬指“彭真抛出的‘汇报提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是一个资本主义复辟的纲领。这个纲领的出笼，是彭真修正主义集团由来已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的大暴露，‘五一六通知’揭露了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

**5月22日、24日、25日** 受到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人员审问，否认是叛徒。

**5月27日** 《红旗》杂志发表社论《两个根本对立的文

件》，诬指“汇报提纲”“是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下，从二月三日到七日，在北京精心炮制出来的。这个提纲，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纲领，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

**6月13日、15日** 受到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人员审问。

**6月17日** 《北京日报》发表社论《彭真——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诬指彭真是“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头子，是妄图篡党、篡军、篡政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是“大叛徒”、“反共老手”。

**6月27日** 被批斗后腰部受伤，右手不能拿东西，疼痛难忍，无法入睡。向哨兵要止疼片，没要到。

**7月10日** 母亲魏桂枝被曲沃县造反派多次批斗，身心受到严重折磨，含冤去世。

**7月19日** 夫人张洁清被捕关进秦城监狱，编为六七五一号。被逮捕的还有张洁清的姑姑张秀岩、弟弟张文松和杜文敏，弟妹黄甘英。

**7月24日** 被押到北京大学批斗，遭到殴打。

**7月31日** 被押到公安部批斗，遭到殴打。

**8月3日** 被押到地质大学批斗，遭到殴打。

**8月9日** 受到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人员审问，坚决否认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8月28日、29日** 受到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人员审问，讲述了一九三五年被国民党当局释放后，继续从事革命斗争的工作情况。

**9月中旬** 毛泽东在从上海回北京途中视察时，提出明年春天“文革”结束，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

多老同志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他列举了邓小平、乌兰夫、彭真、贺龙等人。

**9月23日** 曲沃县革命委员会根据捏造的事实，将彭真家庭成分由一九四九年土改时划定、一九六六年四月“四清”时复议确定的下中农改为地主成分。十月八日康生看了《曲沃县革命委员会关于划定彭真家庭为地主成分及其他有关问题的决定》后，批示：“交彭真专案组存。”专案组以此为依据诬指彭真“出身地主家庭”。

**9月** 彭真专案小组从家中搜出一部有收发报功能的轻便小收音机，责令彭真交代收音机的来历和用途。为此，写书面材料，说明：小收音机“是一九四七年我从哈尔滨到西柏坡时，东北局社会部汪金祥或东总参谋长刘亚楼，为了途中便于收听广播送给我的。我到西柏坡后，曾继续用它收听广播，很多人都知道。这部小型收音机据说是可以收发报的，但我一直用来收听广播。能否发报不清楚，因为没有用过，并不是什么特务电台。”彭真的小儿子傅亮因为曾用此收音机收听广播被关押，时年十五岁，直到一九七二年初才获释。

**10月6日** 受到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人员严厉斥责：“表现太坏。”

**11月23日、27日、28日** 受到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人员审问，坚决否认被国民党逮捕后有叛变活动。

**11月2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通报中说：彭真等“绝不能留在中央委员会里”，“不能选为‘九大’代表”。

## 1968年 六十六岁

**1月14日** 康生秘书齐景和给康生写报告，诬陷北京市公安局是彭真、罗瑞卿、刘仁“窝藏各色特务的巢穴”，十名正副局长“有五名特务”；干警中有一千多名“历史反革命”，一百三十多名“日、美、蒋各色特务”。此后，原北京市公安局有六名正、副局长和六十六名处长、区县局长及其他干警被逮捕入狱；九百七十四名干警被送进劳改场所关押审查；七千四百多人被赶出公安机关，先后有九十八名公安干警被迫害致死。

**3月1日** 齐景和给康生写报告，诬陷彭真、罗瑞卿“为敌特机关承担义务”。

**3月27日** 受到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人员的审问。

**4月18日—20日** 受到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人员的审问。审问人员斥责彭真在人大常委会开斗争会时态度嚣张。回答说：我这是坚持实事求是。

**4月22日** 康生、谢富治、叶群、曹轶欧〔1〕接见彭真、刘仁专案小组办案人员。康生说：彭真专案组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思想右倾，提出“把刘仁专案组、彭真专案组合并”。并诬陷说：彭真“是个日本特务，同蒋介石、美国人都有联系”。六月一日，彭真专案小组与刘仁专案小组合并为彭真、

---

〔1〕 曹轶欧，康生夫人。

刘仁专案组。

**5月6日、7月3日、7月30日** 齐景和起草审定三个报告送给康生，诬陷刘少奇、彭真、罗瑞卿、刘仁“投敌叛国”，和蒋介石、蒋经国以及中统局、军统局的特务头子郑介民、叶翔之有联系，“进行特务活动”。

**5月20日** 林彪随同毛泽东接见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人员时，诬陷彭真“是国民党的人”，“他是很坏的人”。

**5月21日—24日、28日—31日** 受到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人员审问。回答在东北工作期间搞的要求释放张学良〔1〕运动的有关情况。

**5月** 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按照谢富治指示，炮制了《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特务间谍活动的一些情况》的材料，诬陷彭真、罗瑞卿“里通外国出卖情报”。此材料由康生送毛泽东等。

**6月3日、8日** 继续回答彭真、刘仁专案组办公室人员关于东北工作期间要求释放张学良运动有关情况。

**6月6日** 康生在彭真、刘仁专案组的报告上批示，要求重点搞“彭真内奸的现行罪”，“要紧紧抓这个问题”。

**7月4日** 康生在接见彭真、刘仁专案组时说：“要把彭真逮捕，送进秦城监狱。”

**7月9日** 彭真、刘仁专案组按照康生授意，以聂元梓报送康生的由“新北大公社第二战斗队”编写的《彭真、薄一波、安子文、胡仁奎、李伦特务案》的诬陷材料为主要根据，

---

〔1〕 张学良，东北军爱国将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和杨虎城一起发动西安事变，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被蒋介石长期关押。



写出《关于逮捕大叛徒、大特务彭真的请示报告》，提出：“彭真不仅是大叛徒，而且是隐藏在党内罪恶累累的大特务。在监护期间他的反革命气焰一直非常嚣张，拒不交代问题。建议将彭真立即逮捕，送交秦城监狱关押。”十日，康生批示：“拟同意。”十五日凌晨，彭真被从北京卫戍区营房临时关押处转送关押到秦城监狱，关押在二〇四监区六十六号监房，编号为六八一七一号。

**7月12日、13日、16日、23日、24日** 受到彭真、刘仁专案组办公室人员审问。回答有关特情工作的问题。

**7月24日** 为北京市公安局被诬陷为“通敌”的两名公安干部分别写出两份证明材料，证明做特情工作“是我批准的”，“我都应负责”，承担责任，保护干部。

**8月6日—9日** 连日受到彭真、刘仁专案组办公室人员的审问。驳斥对特情工作的诬蔑，指出：逆用特情，对侦破敌情案件是成功的。

**8月7日** 为北京市公安局被诬陷为“通敌”的三名公安干部分别写三份证明材料，证明“逆用特情工作的政策原则是我同意的，我也要负责”，“我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圈，是表示我同意我负责”，再次承担责任，保护干部。

**8月8日** 为北京市公安局被诬陷为“通敌”的公安干部再次写证明材料，郑重声明：“选派逆用特情”，“整个说都是我批准的，出了什么乱子我都要负责。”“他们可能有专题报告，我批了我也得负责。已经造成什么恶果，造成什么损失，有多大罪，有多大的责任，我也不推。”

**9月10日** 受到彭真、刘仁专案组办公室人员的审问。被指责拒不交代、顽抗到底。

**10月13日—31日**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

议讨论召开党的九大问题；批准用伪证编造的刘少奇所谓罪名的报告，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

**11月** 康生、谢富治指示，在北京市第二学习班设立彭真、刘仁专案组外围组，搜集彭真、刘仁等原北京市党政领导干部的材料。

**12月** 为彭真、刘仁专案组写补充交代材料。

## 1969年 六十七岁

2月12日、13日 受到彭真、刘仁专案组办公室人员的审问。回答东北局工作期间的一些问题。

4月1日—24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合法化，林彪、江青<sup>〔1〕</sup>一伙亲信进入中央委员会。林彪被选为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5月19日 毛泽东召集周恩来、李先念、叶剑英等开会，批评一些地区清理阶级队伍搞扩大化等错误时说：“专案组材料至少一半不能相信。”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又指出：“搞专案，许多是靠不住的，是道听途说的。内查外调搞不出什么东西，搞逼供信，一逼就供，一供就信。”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同中共湖北省委、武汉军区几位负责人谈话时明确指出：“受监护的人，统统放了，不管他职务大小，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看搞专案小组很危险。他怕右了，就要千方百计把人家打成反革命。”

9月18日、19日 受到彭真、刘仁专案组办公室人员的审问。

12月9日 《北京日报》发表北京市革命大批判写作小

---

〔1〕 江青，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组的文章《批判彭真的〈前线〉发刊词》。

## 1970年 六十八岁

9月上旬 从广播中得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召开的消息。此后，注意到报纸上不再出现陈伯达的名字，并出现了开展“批修整风”运动的报道。

## 1971年 六十九岁

9月13日 林彪、叶群在策划反革命政变阴谋败露后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机摔死。此后，从报纸上发现不再出现林彪名字，对种种动向作更加深入的思考。

## 1972年 七十岁

**4月24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针对“文化大革命”中对广大干部进行打击和迫害的极“左”思潮，重申了党的干部政策，强调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

**6月2日、3日** 受到彭真、刘仁专案组办公室人员审问，向他们谈学习毛泽东著作体会。在回答审问人提出的林彪与高岗的关系问题时说：在东北时，林彪信任高岗，依靠高岗。东北局改组时，我是第一副书记兼第一副政委，而高岗排在我后边第四位，但林彪叫高岗主持东北局日常工作。

**7月** 子女首次获准到秦城监狱探监。通过子女得知夫人张洁清也关押在秦城监狱。

## 1973年 七十一岁

**2月28日** 受到彭真、刘仁专案组办公室人员审问。在回答同子女已谈过话时说：对他们我有信心，大的倾向还好。对毛主席，对人民要绝对相信，有这一条就行了。在回答在东北执行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的问题时说：当时东北是个打的局面，不是和平民主新阶段。

**5月20日—31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筹备召开党的十大、批林整风和一九七三年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宣布“解放”了十三名老干部。此后，中央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一批老干部陆续被“解放”。

**夏** 子女第二次获准赴秦城监狱探监。

**8月24日—2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等部分老干部被选入中央委员会，江青网罗的一伙追随者更多地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

**12月21日** 毛泽东同参加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人员谈话时问邓小平：“布加勒斯特会议你去了吧？”邓小平说：“那次我没有去，彭真去的。”毛泽东说：“彭真对于整苏修还是有功的。”并问：“现在他怎样？”



## 1974年 七十二岁

夏 子女第三次获准赴秦城监狱探监。

本年 在狱中作诗一首：“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万感交集，无处话衷肠。纵使相逢恐难识，面苍苍，鬓如霜。夜来梦还台基厂，儿女愕，喜泪望。怨愤交织，话是非兴亡。料得女魅不长久，东方亮，见短长。”

## 1975年 七十三岁

1月13日—17日 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设想。

5月19日 根据中共中央三月八日批准发出的《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中“对于各类审查对象，均采取审查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除极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人均予以释放，并妥善安置”的意见，从秦城监狱中被释放。二十日，夫人张洁清也从秦城监狱中被释放。在秦城监狱九年中，阅读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著作以及有关哲学、历史、自然科学等方面的书籍。由于狱中没有笔，用牙粉纸袋及画报撕成小条，用米饭或馒头在字里行间中粘贴标出重点。经粘贴重点的书有三十四本。在狱中用英语字典读英文版《毛主席语录》，学习英文。为了防止失语，每天大声念英文和唱京戏。为了防止双腿僵硬，每天在十平方米左右的小屋中踱步。注重所住监室的清洁卫生，坚持锻炼身体。

5月21日 被押解到陕西省商洛，安排在商洛地区干休所监视居住。二十二日，夫人张洁清也被押解到商洛，住在一起。随后几天，子女全部来到商洛，全家团聚。

△ 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写出《关于叛徒、反党分子彭真的审查结论》，利用捏造、拼凑的所谓“证据”，诬指“彭真是一个叛徒、反党分子”，并提出“清除出党”。六月十

七日，中央专案组第一办公室派唐胜玉到商洛，向彭真宣布审查结论。彭真看后，当即表示不接受这一“结论”。并在“结论”最后一页写了自己的意见，提出：“情况与事实有重大出入。我请求进一步核实。”此后，中央对这一审查“结论”没有审批。六月十七日，唐胜玉还向张洁清宣布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写的《关于叛徒张洁清的审查结论》。“结论”利用捏造、拼凑的所谓“证据”，将张洁清定为“叛徒”。张洁清看后写了意见：“不能接受，保留意见，请求复查。”随后向中央写了申诉材料。

**5月24日** 作诗一首：“千金含笑，母酣眠，心情愉快谢老顽；但愿阖家通马列，世世代代用不完。望儿工余更抖擞，开卷有益自古然；少壮及早惜寸阴，不学无术老更难。”

**6月19日** 针对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的《关于叛徒、反党分子彭真的审查结论》给毛泽东、中共中央写信。信中明确提出“结论”与“事实有重大出入，因为事关我的政治生命存亡，我不得不扼要向主席、中央据实报告和提出申诉”。信中重点讲了一九二九年在天津被捕判刑到一九三五年刑满释放出狱的有关情节，郑重声明“我在那次被捕期间，没有任何党员、干部，因我的口供被捕，没有党的任何机关，因为我的口供遭受破坏”，提出“诚挚地请求党把我留在党内”。同日，张洁清写了向中央的申诉信。

**6月** 看了“审查结论”后，曾同儿女到商县城外旷野处谈话。谈话后给儿女写信，信中说：“一、解除了监护，恢复了自由，在此休养。有几句话，再向你们讲讲。二、关于我的问题，请你们相信党，听党的。此外，不必问，不必管。三、我今后，会严格按照毛主席为首的党的决定、指示行动——这就是我的晚节。希望你们放心和鞭策。四、希望你们按照毛主

---

席、中央的指示，好好抓紧政治理论学习——‘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革命运动’，要切实执行列宁和毛主席的话，它是历史经验的总结。要‘实事求是，不尚空谈’，要言行一致。希望我们彼此都天天进步，不断革命。”

## 1976年 七十四岁

**9月9日** 毛泽东于零点十分在北京逝世。

**9月10日** 凌晨，同张洁清联名给中共中央、华国锋〔1〕写信，提出向毛泽东主席遗容告别。信中说：“惊悉我们伟大的敬爱的领袖和导师抛弃我们逝世了，不胜哀悼沉痛万分！谨向中央全体领导人和主席全家表示深切的慰问！主席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最英明、最有经验、最有远见的革命舵手。这是我国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的不可估量的和无法弥补的损失，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不可估量的和无法弥补的损失。时间愈久，将愈突出地显示出毛泽东思想和他一生事业的伟大和光辉，日益成为更伟大的鼓舞我国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革命战斗的动力和精神力量。他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现在，距惊悉主席逝世已快一天了，我却一直还像在主席面前聆受着他的教诲，万感交集，彻夜不能成寐。现在我以无论如何不能抑制的悲痛心情和强烈的愿望，希望中央允许我们向主席遗容告别！”同日，向干休所负责人提出要回北京向毛主席遗体告别。

**9月13日** 干休所负责人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电话告商洛地委的意见，当面拒绝了彭真要回北京向毛主席遗体告别的请求。

---

〔1〕 华国锋，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9月14日** 中共商洛地委向陕西省委报告，说彭真要去北京向毛主席遗体告别遭到拒绝后，态度很坏，应组织干休所全体同志进行批判。十月十三日，省委组织部电话答复商洛地委：“省委研究，同意在干休所范围内组织干部对彭真进行批判。”

**10月6日** 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对王洪文、张春桥<sup>〔1〕</sup>、江青、姚文元<sup>〔2〕</sup>实行隔离审查。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紧急会议，通报了对王、张、江、姚的处理情况，得到政治局会议的一致赞同。会议还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

**12月2日** 因给中央写信要求到北京向毛泽东遗体告别，在商洛地区干休所遭到批判。

**本年至1977年12月** 阅读郭沫若、范文澜等的历史著作，写出约十万字的《读史笔记》，提出“西周以来，中国就已进入封建社会”，“不能因为封建社会，特别是初期还存在着奴隶社会残余，还存在着所谓‘公、私奴隶’（如王莽时期还颁布过禁止买卖奴隶的命令），就认为是奴隶社会。”

---

〔1〕 王洪文，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2〕 姚文元，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宣传组副组长。

## 1977年 七十五岁

3月19日 给华国锋并中共中央写出长达一万四千余字的申诉信，祝贺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并以“我不是叛徒”、“我不是反党分子”为题，详细申诉、批驳了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关于叛徒、反党分子彭真的审查结论》所强加的罪名。关于所谓叛徒问题，申诉信说：“一九二九年和我同时被捕的几十个政治犯中有当时顺直前省委和现任省委干部。其中有党的六届中委现任省委书记、秘书长、总交通等。总交通已叛变。党的组织继续遭受破坏，大批干部遭受牺牲的危险性很大。在这样紧迫的情势下，我和同案的几个主要负责人伺隙串供，为了缩小牺牲范围，决心牺牲已遭受敌特、叛徒严重破坏，敌特早已知道的前任省委，即我曾任组织部长的已被停止职务的那任省委。把一切都推到前省委，即推到我和郭宗鉴（已被判死刑）身上，以掩护保存被捕的现任省委负责人和党员干部。结果现任六届中委省委书记卢福坦、秘书长王奇岳等三分之一党员干部只判了十一个月短期徒刑即刑满无条件释放。只有九人包括我，判了九年徒刑，是当时敌统治者法定的最重刑。后国民党全国大赦，一律减刑三分之一，改判为刑期六年。我一九三五年刑满无条件释放，未履行任何手续。狱中我长期担任党支部书记。”关于所谓反党问题，申诉信说：“说我一九六一年曾布置项子明、邓拓等人秘密检查中央文件，制造反党材料，这不符合实际情况。我曾让北京

市委办公厅主任项子明负责查对中央各系统那几年下达的和北京市委有关的指示，准备在全面检查总结北京市那几年工作时作参考。”“说我一九六六年二月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等同志私自炮制五人小组汇报提纲，不符合事实。它是除周扬外五人小组开会讨论了当前学术问题以后，秀才们在钓鱼台起草的，我修改后即印发了五人小组成员审阅。五人小组向毛主席汇报时，五人小组成员亦都参加了的。”“我并没有背着五人小组成员进行什么反党阴谋活动。”申诉信最后说：“我深感‘结论’的实事求是精神不足，而主观主义地‘欲加之罪’从政治上扼杀我的决心则有余。对于这样的‘结论’，我是不能接受，也不应当接受的。因为它不仅对于我个人是政治上的诬陷迫害，而且是对于毛主席亲手缔造、培养的党的原则和优良传统的背弃。我入党以来一直为党的事业奋斗的政治生命，决不能忍受这样的‘莫须有’的罪名来扼杀。”“我自从因为林彪诬蔑我有‘彭、陆、罗、杨反党阴谋集团’表示抗议，请求中央审查和接着不久‘中央专委’即开始进行审查以来，已经在很不平常的生活中度过了近十年了。此中的苦况和心情，是用不着赘述的。因为当时毛主席在中央‘杭州会议’上有‘不要紧张，帮助你’、‘事情总是可以审查清楚的’的教导和中央其他一些领导同志的马列主义的原则性态度，使我始终坚信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现在以华主席为首的中央，始终必能正确解决我的问题，才能忍痛支持、等待了近十年。可是人生并没有多少个十年，尤其是现在的我，有生余年已经有限了！我恳切地希望以华主席为首的中央在我生前予以平反！”同日，张洁清也向中共中央写出申诉信。

**7月16日—21日** 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



议；关于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的决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关于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8月12日—1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总结了同“四人帮”的斗争，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的根本任务。这次大会没有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十九日，举行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

**8月22日** 给华国锋并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写信，再次申诉“我不是反党分子”、“我不是叛徒”的问题，并“控诉林彪、陈伯达、江青对我进行的诬陷、迫害”。在信中最后说：“人生并没有多少个十年，尤其是我，有生余年已经很有限了！”“我入党以来五十几年始终如一地为党的事业奋斗的政治生命就这样被扼杀吗？想到这里真是万感交集！现在我恳切地请求主席、副主席能于百忙中拨冗直接过问处理我的问题，恳切地期望在我生前给予平反。”

**12月29日** 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写出《关于张洁清同志问题的审查结论》，认为“张洁清被捕后，未发现她有什么问题。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补发受审期间停发的工资，由陕西省委分配工作。”一九七八年六月九日，张洁清被任命为陕西省商洛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七日，张洁清被任命为中共商洛地委委员、常委。

## 1978年 七十六岁

**2月26日—3月5日** 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提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任务。大会选举叶剑英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继续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

**7月1日** 给叶剑英写信。信中主要申诉“关于一九六六年中央‘杭州会议’时，林彪、江青（她是在会外）、陈伯达狼狈为奸借机开始对我下毒手的情形”。信中在回顾了杭州会议情况后说：杭州会议“是让我从头参加到尾的”，“毛主席和中央其他一些领导同志，对我的错误是采取批评教育、治病救人的态度，并不是一棍子把我打死，把我当做专政对象。林彪、江青、陈伯达一伙的态度则显然不同。他们是借机在政治上对我下毒手，疯狂地诬陷迫害，妄图用莫须有的罪名把我诬陷为党的敌人，置我于死地。”

**7月** 胡耀邦<sup>〔1〕</sup>在家中接待彭真子女，听取他们对彭真问题的申诉。

**11月10日—12月15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原定议题，一是讨论农业问题；二是商定一九七九年、一九八〇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经济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会前，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央政

---

〔1〕 胡耀邦，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会议先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从一九七九年起的，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会议开始后，陈云在分组讨论中指出：发展安定团结是保证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的关键。为此，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提出：要肯定天安门事件是“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要肯定彭德怀对革命的贡献，要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件，为陶铸等人的问题平反，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定为“叛徒”的人平反，要批判康生，等等。会议讨论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适应工作重点转移的需要、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内民主生活等重大问题，批评了中央在领导工作中的一些失误。十一月二十五日，华国锋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代表中央政治局讲话，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和涉及党的领导人的一些已经查明的重大错案平反。十二月十三日，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分别在全会上讲话。十五日，会议结束。这次会议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

**11月27日** 邓小平在听取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时，针对华东组提出一九六六年夏康生诬陷彭真、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的问题时，指出：“我那时就说，这个事不可能。当时我是总书记，但调两个团到北京也不行。那时规定，调一个连，归大军区管，调一个营，归军委、总参谋部管。”

**12月7日** 彭真子女给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写信，要求将父亲彭真、母亲张洁清接回北京检查身体。十二月十六日，胡耀邦将信转送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并签署意见：“我赞成把他接回北京

来。”华国锋、汪东兴批示“同意”，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圈阅。根据中央领导批示，胡耀邦安排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局负责彭真、张洁清回京后的生活、医疗问题，审干局办理复查问题。

**12月13日**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讲话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12月18日—22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指出：现在就应当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指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全会作出了关于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决策和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全会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一些重要领导人所作的错误结论，肯

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全会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会议公报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全会根据党的历史的经验教训，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1〕、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2〕等为中央委员；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陈云为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为副书记。这次全会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

---

〔1〕 邓颖超，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

〔2〕 黄克诚，时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全国政协常委。宋任穷，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胡乔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起，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习仲勋，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广州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织路线，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并开始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12月25日** 根据中共中央通知，中央组织部派干部到西安，会同中共陕西省委有关人员将彭真全家从商县接到西安，准备接回北京。

**12月28日** 和家人从西安乘中国民航二一七次航班回到北京。在首都机场，受到三百多人的欢迎。由中央组织部安排到前门饭店居住。

**12月31日—1979年1月25日** 住北京医院检查身体和治疗。